

#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原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2014/12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第30卷 第12期 (总第151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程建军

副主任 刘守旗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坚勤 方露娜 冯保善

刘守旗 张勤 张广才

沈仁国 周韵 周成平

黄正平 黄光耀 程建军

蔡飞 管向群

主编 程建军

执行主编 吴春浩

#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

## 【教育思想研究】

胡瑗教育思想的当下继承与应用

——以江苏省泰州中学为例 ..... 张树俊(1)

---

## 【德育与心育】

大学生理性爱国问题的研究与反思 ..... 戴韶华 段文忠(5)

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的发展性评价与矫正 ..... 李贵平(11)

“新媒体一代”闲暇生活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 丁炫凯(15)

初中生羞怯、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关系 ..... 张露 丁芳 曹令敏(19)

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策略 ..... 李玲玉(26)

概念组合的具身观:具身概念组合理论述评 ..... 张师辉(30)

---

## 【核心价值观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论析 ..... 李东晓(3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 印亚军 徐惠忠(42)

---

## 【政治学研究】

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之研究 ..... 董鹏 黄志红(46)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初探 ..... 潘国红(52)

---

## 【历史与经济研究】

近30年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综述 ..... 王倩雯 彭校(58)

---

---

---

基于 FDI 产业集群的溢出效应分析

——来自江苏苏州的实证 ..... 吉丹俊(63)

---

**【中国古代文学与教学研究】**

叶燮的诗学观:“物我相合而为诗” ..... 祁志祥(69)

宋代奏议集序跋之书写特色及心理期待 ..... 梅 华(74)

晚明周履靖“和陶诗”论略 ..... 邓富华(79)

《安禄山事迹》的叙事艺术

——兼与正史比较 ..... 凌 帆 王立增(84)

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应“知识、情商、能力”兼顾

——以“明代诗文”教学为例 ..... 徐 燕(95)

---

**【外国文学研究】**

《纯真年代》中华顿对男性神话的解构 ..... 孙晓明 姜礼福(100)

移置、流放、错位:“间质空间”视域下的《祖先游戏》 ..... 鲁晓川 胡 戈(104)

E.B.怀特的幻想世界

——以《夏洛的网》为例 ..... 陆 新(108)

---

**【外语教学研究】**

《西游记》第 59 回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 王 烨 刘宗敏(114)

“去英语化”时代高校英语教师出路探析 ..... 王春梅(120)

## Main Contents

-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Hu Yuan's Educational Thoughts  
——A Case Study of Taizhou High school in Jiangsu Province ..... ZHANG Shu-jun( 1 )
- Research and Reflections on College Students' Rational Patriotism  
..... DAI Shao-hua DUAN Wen-zhong( 5 )
-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n Leisure Life of "The New Media Generation"  
..... DING Xuan-kai( 15 )
-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hyness, Anxiety and Creative Science Question-Asking Abil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ZHANG Lu DING Fang CAO Ling-min( 19 )
- Factors Affecting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Learning and Countermeasures ..... LI Lin-yu( 26 )
- Embodied Cognition of Conceptual Combinat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 ZHANG Shi-hui( 30 )
- The Change of China's Rural Power Structure since 1949 ..... DONG Peng HUANG Zhi-hong( 46 )
-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for Nearly 30 Years  
..... WANG Qian-wen PENG Xiao( 58 )
- Ye Xie's Poetic Views: "Harmony between Object and Subject Makes Poems Poetic"  
..... QI Zhi-xiang( 69 )
-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Anticipation on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Corpuses of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 MEI Hua( 74 )
- On He Tao Poems by Zhou Lvjing in Late Ming Dynasty ..... DENG Fu-hua( 79 )
- The Deconstruction of Male Mythology in The Age of Innocence  
..... SUN Xiao-ming JIANG Li-fu(100)
- The Fantasy World Created by E.B. White  
——A Case Study of Charlotte's Web ..... LU Xin(108)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Journey to the West  
..... WANG Ye LIU Zong-min(114)
-



# 胡瑗教育思想的当下继承与应用<sup>\*</sup>

——以江苏省泰州中学为例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 江苏泰州 225300)

**[摘要]** 胡瑗教育思想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在胡瑗讲学旧址安定书院发展起来的泰州中学, 发扬胡瑗精神, 继承和实践胡瑗的教育思想, 确立培养明理达用之才的办学理念, 注重养成教育, 倡导有效教育, 注重素质教育。同时, 泰州中学把办好负责任的教育作为学校教育使命, 强调教育的责任担当, 强调对师生的关爱, 强调教育的精细管理。此外, 泰州中学发扬胡瑗的改革精神, 探索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探索新型的人才培养机制, 探索学生的科技创新驱动机制, 有效推进了学校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 胡瑗; 教育思想; 当下实践; 泰州中学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01-04

江苏省泰州中学是1902年在胡瑗讲学旧址安定书院发展起来的百年名校。<sup>①</sup>自安定书院发展为泰州学堂, 到泰州中学堂、私立淮东公学、江苏省立代用中学、私立时敏中学, 到江苏省泰州中学, 一直注重继承和实践胡瑗的教育思想。近年来, 泰州中学发扬胡瑗精神, 勇于改革创新, 并将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发展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明理达用教育理念。在明理达用的教育理念指导下, 泰州中学注重学以致用, 倡导负责任的教育, 促进了教育的转型升级,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 一、办学理念——培养明理达用之才

胡瑗最核心的教育思想是倡导明体达用之学。可以说明体达用是胡瑗教育思想的核心。在明体达用思想指导下, 胡瑗在苏州、湖州两地推进教学改革, 创造了名满神州的“苏湖教法”。范仲淹称胡瑗为“孔孟衣钵, 苏湖领袖”。司马光颂之为“苏湖之教, 造士有术”。<sup>[1](P. 124, P. 126)</sup>朱熹把古代

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 编成《小学》一书, 以作小学儿童的必读之物, 并称胡瑗的“苏湖教法”可作百世之法。明体达用是胡瑗的办学理念。所谓“明体”, 就是明圣人之体, 即教学生以圣人之道, 使其懂得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所谓“达用”, 就是在“明”圣人之体的基础上, 把所学儒家经义和才能通达于实际, 运用于实践。胡瑗的这一思想随着安定书院的演化, 不仅得到传承, 而且在传承中得到了光大与发展。而今, 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在泰州中学已经演化为“明理达用”, 且成为泰州中学新的教育理念, 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明理重在养成。泰州中学将“明理达用”作为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校训, 与胡瑗的“明体达用”是相通的。胡瑗把“明体”视作“为政教育之本”, <sup>[1](P. 150)</sup>目的就是要以圣人之道教授学生, 使学生懂得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当然, 由于胡瑗是解易之人, 他的“明体”除了强调

\* [基金项目] 2013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胡瑗教育思想与当下继承应用”(项目编号:13SXH-085)。

[收稿日期] 2014-11-07

[作者简介] 张树俊, 男, 江苏姜堰人,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泰州市行政学院副院长, 《泰州论坛》主编, 教授。

① 胡瑗(993—1059), 字翼之, 泰州海陵人, 因祖居安定堡而世称安定先生。胡瑗是我国宋代最有成就的教育家, 也是宋代理学先驱, 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

要学好传统儒学之外,包括明易经本体,其中包含着对专业知识和济世技能学习的要求,而泰州中学所提倡的“明理”更多强调的是做事、做人的道理。但从本质上来说,“明理”与“明体”在“成人”的要求上是一致的,都要求学生好好学习,懂得道理。所以不管是明体达用还是明理达用,关注的都是成人之道。明理达用与我国历代思想家、教育家的观点基本一致。比如清代的郑板桥曾经批评有些人说:“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走错了路,越来越作坏,总没个好结果。”他认为“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sup>[2](P.19)</sup>成才首先要成人。“明理”的核心要求就是明做人之理,明做事之理,明学问之理。所以说泰州中学的“明理达用”既是对胡瑗思想的继承,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吸纳、传承与发展。

达用重在实学。胡瑗所说的“达用”核心要求是把所学知识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使之“大则可以论道经邦,小可以作而行事”,成为“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培养能报效国家的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sup>[1](P.197)</sup>换句话说,教育仅靠“明体”仍然不够,只有将“明体”与“达用”统一起来,才能贡献于社会。从学校培养的目标来看,胡瑗强调的是学校应着力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也是其“达用”的目标。由此看来,泰州中学与胡瑗的“达用”思想也是一致的。当然,胡瑗讲的“达用”与泰州中学讲的达用目标有差别。胡瑗的“达用”是达济世之用,其分斋教学重在为国家培养专门管理人才。而泰州中学是要使学生在“明理”的基础上具有宽广的胸怀、大家的气质,做到学以致用,成合格之才,成顶用之才,成栋梁之才。尤其是泰州中学立足于培养“领袖风范,领军人物”,这就大大超越了胡瑗的专门人才的“达用”要求,大有王良“奋臂托天而起”,“布尔日月列宿秩序”的“见世”救民之追求。<sup>[3](P.68)</sup>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泰州中学倡导有效教育,即“有效育人、有效教学、有效管理”。这种“有效”强调的也是一个“实”字。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从泰州中学已经走出了五万余名校友,其中有国家领袖、两院院士、先进楷模以及科技、教育、企业、军事、外交、体艺等各界翘楚,这正是泰州中学一贯推行有效教育的结果。

育才重在素质。胡瑗关注学生知识的学

习,也关注学生素质的提高。在这方面他有不少成功的做法。比如,胡瑗重视课堂教学的同时,重视课外教学。他曾多次带领学生游历名山大川,以增长学生见闻,陶冶学生性情。再如,他善于联系时事政治,就某一专题,提出问题让学生广泛进行讨论。他重视审美教育,每次考试后,总要带领学生一起唱诗奏乐。此外,胡瑗还经常组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应该说,胡瑗的这些做法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了人的素质培训问题。泰州中学为了培养“明理达用”之才,也是始终把素质教育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比如就知识学习而言,他们更加重视的是学习素养,努力培养学生好学、善思、致用的学风。泰州中学所开展的道德意识、学习意识、规范意识、责任意识、生存意识、俭朴意识、审美意识、公民意识、感恩意识和健康意识十大主题教育活动,就是为了提高学生做人、做事和生存生活技能等素养。

## 二、教育使命——办好负责任的教育

胡瑗说过:“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sup>[1](P.197)</sup>他实际上强调了学校对教化与治理天下的一种责任。胡瑗这种责任意识在泰州中学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胡锦涛在建校110周年参观母校泰州中学时说:“中学时期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对人的一生影响深远。”奥巴马也说过:“高中教育关乎国家的安全。”<sup>[4]</sup>所以中学责任重大。时任校长蒋建华的理解是:“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首先要从负责任的教育开始。人无精神不立,只有负责任,才能立于天地间。”<sup>[5]</sup>

负责任教育重在责任担当。要培养负责任的学生,最终必须依靠负责任的校长和负责任的教师。胡瑗认为,天下之兴在于师,师立则国立,师兴则国兴。胡瑗这里所说的师兴不只是教师的数量多少,更多强调的是师资质量。胡瑗对做教师有很高的要求,他认为教师既要具有性明、志通、德隆三个方面的品质,也要有“探天下之术”。<sup>[6]</sup>否则,就会误人子弟,也就是对学生不负责任。为此,泰州中学在继承胡瑗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办负责任的教育,办负责任的学校”的思想主张。时任校长蒋建华认为,负责任的国家需要负责任的教育;要办好负责任的教育,必须依靠负责任的学校。作为学校来说,负责任就是对学生负责任,对老师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教师负

责任,就是要说负责任的话,做负责任的事,当负责任的人。当然,学校的这种负责是多方面的,比如学校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式的、以牺牲师生健康为代价换取所谓“高质量”的做法,力求做到负担适度,同时提出“三要三也要”的口号,即“要工作也要家庭、要学生也要孩子、要质量也要身体”。学校对学生负责任,不仅是对其学习成绩负责任,而且对其做人、品行修养及个性特长培养负责任,不仅是对学生现在负责,还要对其未来的发展负责任。

负责任教育重在关爱师生。胡瑗认为,仅以柔言求人并不能感人,最起码“不能感人以至诚”,所以在学校管理问题上他强调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他在苏、湖执教期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对学生提出了严格要求,让学生“所据而据”。但胡瑗对学生的严与对学生的爱是统一的。他在严的同时,提出了“安人”之法。比如在劝人方面,不能骄傲,要善于用平等友善的态度进行教学和交谈;在待人方面,要有和气之辞、安人之色。再比如他常教育学生在饭后及据案久坐后,要避免伤气血流通,多参加“射箭、投壶、游息”活动,调节身心状态,做到劳逸结合。胡瑗这些做法体现的就是对学生的关爱。泰州中学继承了这一传统,把“严”与“爱”统一起来。学校积极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提出了“不让学生吃不该吃的苦,不让学生享不该享的福”的口号,就是“严”与“爱”的统一。泰州中学紧扣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尊重每一位学生,激活每一位学生,成就每一位学生。学校设立爱心救助基金帮扶困难学生,家庭特困生全免除学杂费、生活费,等等。泰州中学既关爱学生,也关爱老师。例如,早读值班老师及管理人员可享受免费早餐;教师生病,校领导看望问候;教师生日,学校不忘送上一份生日贺卡和生日蛋糕,等等。

负责任教育重在精细管理。应该说,甄别人物、因材施教是胡瑗的一大特点。他在教学中,十分注重了解学生的个性和才能,依据各人的志趣和特长,分成相应的组互相进行讲习,使每个人都能发展专长,学有所成。从教育管理的角度理解,甄别人物、因材施教本身也是对学生进行精细管理的基础。近年来,为了让人人成才、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泰州中学以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负责为前提,在教育上强

调“厚重、灵动、精致”的教风,做到尊重每一位学生、激活每一位学生、成就每一位学生;在管理上强调精心、精细、精致“三精”原则。要求“为人师者,少一分抱怨,多一分实干;少一分浮躁,多一分宁静;少一分粗糙,多一分精细”。真正做到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关注所有学生,做到全面育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 三、转型升级——寻求最佳结合点

成功的教育在于能够很好地继承优秀的教育文化传统,也在于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近年来,泰州中学着眼于学校教育的转型升级,有效地将学校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对传统文化的吸纳、传承基础上,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围绕“明理达用”的办学理念和办负责任教育的要求,推进特色高中建设,全方位地构建了“思想育人、道德育人、知识育人、文化育人、环境育人、活动育人”的新型教育体系,实现了传统高中向现代高中转型升级。

探索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办好负责任的教育关键在教师。胡瑗把教育当作“使天下之人物自然感日月之照临”的事业,教师须用自己的道德和学识教育学生、感染学生。泰州中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名语文特级教师、语文教育家、原副校长洪宗礼勉励全体教师“做一个虔诚的教育者”。一方面发扬“追求卓越、自强不息”的泰中精神,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通过政策导向、培训引领、考核激励,不断催生教师成长内在驱动力,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素质过硬、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泰州中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已经逐步形成了“和谐、求实、进取”的校风和“忠诚、敬业、创新”的教风。全校已有特级教师八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一人。一批老师获得“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首批培养对象、江苏省先进教育工作者、泰州市师德模范、泰州市及市直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教坛新秀等各种荣誉称号。

探索新型的人才培养机制。当年胡瑗进行教学改革,其贡献不仅在于他开分斋教学之先河,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勇于创造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的改革精神影响了当代与后世。泰州中学传承了这种精神。客观地说,培养“明理达用”之才,办好负责任教育,需要强烈的责任担当,也需要一流的教学设施、一流的课程改革。近年来,泰州中学

在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的整体框架下,进一步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让那些综合素质更加全面、学科特长更加突出的优秀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著名高校学习。目前,泰州中学教育教学设施齐全,拥有高档的多媒体教学设施、语音实验室、电子阅览室、闭路电视、校园网、游泳馆、影剧院、塑胶跑道田径场和高标准学生公寓等。同时,泰州中学还确立了“文化立校、文化育人”的指导思想,摒弃了“有知识、无文化”的低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开办校园“梅苑之声”广播台,创建梅苑文学社、《泰州中学报》,并通过成立多种类型的活动兴趣小组,开设选修课程,倡导研究性学习,组织综合社会实践活动等各种形式,创建内涵丰富的育人环境。在办学特色方面,注意向精品化、多元化、现代化发展,先后开办雅思英语班、苏教国际班、韩国留学生班等班型。此外,他们加强与美、澳、日、韩、英等国的教育联系,并与澳大利亚特拉蕾根中学结为友好学校,进行师生互访交流活动。

探索学生科技创新驱动机制。胡瑗的主要哲学思想是大易之道,而其大易之道的本质内涵就是随事物发展的变化而不断革新。当前处于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都在转型升级,社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对时代负责,泰州中学注重观念更新,并把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创造能力与创新精神作为新的教育要求。正如泰州中学蒋校长所说,责任教育的核心价值指向学生思维、品格、能力、素养的发展和提升,所以中学应尽力打造素质教育品牌,注重培养实践与创新精神。近年来,泰州中学启动了素质教育“个十百千万工程”,在全国率先发放了学生创新作业本。同时,泰州中学突出科技创新教育,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大赛,让学生获得展示自己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平台。据了解,自2006年起,泰州中学每年都举办“校园科技文化节”。其间,邀请相关专家做科普报告,聘请校外辅导员指导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这不仅培养和提升了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而且促进了学生的思维创新。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训练,创新成果也不断涌现。比如,为解决洪灾频发引起的救灾困难问题,学生发明了一种

“防洪救灾船”,拿到了国家发明专利。汶川地震发生后,学生们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榫卯结构”找到了突破口,用“榫卯结构”发明的“抗震砖”,以及用“抗震砖”组合而成的“抗震房”,分别被国家授予“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再如,在第三届“尚德电力杯”创意大赛期间,学生们创作完成的《新型太阳能绿色环保节水坐便器》《3“S”》《便携式足球运动鞋》《太阳能智能眼镜》《阳光动力直升机》等设计方案,分别获得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著作权证书。为了鼓励学生创新,泰州中学还成立了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了洪宗礼奖教奖学基金、优秀生奖学金、lg电子奖学金,用以表彰品学兼优的学生,激励学生勇于竞争、敢于创新的积极性。

总之,胡瑗教育思想是教育的宝贵资源,胡瑗离我们虽然相隔一千多年,但他的教育思想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并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事实上,任何一所学校发展总是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传承、创造中不断前行,泰州中学的发展得益于胡瑗这一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教育资源。当然,胡瑗教育思想在泰州的学校普遍受到重视与应用,而由于泰州中学是在胡瑗讲学旧址发展起来的学校,所以其对胡瑗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应用比其他学校更为明显。

#### [ 参 考 文 献 ]

- [1]徐建平. 胡瑗[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 [2]郑燮. 郑板桥文集[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
- [3]陈祝生主编. 王心斋全集[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4]陈泰. 省泰中与我[DB/OL]. [2012-07-22] <http://whllt.taizhou.gov.cn/thread-644035-1-1.html>.
- [5]佚名. 教育的大情怀——江苏省泰州中学的教育[DB/OL]. [2012-09-0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fc33cc01012exa.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fc33cc01012exa.html).
- [6]胡瑗. 洪范口义[M].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师 语)

# 大学生理性爱国问题的研究与反思<sup>\*</sup>

戴韶华 段文忠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少年,对这个群体的爱国表现需要从国际环境、国家发展阶段和他们的心理、生理、思想等基本情况的互动中才能有清晰的了解。大学生不能只作为被动接受教育的一个群体,相对应的国家也要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强化自身的理性和责任。

**[关键词]** 大学生; 爱国问题; 理性与非理性; 反思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05-06

## 一、青年大学生的角色地位、心理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从理论上来看,“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学生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依附于某个大的阶级而存在的,通常将学生阶层划为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很少把学生作为一种历史活动的主体加以研究。”<sup>[1](P.3)</sup>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变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科举制度的没落、废除,新式学堂的出现,使得“学生”的身份得到社会的认可,并成为一种新的“知识阶级”区分旧的读书人。<sup>[2]</sup>尽管如此,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怀和责任担当,并不惜为此舍生取义的精神并没有中断。近代以来,虽然国民尊崇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但这种传统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发挥了知识、信息、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优势,较早地具备了民族自觉和国家意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在革命战争年代,学生最容易在爱国热情的

鼓动下成为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把国家的忧患和人民的觉醒、动员联系起来。他们常常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感觉敏锐,思想觉悟较高,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具有高度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秉持了中国自古以来士大夫救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最能够认识到个人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并且具有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勇敢的革命精神。正如郁达夫所说:青年学生是“血气方刚,没有同污恶的社会接触过,家累全无,只在向未来着眼而并不顾到左右过去。在中国社会里,只有他们能够前进、奋斗、牺牲;只有他们是纯洁、勇敢,没有其他的目的,而只在为正义呼号的团体。”<sup>[3](P.59)</sup>因此,“在社会文化变革中,青年学生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然而,青年学生毕竟只是一种身份而非一种职业。它只是人生的一个短暂阶段,是处在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边缘性群体,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它既缺乏经济基础,政治角色也难以定位。由于具有这些难以逾越的局限,青年学生运动一般难以持久。尽管他们很容易集结成军,容易造成声势,但如果不能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与支持,便难免只能维持‘五分钟的热度。’”<sup>[4](PP.43-44)</sup>

\*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联 2013 年度研究课题“理性爱国研究——对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反思”(项目编号: 2013B002)。

[收稿日期] 2014-09-02

[作者简介] 戴韶华,男,山东聊城人,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段文忠,男,甘肃镇原人,浙江警官职业学院讲师。

然而,在现实的革命历史进程中,青年学生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他们的这些弱点,但社会自身发展中的非理性如果与青年学生的弱点相结合,会发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在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进程中,民众的觉悟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学生群体所具有的知识、眼光和责任使他们在国家命运与个人安危的关系上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尽管有阶级地位和年龄、身份、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弱点,但学生在全社会爱国热情的发动中,使整个社会具有了生机和活力。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青年学生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sup>[5](P.641)</sup>的确,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起到了领导和带头作用。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应激性”的民族主义,对外反抗外敌入侵和对内激烈的反传统构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也常常会形成偏激的见解和民族虚无主义,并在革命的名义下走向极端,青年学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社会特点的影响。除了年龄原因之外,如果追溯思想和社会根源的话,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惯性,或许是中国革命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过大,人民共和国胜利后又面临险恶的国际政治环境,使人养成了“破坏性思维”与“运动意识”。加上我们还有一种“矫枉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的哲学,结果片面强调“不破不立”的斗争哲学。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追溯或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创造者,但多多少少,我们在思想、情感深处是受到了他们的潜在影响。<sup>[6](P.115)</sup>

从文化和体制的角度来看,建国以后,由于传统的封建意识的延续与国家体制、法治的缺陷,把对祖国的忠诚变成对领袖的极端个人崇拜,加上教育中健康人格培养的不足,青年学生在政治运动中有较深的参与,并出现了极端的事件。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单凭一腔热情,并不总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同时,政治上的幼稚和传统思想观念的缺陷在他们身上也得到了表现。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对历史的反思和传统的批判,在表达个人理想和忧国情怀的同时多少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90年代大学生与具有高涨理想主义情怀的80年代大学生不同,他们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对80年代思想反思的基

础上,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对于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不利言行,与百年屈辱的历史联系起来,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但也出现了偏狭的态度和行为。大学生以致更多青年人的思维、行为受制于中西关系矛盾交织下的悖论,既有盲从和反叛,又有盲目自大和自卑,民族虚无主义、自由化思潮以及激烈的反传统或反西方,这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国家建构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和激烈的民族主义相比,有人对爱国表现出一种冷漠,也是非理性的表现。“人们往往把过激的爱国行为视为理性缺失的表现,殊不知,对祖国冷漠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非理性爱国情绪。这种冷漠主要表现为‘口头爱国主义’。”<sup>[7]</sup>

可以说,当今大学生身上既有古代士人的忧国济世的传统,又有近代以来革命传统对民族国家命运的高度关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又因为自身的身份、地位、年龄、经验、学识等原因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态度和行为,甚至是极端的行为。这既有他们自身的原因,又有国家、时代的原因。在当今世界格局和国家、社会又面临新的大变局的形势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发挥大学生的社会引导作用,促进和推动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也需要对大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环境。这对大学生自身的人生定位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考验,大学生应该站在更高远的角度,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规划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道路,做到方向、责任和利益的统一。

## 二、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分析

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自身都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爱国主义最主要的表现,也是最能推动国家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的,首要的就是爱国的情感和精神,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爱国还需要对大局、整体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洞察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爱国情感能够在正确、合理的方向上前进。作为大学生,其自身的社会角色和自身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发挥积极的社会影响的同时,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当前对他们来说,在爱国问题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1.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是当代中国爱国

主义的本质体现,但是要让大学生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仅仅来自灌输,实践证明这样的教育效果并不受欢迎,更主要的是通过大学生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和基本的社会逻辑的感知来认识。在没有直接的外部威胁的条件下,人们的爱国热情体现在基本的道德操守和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认同。当前,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大学生的爱国情感既有对外国的欺辱的刺激而产生的直接的民族主义感情的反映,同时还有对政府工作、传统积弊的批评,特别是社会不公、腐败现象以及高调的理论宣传与现实的差距等方面的不满。改变现状、赶超发达国家的愿望也是爱国的一种表现,从历史看,这两者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当前大学生的理性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要增强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和信心,继续深化改革;否则,就会在对党和政府、社会主义道路、祖国这几个方面的认识上出现偏差。

近年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对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以及对国家的忠诚的强调,这是增强党的合法性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爱国主义教育主要针对青年大学生这个群体,因为现实中他们在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是青年爱国主义的理性发展的重要标志。但由于部分学生对中国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缺乏充分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仅从情感角度来把握爱国主义,因此有42.8%的大学生出现认识上的误区,认为爱国主义只是一种民族情感的长期积淀,与社会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不少学生对于爱国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游离于经验认识和理性认识相融合的界面上,还停留在情感化体验或前理性体验上,……直观的成分比理性的成分所占的比重更大,还谈不上价值体系化体验。”这说明“要将爱国主义情感教育与理论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让朴素的感情升华为理想、信念的高度,才能使爱国主义植根在深厚的思想土壤之中,才能结出硕果。”<sup>[8]</sup>

只有建立在理想、信仰基础上的爱国才能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应该是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国家认同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一种认同,当前来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传统文化、历史经验以及取得了巨大

成就基础上的一种理性选择。作为大学生只有认识到这种背景,才能把个人对祖国的感情与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认识结合起来,才有更明确的目标和动力。“在今天,我们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汇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sup>[9]</sup>

## 2. 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关系

对于国家的认识,首要的是对国情的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发生在国内国外的政治变化,使得当时我们对国情教育和近现代史教育进行了特别的强调。之所以加强这两个方面的教育,最主要的是要认识到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区别,在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既要看到我们的差距,同时又要保持自信心和自尊心,过分自卑心态下的民族虚无主义与过分自傲心态下的自我中心主义都是非理性的表现,因此,国家逐步强大的过程也是逐步培养成熟的国民心态的过程。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条件下,对于西方某些人和某些国家的批评、阻挠,对于中国与某些国家有时产生的矛盾、摩擦乃至冲突,作出激烈反应固然说明大学生的爱国热情难能可贵,但要认清国家的长远利益,克服敏感和报复心态,爱国情感的表达要讲究策略,否则会陷入他国设立的“陷阱”中去。因此,爱国要服从于国家的总体战略。我国当前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处于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的关键阶段。所以,对于每一个大学生来说,要从自己当前的学习和具体事情开始做起,这样才是最现实的爱国举动。同时更重要的是从“百年耻辱”的受害者心态和弱者心态中逐步走出来,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体制也要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因为一个人只有在个人与国家、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中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行为时,只有在把爱国主义变为一种对自身与祖国利益关系的自觉而理性的认识和为祖国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才有可能有稳定的、自觉的、理性的爱国行为。”<sup>[10]</sup>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共时性因素与历史性因素,并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对国家的政策与个人的爱国激情有



更理性的认识。

### 3. 民族感情的激发与民族悲情的关系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情感的切入是认知的前提,从血缘、语言、乡土、道德、历史等方面进行教育,但情感的激发还需要凝聚到共同的方向、目标上来,形成一定的理性信念,并通过体制进行合理的表达,否则如果被利用就可能成为破坏性力量。大学生具有敏锐的社会感知,掌握一定的知识,感情丰富,但是真正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组织的支持。因此,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如何组织、引导这种情感使其沿着与国家整体利益需要的目标和方向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爱国的认知和情感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关键的一个因素。在文化上理性地看待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应该表现出一定的自信,但过分夸大自身文化的影响不利于看清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时常表现出一种自大的心态。现实中,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常常表现出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面向传统这一矛盾,同时,在文化上需要谦卑而与爱国运动中的自信、抗争也存在一定的悖论。<sup>[11](PP.248-249)</sup>当前,大学生中也存在这样的困惑。

在历史教育中最能体现对国家的感情和认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历史记忆的选择和历史记忆的政治理解。对于历史教育,一方面通过强化历史记忆不忘民族耻辱,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团结奋进的精神,而不是一味地增加民族仇恨和报复心理;另一方面对于历史问题还要进行理性的反思和分析。因此,从历史教育来看,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增加思维的自主性,这非常有利于减少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对培养学生的理性主义很重要。<sup>[12](P.161)</sup>相反,那种以爱国的名义占领道德制高点,似乎具有任意行为的道德优势,是很可怕的行为。大学生对于爱国常常有强烈的感情,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另一面,他们经常在网络上、或走上街头表达他们激烈的情绪。这使得他们常把理性的言论和政策看成是爱国的对立面,是软弱的行为,满足于口头的强硬和情绪的发泄。比如在中国与日本、美国的关系上大学生们常常有激烈的对立情绪,有时显得非常敏感,只要涉及到日本的事件,会利用网络进行无限的放大,瞬间激起民众激烈的情绪,而对那些理性的声音,进行大加抨击和声讨。“在中国这样一

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是我们的财富,但与悠久历史同步的是过多的是非和恩怨,若不能以高度的智慧来处理这种历史恩怨,则国家的发展将会陷入迷途。”<sup>[13]</sup>

因此,以爱国主义凝聚人心,以理性和法律规范行动,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 4. 爱国主义情绪的表达与民主、法治的关系

在爱国主义言行中,“有不少人并非是出于内心对民族的一种深厚的情感而产生的行为,而只是在无涉自己具体利益的情况下的一种情绪表达和宣泄。”<sup>[14]</sup>我们经常提及的五四爱国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为、激烈的反传统甚至全盘西化的言行在当时就有争论,在当今的背景下更应反思这种暴力、偏激的言论和行动。革命的思维和行为在解放后一直延续,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1968年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激烈行为。而在民主与法治有了更大发展的今天,竟然又出现了借所谓的爱国行为而砸自己同胞的车甚至致人死亡的惨剧。当年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这样理性的思考应该成为今天效法的榜样。另外,我们也要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抗议活动的法治背景以及在社会中的作用与我们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别。

现实中,我们有时会看到,即使个人的理性偏好或行动加在一起有时反而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更何况我们很多人的出发点就有点非理性。网络中这种表现尤其突出。“网民往往倾向于选择并认同与已有的价值判断相一致、用本民族语言呈现的信息——民族情结会在这种无限重复的过程中得到加深。”<sup>[15](P.67)</sup>网络中个人情绪的发泄与责任的缺失,使得民族主义的激烈情绪向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9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源自国外与中国的矛盾、摩擦、对抗,另一方面也有对社会不公等现象的表达。因此,我们需要一定的合法的表达个人情绪的体制和机制,更重要的是通过民主、法治的途径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对政府的认同。

### 三、大学生理性爱国主义的引导与发展

对于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进行积极的引导和保护,可以通过课堂和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等多种渠道和方式来进行,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考虑:

一是转变思维方式,从敌我完全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上来,转变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和目标上来。历史观上要从革命与反革命、“善善恶恶”的简单的道德判断和政治结论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走出两极化的思维方式。现实中有人用无法进行理性讨论的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动辄用爱国与卖国的区分来评价某人的言行,这样的观念和言论缺乏理性、法治、宽容的公民精神。这方面的改进需要建立在社会文明进步基础上,需要人们的思想、心态以及意识形态的协调。现实中的一些探索可以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示,如中日韩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德国、法国、波兰共同编写教科书的例子以及当前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的推行让我们看到人类在对历史记忆和敌对各方在获取共识方面的进步。<sup>[16]</sup>

二是在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上要还原历史真相,从而能够对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和变化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用道德判断、政治判断来代替历史事实、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对于历史的认识,不是简单地用政治结论来代替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性进行分析和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引导。杨奎松关于孙中山爱国问题的论述说明了要从历史人物的处境去考虑。孙中山对民族国家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如果从今天的爱国主义的理解来认识的话,也会存在一定的误解,因此,对于他们的表现,作为后人和研究者应该从“同情”或“理解”的心态去体认。<sup>[17](P.9)</sup>郑大华在关于理性爱国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所谓理性的民族主义,即从实际情况出发,理性地思考和处理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不偏不倚,避免情绪化、非理性化的行为和言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sup>[18]</sup>通过这些事例和分析,可以看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固然可敬,但理性成熟的爱国才是对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认识。这种认识的主体不但是个人、群体也包括国家,而且国家起着主导作用。通过这些讨论让学生认识到历史事实和现实问题不是简单通过爱国热情就能理解和解决的,历史和现实往往是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的,以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核心,这才是衡量爱国与否的标准。

三是培养学生健全与健康的人格,让学生能

够有充足的空间和渠道去实践自己的梦想和发挥自己的特长、爱好,不单单是通过学习成绩来作为考核学生的唯一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自主能力和个性的成长、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培养学生作为公民的理性精神和健康人格,从长远来看,这对于封建制度所造成的陈旧“国民性”改变具有推动作用。只有自主、独立、人格健全的公民才是国家强大的社会基础。

四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大学生的思想升华。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并与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相契合,形成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培养健康、理性、平和的国民心态,形成“自信民族主义”<sup>[19]</sup>。“自信的民族主义”就是新时期的爱国主义,只有当这种爱国主义融入到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中,才能真正形成民族自信和民族凝聚力。“作为价值取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爱国主义的核心。”<sup>[10]</sup>这需要继承和发挥传统的民族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把爱国主义作为最重要的起点,同时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全面完善各项事业,使得爱国思想建立在坚强的经济基础之上。

总之,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关系到国家社会的稳定和未来发展方向、前景,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爱国主义的历史性和时代性要求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无论从方式方法到理念都要有一个调整。多元化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全球化的影响,国内改革的深化,这些都要求国家首先从自身做起,调整自身的理念和角色,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文明的自觉性,尤其是把国家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到更广大的人群,使得个人能够在自身的成长发展中体会到国家的进步,这是无声的但也是最有效果的爱国主义教育,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在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中,才能真正把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理念和价值传输到大学生身上。

#### [参考文献]

- [1] 沈汉,黄凤祝. 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 [2] 罗志田. 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J]. 开放时代, 1999(4).

- [3] 郁达夫. 郁达夫全集(第7卷)[C]. 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33.
- [4] 王奇生. 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杨雄. 激情与理性——青年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思潮[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 [7] 王顺洪,王文菊. 关于理性爱国的思考[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3).
- [8] 陈春萍,乐斌辉. 当前大学生国家观调查分析[J]. 煤炭高等教育,2003(2).
- [9] 江泽民. 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1995-06-05(1).
- [10] 朱桂莲. 关于全球视域中爱国主义教育本质的思考[J]. 湖北社会科学,2008(3).
- [11] 许纪霖. 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J].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 [12] Zheng Wang.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3] 章秀英. 加强对狭隘爱国情感的理性教育[J]. 思想教育研究,2004(9).
- [14] 萧功秦. 走向成熟:当代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展望[N]. 北京青年报,1993-05-13(3).
- [15] 赵瑞琦. 网络爱国主义:源流、利弊与策论[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 [16] 刘斌. 百年宿敌修成共同历史[N]. 南方周末,2014-01-09(A5).
- [17] 杨奎松. 孙中山爱国不爱国?——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新焯《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A]. 开卷有疑[C].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 [18] 郑大华. 理性民族主义之一例:九一八事变后的天津《大公报》[J]. 浙江学刊,2009(4).
- [19] 沈大伟. 中国应构建“自信的民族主义”[N]. 参考消息,2008-05-08(8).

(责任编辑 光 翟)

# 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的发展性评价与矫正<sup>\*</sup>

李贵平

(南京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 江苏南京 211167)

**[摘要]** 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的发展性评价与矫正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转变教育观念、加强理论教育、建立长效机制和加强自身建设等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党组织、社会、学校、家庭和大学生本人五方联动、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关键词]** 入党动机; 发展性; 矫正;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C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11-04

90后大学生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复杂化、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受各种思潮和不同价值观的冲击,入党动机难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在基于主体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基础上,难免出现不正确、不成熟的入党动机。因此,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对90后大学生的入党动机进行矫正,这不仅是90后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要,更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关键之所在。

## 一、90后大学生几种典型入党动机的发展性评价

入党动机的发展性评价是基于促进大学生的自身发展,促进大学生潜能、个性、创造性的发挥,使每一个大学生具有自信心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基础上的认识和评价。

### 1. 功利型动机

功利型是指入党就是为了个人利益,如入党是为了未来能找一份好工作,是为了今后晋升的空间更大、机会更多。入党动机功利化表现的形式不完全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把入党作为捞取个人好处的敲门砖。这种入党动机与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的正确入党动机是格格不入的,对促进大学生的自身发展非常不利。

### 2. 盲从型动机

有这种动机的大学生,自己对党缺乏深层次的了解,是一种从众心理支配下的行为,觉得身边的同学要求入党,自己不要求入党是否显得没有政治觉悟,所以也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这样的同学很难自觉地用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很难具备持续发展和前进的动力。

### 3. 虚荣型动机

有虚荣型动机的同学缺乏坚定的信念,认为共产党员称号很光荣,入党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和政治资本,至少少数学生干部的工作动力便来源于将来有发展入党的机会,一旦阶段性入党的目标没达成,便彻底失去学习和工作激情,从而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发展和成长。

### 4. 被动型动机

有的同学学习成绩优秀,在党组织的催促下被动入党;有的同学各方面表现较好,在家人和老师的催促下,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这两部分同学入党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均表现出被动性,缺乏自我发展、自我要求的原动力。

<sup>\*</sup>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90后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3SJBFDY033),江苏省教育系统党建研究会课题“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3JYDJLX-YB04011)。

[收稿日期] 2014-09-10

[作者简介] 李贵平,男,江苏盐城人,南京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副研究员。

## 5. 成长型动机

有这种入党动机的同学认为入党能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向党组织靠拢能鞭策自己不断进步。这部分同学把入党与自身政治发展、个人发展相联系,有其正确的地方,但过分注重现实成分,是入党动机是不成熟的表现。

## 6. 情感型动机

有这种入党动机的同学一般从小就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由然而生崇敬之情,并为报答恩情而要求入党。甚至有家庭贫困的学生更是在党的帮助下才有机会上大学,想通过加入党组织来更好地报答党组织。这部分同学对党有着朴素的感情,具有积极、健康的一面,但是,从个人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更要把这份朴素的感情上升到为党的事业而不懈努力和奋斗的高度,从而为自己的成长成才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 二、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发展性矫正的原则

发展性原则要求我们不仅阐明90后大学生个体业已形成的心理品质,而且要考虑大学生个人的成长历史以及家庭环境,还要密切关注其刚刚产生的新的心理特点,从而客观地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的发展性矫正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政治性原则

大学生的入党动机是否端正,与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认知是否深刻密切相关。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发展性矫正的政治性原则,就是要通过大学生主动和被动地接受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教育,不断坚定他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 2. 主体性原则

主体性原则是从人的内在尺度出发来把握物的尺度的原则,是强调人的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对改造世界所具意义的原则,就是承认、重视并坚持主体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原则。对于大学生入党动机发展性矫正而言,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承认、重视并坚持大学生自身在端正其入党动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3. 发展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是指在大学生入党动机的矫正过

程中,要以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原则,充分肯定并稳固其入党动机中的积极、向上和进取的方面,同时更要从大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成才的需要出发,通过教育和引导帮助其转化消极、功利和虚荣的方面,从而在其思想上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到“未进党的门,先做党的人”。

### 4. 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指入党动机的发展性矫正要兼顾到每一位积极要求入党的大学生,为他们提供均等的接受教育培养并端正入党动机的机会;二是指入党动机的发展性矫正要从每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大学生不同成长阶段的需求出发,帮助他们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教育过程,从而在其自身全面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自己的入党动机。

## 三、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发展性矫正的具体措施

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的矫正,要在认真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具体深入分析90后大学生所处的时代特征、受教育的特点和他们的内在需求,在最大限度地促进大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发展性矫正的具体措施,从而引导90后大学生树立适应时代要求、符合国家和党的需要,同时又能不断激励和促进其成长成才的正确的入党动机。笔者认为,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发展性矫正的具体措施至少有如下四点:

### 1. 转变教育观念,推进大学生党员培养与管理服务的协调统一

一方面,90后的大学生家长们必须彻底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正确引导自己的子女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子女最好的老师,他们的价值取向、处世哲学甚至一言一行都直接关系到子女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进而直接影响到子女的入党动机正确与否。因此,作为90后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们,首先必须认真地自我审视自己,是否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共产党员的要时常自我反省,是否具有端正的入党动机,只有在自身具备正确的“三观”和入党动机才能做到正确的言传身教,切忌在子女面前表现出对社会、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甚至向子女传递“官本位”、“有权就有钱”等不该有的功利思想。<sup>[1]</sup>其次在整个教育体制

还未彻底脱离“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要摒弃那种“成绩代表一切”的唯成绩论的思想,积极引导子女向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不断激发子女自我全面发展、渴望成长成才的内在需求和动力,从而引导子女形成正确的“三观”,进而达到把实现个人价值与实现社会价值完美统一起来,从而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

另一方面,对于学校而言,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要深入研究90后大学生的教育背景、成长历程和心理需求,从而探索出适合当代大学生需求特点的教育理念和观念。90后大学生基本上是完全独生的一代人,从接受教育的那一天开始,就肩负着为了升学而努力学习的使命,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更多地是一直围绕着考上理想的大学而不懈奋斗,至于个人理想、价值观教育等等在升学面前变得并不重要,等到考上了大学自然就能解决,这种只注重现实的功利化教育模式无疑给高校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高校党建工作必须正视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彻底变“管理”为“服务”,通过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充分了解并掌握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在入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背景、成长历程以及个性化的心理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入党积极分子从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入手,激发其内心的发展性需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引导,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进而真正达到其主动端正入党动机的教育目标和良好效果。

## 2. 加强理论教育,激发大学生追求政治理想的内在需求

加强理论教育,强化宗旨意识,是大学生入党动机发展性矫正的客观要求,更是激发大学生追求政治理想内在需求的重要措施。对90后大学生而言,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他们的头脑,积极开展针对性、时效性强的党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教育,不断强化入党积极分子的自我党性教育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进而引导和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在成长成才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能力,以及解除在入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惑的能力。<sup>[2]</sup>另一方面,在抓好面上理论教育的同时,要针对不同大学生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需求,充分利用新媒体、积极探索新方法,<sup>[3]</sup>

大力开展针对性强的教育活动,尽可能满足绝大多数大学生个体的发展性需求,真正做到“量体裁衣、因材施教”,从而达到大学生主动接受政治理论教育、主动参与政治理论教育的良好效果。最后,要将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sup>[4]</sup>如党史教育可以结合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用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来教育和鞭策90后大学生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党的先进性教育可以组织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参观高新技术企业,亲身感受科学技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如此等等,通过让大学生身临其境,结合平时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不断增加感性认识,进而切实加深对党的历史以及先进性认识和理解,逐步达到激发大学生追求政治理想的内在需求的理论教育目标。

## 3. 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大学生个人成才和服务社会的相互促进

建立长效机制,督促大学生党员在不断发挥模范作用的过程中历练自己、成长自己、提高自己,同时,引导大学生将个人成长成才与服务社会相互促进、相互结合,是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发展性矫正的关键举措。

一方面,让大学生党员成为和谐校园建设的引领者。“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扫一屋”是为“扫天下”而准备的。作为90后的一代学生党员,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神圣责任和使命,必将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生力军。因此,学校要不断创造条件让学生党员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和谐校园建设的过程中不断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让“中国梦”深深扎根于每一位90后大学生党员的心中,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都能不断地挑战自我、努力进取,成为和谐校园建设的引领者,同时也让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受过高等教育的90后大学生党员。

另一方面,让大学生党员成为服务社会的示范者。“少年强则国强。”90后大学生党员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少年”,也必将代表的的是一个时期的社会主流。“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90后学生党员的入党动机是否端正,能否发挥应有的模范作用,归根结底离不开其对党的宗旨的承诺与践行。因此,必须让学生党员在服务社会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入党动机,让90后大学生在接受高等

教育的同时积极主动地接触社会、走进社会、服务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用自己的所学服务于社会,在服务社会中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成长,成为同龄人中服务社会的示范者。<sup>[5]</sup>

#### 4. 加强自身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大学生入党的良好政治氛围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党的形象在普通群众心目中尤其是在90后大学生的心目中,与理想中的高大形象确实存在一些差距,特别是党内的腐败现象在少数党员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身上发生,客观上对90后大学生的入党动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让还处于稚嫩期的90后大学生的入党动机在不知不觉中夹杂了功利主义的色彩,导致了“入党就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入党就有机会做官,做官就有机会发财”等等一些功利性的入党动机的形成。因此,加强自身建设,为大学生入党营造积极向上的健康的良好政治氛围也是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发展性矫正的重要措施。为此,必须在全党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通过加强自身建设,让90后大学生牢固树立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和对实现自己梦想的渴望和追求,直至不断自我矫正自己的入党动机。

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的发展性评价与矫正是一个系统工程,将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实现,需要党组织、社会、学校、家庭和大学生本人五方联动、共同努力、协调配合才能完成。

#### [参考文献]

- [1]周素勤,徐承英.“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纠偏途径探析[J].人民论坛,2014(2).
- [2]刘建军,曾有艺.试论大学生入党动机若干问题的综合矫正[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12).
- [3]孙成政,吴立伟.基于新媒体视野下的“90后”学生党员的教育引导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13(8).
- [4]郭艳.“90后”大学生入党动机的调查研究[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4).
- [5]刘怀玉,刘诚.高校学生党员队伍建设的基本路径[N].光明日报,2013-10-11(12).

(责任编辑 光 翟)

# “新媒体一代”闲暇生活的现状及对策研究<sup>\*</sup>

丁炫凯

(盐城师范学院团委, 江苏盐城 224051)

**[摘要]**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臻成熟,其在现代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愈来愈大。特别对于闲暇时间较多又敢于尝新的大学生群体来说,新媒体技术应用更是其闲暇生活方式的重要媒介和关键因素。为此,基于1000名“新媒体一代”大学生闲暇生活调查的分析基础上,本文阐明该群体在闲暇生活中的高频率的新媒体使用度正深刻地改变着交往模式、思维方式及价值判断等多个方面。针对这些新呈现出的特点,本文从善用新媒体、完善闲暇生活教育系统、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三个维度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新媒体; “新媒体一代”; 大学生; 闲暇生活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15-04

所谓闲暇生活,即指个人扣除工作、学习等劳动时间及睡眠等生理时间后,可以依据自身意愿需要去开展各项自由活动的时间。为此,闲暇生活的长短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出比较高的重合度和一致性。就像《世界的事实和趋势》一书所述,工业时代较之原始社会,人们的闲暇生活时间就从16.6%提高至38.6%。特别是面对电子技术和互联网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的闲暇生活消费方式借助新媒体技术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扩容,形式不断多样,边界逐渐模糊。由此不难推断,在当今这个时代,相对于其他生活类型,闲暇生活已然在人类生活习惯的养成过程中发挥起了重要作用,而新媒体则成为其得以成功渗透的关键载体之一。

根据2014年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的网络使用人群规模已达到6.18亿,10至29岁年龄段的青少年人群更是以55.3%的比例当选首要网民群体。因此,网络等新媒体对于这一群体闲暇生活的影响格外深刻与广泛。而作为这一群体主力军的大学生群体,由于闲暇时间较多又敢于尝新,更是被冠以“新媒体一代”的称号。

但与以往的大学生群体相比,拥有这一“美誉”的当代大学生们却也因为受到新媒体发展的影响,在人际交往、沟通、消费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极其重要的改变,“宅”逐渐成为了他们的另一代名词。为此,受到新媒体多元影响的“新媒体一代”,他们的闲暇生活方式和与之俱生的生活习惯方式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 一、“新媒体一代”闲暇生活现状及特点

为了更好地为“新媒体一代”的闲暇生活把脉,我们对这一群体的闲暇生活现状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式,向江苏省内7所不同类型高校的1000名大学生发放问卷。下面我们以在校大学生新媒体使用情况为出发点,从其闲暇时间分配比率、网络闲暇在线应用等入手,分析当下“新媒体一代”的闲暇生活特点。

### 1. 闲暇时间较充裕,网络使用居首

根据表1,高校“新媒体一代”都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平均每天可以拥有4.6小时的闲暇生活。但对于这些充足的闲暇时间,却只有20%的大学生选择了去制定详细的时间规划。并且,随着年

<sup>\*</sup>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大学生闲暇生活的道德引导研究”(项目编号:2011SJB880133)。

[收稿日期] 2014-09-16

[作者简介] 丁炫凯,男,江苏东台人,盐城师范学院团委副书记,助理研究员。

级的增长,对于制定详细时间规划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效应。

对于这些闲暇时间,“新媒体一代”大学生的消费方式呈现出高度多元性,甚至可以用“热闹非凡”来形容,学习、运动、社交、娱乐等均有涉及,睡懒觉、处理生活琐事也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不过,网络使用以 26.1% 的比例高居各项闲暇活动之首,而旅游、运动等户外项目则排名靠后。由此不难发现,“新媒体一代”是典型的宅男、宅女,擅长开展各类网络互动,即使是开展人际交往活动,也更为偏好于通过微信、电脑等新媒体交互应用进行,取代更利于交流感情的线下交往模式。

## 2. 娱乐化倾向鲜明,网络依赖性强

区别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新媒体因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实现了满足差异化需求、向受众群体提供各类服务信息的作用。因此,对于“新媒体一代”而言,网络带来了极为丰富的娱乐化应用享受。

从对“新媒体一代”大学生在线应用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也基本印证了以上的观点。网络游戏、网络社交、在线购物、影视剧欣赏等十余项内容均有参与。在平均每天 5-9 小时的新媒体使用时间内,社交工具使用,网络游戏及小说、电视剧欣赏这三个项目更是位居所有在线应用前三位。因此,单就这些子项来看,目前大学生在利用在线应用时,还是更偏向于社交化与娱乐化,以消

表 1 “新媒体一代”大学生闲暇时间分配情况

调查选项	题 目	在调查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1	除了双休日和节假日以外, 你每天的闲暇时间是	3-5 小时	69%
		6-8 小时	15%
		充分规划	20%
2	您制定闲暇时间的计划吗	对重要的事进行规划	16.90%
		大多只想但不会去做	47%
3	在闲暇时间里,您通常会做什么	学习	15%
		娱乐	58%
		旅游	10%
4	在闲暇时间里, 您选择最多的娱乐方式是什么	运动	18%
		上网	48%
		睡懒觉	28%
		社交	24%

表 2 “新媒体一代”大学生在线应用使用情况一览表

调查选项	题 目	在调查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1	您在闲暇生活中主要做些什么	上网(微信、微博、网购等)	35%
		体育锻炼	20%
		逛街	24.3%
		学习	10.1%
2	您在闲暇生活中, 运用新媒体的时间一般为多长时间	1-2 小时	15%
		3-4 小时	24%
		5-9 小时	59%
3	您上网都做些什么	微信、微博、QQ 聊天	50%
		打网络游戏	48%
		看小说和电视剧	38%
		网络购物	34%
		查询、下载资料	20%



磨时间功能为主。当然,也有 20% 的大学生将“查询、下载资料”作为在线应用的主要选择,这也可以表明大学生还是会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课外学习与知识积累行动的,只是这一类活动并不是主流子项。

不过,不同性别的“新媒体一代”大学生在在线应用使用频率方面却也存在较为显著的二元特点。大部分男生在各项在线应用的使用频率方面,只有网络游戏与查询、下载资料这两个子项的得分要高于女生,其余项目均低于女生。尤其是网络购物这一子项,女生的使用频率为男生使用频率的近 3 倍。由此可见,对于女生而言,新媒体已成为他们开展闲暇生活的“消费”平台之一。

### 3.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由于新媒体的出现,“新媒体一代”大学生在对闲暇时光分配的过程中,往往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网络上,挤兑了原本的阅读书本、人际交往、户外活动和睡觉休息的时间,打破了其原有的平衡发展。加之网络文化的多元化造成了价值观的多元化,潜移默化中就可能造成主流价值观在这代大学生身上改变。因此,“新媒体一代”大学生的闲暇生活现状给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对于单一灌输思想政治理论的主渠道——课堂教育来说,当新媒体介入大学生闲暇生活后,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枯燥的理论说教,不满足于呆板的课堂教学,这倒逼其教师必须实现自身的教育范式转变,思考如何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进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水平,全面把握新媒体的特性,趋利避害、发挥优势,营造适合“新媒体一代”健康成长的环境氛围。

## 二、造成“新媒体一代”闲暇生活现状的原因分析

“新媒体一代”大学生的闲暇生活之所以呈现出当前的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与分析,即新媒体技术的必然结果、高校大学生的自身特点与当代大学教育的功能缺失。

### 1. 新媒体技术的必然结果

分析任何社会现状的存在,都必然需要先对整个时代的特点及孕育这一现状的社会环境进行探讨。首先,工具便捷性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sup>[1]</sup>因此,相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四大传统媒体,以计算机、手机等随手可得的移动终端为平台载体

的网络新媒体技术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代大学生拥有大量闲暇时间需要消费的客观需求,使其能随时随地对各类闲暇时光进行消费。其次,新媒体技术为大学生带来了丰富的休闲体验方式。新媒体技术因其便捷、双向、开源的特点使市场中的组织方捕捉到商机。为此,基于新媒体技术开发的各类应用层出不穷,也使大学生能够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休闲体验,导致更多的“新媒体一代”大学生的闲暇生活呈现出明显的泛网络化状态。同时,新媒体环境让这一代的大学生能够拥有使用匿名的方式在非现实空间开展自我实现、情感传递、压力宣泄等现实空间无法完成的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大学生渴望追求平等、重视自我意识、希望得到尊重的愿望。从而于另一个深层次推进了新媒体对“新媒体一代”的影响。<sup>[2]</sup>

### 2. 大学生自身某些原因

与其他按年龄细分的人群群体而言,高校大学生群体思想单纯、敢于尝试,在个性方面表现得更为敏感和以自我为中心。而新媒体技术提供的各项服务则很好地吻合了大学生的这些性格特点,为其提供了很好的情感释放空间。

网络技术的隐匿性帮助“新媒体一代”大学生能够取得在现实空间中无法获得的身份。因此,“新媒体一代”大学生可以利用网络新媒体技术虚拟建构自己的身份,从而肆意分享自己的快乐与喜悦、宣泄自己的情感与不满,充分满足了高校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诉求。

此外,因为新媒体技术为大学生提供了不同于以往感受的社交方式,加之大学生自身的敏感特性,所以,网络新媒体技术为大学生主体带来了充分的社交安全感与较高等度的依赖性,从而真正意义上使网络新媒体技术深入地渗透到这些大学生闲暇生活的各个领域内。

### 3. 大学教育的某些功能缺失

当代大学教育在功能定位上的缺失是造成“新媒体一代”大学生闲暇生活呈现目前状态的最直接的原因。因此,整个高等教育界在近几年内也已经对自身的教育方式与途径进行反思,希望寻找到切合新媒体时代发展的理念与途径。

这种功能定位的缺失主要体现在教育目标的设置方面。目前对于闲暇教育的目标侧重于站在培养学生在闲暇时光选择合适的休闲方式角度上,却往往忽视了这些学生们本身对闲暇生活的

价值理念。<sup>[3]</sup>同时,当前高校的闲暇教育一般采用灌输既定理念的方式。这种“强加式”的教育手段自然会招致收到新媒体技术“宽容优待”的大学生们反感,从而导致高校不断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组织活动却依然无法引导“新媒体一代”大学生合理安排自身空闲时间的现象。

### 三、引导“新媒体一代”合理开展闲暇生活的对策

#### 1. 适应“新媒体”环境特性,全力营造科学闲暇生活氛围

“新媒体成为当前大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是无法避免的”,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持有高度肯定的态度。因此,堵不如疏,与其一直排斥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还不如合理的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环境特性,营造与这个时代发展相吻合的科学闲暇生活氛围。

尽管网络新媒体因其空间超常规、虚拟无规范的特点使部分大学生在道德方面更容易出现失范行为。但同时,通过对这些新媒体的利用,也让我们在宣传闲暇教育、推进闲暇生活多样化的过程中拥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们要通过对新媒体的了解和控制,通过多种新媒体技术手段提醒高校大学生合理分配时间,正确使用网络资源。<sup>[4]</sup>

#### 2. 完善“新媒体一代”大学生闲暇教育系统

完善闲暇教育系统是目前各高校在助推“新媒体一代”大学生正确树立闲暇生活价值观的主流做法,目的在于培养这些大学生正确的闲暇生活习惯。主体、客体、内容及手段构成了这一闲暇教育系统的四大关键元素。

针对“新媒体一代”大学生的闲暇教育系统,组成其客体的学校、家庭、社会三元素在这一系统的建构过程中分别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学校在闲暇教育系统中的主要功能是净化校园文化环境,为“新媒体一代”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习惯养成的环境;家庭在闲暇教育系统中发挥着引导者的功能,特别在寒暑假等闲暇时间较为集中的时间段内,家庭更应该扮演好引导的角色,引导这些大学生学会劳逸结合,从而合理规划自己的闲暇时间;当然,社会也应该站在顶层设计的角度,做好新媒体环境的营造。<sup>[5]</sup>同时,还要丰富闲暇教育系统的内容,采取“新媒体一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创新闲暇教育系统的手段,吸引更

多的“新媒体一代”加入进来。

#### 3. 发挥“新媒体”粘合剂功能,在闲暇教育过程中引入新媒体技术

新媒体技术还具有着极为稳定的粘合剂功能,可以将闲暇教育系统与科学的闲暇生活氛围连接起来。首先,可以依靠新媒体技术搭建好平台,以此为基础拓展闲暇教育的空间深度。并且这种引入新媒体技术的做法,还很好地利用论坛、博客、微博等大学生目前熟悉的平台,更为容易地吸引他们关注闲暇教育的实质内容。

其次,在课堂上运用新媒体技术,如Flash等动画效果,可以增强课堂活跃度,转变过往理论教育型课堂的单向性,为“新媒体一代”大学生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不仅转变他们的逆反态度,还能深层次地化被动为主动,加深系列教育的实际效果。

当然新媒体的粘合性还体现在它对闲暇文化的树立中。通过新媒体技术,能很好地将闲暇文化的制度性、物质性、精神性相统一,从而保证“新媒体一代”大学生能在一个统一的氛围环境中,开展适合自身发展、顺应社会需要的闲暇生活活动。<sup>[6]</sup>

总之,新媒体技术显然是为“新媒体一代”大学生的闲暇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只要我们能在充分巩固传统教育精华的基础上,利用好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便捷,善用新媒体、巧用新媒体,就一定能帮助“新媒体一代”大学生拥有健康、合理的闲暇时光安排。

#### [参考文献]

- [1]王传中.新媒体对大学生生活、学习、思想的影响[J].高校理论战线,2009(7).
- [2]季海群.大学生闲暇生活的现状、特点及其对策研究——从网络使用的视角[J].江苏社会科学,2013(3).
- [3]肖武平,徐春华,陈延斌.闲暇教育视角下网络性心理问题的健康教育[J].心理健康教育,2010(8).
- [4]汪頔.新媒体对“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挑战[J].思想教育研究,2010(1).
- [5]宋桂支.大学生闲暇生活调查分析[J].教育与职业,2013(11).
- [6]严文锦.网络时代下大学生闲暇生活现状及引导策略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13(10).

(责任编辑 光 翟)

# 初中生羞怯、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关系

张露<sup>1</sup> 丁芳<sup>1</sup> 曹令敏<sup>2</sup>

(1.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 江苏苏州 215123;  
2.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济南 250307)

**[摘要]** 采用羞怯量表、焦虑量表和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测验, 考察100名初中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特点, 并探讨羞怯、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初中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年级差异和性别差异不显著; 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初中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显著高于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初中生; 初中生的羞怯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 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呈显著负相关; 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呈显著负相关; 焦虑在羞怯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 羞怯; 焦虑; 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 初中生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19-07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是我国培养21世纪人才的迫切要求, 是实施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重要课题。而创造性提问是挖掘无价知识宝藏的向导, 它能够促进个体进行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 是创造力的有力保障。许多学者认为创造力的过程是由问题提出开始的, 它同时也是创造力极为重要的组成要素。<sup>[1]</sup> 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情境, 运用已有知识或经验, 在独特地、新颖地且有价值地(或恰当地)提出并表达科学问题的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智能品质或能力。<sup>[2]</sup>

与创造力相一致, 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不仅与教师、同伴等外在因素有关, 学生自身的知识储备、情绪、个性特征等主体方面的因素也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Eyzek和Keane认为创造力会受到认知因素、环境因素、个性特征和性别的影响, 在这一系列的因素中存在很多重要但被忽略的因素。<sup>[3](P.151)</sup> 有研究者指出, 和不同社会人群交

往和沟通, 有利于激发个体创造力的发展。但羞怯是阻碍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因素之一, 因而可能会影响创造力的发展。<sup>[4]</sup> 羞怯是一种性格特征, 指的是在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或意识到社会评价的情境中个体的紧张和不适。<sup>[5]</sup> Silvia等指出对羞怯进行研究非常重要, 因为羞怯是可以通过外界因素和自身努力加以改善的, 找出羞怯与创造力之间的相关关系, 或许可以通过克服羞怯从而提高个体的创造力。<sup>[6]</sup> 王极盛、丁新华发现, 中学生创新意识与学习压力、抑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sup>[7]</sup> 这说明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焦虑等消极情绪有关。盛红勇发现大学新生的羞怯心理与抑郁、焦虑等存在显著正相关。<sup>[8]</sup> 国外研究表明, 焦虑与羞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sup>[4][9]</sup> 与创造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sup>[10-11]</sup> 可以看出, 羞怯与焦虑、焦虑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虽然国外已有关于羞怯与创造力的相关研究,<sup>[12-14]</sup> 但目前还没有关于羞怯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相关研究, 也

**[收稿日期]** 2014-09-19

**[作者简介]** 张露, 女, 江西玉山人,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丁芳, 女, 山东泰安人,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曹令敏, 女, 山东济南人,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高级讲师。

并未见羞怯、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假设羞怯作为一种个性特征,可能通过焦虑等负性情绪间接地对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产生影响。

初中生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逐渐增强,这为创造力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他们兴趣广泛、思想活跃,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创造欲望,因此中学阶段是创造力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个体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鉴于此,本研究拟探讨初中生羞怯、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丰富创造力的理论,并为提高初中生的创造力和培养创新性人才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 一、方法

### 1. 被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浙江金华某中学随机抽取初一、初二年级 120 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剔除 20 份无效问卷,得有效问卷 100 份,有效率为 83.3%。100 名被试中,初一共 42 名被试,平均年龄为 14.19 岁;初二共 58 名被试,平均年龄为 15.29 岁。被试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统计表 (N = 100)

性别	是否独生子女		籍贯		家庭教养方式					
	是	否	城镇	农村	民主型	专制型	溺爱型	忽视型		
初一	28	14	2	40	4	38	25	9	1	7
初二	32	26	6	52	6	52	37	26	2	3
合计	60	40	8	92	10	90	62	35	3	10

### 2. 研究工具

(1)羞怯量表。羞怯量表由 Cheek 和 Buss 编制,<sup>[15]</sup>本研究采用的是有 13 个项目的修订量表,1—5 分的 5 级评分制。总分范围从 13 分(羞怯程度最低)到 65 分(羞怯程度最高)。量表的 Cronbach' sa 值为 0.90,条目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为 0.39,45 天重测信度为 0.88。<sup>[16](P.219)</sup>

(2)焦虑自评量表。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由 Zung 于 1971 年编制,是一个包含 20 个项目的 4 级评分量表。<sup>[16](P.219)</sup>20 个项目评分之和为粗分。标准分 = 粗分 × 1.25(取整数部分)。焦虑标准分在 50 分以下为无焦虑,50—59 分为轻中度焦虑,60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该量表用于评价被试近期的焦虑状况。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7。

(3)创造性科学问题能力提出测验。采用胡卫平等编写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测验。<sup>[17]</sup>该测验采用纸笔测验的方式对被试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进行测量。测验由一道开放式的题目和一道封闭式题目组成,每道题目配以不同的指导语。开放式题目要求被试依据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以及观察提出问题,封闭式的题目要求被试依据一幅宇航员站在月球上的图片来进行提问。该测验的评分包含三个方面,分别是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流畅性是指提出问题的有效数量,每个有效问题记 1 分;灵活性代表提出问题的有效类别数,每一类别记 1 分;独创性指所提问题的新颖性和独特性,它的得分由提出该问题的人数占被试总人数的百分比决定:当比例小于 5% 时,被试得 2 分;比例在 5%—10% 之间得 1 分;如果比例超过了 10% 就不计分。三个维度得分总和即为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总分。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总分与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各维度得分的 Cronbach' sa 系数为 0.86,信度良好。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检测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 0.49—0.85(开放式)以及 0.54—0.89(封闭式),表明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两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分别对 100 名学生的试卷进行独立评分,结果显示评分者信度一致性系数达到 0.80 以上。对于两人不一致的计分,再由两人共同讨论,最终确定一致的计分。

### 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班级进行团体测试,测试时由主试宣读指导语。时间大约为 30 分钟。问卷收回后,剔除资料不完整或有明显规律作答的问卷,对有效问卷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其中,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问卷为非选择题,因此在问卷收回后,按照评分标准对每题进行评分。然后再同其他量表数据一同录入整理。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18.0 进行统计处理。

## 二、结果

### 1. 初中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在年级和性别上的差异

分别以年级(初一、初二)和性别(男、女)为自变量,对被试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上的得分做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年级被试在流畅性( $t_{(98)} = -0.171, p = 0.865 > 0.05$ )、灵活性( $t_{(98)} = -0.127, p = 0.900 > 0.05$ )、独创性( $t$

( $98$ ) =  $-0.897$ ,  $p = 0.372 > 0.05$ )及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总分( $t_{(98)} = -0.516$ ,  $p = 0.607 > 0.05$ )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女生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总分及其三个维度得分均高于男生,但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 )。

表2 不同年级和性别初中生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各维度得分及总分  $M(SD) N = 100$

	年级		性别	
	初一	初二	男	女
n	42	58	60	40
流畅性	4.95(3.51)	5.07(3.27)	4.70(3.30)	5.50(3.42)
灵活性	3.33(1.80)	3.38(1.79)	3.10(1.70)	3.75(1.85)
独创性	2.67(3.16)	3.24(3.16)	2.62(2.86)	3.58(3.52)
总分	10.95(8.47)	11.69(8.22)	10.42(7.86)	12.83(8.79)

## 2. 初中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在家庭教养方式上的差异

表3 不同家庭教养方式的初中生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各维度得分及总分  $M(SD) N = 100$

	家庭教养方式			
	民主型	专制型	溺爱型	忽视型
n	62	25	3	10
流畅性	5.58(3.78)	3.48(1.87)	6.67(1.53)	4.90(2.77)
灵活性	3.58(2.01)	2.72(1.21)	4.33(1.53)	3.30(1.16)
独创性	3.60(3.53)	1.80(2.10)	3.67(2.08)	2.10(2.28)
总分	12.76(9.32)	8.00(5.18)	14.67(5.14)	10.30(6.21)

本研究将家庭教养方式放入人口学变量中,采用美国心理学家 Baumrind 的划分,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民主型(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和忽视型四种不同的教养方式。<sup>[18]</sup>以家庭教养方式为自变量,被试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为因变量,进行 One - Way ANOVA 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教养方式在流畅性 ( $F_{(3,96)} = 2.347$ ,  $p = 0.049 < 0.05$ )、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 ( $F_{(3,96)} = 2.773$ ,  $p = 0.046 < 0.05$ )上差异显著,在独创性 ( $F_{(3,96)} = 1.728$ ,  $p = 0.078 > 0.05$ )上存在边缘显著,在灵活性 ( $F_{(3,96)} = 1.728$ ,  $p = 0.166 > 0.05$ )上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多重比较(LSD)发现,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与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 $p = 0.007 < 0.01$ ),民主型与溺爱型、民主型与忽视型、专制型与溺爱型、专制型与忽视型及溺爱型与忽视型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 )。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

学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得分在四种家庭教养方式中最高。

## 3. 初中生羞怯、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相关分析

羞怯、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 Pearson 相关系数表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与羞怯( $r = -0.219$ ,  $p = 0.029 < 0.05$ )、焦虑( $r = -0.236$ ,  $p = 0.018 < 0.05$ )呈显著的负相关,羞怯与焦虑( $r = 0.270$ ,  $p = 0.007 < 0.01$ )呈显著的正相关。

表4 初中生羞怯、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相关比较

	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	羞怯	焦虑
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	1		
羞怯	-0.219*	1	
焦虑	-0.236*	0.270**	1

注: \* $p < 0.05$ , \*\* $p < 0.01$

## 4. 焦虑在羞怯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4可知,羞怯、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为进一步明确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深入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自变量  $X$  通过影响变量  $M$  来影响因变量  $Y$ ,那么就称  $M$  为中介变量。<sup>[19]</sup>中介变量的作用示意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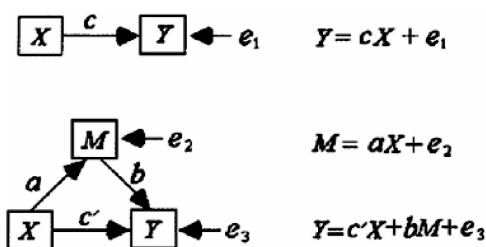


图1 中介变量示意图<sup>[20]</sup>

注:  $X$  表示自变量,  $M$  为中介变量,  $Y$  表示因变量

在对羞怯、焦虑与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两两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sup>[20]</sup>以羞怯为自变量,焦虑为中介变量,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为因变量,对焦虑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根据中介作用的检验程序,焦虑在羞怯与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中的中介作用的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以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为因变量,以羞怯为自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系数  $c$ ;第二步,以焦虑为因变量,以羞怯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系数  $a$ ;第三步,以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为因变量,以羞怯和焦虑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系数  $b$  和  $c'$ 。焦虑在羞怯与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中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焦虑在羞怯与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248x$	SE = 0.112, $t = -2.219^*$
第二步	$m = 0.302x$	SE = 0.109, $t = 2.775^{**}$
第三步	$y = -0.239m - 0.190x$	SE = 0.099, $t = -2.407^*$ SE = 0.115, $t = -1.654$

注:SE表示标准误,\* $p < 0.05$ ,\*\* $p < 0.01$

由上表可知,羞怯对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有负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  $c$  为  $-0.248$  ( $p = 0.029 < 0.05$ ),回归系数  $c$  显著。然后,将焦虑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检验系数  $a$  和  $b$  是否显著。自变量(羞怯)对中介变量有正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  $a$  为  $0.302$  ( $p = 0.007 < 0.01$ ),回归系数  $a$  显著;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有负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  $b$  为  $-0.239$  ( $p = 0.018 < 0.05$ ),回归系数  $b$  显著。于是接着检验系数  $c'$  的显著性,结果发现, $c'$  降低为  $-0.190$  ( $p = 0.101 > 0.05$ ),回归系数  $c'$  不显著。根据 Judd 和 Kenny 提出的完全中介检验中的第三个检验,<sup>[21]</sup> 检验系数  $c'$  如果不显著,说明是完全中介过程,即  $X$  对  $Y$  的影响都是通过中介变量  $M$  实现的;如果显著,说明只是部分中介过程,即  $X$  对  $Y$  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  $M$  实现的。对于焦虑这一中介变量而言,标准化回归系数  $c'$  不显著,所以,焦虑在羞怯和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 三、讨论

#### 1. 初中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年级和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初二学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总分及其三个维度得分均高于初一学生,但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sup>[22]</sup> 这可能是由于,一是本研究的被试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受到的教育水平和生活环境相似,使得他们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趋于一致;二是本研究只考察了100个被试,被试量较小,

可能会导致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达不到显著水平;三是初中阶段个体在身心方面发展比较一致,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发展都趋于成熟和完善。胡卫平分七个维度对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进行了跨文化、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关于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sup>[23]</sup> (PP. 41-42, P. 57, P. 77)

他认为在12—17岁期间,青少年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的能力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但是在18岁时会有所下降,14岁到16岁是青少年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迅速发展的阶段。本研究中的初一、初二被试年龄在14—16岁之间,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及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均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因而虽然初二学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三个维度得分和总分高于初一学生,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对于创造力在性别上的差异,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但研究结论却不相同。有研究发现,女生比男生在一些语言任务上更有创造性,男生在艺术任务上更有创造性。<sup>[24]</sup> 但也有研究认为创造力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sup>[25]</sup>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总分及三个维度得分上,女生高于男生,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三个维度得分及总分高于男生,究其原因可能是,女生与男生相比,她们更习惯形象思维,想象力丰富,更善于解决需要综合、概括及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另外,社会对男女平等的关注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等都为女生提高了自信,加之女生做事一般认真细致,导致女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提出问题,提问的数量、种类和独创性也相应增高。因而女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三个维度得分及总分高于男生。张文新与谷传华研究表明,人们在创造力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在学龄前与小学阶段的差异明显,即女孩的创造力高于男孩;但是,进入中学阶段,性别差异的方向开始倒转,即男生的创造力开始追赶女孩并超越女孩的创造力。<sup>[26]</sup> 本研究结果表明初中生的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及其三个维度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正说明了初中阶段,在创造力方面,男生开始追赶并超越女生,女生的创造力优势不再表现明显。原因可能是,一是假设在初中阶段之前,女生比男生有更强的创造力,那么进入初中后,与女生相比,男生在创造力发展方面有更快速的发展速度;二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环境的变化,导致男女学生的创

造力在培养与发展上趋同。家长在男女后代观念上转变明显,加之受独生子女因素的影响,家长对男孩与女孩不同的期望开始改变,并影响到家长对男孩和女孩的培养目标不断趋同等;三是素质教育与民主型教育的开展,使得男生与女生的创造力在学校得以共同的培养和发展。男女有别的传统文化、经济地位与教育体制等开始改变,并促进了男女生科学创造力的共同发展。因此男女生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三个维度得分及其总分上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 2. 初中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在家庭教养方式上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民主型教养方式和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初中生的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和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总分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民主型教养方式学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三个维度得分及总分显著高于专制型教养方式学生。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Baumrind 对儿童与其家庭的研究发现,专制型和放任型不能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使孩子养成依赖、服从的习惯,创造力水平低。只有民主型(权威型)家庭教育,才有利于孩子创造力的发展。<sup>[18]</sup>林静怡研究表明,父母积极教养、营造支持创造力发展的家庭环境,以及提供多方面发展所需资源,能使子女发现自己的兴趣,并能在有潜力的领域中展现其创造力。<sup>[27]</sup>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子女和父母之间是一种积极的交流关系,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尝试有新颖独特的想法和行为,尤其表现在喜欢提问的态度上,他们更多地参与到各种活动中,其独立意识增强,创造动机也得到进一步激发,因而更具有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而溺爱型和压制型的教养方式会使子女养成服从、依赖的习惯,这种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多缺乏创新意识,思维懒散,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水平不高。总的来说,积极的、有效的、支持性的父母教养方式能够促进个体创造力及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因而在家庭中培养和谐、融洽、温暖和民主的气氛是非常有必要的。

## 3. 初中生的羞怯、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羞怯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呈显著负相关;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回归分

析的结果表明,羞怯、焦虑对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羞怯对焦虑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羞怯是通过焦虑对个体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进行影响的,焦虑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

大部分研究表明,羞怯与焦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sup>[8-9]</sup>本研究结果与其一致。可能是因为在社交场合中,羞怯的个体由于没有机会练习社交技巧,不能很好地与人交流互动。当他们处在有陌生人在场的人际情境中时,便会越表现出不自在、情绪紧张焦虑、压抑、笨拙以及消极的自我评价。也可能是与羞怯个体缺乏自信和低自我效能感有关。Henderson 和 Zimbardo 的研究发现,羞怯的个体通常表现出关于自己、情境和他人的消极想法,通常表现为在他人面前表现愚笨、低自尊、自责归因以及潜意识中关于自身弱小和他人强大等消极想法。<sup>[28]</sup>他们极度缺乏自信,导致对自己的否定,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也很低,从而产生更多的诸如焦虑等消极情绪。近期的研究也指出,羞怯个体较多的消极情绪体验可能与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缺陷有关。<sup>[29]</sup>因此,羞怯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诸如焦虑等负面情绪。至于焦虑对创造性影响方面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如 Saxena 以高中生为被试研究了创造性和焦虑的关系,结果发现,创造性和焦虑之间呈负相关。<sup>[11]</sup>Okebukola 通过实验证明,高焦虑被试的创造性得分显著低于低焦虑被试的得分。<sup>[30]</sup>而卢家楣、贺雯、刘伟和卢盛华的研究则表明,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特质焦虑对学生的创造性没有显著影响,而状态焦虑对学生的创造性有显著影响,即状态焦虑低分组在创造性测试的总分上明显高于状态焦虑高分组。<sup>[31]</sup>本研究结果表明,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原因可能是焦虑的产生限制了个体的注意力,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不良情绪上,使人的反应刻板化、僵化,因而限制了个体创造力的发展。认知资源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即当个体被激发出负性情绪时,用于创造力活动的认知资源会转向产生一种防御物,防御负性情绪,这样,个体用于创造性活动的资源就会减少。同时,思维和情绪竞争认知资源时,情绪往往占优势,因此负性情绪不利于创造力的发挥。正因为如此,当个体产生焦虑的负性情绪时,原有的认知资源会转向防御焦虑的负性情绪,用于创造性科学问



题提出能力的资源就减少了,因此,焦虑会显著影响个体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

本研究发现,焦虑在羞怯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即羞怯是通过焦虑影响初中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这也最终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羞怯作为一种个性特征,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有研究发现,羞怯常与消极的社会适应后果相联系,羞怯个体常表现出低自尊、社交焦虑和亲密关系困难等。<sup>[32-34]</sup>处于初中阶段的个体,正处于自我意识高涨的时期,他们强烈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但羞怯个体常处于既想表现自己又不敢表现自己的矛盾心理中,因而他们更容易陷入烦恼、孤独和压抑等不良情绪中,这个时期他们的自尊心也很强烈,消极的社会适应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因而内心产生更多的消极自我评价和负性情绪(包括焦虑),从而阻碍他们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因此,虽然羞怯本身并不影响个体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但羞怯个体会体验到较多的焦虑情绪,并通过焦虑间接地影响个体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有研究指出,自信、自尊等与羞怯之间存在负相关,而与创造力之间存在正相关。<sup>[35]</sup>Xu、Farver、Yu和Zhan发现积极自我概念与羞怯之间存在负相关,而与创造力之间存在正相关。<sup>[36]</sup>或许羞怯不仅会通过焦虑间接地影响初中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可能还会通过影响个体的自信水平、自尊、自我概念等因素间接地影响他们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近年来,国外对儿童的羞怯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国内对于羞怯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倡导谦虚谨慎、内敛稳重等个性特征,所以过去常将羞怯儿童视为乖巧听话的好孩子,他们很少闯祸或惹麻烦,不会有攻击行为,因而在中国,羞怯行为是被接受与鼓励的行为。但众多研究表明,羞怯会给儿童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sup>[4][28][33]</sup>本研究也发现,羞怯与焦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羞怯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羞怯个体会产生更多的焦虑情绪,从而影响初中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因此,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必须对儿童的羞怯问题多加关注,采用一定的手段改变他们的羞怯状况,从而提高其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并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 四、结论

1. 初中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在年级和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2. 初中生的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在家庭教养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民主型教养方式下的初中生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方面显著高于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初中生。

3. 初中生的羞怯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呈显著负相关;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呈显著负相关;焦虑在羞怯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 [参考文献]

- [1] Sternberg, R. J. Questioning and intelligence [J]. *Questioning Exchange*, 1987.
- [2] 胡卫平, 韩琴. 小学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研究[J]. *心理科学*, 2006(4).
- [3] Eyzek, M. W., & Keane, M. T. *Cognitive psychology: A student's handbook* [M]. East Sussex: Psychology Press, 2009.
- [4] Heiser, N. A., Turner, S. M., Beidel, D. C., & Roberson - Nay, R. Differentiating social phobia from shyness [J].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09 (4).
- [5] Rubin, K. H., Coplan, R. J., & Bowker, J. C. Social withdrawal in childhood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9.
- [6] Silvia, P., Winterstein, B., Willse, J., Barona, C., Cram, J., Hess, K., Martinez, J., & Richar, C. Assessing creativity with divergent thinking tasks: Explor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new subjective scoring methods [J].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2008(2).
- [7] 王极盛, 丁新华. 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与相关因素的综合研究 [J]. *心理科学*, 2003(4).
- [8] 盛红勇. 大学新生社交回避、苦恼、羞怯与心理健康相关研究 [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0(4).
- [9] Chavira, D. A., Stein, M. B., & Malcarne, V. L. Scrutin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yness and social phobia [J].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02 (6).
- [10] Parnes, S. J. Creativity: Developing human potential [J].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1971(1).
- [11] Saxena, S. Study of creativity in relation to anxiety [J]. *India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5(5).



- [12] Jonathan, M., & Sherin, S. Shyness and verbal creativity[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86(1).
- [13] Kristen, M. K., & Gigi, M. D. Preschooler's creativity, shyness and self-esteem[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996(4).
- [14] Farahini, N., & Afrooz, G. The role of shyness in anticipating creativity among the gifted[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1.
- [15] Cheek, J. M., & Buss, A. H. Shyness and sociabi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1(2).
- [16]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17] Hu, W., Shi, Q., Han, Q., Wang, X., & Andy, P. Creative scientific problem finding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10(1).
- [18] Baumrind, 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competence and substance use[J].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991(1).
- [19] James, L. R., & Brett, J. M. Mediators, moderators and tests for medi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4(2).
- [20]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
- [21] Judd, C. M., & Kenny, D. A. Process analysis: Estimating mediation in treatment evaluations[J]. *Evaluation Review*, 1981(5).
- [22] 沃建中, 王焯辉, 刘彩梅, 林崇德. 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研究[J]. *心理科学*, 2009(3).
- [23] 胡卫平. 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研究[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1999.
- [24] Baer, J. Gender and creativity[J].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5(8).
- [25] Matud, M. P., Rodriguez, C., & Grande, J. Gender differences in creative thinking[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5).
- [26] 张文新, 谷传华. 创造力发展心理学[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 [27] 林静怡. 创造力青少年其家庭教养环境之研究——以全国科展得奖国中生为例[D]. 台湾: 台湾师范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所, 2003.
- [28] Henderson, L., & Zimbardo, P. Social fitness training, restructuring self-blaming attributions and reducing shame: Preliminary data[J]. *The Shyness Institute*, 2001(7).
- [29] Lightsey, J., Owen, R., Maxwell, D. A., Nash, T. M., Rarey, E. B., & McKinney, V. A. Self-control and self-efficacy for affect regulation as moderators of the negative affect-life satisfaction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2011(2).
- [30] Okebukola, P. A. Relationships among anxiety, belief system, and creativity[J].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86(6).
- [31] 卢家楣, 贺雯, 刘伟, 卢盛华. 焦虑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05(6).
- [32] Zimbardo, P. G. *Shyness: What it is, what to do about it* [M]. South Boston, MA: Da Capo Press, 1990.
- [33] Cowden, C. R. Worr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hyness[J].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5(1).
- [34] Myers, B. C. An inhibition of being shy: Shyness and its effects of career pre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5(1).
- [35] Fordham, K., Stevenson, H. J. Shyness, friendship quality, and adjustment during middle childhood[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99(5).
- [36] Xu, Y., Farver, J., Yu, L., Zhan, Z. Three types of shyness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the relation to effortful control[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6).

(责任编辑 师 语)

# 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策略

李玲玉

(丹阳市第六中学, 江苏镇江 212300)

**[摘要]** 学习习得性无助感是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多次失败经历产生的不良的认知方式、失落的情绪体验、被动的行为反应和消极的归因模式。学习习得性无助感不仅受到学生自身的自尊、归因方式和动机调整策略使用情况的影响,也受到外在的教师的期望和父母教养方式的作用。据于这五大因素,提出对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应对策略,包括树立积极的归因方式、给予学生正确的期望、建立合理的教养方式、动机调整训练和保护自尊,以期降低学生学习习得性无助感,提高学习动机。

**[关键词]** 学习习得性无助感; 影响因素; 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26-04

## 一、学习习得性无助感概念

学习习得性无助感是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多次失败经历产生的不良的认知方式、失落的情绪体验、被动的行为反应和消极的归因模式。<sup>[1]</sup>学习习得性无助感主要表现为行为、情绪和认知三方面的障碍。在行为上,在最初的学习中,当学生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学习结果时,会提高动机水平,努力学习,但是多次尝试后发现自己仍然无法提高学习成绩时,其学习动机水平逐渐下降,积极努力的要求降低,表现出被动、消极、逃避的行为倾向。在情绪上,学生在习得性无助感产生的初期会产生忧虑和烦躁的情绪体验,逐渐转变为冷淡、悲观、颓废状态,乃至陷入抑郁状态。在认知上,多次失败的学习经验抑制学生后来的学习,致使其认为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取得好成绩。<sup>[2]</sup>

随着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测量工具也得到丰富和完善。第一,当前习得性无助感量表主要用于测量学生的习得性无助感,其研究对象不断细化。根据学生年龄阶段的不同,研究者编制出了应用于小学、初中和高中生的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量表。<sup>[3-5]</sup>第二,习得性无助

感趋于具体学科,其研究范围更为精细。根据学科不同,学者已编制出英语、历史、数学等学科的学习习得性无助感量表。<sup>[5-7]</sup>

## 二、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影响因素

学生的学习习得性无助感产生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这其中并不仅是学生个人的因素,也包括了外在的因素。从学生自身因素来讲,归因方式、自尊、动机调整策略的使用情况都会对其无助感产生影响。从外部因素来看,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和父母的教养方式都会对学生学业的习得性无助感产生作用。

### 1. 归因方式与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关系

归因方式又称归因风格,是指个体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习惯上倾向于做怎样的解释,具有个体的特点,通过个体对多个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判断来评定。<sup>[8]</sup>通常学生的习得性无助感与过去经验的负性事件有关,但是有些学生经历挫折以后越挫越勇,有些学生却一蹶不振。有学者认为这与学生的归因方式有关,归因方式作为中介变量在负性事件和学生的习得性无助感之间起作用归因方式分为三个维度四个因素,三个维度分别为

**[收稿日期]** 2014-10-30

**[作者简介]** 李玲玉,女,江苏常州人,江苏省丹阳市第六中学心理健康教师,中学二级,硕士。

特殊一般归因维度、稳定维度、内外归因维度。<sup>[9]</sup>若学生将学习失败的经验进行一般归因,例如自己的能力不行,很容易导致学生的无助感。当学生将负性事件归因于稳定的因素例如能力时,学生则易感到无助,若归因于不稳定的因素,例如运气、努力等,其产生的失落感则是短暂的。当学生将自己的失败经验归因于外部原因,容易寻找到一个心理的支撑点,若一直将失败归因于内部的原因,学生则会对自己失去信心,而不愿意再去努力。因此,我们将负性事件归因于内部、稳定、一般原因的方式称之为消极的归因风格,反之,为积极的归因风格,消极的归因风格是习得性无助感产生的根源,让学生产生弥漫性的无助感。

## 2. 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关系

教养方式是父母对待子女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表现的态度和方法,是一种较为稳定的行为倾向,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sup>[10]</sup>斯高特(Scott)认为父母的管教方式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律,学生很容易产生自己无论如何做都得不到父母认可的绝望心态,容易产生放弃的念头,其习得性无助感也易恶化。<sup>[11]</sup>

但也并不是有规律的教养方式就一定能够减少学生的习得性无助感,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开明权威型、宽松放任型、专制权威型、忽视冷漠型四种。吴美玲对国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不同教养类型孩子在习得性无助感方面表现不同,忽视冷漠和专制权威型两种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孩子习得性无助得分最高,宽松放任型次之、开明权威型最低。<sup>[10]</sup>

这与麦克昆(McClun)和米勒尔(Merrell)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认为父母采用开明权威的管教方式,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业表现,降低学生的习得性无助感。<sup>[12]</sup>家长以开明权威的方式对待学生,不仅可以给学生比较好的导向,也可以让学生在遇到成功与失败时有父母的反馈与支持,进而降低学生的无助感。

## 3. 教师期望与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关系

教师的期望是指教师以个人的态度、价值观、人格特质以及与学生互动的经验为基础,对学生现在和未来的行为表现及学业成就作出的评价与期望,包括对学生生活的关心、学习的要求和情感

的偏爱。学生先前的成绩、家庭所处社会阶层以及教师自身的人格特点都影响教师对学生的期待。<sup>[13]</sup>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不仅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业,还会对学生的个性、社会发展和情感产生重要的作用。<sup>[14]</sup>教师对学生不适当的期望,会令孩子更易产生学习上的无助感。教师消极的评价和期望会给学生传递不良的信息,导致学生产生习得性无助感,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sup>[10]</sup>

## 4. 自尊与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关系

自尊是在社会经历中所形成的对自我的评价。<sup>[15]</sup>自尊越高的个体,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and 心境,面对困境能减少躯体化的反应,即使失败也不会认为是自己的能力问题。弗兰克就曾提出习得性无助感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想要保护自己的自尊。<sup>[16]</sup>当个体接收到别人否定的评价时,信心会动摇,并怀疑自己的能力,害怕这种不被肯定的感觉。因此他们宁愿让别人认为他们是不够努力,也不承认是自己没有能力。他们逃学、不听讲、不完成作业等,即使坏的结果出现,没有努力会是最好的借口。自尊较低的人很难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战胜困难,采用防御性策略来防止别人低能力的评价,长期颓废的状态又会带来学习成绩的下滑,为了保护自己仍旧不敢努力,长此以往陷入恶性循环,其习得性无助感不断增强。<sup>[17]</sup>

## 5. 动机调整策略与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关系

动机调整策略是指当学生面临无趣和繁琐的学习情境以及作业时,学生主动持续增进学习意愿来完成学习,当面临可能会降低学习动机的情境时,学生会通过一些方法和策略来维持学习行为。<sup>[18]</sup>动机调整策略与习得性无助感呈显著性负相关,学生使用动机调整策略水平越好,其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程度越低;反之,越高。<sup>[1]</sup>这是由于动机调整策略有助于学生维持和提高自己的学习动机,进而可以使得学生在学习上的坚持力提高,增加学生成功的学习体验,建立正强化,促使学生不断督促自己,降低自己的消极体验,提高对学习力的评价,减少习得性无助感,这与陈李绸的研究结果一致。<sup>[19]</sup>

## 三、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五大应对策略

学生在学习表现出消极、颓废的状态,让家长 and 教师感到手足无措、无比揪心,这不仅会影响学生学业,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对其一生的发展

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解决学生的学习习得性无助感显得尤为重要。根据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五点影响因素,笔者给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建议。

### 1. 学生应树立积极的归因方式

第一,通过一系列测试筛选出习得性无助感较强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归因训练,让他们形成较为积极的归因方式。此外,长期追踪这些学生的发展,对学习习得性无助感严重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让其走出学习的困境。第二,将归因训练结合在具体的学科教学当中,让学生在遇到学习障碍时意识到自己的努力不够,需要针对薄弱的环节加以复习巩固,而不是归结于自己没有能力。

### 2. 教师应给予学生正确的期望

教师的期望和鼓励如同春天的阳光照耀着每个学生的心田,适当合理的期望会有效促进学生的成长,许多有较强习得性无助感的学生表示在成长的过程中曾遭到老师的指责、批评等。教师应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学生,每个学生都是有闪光点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培养教师对学生的正确期望。第一,学校举办各类讲座或活动,提供相关的资料,让教师意识到教师的期望对学生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影响,减少对学生的歧视和忽略。第二,教师时刻自查自己对学生的期待是否符合学生的具体情况。教师要认真观察学生的变化,细心观察学生的进步和优点,每日一省是否给予孩子正确的评价,不能因为自己的刻板印象而否定了学生的进步。第三,教师在对孩子提出期望和评价时,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和能力的高低,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良苦用心。

### 3. 家长应建立合理的教养方式

父母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学习习得性无助感有重要的作用。开明权威的教养方式是父母对孩子的高回应高要求,宽容放任的教养方式是父母对孩子的高回应低要求,专制权威的教养方式是父母对子女的低回应高要求,忽视冷漠的教养方式是父母对子女的低回应低要求。父母如果对待孩子一味地高要求低回应,孩子就像在不断跳高,却永远无法得到父母的肯定,因此努力尝试对他来说都是无用的,这样的感觉会蔓延到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何建立合理的教养方式?首先,家长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家长最重要的任务是陪伴和

引导孩子成长,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预先设定孩子未来的状态,关注孩子内心的成长和发展,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在孩子遇到挫折时不是以领导和长官的身份来训斥孩子,而是主动发现孩子在挫折中的收获,陪伴孩子寻找成功的办法。其次,家长在培养孩子时要考虑孩子的性别和个性,对待男孩和女孩的要求要有差异,反馈方式也要差别对待。第三,家长应多学习,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家长要积极学习,参与一些课程或讲座,了解孩子的变化和需要,了解孩子习得性无助感的来源,帮助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乐观更自信。第四,社区与学校可以联合为家长提供帮助和服务,开展一系列促进亲子沟通的活动,例如体育活动、话剧表演、歌曲演唱、绘画比赛等,进一步融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让家长体会到管教方式对子女的影响。

### 4. 进行动机调整训练

通过动机调整训练团体辅导与课程,培养学生监控自己动机水平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坚持力,增加学生的成功经验,降低学生的习得性无助感。这类课程可以通过团体辅导的方式进行,也可以融入具体的课程,帮助学生分析自己在学习中存在什么问题。这类辅导课程的训练内容是维持学习动机的策略,包括环境控制策略、情绪控制策略、外在酬赏策略、内在目标导向策略、评估学习进度策略、制定学习目标与计划策略等。通过训练学生掌握这些动机调整策略,帮助学生在遇到学习困境时,运用一定的学习策略来维持自己的注意力和专注度,避免逃避学习问题。

### 5. 保护学生自尊,促其提高自我评价

学生所表现出的“无所谓”有时并不是出于内心,而只是为了保护自尊。当前很多家长 and 教师更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而忽视了对其自尊的保护。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对学生的一生都很有帮助,可以减少他们的无助感,增加对自己的信心。家长和教师要注意保护孩子的自尊,在批评学生时要具体客观,绝不能从对学生某个方面的责备泛化为对其人格的否定。第二,学校应开设心理健康课,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和接纳自己,不仅正视自己的缺点,也能了解自身的优点,减少自卑心理,正确地进行自我评价。

#### [参考文献]

[1]李玲玉. 动机调整训练课程对改善中职生学习习

- 得性无助感的影响研究[D]. 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3.
- [2]周国韬. 习得性无助感理论浅析[J]. 心理科学通讯,1988(6).
- [3]陈玉芬. 小学高年级儿童内外向、亲子依恋与习得性无助感的关系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9.
- [4]彭雅静. 初中生英语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研究[D]. 新乡:河南师范大学,2007.
- [5]朱诗敏. 高中生英语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09.
- [6]皮磊. 数学焦虑对数学习得性无助感的影响研究[J]. 调查与思考,2008(6).
- [7]潘小芹. 高中历史学习“习得性无助感”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D]. 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09.
- [8]张慧杰. 大学生归因方式、自尊与习得性无助感的关系研究[D].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11.
- [9]Abramson, L. Y., Seligman, E. P., & Teasdale, J. D.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humans: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78(1).
- [10]吴美玲. 国小学童父母管教方式、教师期望与习得无助感相关之研究[D]. 高雄:高雄师范大学,2001.
- [11]Scott, E. How to void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your child, part I [OL]. [http://www.okumc.org/con-tact/05\\_30\\_97/coc3.html](http://www.okumc.org/con-tact/05_30_97/coc3.html). 2002-02-01
- [12] McClun, L. A., & Merrell, K. W. Relationship of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s, locus of control orientation, and self-concept among junior high age students [J].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1998(4).
- [13]范丽恒. 国外教师期望研究综述[J]. 心理科学, 2006(3).
- [14] Good T, Brophy J. 透视课堂[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 [15]尹玲. 高职生的自尊研究[D]. 扬州:扬州大学,2007.
- [16] Snyder M Frankel A. Egotism Versus learned helplessness a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unsolvable problem effect; comment on kofta and sedek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al*, 1983(4).
- [17] Harald Valas. Learned Helplessnes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effects of age, gender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1(1).
- [18]苏嘉玲. 动机调整策略融入英语科之教学效果[D].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教育研究所,2005.
- [19]陈李绸. 有效学习策略的研究与应用[J]. 学生辅导通讯,1995(38).

(责任编辑 师 语)

# 概念组合的具身观:具身概念组合理论述评

张师辉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7)

**[摘要]** 具身概念组合(ECCo)理论是从语言理解的具身框架上建立起来的新理论模型,它强调知觉、运动、情感等具身体验在概念组合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组合概念的表征与理解是通过语义分布信息系统与具身模拟信息系统的交互作用来实现的,个体采用解构或非解构的加工策略将子概念的功能承受性进行匹配,从而获取组合概念的意义。这些理论观点能较好解释概念组合中一些特殊语言现象,如涌现特征、语境作用等,但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

**[关键词]** 概念组合; 组合概念; 具身认知; 具身概念组合理论

**[中图分类号]** B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30-06

## 一、引言

概念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个体进行思维认知加工的基本单位。概念组合(conceptual combination)是将两个(或以上)已知概念组合成一个新概念的认知加工过程,是新概念形成的途径之一,其中所形成的新概念被称为组合概念(combined concept)。<sup>[1][2]</sup>例如,“胶囊”和“公寓”组合成新概念“胶囊公寓”。在语言的认知研究中,以形容词-名词形式与名词-名词形式的组合概念较为常见。<sup>[3](pp. 443-475)</sup>其中,前者的形容词通常只修饰名词的相应维度;而后者的名词与名词间修饰关系较为复杂,涉及更深层的概念加工机制,为此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sup>[4]</sup>概念组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结构,对其认知加工过程的研究有助于弄清概念知识的表征与理解机制,因此该方面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sup>[5]</sup>研究者通过不同的研究范式,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或模型。其中,Lynott和Connell从心智的具身性角度,提出了概念组合的具身理论(Embodied Conceptual Combination, ECCo),对概念组合的加工过程进行了新的

诠释。

## 二、具身概念组合理论的提出背景

在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认知或心智的观念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形成了两代认知科学。第一代认知科学是以计算机隐喻为核心假设,认为心智是根据某种程序(或算法)对无意义符号进行的操作(或计算),类似于计算机程序的运行,是独立于身体硬件的,身体硬件仅是运行相应程序的载体。而第二代认知科学则抛弃了计算机的隐喻,认为心智离不开身体,所有的认知活动都源于作为认知主体的身体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sup>[6]</sup>认知科学理论构架上的这种心智观念的重大转变,无可避免地波及了语言认知领域中概念知识的研究。

起初,在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框架下,传统的语言认知理论认为概念的表征是通过非模态的抽象符号(amodal abstract symbols)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们是通过独立于身体知觉经验之外的抽象符号来进行语言理解。<sup>[7]</sup>基于这样的假设,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组合概念的表征与理解机制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或模型,如Gagné和Shoben提出了关系竞争理论(Competition Among Relations in Nominals

**[收稿日期]** 2014-11-18

**[作者简介]** 张师辉,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Theory, CARIN), 认为人们是基于主题关系 (thematic relation) 来理解组合概念的。<sup>[8]</sup> Wisniewski 等人则提出了基于关系解释与属性解释的双重加工理论 (Dual Process Theory), 认为除了关系解释外, 属性映射也是理解组合概念的策略之一。<sup>[9]</sup> Estes 和 Glucksberg 扩展了双重加工观点, 强调不同的策略选择产生于组合概念中修饰词的特征与主名词的相关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提出了属性维度交互模型 (Interactive Property Attribution Model, IPA)。<sup>[5]</sup> 与上面理论的视角不同, Costello 和 Keane 则从语用学角度提出概念组合的限制理论 (constraint theory), 认为人们使用诊断性 (diagnosticity)、信息性 (informativeness)、合理性 (plausibility) 这三种限制规则来获得组合概念的精确意义。<sup>[10]</sup> 此外, Prinz 用检索 - 合成 - 分析模型 (Retrieval - Composition - Analysis model, RCA) 来解释概念组合加工的三个阶段。<sup>[11]</sup> 这些理论或模型从各自的实验证据上对概念组合的认知加工机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发展。

然而, 随着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 学者们在语言认知研究领域发现了众多语言理解的具身现象, 如概念系统与知觉系统的等价效应、概念加工可引发身体知觉 - 运动变化等。对于这些具身现象, 传统的语言认知理论未能做出满意的解释, 从而使得非模态抽象符号的表征观点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进而导致了概念组合的研究陷入困境, 即以非模态抽象符号为前提假设的概念组合理论未能较好地整合现有的实验现象, 特别是概念组合中的具身加工现象。<sup>[12][13]</sup> 面对如此困境与背景, Lynott 和 Connell 转而从具身认知的视角对概念组合的加工机制进行探讨, 提出了概念组合的具身理论模型。

### 三、具身概念组合理论的主要内容

ECCo 理论从语言理解的具身视角上, 对组合概念的表征与理解加工做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解释, 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 ECCo 理论吸收了具身认知的观点, 将具身的模拟 (simulation) 信息纳入概念的表征中, 认为概念系统存在多元表征, 即具身的模拟信息与语言分布信息, 两者各司其职, 相互影响。第二, ECCo 理论整合了先前理论中有关组合概念理解加工策略的分类, 提出了解构 (destructive) 与非解构 (nondestructive) 的这两种解释类别, 认为个体通过这两种策略来

获得组合概念的意义。

#### 1. 概念知识的多元表征: 语言分布信息与具身模拟信息

ECCo 理论认为, 要解释概念组合的加工机制, 首先要弄清概念知识在人脑中的表征形式。<sup>[13]</sup> 对于概念知识的表征方式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类认知观点, 即以计算机隐喻为核心假设的传统认知观点和以具身认知为核心假设的第二代认知观点。传统的认知观点将知识的表征视为独立于主体的感知 - 运动系统的抽象符号, 而具身观点则认为知识的表征是以主体的感知 - 运动系统为基础, 身体经验构成了概念表征的内容, 身体经验的模拟与还原是概念加工的基本形式。<sup>[14][15]</sup> 受语言认知具身观的影响, ECCo 理论将 Barsalou 等人提出的语言与情境模拟理论 (Language and Situated Simulation theory) 以及 Louwerse 等人的符号交互理论 (Symbol Interdependency theory) 中有关概念多元表征的观点引入组合概念中, 认为概念系统的多元表征内容包括存在于人脑语言系统的统计分布信息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al information) 和存在于人脑多通道 (multimodal) 系统中具身的模拟信息 (simulation information), 这两类信息相互影响, 构成概念知识的表征形式。<sup>[13][16][17]</sup>

所谓语言统计分布信息 (语言分布信息) 是指在日常的语言交流中, 人们通常以语言词汇的形式来表示概念, 而概念与概念间的意义关联使得与它们相对应的词汇在语言表达中同时出现的机率也较高, 长期过程中, 这些词汇的关联频率信息就会被个体的语言记忆系统所记录, 形成词汇关联的统计分布信息。因此, 当某一概念词汇被识别时, 语言记忆系统中的统计分布信息也会被激活, 提取了该词汇的关联词汇, 而这些关联词汇就参与了该概念的意义表征。<sup>[16][18]</sup> 例如, 与“狗”有意义关联的词汇有“动物”“摇尾”“忠诚”等, 因此在人们的长期语言交流中, 这些词汇经常与“狗”这个词汇共同出现, 从而形成相应的统计分布信息。之后, 当个体再次识别到“狗”这个词汇时, 通过语言分布信息系统的激活, 就会自动提取与之关联的其他词汇, 如“动物”“摇尾”“忠诚”等, 而这些词汇就参与了对“狗”的描述, 也即参与了“狗”的意义表征。而所谓具身的模拟信息则指表征概念的内容并不是一种非模态的抽象符号 (即与主体的身体经验相独立的抽象符号), 而是一种

多通道的神经表征,是主体经验客体时的知觉、运动、情感状态及内省体验等具身内容。因此当某一概念词汇被加工时,人脑就会激活与此概念相关的多通道模拟信息,如与该概念有关的知觉体验、运动体验、情感体验等具身内容,正是这些模拟信息而不是独立于身体的抽象符合参与了概念的意义表征。<sup>[16][18][19]</sup>例如,当同样识别到“狗”这一词汇概念时,与“狗”有关的多通道模拟信息,即具身体验就会被激活,犹如模拟现实中知觉到“狗”的实体,从而产生视觉通道上狗的体型与颜色、听觉上狗的叫声、嗅觉上狗的味道以及情感上狗的忠诚等具身体验,这些多通道的表征信息构成了“狗”的意义表征。

## 2. 概念组合中的语言分布信息加工与具身的模拟信息加工

ECCo 理论认为,由于概念知识的多元表征涉及语言分布信息加工过程与具身的模拟信息加工过程,因此作为概念知识的一种结构形式,组合概念的加工也离不开两者的参与。在概念组合加工中,语言分布信息加工与具身的模拟信息加工两者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前者是概念加工的一种快速、浅层及非情境化的方式,后者则是一种后续、深层及情境化的加工方式。当进行概念组合时,两种加工方式都会自动激活,但语言分布信息加工会最先达到激活峰值,完成概念的浅层信息关联,而具身的模拟信息牵涉到概念知识的深层表征,因此其加工过程到达激活峰值较迟。此外,不同类型的组合概念或认知加工任务对两种信息加工的需求不同。<sup>[13]</sup>例如,当要理解熟悉的组合概念(如“狼狗”)时,由于个体的语言系统中存在与“狼狗”有关的语言分布信息,因此语言分布信息加工就可能起主导作用,个体只需通过简单地记忆检索,就可完成“狼”与“狗”的组合,获得该组合概念的意义。然而,当要理解陌生或新异的组合概念(如“孔雀蛇”)时,由于人们的语言系统中与“孔雀蛇”有关的语言分布信息寥寥无几,因此无法通过简单地记忆检索来获得该组合概念的意义,此时对子概念“孔雀”与“蛇”的深层信息进行组合加工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具身的模拟信息加工则起主导作用。

鉴于大多数组合概念(特别是陌生或新异的组合概念)的意义获取通常涉及复杂的、精细的、深层的信息加工,为此,ECCo 理论认为具身的情

境模拟信息加工是理解组合概念的基本形式,即子概念的组合加工是以具身的情境模拟信息加工为主导的,语言分布信息加工则使模拟信息加工更有效率。<sup>[13]</sup>

## 3. 概念组合的意义建构过程

(1) 组合概念意义建构的关键:功能承受性在模拟信息系统中的匹配。对于陌生或新异的组合概念,个体是如何通过子概念间的组合加工来进行意义的建构或理解的?首先,ECCo 理论认为,可以用子概念间的功能承受性(affordances)相互匹配(mesh)来描述概念组合的加工机制。<sup>[13]</sup>所谓功能承受性描述的是一种“可能性”,最早由心理学家 Gibson 提出,Gibson 认为个体在知觉周围环境时,客体的属性为个体提供某种互动的可能,这种“提供了互动的可能”即是该客体的功能承受性,个体对该客体的有关意义就在这种互动中获得。<sup>[20][21]</sup>例如,某物体的视觉属性为个体提供的“看见颜色”的可能,其中“可被看见颜色”即是该物体的一个功能承受性,而个体对该物体颜色的意义就在这种互动中获得。在 Gibson 的基础上,Glenberg 等人认为人们理解概念与知觉实体一样,都会提取相应的功能承受性,而提取功能承受性的过程即是理解概念意义的过程,也是一种具身的模拟信息加工过程。<sup>[22][7]</sup>ECCo 理论引入了 Gibson 与 Glenberg 等人有关功能承受性的观点,并将其扩展为“是描述某个概念的具身模拟信息为其他概念的具身模拟信息提供某种互动的可能”。由于组合概念是由两个(或多个)子概念构成,每个子概念都有它的功能承受性,再加上子概念间的意义通达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它们的功能承受性是相互制约地决定整个组合概念的意义。为此,ECCo 理论就概念组合的意义建构提出了它的核心观点,认为只有当子概念所具有的功能承受性能够彼此成功地匹配到一个协调稳定的情景模拟(situated simulation)中时,该组合概念才能获得理解。<sup>[13][23]</sup>例如,在“孔雀蛇”的意义建构中,个体对子概念“孔雀”的模拟信息可能包括视觉通道上的孔雀羽毛的金色光泽、听觉上的叫声等,而对“蛇”的模拟信息则可能包括视觉上的某种蛇皮颜色、听觉上的吐信子声音等。在这些模拟信息中,个体视觉通道上激活的“孔雀”的金色光泽可以为“蛇”的蛇皮颜色提供填充。因此可以说“孔雀”的羽毛颜色与“蛇”的蛇皮颜色都隐含着各自的功能承受性。当个体将这两个功能承受性匹配到一个



犹如知觉到“一种皮肤如孔雀般金色光泽的蛇”的模拟情境中时,该组合概念的意义就得到了建构。由此可见,在概念的组合加工中,子概念间的功能承受性能否成功地完成匹配是个体理解组合概念的关键。

(2)组合概念意义建构的两种加工策略:基于解构与非解构的匹配。在 ECCo 理论中,Lynott 等人提出了子概念间功能承受性匹配的两种加工策略,即解构加工(destructive processing)与非解构加工(nondestructive processing),并认为这两种加工策略同时也是个体对组合概念进行理解的策略。所谓解构加工策略是指在功能承受性匹配中,构成组合概念的一个或多个子概念的整体形式受到拆解,以得到合理的匹配。<sup>[13]</sup>例如,上文中的“孔雀蛇”的解释,“孔雀”这个子概念的整体形式被拆解,只保留“孔雀”的“羽毛颜色”,进而使得“孔雀”与“蛇”的功能承受性得到合理的匹配。即在“孔雀蛇”的组合概念中,“孔雀”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的形式来解释。相反,非解构加工策略则指在功能承受性匹配中,构成组合概念的所有子概念的整体形式保持较为完整。<sup>[13]</sup>例如,当“孔雀蛇”被匹配解释为“吃孔雀的蛇”时,“孔雀”概念的整体形式保持完整,“蛇”也是,因此这种匹配加工可称为非解构。由此可见,两种加工策略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功能承受性匹配中子概念的整体形式是否保持完整。

就两种策略的选择使用上,Lynott 等人认为,个体通常不会在组合概念加工的整个进程中同时使用这两种加工策略,因为这对于认知资源是浪费的,不符合认知加工的经济性原则。实际上,虽然这两种策略在意义建构的初始加工阶段可能会同时激活,但随后由于受到许多因素(如注意、先前经验、情境等)的影响,只有其中一个加工策略会居于主导,操纵整个加工过程。Lynott 等人举了这样一个实例,对概念“elephant”,有些人倾向于解释为“整体形式的动物”,而有些人受先前经验的影响,更多地注意“elephant”是“一种庞大的、笨拙的客体”,因此当他们面对组合概念“elephant complaint”时,会选择不同的加工策略。前者会使用非解构式加工,将该组合概念理解为“大象的抱怨”,其中“大象”是“抱怨”的实施主体;而后者则会使用解构式加工,将组合概念理解为“很大的抱怨”。<sup>[13]</sup>

#### 4. ECCo 理论对概念组合研究中典型现

#### 象的阐释

ECCo 理论不仅从语言理解的具身框架下提出了概念组合加工的理论模型,还对已有研究中发现的难以用传统理论进行解释的某些概念组合现象给予了相关的阐释。例如,在概念知识的多元表征观点上,ECCo 理论对组合概念的属性特异性(property specificity)、涌现特征(emergent properties)等现象做出了理论阐释。所谓属性特异性现象,是指人们对相同的颜色词汇概念有着不同的表征。这个现象最早由 Half 等人提出,他们在认知实验研究中使用相似性评定范式(similarity-rating paradigm),发现人们在加工同一个颜色概念“red”时,会因该概念与其他不同概念的组合而产生不一致的表征意义。如被试对“red flag”与“red light”中“red”的相似度评价高于“red light”与“red wine”中“red”的相似度。<sup>[23][24]</sup>按照传统的非模态抽象符号认知加工观点,“red”是以一个固定的抽象符号存储在人脑中,这就较难解释属性特异性现象。对此,ECCo 理论认为相似性评定范式涉及组合概念的精细加工,因此具身的情境模拟信息加工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当个体识别到“red”概念时,与此概念相关的多通道模拟信息就被激活,犹如知觉到现实客体中不同色调的颜色,从而辨别了“red”在不同组合中的色调。<sup>[13]</sup>对于组合概念的涌现特征现象,非模态的抽象符号认知在解释上也遇到了困难。<sup>[25]</sup>所谓涌现特征,是指组合概念拥有了某些原来任何一个子概念所不具备的特征,如“北极自行车”拥有了“轮胎上有钉子”的特征,这个特征是子概念“北极”或“自行车”单独时所不具备的。现有的关系竞争理论、双重加工理论等都未能对此现象做出较满意的解释。<sup>[26][2]</sup>就此,ECCo 理论认为,由于子概念的组合加工是具身的情境模拟过程,如“北极”与“自行车”概念间的组合加工要在具身的情境模拟中完成,当个体对“北极”与“自行车”的功能承受性进行匹配时,需要将子概念组合到一个模拟情境中,一旦个体知觉模拟到一种“在北极冰面上行驶的自行车”的情境时,有关“轮胎上有钉子”的涌现特征就产生了。<sup>[13]</sup>

此外,ECCo 理论还从组合概念意义建构的加工策略上,对子概念语义相似性评价不一致的现象做了解释。Estes 研究发现,人们对子概念间的相似性评价会受组合概念的解释策略影响。在实验中,Estes 首先将组合概念(如“zebra clam”)呈现

给所有被试,要求其中的一半被试在对“zebra clam”进行解释后,再评价两个子概念“zebra”与“clam”的相似度;要求另一半被试直接进行两个子概念的相似度评价。结果发现,在组合概念意义建构中,采用类似于解构加工策略的被试比采用非解构策略的被试对“zebra”与“clam”的相似度评价更低。<sup>[27]</sup>对此,Lynott 等人认为在解构加工策略中,由于子概念的整体形式被拆解,这个子概念在概念组合的具身情境模拟中保留的特征相对变少,从而导致相似度评价变低。<sup>[13]</sup>

#### 四、对具身概念组合理论的评述及展望

##### 1. ECCo 理论与其他概念组合理论的对比

先前的概念组合理论或模型,如关系竞争理论(CARIN)、双重加工理论、属性维度交互模型(IPA)、限制理论等,大多是建立在以计算机隐喻为核心假设的传统认知加工的框架上对概念组合加工机制进行阐述说明的。与这些理论模型不同,ECCo 理论吸收了具身认知的观点,从语言理解的具身视角中对概念组合加工机制展开陈述,其中主要集中于概念的表征和组合概念理解的加工策略两个方面。

第一,在概念表征观点上的区别。经典的关系竞争理论以及限制理论未对概念的表征形式做出明确说明,以至于忽略了概念自身的表征结构对概念组合加工的影响。而双重加工理论与属性维度交互模型则以非模态抽象符号作为概念表征的前提假设,导致难以解释语言理解的具身现象,即难以就知觉-运动系统等身体体验在概念组合加工中的作用做出解释。另外,检索-合成-分析模型虽然承认知觉-运动系统在概念表征中的作用,但未对此进一步地加以阐述。相比而言,ECCo 理论摒弃了第一代认知科学中非模态抽象符号加工的假设,认为语言分布信息系统只是概念知识的浅层表征的形式,具身的模拟信息则表征了深层的概念知识,也就是说概念的表征本质上是具身的,即概念知识的表征离不开身体的经验。ECCo 理论中概念表征的具身观点关注到知觉-运动系统等身体体验在组合概念表征中的作用,能够解释先前理论较难解释的概念组合的具身现象,如通道切换代价(modality switching costs)等。<sup>[28]</sup>因此,ECCo 理论在组合概念表征上的观点契合了当代具身认知研究的思潮,具有一定的启

迪意义。

第二,在组合概念理解(意义建构)的加工策略划分上的差异。先前的理论主要根据子概念间的主题关系或属性映射来划分组合概念的理解策略,如关系竞争理论强调主题关系是理解组合概念的核心,而双重加工理论、属性维度交互模型还强调子概念间的属性映射也是理解组合概念的关键,且两者平行竞争。此外,双重加工理论还认为混合(hybrid)策略也是一种补充的理解途径。但由于不同的理论模型对关系理解与属性理解的界定不同,导致这三种理解策略存在一定的交叉,影响了有关策略在实验研究中的编码,从而使得相似的实验与分析却得到不同的结果。例如,混合策略在关系竞争理论中被单独编码,而在双重加工理论则被编码为属性策略;另外,在用“像”进行组合概念的解释中(如“金鱼蛋糕”理解成“像金鱼的蛋糕”),关系竞争理论将“像”看作一种主题关系,因而将其归为关系策略,而双重加工理论则认为这是属性策略。<sup>[29]</sup>对此,ECCo 理论根据功能承受性匹配中子概念的整体形式是否保持完整的原则,将组合概念的理解策略分为解构策略与非解构策略两类。这样划分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以对不同策略下的概念组合的加工时间做比较,还可以在整合关系策略、属性策略与混合策略的同时,减少了实验分析时策略编码的不一致性。<sup>[23]</sup>

##### 2. 对 ECCo 理论的展望

目前,组合概念的加工机制是语言认知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者正围绕着组合概念的表征、解释策略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开展深入的研究。ECCo 理论受到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的影响,将语言理解的具身观引入概念组合的加工机制中,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为我们理解组合概念的加工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然而,这一新的理论模型仍需要面对如下挑战:第一,ECCo 理论中所引述的组合概念的实例大多是具体的名词-名词形式,而对于抽象概念的组加工,是否也都要通过具身的模拟情境进行匹配来完成以及它们是如何引发具身的情境模拟的?第二,子概念间的功能承受性是如何相互限制以及它们的提取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三,先前经验、情境等如何影响解构与非解构理解策略的选择以及个体间的差异如何?第四,ECCo 理论是基于对现有的实验证据进行整合而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其仍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修订与

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 [1] Murphy G L. Noun phrase interpretation and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0(3).
- [2] 刘焯,傅小兰. 概念组合的理论模型[J]. 心理科学进展,2005(1).
- [3] Murphy G L. Conceptual combination. *The Big Book of Concepts*. Cambridge[M]. MA: MIT Press, 2002.
- [4] 陈俊,张得龙. 名-名组合概念关系竞争理论与研究的嬗变[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
- [5] Estes Z, Glucksberg S. Interactive property attribution in concept combination [J]. *Memory & Cognition*, 2000(1).
- [6] 李其维. “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 [J]. 心理学报,2009(12).
- [7] 曲方炳,殷融,钟元,等. 语言理解中的动作知觉: 基于具身认知的视角 [J]. 心理科学进展,2012 (6).
- [8] Gagné C L, Shoben E J. Influence of thematic relations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modifier-noun combinations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997(1).
- [9] Wisniewski E J. When concepts combine [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997(2).
- [10] Costello F J, Keane M T. Efficient creativity: Constraint-guided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 *Cognitive Science*, 2000(2).
- [11] Prinz J J. The return of concept empiricism [J]. *Handbook of categorization in cognitive science*, 2005 (3).
- [12] 苏得权,叶浩生. 大脑理解语言还是身体理解语言——具身认知视角下的语义理解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 [13] Lynott D, Connell L. Embodied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0(1).
- [14] 殷融,叶浩生. 多元表征假设:概念表征机制的新观点 [J]. 心理科学,2014(2).
- [15] Horchak O V, Giger J C, Cabral M, et al. From demonstration to theory in embodied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 review [J]. *Cognitive Systems Research*, 2014(9).
- [16] Barsalou L W, Santos A, Simmons W K, et al. Language and simulation in conceptual processing [J]. *Symbols, embodiment, and meaning*, 2008 (13).
- [17] Louwse M M, Jeuniaux P. The linguistic and embodied nature of conceptual processing [J]. *Cognition*, 2010(1).
- [18] 殷融,叶浩生. 语言与情境仿真理论:概念与展望 [J]. 心理学探新,2013(4).
- [19] 殷融,曲方炳,叶浩生. 具身概念表征的研究及理论述评 [J]. 心理科学进展,2012(9).
- [20] Jones K S. What is an affordance? [J]. *Ecological psychology*, 2003(2).
- [21] 鲁忠义,陈筑桥,邵一杰. 语篇理解中动允性信息的提取 [J]. 心理学报,2009(9).
- [22] Glenberg A M, Robertson D A. Symbol grounding and meaning: A comparison of high-dimensional and embodied theories of meaning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0(3).
- [23] Connell L, Lynott D. Interpre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Testing the embodied conceptual combination (ECCo) theory [A].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gnitive Science* [C]. Sofia, Bulgaria: New Bulgari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24] Half H M, Ortony A, Anderson R C. A context-sensitive representation of word meanings [J]. *Memory & Cognition*, 1976(4).
- [25] Hampton J A. Emergent attributes in combined concepts [J]. *Creative thought: An investigation of conceptu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1997( ).
- [26] Wilkenfeld M J, Ward T B. Similarity and emergence i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1(1).
- [27] Estes Z. A tale of two similarities: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i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 *Cognitive Science*, 2003(6).
- [28] Connell L, Lynott D. Modality switching costs emerge in concept creation as well as retrieval [J]. *Cognitive Science*, 2011(4).
- [29] Gagné C L. Relation-based combinations versus property-based combinations: A test of the CARIN theory and the dual-process theory of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0(3).

(责任编辑 师 语)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论析<sup>\*</sup>

李东晓

(信阳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 河南信阳 464000)

**[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是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特质和社会整合功能使其具有引领社会思潮的优势和可操作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崭新课题和本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凝聚社会各阶层思想的现实需要,是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是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重任。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思潮; 引领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36-06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是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 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之大成,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内容中,马克思主义是灵魂。在改革开放、富民强国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回答“确立什么样的价值取向”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从价值的维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汇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实现了中国共

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根基的融会贯通。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示了当代中国的鲜明旗帜,从根本上保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进程中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不同方面回应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社会是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正确引导和强力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制约着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性质和目标任务,支配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和运行模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sup>[1]</sup>

<sup>\*</sup>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0BKS05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红色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1YJC710028),信阳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的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3-QN-004)。

**[收稿日期]** 2014-09-17

**[作者简介]** 李东晓,男,河南叶县人,信阳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讲师。

## 2. 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灵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是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灵魂。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诉求,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高度耦合、相辅相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要实现信息化、城镇化,顺利完成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转型,迫切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只有牢固确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战胜各种挑战和干扰,在兴国强国的征程上一路凯歌,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要求,丰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弘扬者和忠实践行者。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中国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全过程。只有领导牢固确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坚持为人民创造政绩,同时大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勤谋富民之策,常兴安民之举,多办利民之事,中国共产党才能巩固和深化兴国为民的执政主题,才能通过自身的执政实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公民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决定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一方面,通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能够增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有效起到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激发全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造热情。要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凝聚成一股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就必须积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使全体人民团结一心,积极行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与当代中华文化的融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先进、最严密的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

证。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本质和规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的要求,围绕中心任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造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体现了全社会意愿和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遵循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理,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推崇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以人为本等重要思想并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第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经济创造力相辅相成,当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一起,共同构成凝聚人民、动员人民、激发人民创造力的文化认同力量。第四,社会主义荣辱观汲取了中国传统伦理“耻感文化”在提升个人品格、培育社会公德方面的合理内核,把“荣”与“耻”这两个传统道德概念对应起来,丰富、拓展了“耻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又丰富、补充和完善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优势

###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特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具有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的先进特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内在地蕴涵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要求,包含着和谐的精

神、和谐的理念,真正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基础和根本目的与阶级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完全对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现阶段,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的积极作用,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强大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认同和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势位”特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提供了理论支撑。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势位”特性是指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知识的层次高和范畴的位阶高,特别是它自身所内蕴的知识、价值、规律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高,从而具有更大的势能和位能,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和征服力。<sup>[2]</sup>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真理性品格、民族性品格、时代性品格,是当今世界“高势位”的国家意识形态。首先,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社会实践,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方法的合理性、精神向度的合理性、社会利益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性,是抓住事物“根本”的科学理论。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化解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重大难题、挑战和风险,为国家迎接挑战、走向胜利提供了思想理论和对策。再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经济创造力相辅相成,当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正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特性的具体展现。

##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多样化社会思潮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的整合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和开放包容的气度,充分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充满改革创新精神,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她具有包容性的

理论品格,根据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要求,通过吸纳和提升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新经验,不断丰富自身。她与当代社会思潮之间存在着互惠关系,在与社会思潮的融突和合中不断完善自身。她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在推动个体、集体、整体价值追求的有机统一中不断发展自身,实现着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引领。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为本位,强调“人民主权”、“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有利于个体、集体、整体的价值追求得以合理的协调。<sup>[3]</sup>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宗旨,要求我们以人民的利益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竭力维护和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制度保证和社会前提,要求我们当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产生冲突时,自觉把集体利益放在前面,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级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sup>[4](P.190)</sup>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成员齐心协力、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柱,能够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人力、保持高度团结,起到激发人民群众创造热情、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作用。

##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可操作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出了现实的奋斗目标、精神动力和具体道德规范,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性,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目标符合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现实目标就是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唱响了时代主旋律,能够在全社会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为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动力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揭示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能够起到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保持高度团结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持久的凝聚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是中国人民开拓进取、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创造力。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道德规范,为当代中国树立了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融合,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应当普遍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意义

#### 1.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崭新课题和本质要求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思想基础的必然要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一个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社会,多种思想价值体系可以同时并存,但必须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 and 共同理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在我国存在多种社会思潮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高举马克思主义这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才能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

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多样化社会思潮存在的合理性。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必然激荡出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发挥主导作用,很大程度上要看她能不能包容和整合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其次,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扩大影响的现实需要。只有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思想和精神,才能用正确的思想、进步的观念、先进的文化逐步消解错误思想、落后观念、腐朽文化的影响。再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其全球霸权战略中,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不遗余力地向我国推销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sup>[5](P.20)</sup> 基于此,我们一定要更加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动摇,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实践,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 2.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凝聚社会各阶层思想的现实需要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是统一我国社会思想认识、形成强大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当前,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我国的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各种社会思潮等多元思想文化同时并存、相互交织、深刻碰撞;主流价值体系的导向性与非主流思想观念的复杂性同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多样性与引导方式的单调性同时存在。在这一背景下,要有效地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首先,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思想和精神。以实践为源泉,与中华民族和谐传统相承接,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反映时代进步潮流,致力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用正确的思想、进步的观念、先进的文化逐步消解错误思想、落后观念、腐朽文化的影响。其次,坚持以文化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之中。着眼于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用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用高质量高品位的文艺作品,生动形象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尊重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规律,把握群众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加强对新的文化品种、文化形式的研究和引导,使之既大众通俗、多姿多彩,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再次,坚持以人为本、重在建设,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关注人的精神诉求,善于发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引导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提出不同的思想道德要求,努力使每个社会群体的思想境界都能得到提升,道德水平都能得到提高,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 3. 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是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争取世界文化发展话语权的必然要求。自冷战时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与我们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现代传播手段和较完备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企图覆盖或统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犯,我们必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正视核心价值观的竞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推进文化发展和创新,切实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积极建构后冷战时代“和而不同”的国际“价值共识”,力争在世界先进文化发展中取得话语权和主动权。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有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为取向所形成的文化软实力效应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彰显为思想力、理想力、精神力、规范力。首先,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共同思想基础,没有民族凝聚力,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基本前提。其次,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文化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交融不断深化、交锋更加激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立足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的现实,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有效凝聚各个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再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互交融,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力量和保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可以引导人们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对人的思想行为具有推动、引导和调节作用。对个体而言,她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社会而言,它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作用,引导、培育人们和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 4. 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是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及时协调、处理新形势下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矛盾和利益冲突的社会,社会的和谐需要通过各种利益关系,社会矛盾的调整和处理来实现。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约束人们在经济行为中的异化问题,兼顾好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引导人民群众摆正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促进利益和谐的同时,推动社会有序协调发展和保持团结稳定。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是形成和谐社会思想共识的必然要求。一个社会要达到和谐状态,必须实现四个方面的共识:社会成员的利益认同共识、秩序认同共识、政治认同共识和共同理想目标认同共识。<sup>[6](P.133)</sup>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能够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形成上述四个共识。首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有助于使人们自觉认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正确看待当前的利益分化,并把共同富裕与个人的根本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全社会产生利益认同。其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有助于帮助人们正确看待自由与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自觉维护法律和制度的权威,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全社会产生秩序认同。再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有助于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进一步增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和信念,在全社会产生政治认同。最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有助于人们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并且把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融合起来,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和幸福,在全社会产生共同理想目标认同。

## 5. 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重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执政能力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除了防腐拒变的能力外,最主要的表现是动员、凝聚、带领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能力,即体现在它的号召力和组织力上。要增强党的号召和组织的能力,就必须具有凝聚和激励人民的精神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我们党凝聚和激励全体人民提供了牢固的精神纽带。我们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党员干部、教育人民群众,可以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达成思想共识,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党的主张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间的一致性,认识到党的奋斗与个人发展和幸福的内在一致性,使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越来越多,拥护党的领导的人

越来越多,坚定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越来越多。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是我们党不断改进领导方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重任。在经济社会生活和人们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条件下,我们党要领导人民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向前推进,就必须立足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高度,自觉担负起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的政治责任。当今世界,不仅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思潮存在多元化,而且其传播、交流的方式方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渠道大大增多,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获取信息的时间在不断提前,这就使传统的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信息管理方式及其影响力受到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控制力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导和积极整合,党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坚持和巩固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另一方面,必须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要求,特别要适应信息时代信息流动和传播方法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并及时改进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开拓创新相结合,坚持规范管理与开放引领相结合,加强与各种社会思想文化的交流互动,区别对待,科学管理,积极疏导,努力扩大共识,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和整合。

### [ 参 考 文 献 ]

- [1]李金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战略地位论析[J].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5).
- [2]陈秉公. 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与实现“引领”功能的基本方式[J]. 思想理论教育,2010(7).
- [3]钟宜. 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结构和特点[N]. 重庆日报,2011-11-18(01).
- [4]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梅荣政,杨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思潮析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6][加]德鲁里. 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光 翟)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sup>\*</sup>

印亚军 徐惠忠

(南通大学启东校区管委会, 江苏南通 226019)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沃土壤和坚实根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高校是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的重要阵地,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既是高校有效开展立德树人实践的内在需要, 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高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42-0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文化范畴, 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 是一个民族的血脉, 是中华民族长期的精神支柱, 时刻影响着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的近代史经历了沧桑巨变, 传统文化在长期的流变中受到了冲击和折损, 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当下与传统文化间的断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sup>[1]</sup> 高校是传承人类文明、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 要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和示范作用, 就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努力将其丰富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贯穿到教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

核心价值观的孕育形成与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现代文明的基础, 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立足之地。<sup>[2]</sup>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必然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 两者紧密联系, 不可或缺。

###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基础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文化积淀, 彰显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特质、文化特质。《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中写到:“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墨子·修身》中提出:志不强者智不达, 言不信者行不果”;《孟子·滕文公上》中有言:“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持, 则百姓亲睦”;《荀子·劝学》中讲道“积善成德, 而神明自得, 圣心备焉”。文化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奠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反过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消化和吸收, 使得优秀的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播和升华, 突出表现在核心价值观既秉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标识, 强调传统美德和道德规范、强调责任和使命、强调自强和仁义; 又结合了时代特殊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就会变成没有灵魂、没有精髓、没有根本的思想, 经不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得不到广大群众的认同。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计算机说服理论对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研究”(项目编号:2011SJB8800111), 南通大学创业教育重点课题“高校创业文化的构建机理及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3CYA04)。

[收稿日期] 2014-11-12

[作者简介] 印亚军, 男, 江苏泰兴人, 南通大学启东校区管委会副主任, 助理研究员。  
徐惠忠, 男, 江苏启东人, 南通大学启东校区管委会讲师。

##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动力

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呈多元化发展,各种不同的思想相互影响,使得大部分人在形成价值观时容易迷茫、困惑,其根本原因就是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中国官网曾针对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态势进行一项价值观调查,结果认为已经断裂的占40%。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坚持传统文化的核心本质,才能真正指导和完善学生精神文明建设,否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会有影响力,教育就会缺乏说服力。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的宝贵财富,涵育着现代文明,符合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源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对激励学生、教育学生、凝聚学生起着重要的作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使人产生健康向上、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而在此基础上凝练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能使广大师生怡情养志,产生强大的动力。

##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导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入耳入脑入心、敦化为民风民俗民德,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必须与中华文化的根本相融通。<sup>[3]</sup>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实践,高校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主要目的是使广大师生能自觉践行。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生产、劳动、文化的结晶,它与人民息息相关,只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指导,践行核心价值观才不会偏离正确方向,才能真正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五四运动以来和新中国成立初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新思潮不断涌现,许多传统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和颠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价值观又开始出现追求经济利益的极端,一些传统文化受到怀疑甚至被抛弃,不少人再度陷入了迷茫之中。没有优秀传统文化作指导的价值观正如在迷雾中行走的个体,容易迷失方向,容易受他人左右。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摆脱传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同样要根植于传统文化。<sup>[4]</sup>中华民族所秉持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一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重要指导,广大师生只有坚定地以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根基,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正

确的道路,才能带头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需要

高校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者,接续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核心价值观不仅是高校提升师生素养、增强文化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现实需要。教师、学生、载体是高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大要素,其中教师是文化传播的主体,学生是客体,大学文化是载体。

###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师素养的提高

高校教师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要起表率 and 模范作用。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十分强调教师品德的重要性,王安石曾说过:“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为先”,教师首要需要正直的品质,优良的思想,才可以教学生;《礼记》中也提出“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但是近年来,作为教育主体的高校教师在师德方面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一些人思想上存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淡薄、缺乏马克思主义信仰;一些人学术科研上存在论文抄袭、急功近利;一些人在生活上堕落,缺乏良好的师德,与高校教师的形象极为不称,与传统的教师形象相距甚远。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书育人,传播优秀的思想,树立良好的道德楷模形象。作为教育的重要要素,高校教师必须主动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要义,带头学习和弘扬,努力做到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生价值观的养成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生正值青年期,价值观尚未稳定,容易受不良思想的诱导。现在部分大学生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不懂自由而论自由,不懂平等而求平等,此类学生往往以自我为中心,集体主义思想淡薄,好逸恶劳,鄙夷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明确而稳定的价值倾向,缺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大学生身上有了明显的割裂。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越来越频繁,越是在这种形势下越需要我们把握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所言:“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

会的价值取向……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sup>[5]</sup>古人云：“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修辞立其诚；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学生爱国、自强、诚信、友善，这些不是凭空提出的要求，而是经过历史的检验，是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认同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高校要时刻教育和提醒大学生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勿忘历史、勿忘中国传统文化，努力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行者、引领者和推动者。

###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文化建设

大学文化是大学活的灵魂和核心要素。中国大学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凝聚、发展而形成的，其深厚的根基是五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大学文化建设培根固本的工作，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sup>[6]</sup>而核心价值观则是这个体系的凝练和表达。高校是大学生学习文化的主要场所，本应饱含文化底蕴，但是现在一些学校却大楼多，大师少；新的建筑多，人文景观和教育场所少。一些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往往过多地注重学生的实际需要，而忽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使大学生的价值导向趋于模糊，核心价值观容易错位。作为文化的传承基地、践行基地，高校有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去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与方法，重视和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引导全体师生主动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教学、工作和生活中，从而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基础。

## 三、如何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认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从本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sup>[7]</sup>接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基础，也是高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更是维系两者的纽带。为此，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实现：

### 1. 辩证认识，厘清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

当前有些高校在培育优秀传统文化时只是简单的照搬照抄，并未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和看待问题，并未真正提取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并未真正做到有扬弃地继承。中华

传统文化的宝库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不断的探索、学习、挖掘和吸收。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学习其核心元素，关键是体现本民族的特色，关键是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优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客观审视中华传统文化。高校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要讲清楚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价值理念，要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来考量。要注意引导大学生细心辨别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要注意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让学生真正理解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仅停留在字面理解。

### 2. 融合时代，保持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积累而成，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我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成为大众的基本行为准则，但这些终究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长期以来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高校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体现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深刻阐述其新的时代内涵，与时俱进，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要讲清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让学生学会古为今用，学以致用。例如《荀子·哀公》篇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体现了古代的民本思想：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稳定，统治者地位才能巩固。把这句话寓于新的时代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 3. 继承创新，放大传统文化的价值效应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sup>[8]</sup>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巧妙地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高校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首先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这是因为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过时，在新的时代中仍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如“乐于助人”、“扶贫济困”、“与人为善”、“诚信仁爱”等，高校要将这些优秀的思想、道德、价值观理直气壮地传承放大。对那些传统文化中时至今日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作出通俗易懂的解释，循序渐进地融入

学生的价值观培育中,让学生领悟其深刻内涵。其次要在此基础上创新文化内容、创新教育方法。诚如黑格尔所言:“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高校积极地引导、有目的地开展活动,更离不开高校不断的探索和创新。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相结合、和学校相结合、和学生实际情况相结合,推陈出新,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产生共鸣。要以教育引导实践、以实践深化教育,注重提升信仰教育、情感养成、实践体验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比重。

#### 4. 丰富载体,增强传统文化的宣传通道

通过文化传承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既要有内容还要有载体。<sup>[9]</sup>高校应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创新活动载体,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师生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高校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共同致力于构建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环境,重视各种教育载体的建设。要借助重要纪念日、节庆日、民族传统节日、民间民俗活动;依托各类选修课、讲座、报告、学生活动;依靠高校党团组织、学生社团、社会机构、教育基地;做好形势宣传、典型宣传、主题宣传;运用校园报纸、校园广播、新兴媒体网络、公益广告等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创意新颖、品位高雅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通

过这些丰富的活动载体,用师生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切实增强广大师生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 [ 参 考 文 献 ]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学习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2-26(1).
- [2] 郭齐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与基础[N]. 光明日报,2014-04-02(13)
- [3] 罗国杰,夏伟东. 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论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J]. 红旗文稿,2014(7).
- [4] 杨晓英.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 西安日报,2014-03-03(1).
- [5]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5/c\\_126464505.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5/c_126464505.htm).
- [6] 李春林. 大学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着眼点[N]. 光明日报,2011-11-23(16).
- [7] [美]理查德·诺顿·史密斯. 哈佛世纪[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 [8] 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N]. 人民日报,2014-07-09(15).
- [9] 刘云山. 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 求是,2014(2).

(责任编辑 光 翟)

# 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之研究

董 鹏<sup>1</sup> 黄志红<sup>2</sup>

(1. 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计划部, 广东梅州 514759;  
2.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村级组织体系历经多次重组,引起了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在村庄内部,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而村级组织的重组,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和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构;在村庄外部,村级组织是连接国家与分散的农民的组织载体,有效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与治理。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目标、组织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将村级组织作为权力主体,建立国家-村级组织-农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成为深化乡村权力结构研究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村级组织; 1949年; 乡村权力结构; 重组; 嬗变

**[中图分类号]** F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46-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村级组织体系历经多次重组。新的村级组织一经建立,组织自身便拥有一定的权力和权威,进而引起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学术界对于建国以来农村村级组织的研究,或侧重于纵向勾勒其发展轨迹<sup>①</sup>,或重点论述不同历史时期村级组织的建构及其性质、功能<sup>②</sup>。村庄权力结构是指村庄各主要权力主体之间模式化的互动关系。<sup>[1]</sup>学术界对村庄权力结构的研究一般从两种视角展开,“一是对村庄内部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二是对国家与村庄的关系进行研究”<sup>[2]</sup>(pp. 160-162)。村级组织体系的重组与村庄权力结构变迁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对此,学术界相关研究尚付阙如。鉴于此,与以上研究视角不同,本文对将在村治中占主导地位村级组织作为权力主体,从不同时

期村级组织与村庄内部权力结构演变、国家-农民关系建构之间的关联两个维度入手,系统探讨建国以来村级组织与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为克服既有研究中存在的“关于村庄权力结构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脱节”<sup>[2]</sup>的弊端提供新的视角,进而增进对于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

## 一、政权初建时期(建国前后至1954年)

### 1. 政权初建时期的村级组织

就村级组织自身的设置而言,政权初建时期的村级组织主要包括村政府和农民协会。

村政府是建国前后中共正式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较早地开展了土地改革,从而也较早地在

**[收稿日期]** 2014-10-10

**[作者简介]** 董 鹏,男,陕西安康人,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计划部企业战略与品牌研究员。

黄志红,男,陕西安康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sup>①</sup>如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1991年编写的《村民自治示范讲习班试用教材》,张丽琴的“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建设及其职能演变—60年村级民主发展的历程考察与政策分析”,《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沈延生的“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sup>②</sup>如唐明勇的“试论建国初期的农民协会”,《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郭圣福的“贫下中农协会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项继权的《中国的村级组织》,http://www.ccrs.org.cn/show\_704.aspx.

农村进行基层政权建设,建立起了对农村的控制,东北、华北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村政府。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在全国建立行政村与乡作为一级地方政权机关,在土地改革未完成的地区,乡农民代表大会或乡农民代表会议代行乡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不过,在政务院的这两个通则颁布之前,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部分农村在建国前后已经分期分批推行了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改革运动,废除了保甲制,建立了新的乡政权和行政村政权,如湖北全省1948年设有乡镇1276个,其下分为20111保(1949年数字),经过合并或改组旧保甲,到1950年5月,全省组成行政村18037个。<sup>[3](P.442)</sup>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正式规定县以下的乡、民族乡和镇为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撤销了行政村建制,村开始改变其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协会一直是中共发动和组织农民、改造乡村的重要组织载体。建国初期的农民协会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东北、华北等老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贫农团改组、整顿而来,二是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生产备荒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中发展了大批农民协会。由于土地改革、建立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以及调整农村阶级关系及构筑反封建统一战线的需要<sup>[4]</sup>,建国初期的农民协会发展迅猛。为了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农民,规范各级农民协会的建制,1950年7月14日,政务院第4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对农民协会的性质、组成、结构、职能等作出了规定。在村级一般设农民协会,下设农协小组。1953年,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各地的乡村政权普遍建立,农会的骨干大多转变为乡村干部,农民协会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由村政府、农民协会及其领导下的农村妇联、共青团、民兵组织等其他新社会组织,构建了一套新的组织体系,完全替代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乡村保甲组织、宗族组织、帮会组织和民间信仰组织构成的组织体系。

## 2. 村级组织与村庄内部权力结构

在村庄内部,村级组织成为乡村阶级差别的

分水岭和乡村权势转换的重要组织载体。从村政府和农民协会等村级组织的领导者和组成者来看,以前处于农村社会阶层体系底端的贫雇农及其他无产者在政治和经济上获益,成为新组织的骨干和新的乡村精英,如河南省土地改革时,土改工作人员在农村与贫雇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访得苦大仇深,为人正派并有活动能力的贫雇农作土改积极分子,由其以苦引苦串联贫雇农,组成农民协会的骨干力量,并由其中优秀的骨干分子建立民兵班、排,掌握武器(红缨枪、土枪等),紧密团结中农,形成农民阶级队伍的优势。<sup>[5](P.215)</sup>而地主、乡绅、富农则从农村社会阶层体系的上层向下流动到农村社会的底层,被排斥在新的村级组织之外。

## 3. 村级组织与国家-农民关系

新村级组织成为构建新型国家与村庄、农民关系的组织中介,有效加强了中共和新兴国家对农村的渗透和控制。“就政权与村庄的关系而言,土地改革和税率提高使国家政权空前地深入自然村。旧日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sup>[6](P.173)</sup>村级组织的创设过程本身就是共产党组织农民、深入农村的过程,中共通过创建自己掌控的村级组织第一次将国家的权力延伸到了自然村。例如,农民协会的性质被界定为“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但在土改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工作队干部包办代替的情形,如湖北黄冈的土改运动中,“工作队不是当群众的参谋,而是当群众的司令员,这种情况则相当普遍”,在当选代表出席农代会时,圪春××乡农民说:“我们是门客掌钥匙,当家不做主。”<sup>[7]</sup>农民协会的具体职能可谓包罗万象,湖北枝江县土改时,农协领导会员开展了216次大规模的诉苦大会,控诉511个地富、恶霸、土匪逼死人命、霸占田产、强拉壮丁等452项罪行,甚至原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需经农协审查决定<sup>[8](P.552)</sup>。可以说,农民协会弥补了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及政党组织向农村扩张不够、下移不深的局限,成为新旧交替之时有效沟通国家与乡村、农民的渠道,有效地将高度分散的农民整体上纳入新兴国家的控制体系,加强了中共对农村的社会控制。

## 二、合作化时期(1954-1958年)

### 1. 合作化时期的村级组织

合作化时期的村级组织主要包括行政村组



织、互助组、合作社以及村党支部。乡镇是基层政权组织,乡镇不直接干预农民,其职能是组织生产合作,管理文教、卫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财粮、调解等,而村已经改变其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合作社只是经济方面的组织,这种组织实行多层次多级别的管理制度。

自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之后,行政村开始改变其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只是作为乡人民政府的下属机构或派出机构而存在。面积较大、居住分散的乡,由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组成行政村,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划定居民组。行政村设村主任1人,副主任1~2人,村的正副主任在乡人民代表中推选或由乡人民政府委员兼任。辖村不多的乡,乡长可兼乡政府所在地的村主任。村的主要职责是在乡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召开所辖地区的乡人民代表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会议,讨论执行乡人民政府的决议,检查执行情况以及协助乡长处理日常事务。<sup>[9]</sup>

互助组有临时性、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两种基本形式。互助组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农民根据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劳动互助,土地的产出和农业剩余由农民自由支配,村落的治理方式和乡村权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主要的特点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属于农民私有,但可作为股份加入合作社再进行收入分配,农民收入由土地报酬和劳动工分两个部分构成。在实践中,初级社的组建范围一般是自然村。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特点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集体劳动,分配上取消土地报酬,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即以合作社为分配单位,合作社从每年的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和向国家缴纳的税金,留出一定数量的生产基金、公积金和公益金,余下的实物和现金再分配给社员。高级社的组建范围一般是行政村,每年高级社的户数不同,1950年为32户,1953年137.3户,1956年246.4户,经过整顿后,1957年为158.7户。<sup>[10](P.415)</sup>

此外,这一时期,中共开始在合作社和行政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建国初期,中共农村支部只达到乡一级。合作化运动的推行,使得中共组织开始由乡向村庄延伸,“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将党的支部由行政乡一直延伸到村庄和生

产单位”<sup>[11]</sup>。

## 2. 村级组织与村庄内部权力结构

在村级组织内部,组织成员的身份和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合作社成员在身份上逐渐形成社队干部和普通社员两大群体,代替了土地改革时期多等级的身份标签,社员的身份掩盖了农民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

其次,合作化运动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农民开始了由单家独户、分散个体经营转向由集体统一安排生产任务、集体劳动、挣工分维持生计的漫长岁月。

## 3. 村级组织与国家—农民关系

将农民组织起来体现了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努力,为国家从农村吸取资源、在农村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通过合作化、统购统销和1958年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国家在农村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土改后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双边关系被新的国家、村级组织与农民三方关系所取代,有利于国家从农村吸取资源。这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从农业生产计划上来看,农村高级社化以后,高级社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农业生产从生产计划到农作物播种面积等基本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其二,从农产品的流通上来看,1953年底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从流通组织形式上和渠道上,形成了国家对农产品交换的垄断价格”,“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限制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sup>[10](P.114)</sup>。

其三,从农民交纳农业税的方式来看,土改后,农民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公粮)采取分户负担、分户缴纳的方式,初级社时期改为分户负担、由社集中代交,高级社时期则改为由社统一负担、统一交纳。合作社等村级组织的建立,为国家在农村征收农业税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组织保障。<sup>[12](P.114)</sup>

## 三、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2年)

### 1. 人民公社时期的村级组织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党政合一,政经合一,“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sup>[13](P.616)</sup>。人民公



社的规模,初期的一个公社平均大约由 28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sup>[14](P.774)</sup>,平均每个公社 4600 多户,1962 年及其后人民公社的范围有所调整,但直到 1982 年人民公社废除前夕,全国 54 352 个人民公社中,人口在 1 万以上的人民公社占 61%,1 万人以下的占 39%。<sup>[15](PP.68,71)</sup>公社的组织架构一般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村级组织框架主要由生产大队、生产队及其管理委员会、党组织以及贫下中农协会所构成,其中,党组织职责全能化,大队党支部成为村级的一元权力中心。

## 2. 村级组织与村庄权力结构

从大队和生产队来看,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本来是生产管理组织,但是作为公社的下属组织,必须接受公社的集中统一领导,完成一定的行政工作,“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管理本大队范围内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和行政工作”<sup>[13](P.624)</sup>,如生产、分配、兴办农田水利建设、组织生产队之间的协作、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规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民政、民兵、治安、文教卫生等。同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采取严格的自上而下的逐层任命制,生产大队干部,由公社党委任命,生产队干部则由大队支部决定,社员举手通过。

普通农民(社员)必须接受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的统一管理和领导,必须服从这个自上而下的严密的管理控制体系,不能自由迁徙、流动和择业,否则,正常的生存便无法保障。村庄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农民的生产方式、收益(完成国家的征购派购任务和扣除集体提留之后的农业剩余才能分配给农民)、生活方式都被严密地控制。在这样一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下,农民群众的政治、社会参与和民主权利难以具体落实。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党组织在设置上,一般在公社一级设立党委,有的地区在公社与大队之间的管理区设党总支,生产大队设立党支部,生产队则设立党小组,“人民公社根据规模的大小和党员的多少,设立党委员会、总支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生产大队,根据规模的大小和党员的多少,设立总支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在人民公社内的党委员会、总支部、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sup>[13](P.645)</sup>。在公社党委——管理区党总支——大队党支部——生产队党小组的组织系统中,党

小组向党支部负责,党支部向党委负责,而在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内,权力又高度集中在党的书记手中,中共不仅建立起严密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网络,而且“党政合一”,权力高度集中,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组织成为农村各项工作的绝对领导核心,其职能无所不包。在大队一级,大队管理委员会、青年团、妇联、民兵连等组织全部接受党支部的领导,党支部有权为这些组织制定大政方针,并监督它们执行。<sup>[16]</sup>党的支部在大队的建立意味着党的权力通过健全的组织系统已经渗透到了农村的最基层。<sup>[17]</sup>大队党支部成为村落治理的核心和绝对主宰力量,也成为人民公社体制稳定、长期存在的重要支撑。

## 四、“乡政村治”时期(1982 年以来)

### 1. “乡政村治”时期的村级组织

“乡政村治”时期,乡镇是基层政权,乡镇以下实行自治,人民公社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体制逐渐解体,被乡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组织架构所替代,在村级占主导地位的组织主要是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和村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地域范围一般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为基础,由几个自然村联合组建而成,少数以自然村为基础,根据需要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等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村委会的职责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是完成村级自治性的事务,如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管理本村集体资产,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开展文化建设活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二是协助乡镇政府完成一些行政性事务。此外,村民委员会下设若干村民小组,村民小组一般以公社时期的生产队为基础,村民小组在很多地区只设组长一人,组长多由各小组村民直接推选。村民小组直接面对村民,是村委会和村民之间沟通和联络的桥梁,其主要职责:一是贯彻落实村民大会和村委会布置的任务,二是处理与村民利益直接相关的小组内部事务,如农地承包权的变更、水利灌

溉、向村委会反映本组村民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农村改革以来,村级党组织的设置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立村党支部,这种情形最为普遍;二是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村,设党总支或党委,如被称为“豫中一枝花”的河南省南街村,1988年村党组织从支部升格为党总支,1993年又升格为南街村党委。<sup>[18]</sup>此外,少数村只有党小组,未设村党支部。到2006年,全国共有农村基层组织90多万个,其中村级组织73万个(包括党支部、党总支、党委)。<sup>[19]</sup>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政社分设、政企分开,与之相应,各地以村、组为基础,成立了村、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土地的农民群众集体占有关系是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赖以建立的基础”,并且,这些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不改变土地关系和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专业性强”、“组织类型多样化”、“多数为民办官助”、“脆弱性”等特点<sup>[20](PP.175,246-247)</sup>。从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村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一般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管理土地(包括土地承包分配和调整,农田基本建设,有的还经营一部分土地)和其他集体资产;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及兴办和管理集体企业。有部分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村,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向农民和农户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较为广泛的服务,但是,相当数量的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集体经济力量薄弱,统一服务的功能有限。

由上可见,从村级组织的设置情况来看,“乡政村治”时期的村级组织呈现出类型多元化特点。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改革的推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失去其经济基础而解体,农村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农村村级组织出现了重建、重组和分化,村级出现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和村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等三大组织系列并存的复杂图景,而且三大组织往往“三套牌子、一班人马”,三位一体,干部交叉任职。此外,加上共青团、妇联、宗教组织和宗族组织等组织,农村村级组织更加多元化,村级组织在组织内部、组织之间、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组织与国家等方面的关系更加复杂。

## 2. 村级组织与村庄内部权力结构

这一时期村级组织重组所引起的村庄内部权力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村级组织与农民的关系发生改变,村级

组织不再掌控农民的生产方式与收益分配,农民成为自主经营、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从财产权利和身份自由方面,获得了双重解放”<sup>[21](PP.47-49)</sup>。同时,农民也更加分散、“原子化”。

其二,村落内部权力结构从人民公社时期以党组织为一元权力中心转变为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二元权力中心,但村落二元权力中心即党支部的领导权和村委会的自治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对抗。

一方面,村级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一般集中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村经济组织往往只能按照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决策去执行。

另一方面,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委”矛盾不断。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首先,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村党支部并没有成为自治组织,这一点与村委会的性质截然不同。其次,在所有村级组织中,村党支部居核心地位,村党支部与其它村级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如何既能保证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又能实现村委会的自治权,成为现实中难以处理的问题。因此,“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村庄区域特殊政治现象,即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依托的村委会主任和以中国共产党村支部委员会为组织依托的村党支部书记围绕着村庄公共权力而形成的对立冲突。”<sup>[22](P.16)</sup>村委会主任以《村组法》为依据,而村党支部书记则以宪法、《党章》、《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依据,二者围绕着村庄公共权力和利益分配明争暗斗,争做“当家人”,“两委”矛盾不断。民政部门曾对发生过两委关系不和的村作过初步统计,村委过度“自治”,支部放弃领导的比例,只占11.8%;两委互不相让,村级组织瘫痪的情况也只占7.2%;而党支部包办村务,村民自治功能弱化的则占81%。<sup>[23]</sup>

为了缓和及化解“两委”的矛盾,各地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起源于广东、山东的“一肩挑”或称“两委合一”模式被广为推行。“一肩挑”简单地说即由一人兼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两委合一’意味着党支部直接行使管理职能,减少了党支部和村委会两者分立情况下的摩擦,提高了党支部的管理效力。也减少了乡村干部的职数,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sup>[24]</sup>但在村民自治实践中,

若缺乏有力监督,“一肩挑”模式有可能演变为当选者独断专行,“一言堂”。

### 3. 村级组织与国家—农民关系

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部分撤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发生重要改变。在我国“乡政村治”格局形成后,乡(镇)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末梢,乡以下的村级事务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组法》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指导、支持、协助关系。不过,村委会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协助乡镇政府完成一些行政性事务,因而成为“半行政组织”。

## 五、结语

19世纪中叶,马克思用“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sup>[25](P.678)</sup>来形容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小农无力从政治上反映和代表自身利益的分散状态。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多次用“一片散沙”<sup>[26](P.722)</sup>来描述中国人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状态,而在学者梁漱溟笔下,中国的农民是“散漫的农民”<sup>[27](P.495)</sup>。这些小农人数众多,封闭、自给自足,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分散的,缺乏组织纪律性。如何将这些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无论对于革命者还是建设者而言都是一个传统性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历经多次变革,多种村级组织依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农村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方式。纵观建国60多年以来村级组织体系的演变及其与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不难发现以下事实:

第一,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目标和组织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而民间自己组织发育不充分,发展动力不足,缺乏生长空间。建国60多年以来,作为农村村级组织成员的农民始终处于被动、被组织的状况,缺乏横向的、完全基于农民主观意愿建立起来的农民自组织。例如,村民委员会虽然是现今农村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村委会的组建是自上而下的、天然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其充当的仅仅是村庄事务性自治而不是村自治的组织载体,农民并没有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的权力和自由,也并不存在全国性的村委会组织。而且,村党支部

是农村的领导核心,由于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二者性质、授权方式、运作方式的差异、法律相关规定中二者职能的交叉与重叠,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村党支部书记是村落事务的“当家人”,大权独揽,村委会主任没有发言权,村民自治很难实现真正的自治。

第二,在广大村庄内部,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村级组织的重构,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和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构。

第三,在村庄外部,村级组织是连接国家与分散的农民的组织载体,有效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与治理。

第四,村级组织一旦建立,组织自身便拥有一定的权力和权威,对村落社会秩序、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国家对乡村的控制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将村级组织作为权力主体,建立国家—村级组织—农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可以突破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成为深化乡村权力结构研究的有效路径。

### [参考文献]

- [1]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战略与管理,2002(2).
- [2]金太军.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J].文史哲,2004(1).
- [3]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政权[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 [4]唐明勇.试论建国初期的农民协会[J].中共党史研究,2005(1).
- [5]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农民运动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 [6]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7]黄冈地委.半年来土地改革工作总结[J].黄冈通讯,1951(21).
- [8]枝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枝江县志[M].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 [9]何泽中.论村级组织变迁与村民自治[J].求索,2002(1).
- [10]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 [11]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J].学术月刊,2007(8).

(下转第99页)

#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初探

潘国红

(江苏省启东市人大常委会, 江苏启东 226200)

**[摘要]**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组织形式,体现的是代议民主和选举(票决)民主,但协商性也是其重要的民主特征。协商民主的理念内含于参议会制度的理论之中,也体现在这一制度的实践之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协商民主的宝贵经验,对当前各级人大履职中协商民主的运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参议会; 协商民主; 思想逻辑; 实践运用

**[中图分类号]** D6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52-06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型民主理论,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行动者通过对话、讨论、商谈、交易、妥协、沟通和审议等方式及机制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一种理论模式”<sup>[1]</sup>。它针对选举民主过于强调利益竞争和输赢对决,从而导致政治多数对于政治少数的压制,出现托克维尔所言的“多数人的暴政”这一缺陷而提出。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把“国家政权机关”(即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也列为“协商民主”的“渠道”,这是十八大的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要求“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思考民主、实践民主、推进民主的信心和智慧,对于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丰富人民民主内容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是对西方协商民主理念的借鉴,更是对我国民主政治传统,特别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边区参议会制度作为建国后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身,主要体现的是代议民主和选举(票决)民主,但协商性也是其重要的民

主特征。协商民主的理念内含于参议会制度的理论之中,也体现在这一制度的实践之中。当前学术界主要侧重于对参议会选举民主的研究,并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对参议会协商民主的研究很少有人涉及。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求对当前人大履职过程中引入和强化协商民主,充分发挥人大制度职能优势和特有价值有借鉴之用。

## 一、边区参议会协商民主的思想逻辑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即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全国而言,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都是在野党;就局部地区,陕甘宁边区政权是国民政府管辖的一个地方政权,共产党拥有自己领导的军队和统治区域,它是一个执政党。陕甘宁边区政权由参议会(民意机构)和政府两部分组成,分边区(相当于省)、县(市)、乡(有的地方称村)三级。边区参议会是边区人民参与国事管理、实现人民民主的主要组织形式,体现了选举和票决的价值,它与沟通对话为特征的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得

**[收稿日期]** 2014-09-20

**[作者简介]** 潘国红,男,江苏启东人,江苏省启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益彰,统一于发展民主、团结民众、巩固政权的伟大实践。在艰苦的探索 and 实践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林伯渠、谢觉哉等著名共产党人对初含协商民主意蕴的“民主商量”、“民主合作”各自进行了阐述和总结,虽然较为零碎和粗放,但协商民主思想的基本精神已经初见雏形。

### 1. 选举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

民主的实质是“谁之民主”和“如何民主”的问题。1935年,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1939年5月,毛泽东又使用了“人民民主”和“人民民主主义”的概念。<sup>[2]</sup>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人民在当时“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sup>[3](P.126)</sup>。如何实现人民民主?议会是现代国家民主基本的普遍的标志,民主只可能通过代议制形式实现,而代议民主制只可能通过选举的方式来体现人民主权。谢觉哉指出:“选举及议会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虽然说没有真正民主的实质,选举和议会,可以成为空架子,成为统治阶级骗人的御用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选举,没有议会,那民主的精神无所附丽,也就说不上民主”<sup>[4](P.636)</sup>。1937年5月12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提出了“采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的选举原则。<sup>[5](P.243)</sup>民主选举产生的参议会是边区权力机关和民意机构,它代表民意产生各级政府,决定边区各种重大事宜,创制及复决边区的单行法规。1943年4月25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各级参议会为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政府服从各级参议会之决议。”<sup>[4](P.14)</sup>边区各级政府由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受其监督,对其负责。谢觉哉说:“打个比方:议会是人民直接选的,是主人;政府是议会选的,是佣人。主人对佣人有监督指挥的权利,佣人应接受主人的监督和指挥。”<sup>[7]</sup>“参议会决议一经决定,就得执行,我们的议会,不是‘请客’,不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sup>[4](P.644)</sup>参议会由人民选举,接受人民的监督。1941年1月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指出:“民主的第一着,就是由老百姓来选择代表他们出来议事管事的人。边区各级参议会与政府,是老百姓选举的,但做了很久,做得对不对,应该向老

百姓报告,请老百姓检查,看还要你不要。”<sup>[6](P.206)</sup>选举民主通过投票方式遵循多数原则产生的参议会直接体现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原则——人民主权性质,是边区人民参与国事管理、实现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和最高实现形式。

### 2. 参议会引入协商和对话,可以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更好地实现人民民主

中国哲学奉行“和”、“中”的思维,体现在政治价值观念上是重谐和,贵合一,和为贵。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基础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和确立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背景。协商民主寻求的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民主关系,强调多元社会主体之间共生共存,注重在宽容基点上的对话、沟通、争论、妥协与共识,其理论原则和价值追求与抗战时期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相一致,因此,在以选举为基础的陕甘宁边区民主制度框架中,协商民主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他指出:“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及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sup>[7](PP.808-810)</sup>共产党“要学会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sup>[7](P.1062)</sup>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式所作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的,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地加以解释。”他还强调:“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sup>[7](P.809)</sup>周恩来说:“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人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 and 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地在于事前的协商 and 反复的讨论。”<sup>[8](P.134)</sup>选举民主突出的缺陷是遵循多数原则,注重的是结果,不可能完全反映整体的意志。边区参议会运用“协商民主”,就边区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公开的对话、交流和协商,让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个人等尽可能多的公众参与到商谈中来,有

助于促进不同群体间的沟通与理解,使各方面利益得到不断协调和兼顾,有利于建设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战线。

### 3. 发展协商民主,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党的领导

协商民主需要政治权威来主导,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根本保障。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组织普遍实行具有民主性质的“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即在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同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个人协商共事提供了平台。如何保证共产党的领导?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而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sup>[9](P.742)</sup>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统一之道,关键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党员的模范作用,真正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针对当时党内一部分人抵制“三三制”政策,邓小平批评道:“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立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sup>[10](P.11)</sup>谢觉哉也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是带路的意思,有正确的政策和模范的行动,大多数人们自然跟着走。如果靠党员占权位的人多,使少数人不敢不跟着走,那是压迫,不算领导。”<sup>[11](P.63)</sup>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靠共产党员人数多,有权力、有武装来支撑,而是靠共产党以其先进性发挥“带路”、“引导”、“服务”和“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来获取和实现。

## 二、边区参议会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

协商民主需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靠民主的法制化、程序化来实现。边区参议会协商民主的基本主体是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个人。协商活动的领域是边区的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事务以及群众生活等重要问题。协商民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协商一致,通过商讨和吸纳不同意见或相互之间的妥协来达到意见的一致。在意见

分歧的情况下,以商讨等方式来取得共识。边区参议会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构成多元、主体平等、目标明晰,运行有规则、协商有机构、成效有落实的协商民主运行机制。

### 1. 协商准则:《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抗日民主政权是各种爱国政治力量联合的政权,参加政权的各阶级、阶层、各党派与群众团体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政见也自然各异,因此,必须有共同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个合作的政治基础就是抗日和民主。为保障这种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41年,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总结边区建设的实践经验,重新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共21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于同年5月1日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又称“五一纲领”),同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以法制的形式固定下来。施政纲领具有地区宪法性质,通篇贯彻着抗日和民主的精神,对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兼顾了各抗日民主阶级、阶层的利益。如《纲领》第6条明确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施政纲领对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各方都具有约束力,无论是工农分子,还是地主、富农、商人;无论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还是中间分子,都必须以它为准绳,都不能站在各自原来的立场,为各自的利益而说话、办事,而必须以施政纲领为准绳。《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协商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和办事准则。

### 2. 协商平台:“三三制”政权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在边区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初建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机关里,“清一色”的中共党员现象相当普遍。为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各阶层的广泛代表性,中国共产党力图用选举以外的协商民主形式来对选举民主进行补充。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信中明确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sup>[9](P.742)</sup>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的报告时,进一步阐明了“三三制”政权的阶级实质。他指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sup>[9]</sup>(PP. 750-751)“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通过根据地广大人民的民主选举和各阶级各阶层广泛协商完成的。“三三制”政权的基本精神,包含有多元、参与、平等、公开、有效等民主元素,可以说是中国政权史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初步形态。“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既为党同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个人合作共事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各方面爱国人士发挥作用提供了载体和平台。

### 3. 协商形式:会内和会外相结合

陕甘宁边区对协商民主的方法和形式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协商的方法主要是注意倾听和展开讨论。在共同政治基础和行为准则的前提下,鼓励不同意见表达,各方以开明胸怀和耐心姿态接纳对方观点,特别是不同意见甚至是逆耳之言,而后进入平等交流、互相说服的理性讨论阶段,最终在照顾和维护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商形式主要采取会内和会外相结合。“用会议形式解决相互间的纠纷”,是民主协商的主要形式。谢觉哉认为,“施行民主,就得开会,除定期的参议会会议、各团体代表会议外,还须有很多会。会是民主制的具体实施”<sup>[12]</sup>(P. 348)。“一揽子”会、群英会、座谈会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议协商的主要形式。“一揽子”会以乡参议会为主体,即在乡参议会召开时,召集乡政府委员、行政村主任、自然村村长以及共产党员支部干事等,不分党内与党外,不分议员与非议员,围绕全乡政治、经济、文化等群众性的大事,大家讨论、大家决策、大家分工、大家落实,“决议,一揽子;执行,一揽子”。群英会在边区、县、乡举行,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召开或作出重大决策时,邀请本地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参加或列席会议,发挥他们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座谈会则在边区和县级举行。1944年7月,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运用党外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方式,听取党外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并将它们的意见作为指定方针政策的重要参考。而后,“座谈会”作为边区参议会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成为边区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3]</sup>

此外,会外(指会前和会后)协商也是一种重要方式。林伯渠指出:“党外人员尤其中间人士,不习惯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尤其不习惯在会议上争论问题,这虽然是他们的弱点,是他们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但我们今天还不能不顾及他们这种习惯;反正一切重要问题全靠至少主要靠会前会后经过个别协商,以座谈方式决定,提到正式会议上只是取得合法手续而已。遇有意见分歧,争论不能避免时,也要尽量使用会外谈话方式求得解决”<sup>[14]</sup>(P. 395)。

## 三、协商民主在边区参议会履职过程中的广泛运用

边区参议会具有重大职权。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正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明确规定了边区参议会的职权:“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之公务人员,创制及复决边区之单行法规,批准关于民政、财政、粮食、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计划等各项计划,督促及检查边区政府执行参议会的决议,决定边区应兴应革之重要事项等。县和乡市参议会也拥有类似之职权。”<sup>[4]</sup>(P. 289)参议会在其履职过程中,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被广泛应用,并取得卓越成效。

### 1. 加强选前协商,保证选举结果的民意代表性

参议会和政府选举采取协商在前、票决在后,通过协商再做票决的方式,避免票决对政治少数的压制。一是在选举开始之前,边区党和政府组织大量干部深入到县、乡、村对选民进行宣传动员,与广大工农群众选民和地主、士绅等选民开展对话协商。二是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阶级、阶层代表人士共同协商联合提出候选人。在提出候选人、确立候选人环节反复酝酿、充分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立最终候选人。三是采取“退出”或增聘的办法进行调整。如果候选人中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时,就采用共产党员自动退出选举的办法,依次由非党人士递补。选举结果如果不符合“三三制”的要求,则根据选举条例的相关规定,边区政府与各群众团体、地主、士绅中的代表人士协商推举一些代表,由边区政府聘请为参议员,其名额一般不超过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

### 2. 公开征求意见,提高立法的科学化和



民主化

边区、县(或等于县的市)参议会拥有立法权(乡级参议会没有立法权)。边区参议会在其存在的13年间,制定颁布了具有根本法性质的宪法,以及刑法、民法等法律文件,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体系。参议会在其立法过程中广泛存在着协商民主。一是了解民众意见和诉求,确立立法议题。谢觉哉说:“法源在人民。”<sup>[15](P.52)</sup>边区参议会通过的每一个法律法规,都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都是深入群众生产生活实践,广泛听取和征求群众意见,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而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3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46年)等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都是立足边区实际和民众的利益诉求进行创制或修订的。二是公开征求意见,汇集民意。参议会常驻会在法律草案完竣后,在群众中发动普遍讨论,向社会各阶层公开征求意见,通过广泛的讨论、协商,汇集各方民意,加以研究整理,再到参议会上讨论。<sup>[16]</sup>三是形成广泛共识,表决通过法律。边区制定、修改、废止的法律草案提交参议会,参议员们对法律草案的每条款项进行激烈的讨论审议,参议员们站在其所代表的群体利益的立场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经过充分讨论协商取得共识后表决通过。对于不符合边区实际情况,或者执行困难较大,或者违法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律草案,表决时会受到参议会的否决。

### 3. 开展检查评议,推进政府工作

群众在选举中直接检查政府工作和群众选出参议员在参议会中检查政府工作,是群众检查政府工作的两种方式。在边区各级的选举会议中,政府都要报告其执政以来的工作情况,政府工作人员也纷纷向群众报告工作并作自我批评,接受群众询问和批评。群众根据实际情况评论政府工作的好坏,然后通过民主选举,清除那些不称职的代表和干部,选出那些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好人”。在各级参议会会议上,同级政府主席或副主席,代表政府委员会作书面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各职能部门作专题工作报告,接受参议员的检查和评议。“凡参议员对于政府工作报告,均有询问权,询问时以书面或口头为之,由大会主席团通知主管机关负责人定期答复之;如认为答复不满意时,可再提出询问”<sup>[4](P.302)</sup>。参议员在会议上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不受任何限制。参议员们知无不言、言无

不尽,热烈地检讨政府工作。政府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查漏补缺,不断改进政府工作。

### 4. 广泛征询意见,提高提案质量

提出提案(即议案和建议)是参议员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途径。提案质量是能否在参议会通过并最终实施的关键。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高度重视提案质量,要求各级参议会以协商民主的方法通过对话、沟通、争论,广泛听取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保障提案质量。谢觉哉在《县参议会怎样开会》一文中指出,提案的收集,“必须各方面先研究,准备,才能有良好的提案出来”<sup>[4](P.679)</sup>。林伯渠在《关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的报告中要求,提案“事先要有些酝酿”,要“在小组会上大家讨论、座谈、漫谈、交换意见得出一个总的意见”<sup>[4](P.405)</sup>。注重提案议题选择和确立过程中的多方调查和沟通交流,重视参议会表决前的充分审议和热烈讨论,有效提高了提案的质量,同时也较好地实现了各方对提案的共识,便于提案通过后的实施。深为人们熟知的“精兵简政”提案,是李鼎铭先生在广泛征求了各方面人士意见和11位参议员签名基础上提出的,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以165票(共219位参议员)的绝对多数表决通过,并作出了“交政府速办”的决议。这一提案促成了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历时3年多的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

### 5. 倾听各方意见,提高闭会期间参议员履职成效

参议员是参议会的主体,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代表群众,参议员除了参议会会议期间履行职责外,在闭会期间也积极履职,开展经常性参议会活动,将协商民主运用于工作之中。参议会闭会期间,参议员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传达参议会通过的决议、纲领;检查督促各级政府实行参议会决议;联系群众,集中群众意见。参议员工作和生活群众中间,为更好地履行职责,参议员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开展调查研究。为了更好地联系群众,许多地方成立了议员小组,将参议员与所属辖区的选民联系起来。各议员小组深入群众,经常到农村、机关、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听取群众的呼声,如那里的公务人员是否称职,法令是否执行,有无违反人民利益的坏例子及其能帮助人民的好例子,上级是否来检查过或深入检查过工作等等,然后将各个方面的意见综合起来,形成符合实际的



提案提交各级参议会。

#### 四、结语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协商民主的广泛运用,符合当时根据地的社会结构以及团结各种抗战力量的需要。选举民主,落实主权在民原则;协商民主,有效协调根据地内部各阶级阶层的矛盾;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真正使人民民主在陕甘宁边区得到了施行,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了“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和“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民主实践,凝聚了各阶级、阶层以及各民族的力量,巩固和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提高了中共在全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并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协商民主的宝贵经验,对当前各级人大履职中协商民主的运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的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既是对我国近年来民主政治发展实践的总结和发展,也是对未来政治文明建设表达的新期待。人大是行使国家政治决策的权力机关,又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达场所。目前我国人大制度的具体构造和现实运行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人大工作应注重吸收协商民主的优势和特长,在履职过程中积极引入和强化协商民主的机制,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以充分发挥人大制度反映民意、整合民意的职能优势和特有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协商民主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选举民主的超越;但作为制度,协商民主依然是在选举民主这个宏观制度框架下运行的”<sup>[17]</sup>。选举是民主体制中的核心制度,协商则在更多的情况下体现为一种机制,协商民主主要是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起到一种辅助和纠正作用,而不是全盘取代选举民主及其运作。人大在推动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协商民主服从和服务于人大制度这一原则,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持续的良好发展趋势。

#### [ 参 考 文 献 ]

- [1] 邱家军.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技术路线的沿革及协同——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径:选举与协商学术研讨会综述[J]. 人大研究,2008(3).
- [2] 张卓明. 历史维度下的民主中国梦——人民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兴起[J]. 浙江社会科学,2013(7).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Z].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 [5] 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 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Z].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
- [6] 韩延龙,常光儒.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Z].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周恩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1] 谢觉哉. 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 [12] 谢觉哉. 谢觉哉文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13] 魏晓东. 陕甘宁边区的协商民主及其启迪[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4).
- [14] 林伯渠. 林伯渠文集[C].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 [15] 杨永华.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编(宪法、政权组织法篇)[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 [16] 宇赟. 民意的结晶,政策的定型——刍议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立法特点[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
- [17] 万其刚,李春华.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J]. 人民与权力,2012(12).

(责任编辑 光 翟)

# 近30年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综述

王倩雯 彭 校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近30年来,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整体性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和专门性研究。其中尤以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历史学家研究和经济史研究最为突出。当然,专门性研究也继续深入并逐渐发展。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学; 30年来; 发展变迁; 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58-05

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变迁问题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研究,对整个社会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学术界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对该问题的研究。建国以来,研究论著日益增多,研究人员范围渐广,标志着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研究日益走向成熟。特别是近30年来,研究方向更加全面深入,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

近30年来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整体性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和专门性研究三方面。

## 一、整体性研究

### 1.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有向燕南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社会科学运动与史学发展的新境界》<sup>[1]</sup>和李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新发展》<sup>[2]</sup>。前者概括了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新社会科学运动所促成的中国史学发展新境界,指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方面,不仅超越了前一阶段以胡适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史学观点和方法,而且超越了简单的历史进化论;后者总结了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

在史学史研究方面,有杨俊光的《魏应麒〈中国史学史〉的编撰特点》<sup>[3]</sup>,论述了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具有注重总结中国史学整体特征以及各个发展阶段、在章节设置上注意史学的前后联系和前后对比、对史学理论家格外重视以及在体例安排上注重“以类相从”的编撰方式等四个特点,并从整体上肯定了该书的价值和地位。丛晓立的《吴泽与中国史学史研究》<sup>[4]</sup>揭示了吴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四个特点:宏观分析与个案考察并重;历史感与现实感紧密相连;研究方法创新;批判精神与开拓精神。瞿林东、张越、罗炳良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2001-2010)》<sup>[5]</sup>则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做了总结性论述,并展望了未来的前景。

### 2. 新史学

吴珍的《从历史小说看中国近现代史学观念的嬗变》<sup>[6]</sup>和闫立飞的《新史学观念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sup>[7]</sup>,均将史学新观念与近现代历史小说结合在一起,阐述了中国近代新史学观念起源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新史学”,然后发展至胡适和顾颉刚的实验主义“现代新史学”,最后到李大钊的唯物主义史观。中国史学经历了“信古”、“疑古”

**[收稿日期]** 2014-10-16

**[作者简介]** 王倩雯,女,江苏扬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彭 校,男,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到“释古”三个阶段。倪爱山、徐国利的《简论清末民初新史学》<sup>[8]</sup>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进行论述,并将新史学和旧史学以及西方史学进行比较,得出新史学具有科学性、民主性和民族性的观点。

### 3. 发展主流及趋势

苏全有、常城的《当代中国史学界的三大趋向——以朱英为例》<sup>[9]</sup>和杨鹏的《中国近代三大史学主潮中的日本影响因素分析》<sup>[10]</sup>,均解读了现当代中国史学界的三大主流趋向,即:实证主义、多元化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关注现实社会的史学情怀。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视出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对当下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4. 史料

这方面的成果很多,如高石钢的《傅斯年史学思想述评》<sup>[11]</sup>、周兴樑的《报刊资料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sup>[12]</sup>、安尊华的《试论梁启超的史料思想》<sup>[13]</sup>、李春雷的《留学生与民国时期史料的保存和利用——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为例》<sup>[14]</sup>、陈园园的《陶希圣与“食货”学派研究》<sup>[15]</sup>、涂怀京的《胡适教育活动史观初探》<sup>[16]</sup>,等。这些文章具体论述了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保存、辨伪、校勘、辑佚及功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周兴樑的《报刊资料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他首先介绍了近代中国报刊这个史料大宝库,接着详细论述了近现代报刊史料的重要价值和特点,最后着重从报刊史料订史、补史的史学功用层面阐述了报刊史料对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 5. 其他

在史学考证方面,主要有朱允兴的《史坛考证热之我见》<sup>[17]</sup>,作者坚持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克服在诸多领域出现的分歧和貌似创见的现象。这对刚入门的后辈史学学者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在史学功用方面,刘俐娜的《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sup>[18]</sup>借助新理论反省传统的史学,重新阐述了史学为社会、为人生服务的功能,既体现了时代发展对史学的影响,也体现了学者们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全面和深入。

## 二、历史人物研究

### 1. 重要历史学家

(1) 梁启超:论述梁启超贡献的论文,有罗欣的《梁启超对文献学的贡献》<sup>[19]</sup>和石莹丽的《梁启超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

析》<sup>[20]</sup>。前者论述了梁启超在文献的分类、目录、辨伪及辑佚等方面对文献学的贡献;后者分析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历史人文地理学、社会学、西方经济学理论、心理史学以及历史统计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输入和倡导,肯定了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史学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作用。邱丹丹的《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及成因(1898—1906)——变与常的交织》<sup>[21]</sup>选择了梁启超一生思想中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通过爬梳他的个人经历、与师友的交往活动、著述及往来信件,并对史料进行时间上的梳理和逻辑上的总结,阐述了1898—1906这八年间梁启超的四次主要思想变化及其原因。

(2) 傅斯年:高石钢的《傅斯年史学思想述评》<sup>[11]</sup>、刘进全的《傅斯年史学思想探析》<sup>[22]</sup>通过对傅斯年的学术著作、他人的传记以及其他相关学术资料的客观解读,阐述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形成背景和主要内容,肯定了其对中国现代史学的积极作用,也简要分析了其史学思想的不足之处。

(3) 钱穆:对钱穆的研究较为深入,成果主要体现在钱穆思想研究,如徐国利的《钱穆史学思想研究》<sup>[23]</sup>和《钱穆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述论》<sup>[24]</sup>、赵敏俊的《钱穆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论》<sup>[25]</sup>、何方昱的《钱穆教育思想初探》<sup>[26]</sup>、张笑龙的《钱穆对明清学术思想史的研究》<sup>[27]</sup>等。这些研究对钱穆的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进行了客观详实的论述,但遗憾的是,基本上只是从正面对钱穆的思想进行了赞扬与肯定,未能指出其思想存在的不足之处。

(4) 顾颉刚:对顾颉刚的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的,有黄海烈的《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初探》<sup>[28]</sup>、《试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sup>[29]</sup>和《试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sup>[30]</sup>,袁忠东的《试论顾颉刚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sup>[31]</sup>,陈寒鸣的《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sup>[32]</sup>,卫崇文的《试论顾颉刚先生与古史辨运动》<sup>[33]</sup>,唐建军的《试论顾颉刚疑古史观的形成与其性格的关系》<sup>[34]</sup>,沈颂金的《试论顾颉刚与考古学的关系》<sup>[35]</sup>,等。这些文章具体介绍了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史观和“古史层累说”的形成原因、具体内容以及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黄海烈的《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初探》和《试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前者首先对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思想来源、主要观点和理论结构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

研究,认为其开创了20世纪古史学研究的模式,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遗留了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其次在理论方法方面,指出了顾氏无限制使用“默证法”和“社会背景分析法”的薄弱之处,认为其最终导致了顾氏某些具体古史学观点的偏差,并运用考古材料针对“古史层累说”中的个别观点进行实证研究,充分肯定其合理内容,同时也指出其弊端,修正其错误。最后提出应批判继承顾颉刚的古史学说,并将狭义历史学与考古学进行整合,以此推动中国古史学的进步与发展。后者对顾氏的“古史层累说”提出了三个阶段、四个局限、四个问题,并指出对其学说应持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

(5) 其他史学家:覃梅溪的《雷海宗史学成就研究》<sup>[36]</sup>首先考察了雷海宗的生平和学术历程,进而客观全面地评述了其三部主要的学术著作,并总结了这三部著作的特点,最后客观公正地评价了雷海宗史学成就的地位和影响,肯定了其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的贡献。许凌云的《毛泽东史学理论的杰出贡献》<sup>[37]</sup>首先指出了毛泽东的史学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详细论述了毛泽东史学理论的四大杰出贡献,着重指出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历史研究,是因为他非常深刻了解历史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从中引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并据以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同时还阐述了毛泽东十分注意历史研究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 2. 其他学者

张艳国的《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论析——本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研究之一》<sup>[38]</sup>指出了李大钊的史学理论是中国近代史学由资产阶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变的重要标志,论述了李大钊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王吉伟的《刘咸炘史学研究》<sup>[39]</sup>主要介绍了刘咸炘在学术史研究、方志研究和传统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史学成就,指出刘氏重视中西学术的交流和融合,其对方志的研究补充了国史研究,开辟了“大史学”的新天地。王传的《华南学派探渊》<sup>[40]</sup>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史学实践为考察视角,由个人扩大到群体,介绍了二所作为现代学术机构的具体运作特点、取得的学术成

就及影响。史玉华的《怪诞背后的真——论辜鸿铭的保守主义文化观》<sup>[41]</sup>论述了辜鸿铭的文化观既不同于清末的洋务派、国粹派,也有别于民初的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及后来的新儒家,在当时的保守主义知识群体中显示了他的另类。徐暉的《顾树森教育生涯与学术思想研究》<sup>[42]</sup>通过阐述顾树森教育生涯中职业教育与教育史学两个方面的思想,初探顾树森教育思想,并且在阐述顾氏及其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揭示了研究顾树森教育思想的价值。黄庆桥、关增建的《钱三强科学史贡献初探》<sup>[43]</sup>,则对钱三强的原子能、科技史、科技史学思想等方面做了总结性论述,指出这些活动对中国科技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 三、专门性研究

### 1. 与专门学科相结合

(1) 经济史学:赵德馨的《经济史学: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sup>[44]</sup>论述了经济史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的性质和地位,通过分析举例,概述了经济史学的发展演变历程。向燕南、尹静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sup>[45]</sup>介绍了陶希圣与《食货》的创办,论述了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并对《食货》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2) 音乐史:张静蔚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sup>[46]</sup>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进行了综合回顾,并介绍了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新时期的学术会议与学术争鸣,概述了该时期的专题研究、专著与史料成果,但未涉及音乐史研究方法。而兰燕的《九十年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法论综述》<sup>[47]</sup>恰好弥补了这一点。此外,常江涛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两部奠基之作研究》<sup>[48]</sup>和王爱国的《专题阐释,旁征博引——评刘再生著〈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sup>[49]</sup>对近现代音乐史著作都做了内容上的宏观介绍和思想、逻辑上的细致分析。

(3) 新闻史: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谭泽明的《试论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兼谈创新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sup>[50]</sup>。该文指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存在的本体迷失和过度依赖外来学术研究成果的问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及特殊要求,最后提出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应走立足自身探寻规律和民族特色历史研究之路。

### 2. 特殊的断代史

(1) 中共党史:作为一个特殊的断代史,中共

党史研究亦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杨玉玲的《新视野·新突破·新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回顾与思考》<sup>[51]</sup>和汪兵的《中共党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评述及研究展望》<sup>[52]</sup>均对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伍敏的《张静如中共党史学术思想研究》<sup>[53]</sup>考察了张静如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历程,论述了他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理论思想的研究,分析了张氏研究中共党史有所侧重、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史论结合的特点,客观地评析了张氏学术思想的价值,并对其中党史学学术思想进行总结,从中获得启示。

(2) 抗战史学:赵亮、杜学霞的《抗战时期三大区域抗战史学概况简述》<sup>[54]</sup>论述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大区域抗战史学的形成,分析其原因,通过对比总结特点,并客观地肯定了三大区域抗战史学阵营的历史地位。朱春龙的《从回忆到研究——刘大年抗战史学研究再探讨》<sup>[55]</sup>首先从现实与学术两个层面阐述了刘大年抗战史学的研究动机,然后论述了刘大年对抗战史料的整理与对抗战史研究理论的体系构建,最后分析了刘大年对抗战史学研究的主要意义。

综上所述,近30年来史学界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之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上,21世纪以来更注重全面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历史学科与相关专门学科的结合似乎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地方志和考古资料的运用,因此,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依然存在一定不足,在某些领域的探究并未深入。例如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较多,而对群体研究较少。此外,专门性的研究也只是更多的在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上有所开拓和挖掘,在社会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上则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 [ 参 考 文 献 ]

[1] 向燕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社会科学运动与史学发展的新境界[J]. 江海学刊, 2008(3).  
 [2] 李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新发展[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  
 [3] 杨俊光. 魏应麒《中国史学史》的编撰特点[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4] 丛晓立. 吴泽与中国史学史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5] 瞿林东, 张越, 罗炳良.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2001—2010)[J].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2.  
 [6] 吴珍. 从历史小说看中国近现代史学观念的嬗变[J]. 芒种, 2013(19).  
 [7] 闫立飞. 新史学观念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J]. 社会科学战线, 2009(5).  
 [8] 倪爱山, 徐国利. 简论清末民初新史学[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4).  
 [9] 苏全有, 常城. 当代中国史学界的三大趋向——以朱英为例[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5).  
 [10] 杨鹏. 中国近代三大史学主潮中的日本影响因素分析[J]. 日本研究, 2010(3).  
 [11] 高石钢. 傅斯年史学思想述评[J]. 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1).  
 [12] 周兴樑. 报刊资料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C]. 北京: 中国近现代史史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4.  
 [13] 安尊华. 试论梁启超的史料思想[D]. 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 2005.  
 [14] 李春雷. 留学生与民国时期史料的保存和利用——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15] 陈园园. 陶希圣与“食货”学派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16] 涂怀京. 胡适教育活动史观初探[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6).  
 [17] 朱允兴. 史坛考证热之我见[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2).  
 [18] 刘俐娜. 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J]. 历史研究, 1996(3).  
 [19] 罗欣. 梁启超对文献学的贡献[J]. 高校图书馆工作, 1992(4).  
 [20] 石莹丽. 梁启超与中国近现代史学: 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8.  
 [21] 邱丹丹. 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及成因(1898—1906)——变与常的交织[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22] 刘进全. 傅斯年史学思想探析[D].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10.  
 [23] 徐国利. 钱穆史学思想研究[D].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0.  
 [24] 徐国利. 钱穆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述论[J]. 求是学刊, 2002(1).  
 [25] 赵敏俊. 钱穆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论[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26] 何方昱. 钱穆教育思想初探[D].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2003.

- [27]张笑龙.钱穆对明清学术思想史的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3.
- [28]黄海烈.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初探[D].长春:吉林大学,2007.
- [29]黄海烈.试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C].北京: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会,2009.
- [30]黄海烈.试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J].江苏社会科学,2010(4).
- [31]袁忠东.试论顾颉刚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
- [32]陈寒鸣.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
- [33]卫崇文.试论顾颉刚先生与古史辨运动[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1).
- [34]唐建军.试论顾颉刚疑古史观的形成与其性格的关系[J].潍坊学院学报,2004(3).
- [35]沈颂金.试论顾颉刚与考古学的关系[J].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 [36]覃梅溪.雷海宗史学成就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0.
- [37]许凌云.毛泽东史学理论的杰出贡献[J].齐鲁学刊,1991(1).
- [38]张艳国.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论析——本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研究之一[J].史学理论研究,1994(2).
- [39]王吉伟.刘咸炘史学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 [40]王传.华南学派探渊[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 [41]史玉华.怪诞背后的真——论辜鸿铭的保守主义文化观[D].湘潭:湘潭大学,2002.
- [42]徐晖.顾树森教育生涯与学术思想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6.
- [43]黄庆桥,关增建.钱三强科学史贡献初探[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1).
- [44]赵德馨.经济史学: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3).
- [45]向燕南,尹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 [46]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4).
- [47]兰燕.九十年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法综述[J].今传媒,2011(8).
- [48]常江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两部奠基之作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
- [49]王爱国.专题阐释,旁征博引——评刘再生著《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0(2).
- [50]谭泽明.试论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兼谈创新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J].新闻知识,2012(2).
- [51]杨玉玲.新视野·新突破·新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回顾与思考[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0(1).
- [52]汪兵.中共党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评述及研究展望[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4).
- [53]伍敏.张静如中共党史学术思想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 [54]赵亮,杜学霞.抗战时期三大区域抗战史学概况简述[J].理论界,2007(11).
- [55]朱春龙.从回忆到研究——刘大年抗战史学研究再探讨[J].抗战史料研究,2013(2).

(责任编辑 光 翟)

# 基于 FDI 产业集群的溢出效应分析

——来自江苏苏州的实证

吉丹俊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扬州分院, 江苏扬州 225003)

**[摘要]** FDI产业集群中外资占主导因素,行业进入壁垒很大,价值链主要环节基本由外资掌握,不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我们通过对苏州地区 FDI 产业集群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发现:在 FDI 产业集群内部,竞争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较明显。此外,企业集聚程度、技术差距以及 FDI 性质会对溢出效应的大小产生影响。

**[关键词]** FDI; FDI 产业集群; 溢出效应; 苏州

**[中图分类号]** F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09-0063-06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制造业资本不断向中国东部地区转移,大量外资企业在长三角地区扎堆、集聚,出现了不少由外资企业诱发或主导的产业集群,<sup>[1]</sup>这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几乎都与 FDI 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备受关注的苏州,利用低成本优势和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直接投资,并且在苏州新区和工业园区形成了一些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外资占主导因素,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规模较大、管理先进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等特点,行业的进入壁垒很大,本土企业在这些集群内部只能承担一些低附加值的业务或者根本无法进入,外资企业在全局化进程中利用了成本优势并获得产业升级,而当地企业则面临较高的升级障碍。<sup>[2]</sup>

这种状况和政府“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中方本土企业的技术及管理创新能力并没有获得显著提高,并且一些跨国公司采取产业链移植战略,携带原有的外资供应商整体进入形成封闭的生产网络,这对于提升当地企业的配套能力也是不利的。此外,在理论界,自从 Caves

(1974)和 Globerman(1979)开创了 FDI 溢出效应计量研究框架以后,很多后续研究都是沿袭这种分析框架进行计量分析,这些研究只关注跨国公司的进入是否会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并不能解释溢出效应是如何产生的,面板数据或者投入产出表的使用并不能阐明企业以及产业环境特征对于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sup>[3]</sup>有鉴于此,本文针对在长三角地区 FDI 投资已呈现地区集聚的现象,研究这种 FDI 产业集群内部跨国公司溢出效应产生的渠道,探讨影响跨国公司溢出效应大小的因素,这对于内资企业突破某些外资产业集群进入障碍或提升在产业网络中的层次无疑将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 二、理论假设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可知[详见姜瑾(2006)<sup>[3]</sup>, Crespo(2006)<sup>[4]</sup>以及吉丹俊(2011)<sup>[5]</sup>],在 FDI 产业集群背景下研究溢出效应,需要考虑 FDI 产业集群中溢出效应产生渠道以及影响溢出效应大小的因素。

### 1. FDI 集群中溢出效应产生渠道

(1)示范/模仿效应。Caves(1974)<sup>[6]</sup>和 Kokko

[收稿日期] 2014-05-18

[作者简介] 吉丹俊,男,江苏扬州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扬州分院讲师。

(1994)<sup>[7]</sup>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对于当地企业自己研发一项新技术可能成本很高并且风险很大,而当地企业可以通过模仿、逆向工程等方法使用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成功使用的技术,当地企业还可以模仿使用跨国公司先进的管理经验,并且在集聚经济的背景下,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能够促进促进知识外溢,特别是隐性知识的外溢;Jordaan(2005)认为通过示范/模仿产生的溢出效应在集群区域内将会更明显,对墨西哥行业统计数据的计量检验发现地理集中的行业 FDI 溢出效应更大一些;<sup>[8]</sup>朱华晟(2004)通过对浙江嘉善木业 FDI 产业集群的分析发现大规模外资的进入引发示范效应,本地企业加大创新力度。<sup>[9]</sup>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a:在 FDI 产业集群中,通过示范/模仿渠道产生的溢出效应较明显。

(2) 竞争效应。Caves(1974)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对当地企业产生竞争效应,促使当地企业减少 X - 非效率;<sup>[6]</sup>Kokko(1994)也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对当地企业产生竞争压力,迫使当地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以及采用先进技术,然而另一方面,这种竞争效应也会产生挤出效应;<sup>[7]</sup>Chang & Xu(2008)认为在某个区域范围内,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的竞争会产生挤出效应。跨国公司凭借自身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占有大量市场份额,减少了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并将一些当地企业挤出市场。<sup>[10]</sup>此外,赵增耀(2008)认为在 FDI 产业集群中,产业链大部分环节为外资企业所把持,当地企业要么很难进入,要么和跨国公司相比,实力悬殊,<sup>[1]</sup>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效应产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b:在 FDI 产业集群中,通过竞争效应渠道产生的溢出效应不明显。

(3) 人力资源流动效应。Kokko(1994)认为跨国公司对员工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这些人力资源可能会流向当地企业,他们将从跨国公司学习到的管理和技术经验运用到当地企业,会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sup>[7]</sup>集群知识外溢理论认为人力资源在集群内部的流动会促进知识的外溢,特别是隐性知识,因为隐性知识是以个人为载体的。然而在 FDI 产业集群中,跨国公司会支付相对当地企业较高的薪水,吸引优秀人才流向跨国公司,并且跨国公司相对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以及良好的职业发展计划,使得优秀人才大都流向

跨国公司而很难从跨国公司流向当地企业。许和连等人(2007)认为员工的工资报酬率是影响员工在不同企业间的转移因素,但是目前外资企业的工资报酬率普遍高于国内企业,使得外资企业员工很难向国内企业流动。<sup>[11]</sup>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c:在 FDI 产业集群中,通过人力资源流动效应渠道产生的溢出效应不明显。

(4) 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s)。后向联系一般指跨国公司和当地供应商建立的采购供应关系,跨国公司进入当地市场后,出于节约成本和长期发展战略的考虑,逐渐会和当地供应商建立采购供应关系,为了提升当地企业的供应水平、质量以及成本,跨国公司会对当地供应商进行技术和管理帮助。此外,跨国公司和当地生产性服务企业建立的联系也会产生溢出效应,生产者服务企业是指专门为生产企业提供广告、物流、人力资源以及管理咨询等方面服务的企业,跨国公司会对当地生产者服务企业产生类似于上述对当地供应商产生的溢出效应。在此,我们将后向联系的概念扩展到跨国公司和当地生产者服务企业建立的联系。Javorcik(2004)认为溢出效应最有可能发生在行业间,即通过后向联系或前向联系产生溢出效应。Javorcik(2004)<sup>[12]</sup>,Block & Gertler(2003),Harrison & Robinson(2004),以及Liu(2008)<sup>[13]</sup>针对不同国家的计量检验结果均发现了正的后向联系及前向联系溢出效应。任胜钢(2004)在针对苏州 FDI 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发现集群内跨国公司与当地供应商的互动较明显,集群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已初步体现。<sup>[14]</sup>此外,张晔,梅丽霞(2008)通过对昆山台资主导的自行车产业集群案例分析发现台资企业网络与本土供应商网络融合后,台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也沿着网络传递到本土企业。<sup>[15]</sup>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d:在 FDI 产业集群中,跨国公司通过和当地供应商以及生产性服务企业建立的后向联系产生的溢出效应较明显。

(5) 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s)。在 FDI 产业集群中,跨国公司也有可能成为当地企业的供应商,跨国公司为当地企业提供技术含量高以及质量高的中间投入品;此外跨国公司会对下游当地企业提供有关使用这些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指导和帮助,这样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会得到提升。吴波(2008)认为在 FDI 产业集群中会产生基于商业



合作关系的溢出效应途径。<sup>[16]</sup>因此和后向联系一样,这种通过产品供销方式建立起的联系会促进知识向当地企业的转移。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e:在 FDI 产业集群中,跨国公司通过和当地下游企业建立的前向联系产生的溢出效应较明显。

## 2. 影响溢出效应大小的因素

近期的一些研究显示产业集聚、技术差距以及跨国公司的性质都会影响溢出效应的产生。Jordaan (2005) 的计量检验发现产业集聚引起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大;<sup>[8]</sup>而 Chang & Xu (2008) 对中国的计量检验发现在区域范围内,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的影响更多是竞争挤出效应而非溢出效应;<sup>[10]</sup>Thompson (2002) 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对比分析了位于集群内外的香港服装企业对大陆企业的溢出效应,发现位于集群内的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大些。<sup>[17]</sup>

技术差距也会影响溢出效应。对于技术差距,学术界目前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技术差距越小,意味着当地企业吸收能力越强,溢出效应越大;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产生的可能性越大<sup>①</sup>。

此外,FDI 的性质也会对溢出效应产生影响。Buckley et al (2007) 认为 FDI 来源地会影响溢出效应的产生。<sup>[18]</sup>同样,跨国公司在当地的经营时间以及经营方式也有可能影响溢出效应的产生,在当地经营时间长的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的联系可能会更多些,产生的溢出效应可能会大些,外资网络有可能与当地企业网络逐渐融合,从而使得技术溢出的可能性增加<sup>[15]</sup>;采取外商独资方式经营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联系可能会少些,产生的溢出效应可能小些。Javorcik 等人(2008) 认为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相比,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大些。<sup>[19]</sup>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在 FDI 产业集群中,企业集聚程度,技术差距以及 FDI 性质会影响溢出效应的产生。

## 三、实证研究

### 1. 研究设计

(1) 问卷设计及选取依据。本文的数据采集运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对象主要为苏州地区

FDI 产业集群内的外商独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因为近年来,随着苏州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些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 FDI 主导型产业集群,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样本环境。

结合本文理论假设,笔者将问卷设计为两部分:一部分衡量可能会影响溢出效应大小的因素,包括 FDI 性质、企业聚集程度以及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等因素;另一部分衡量溢出效应产生渠道。

问卷共有 25 个问题(对于每个问题以下简称 Q1 ~ Q25),分两部分,对于每个问题的具体描述见表 1 和 2:

表 1 FDI 产业集群性质质量表说明

Q1	贵公司性质(是外商独资企业,外方控股合资企业还是中方控股合资企业等)
Q2	贵公司员工规模
Q3	贵公司年销售额
Q4	贵公司来华投资时间
Q5	贵公司外资来源地
Q6	贵公司所属行业
Q7	贵公司所在地
Q8	在苏州地区,贵公司所在的行业,外资企业占绝大多数(Likert 5 度量形式,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一般,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Q9	在苏州地区,贵公司所在的行业产业链比较完整,企业集聚程度较高(度量形式同上)
Q10	和同行业内当地内资企业相比,贵公司采用的技术相对比较先进(度量形式同上)

表 2 FDI 产业集群溢出效应渠道量表说明<sup>②</sup>

示范/ 模仿 效应	Q11	对于贵公司采用的产品生产技术或流程,当地内资企业能够通过模仿将这些技术运用于其产品上
	Q12	对于同行业内的当地内资企业,倾向于模仿贵公司的管理制度
竞争 效应	Q13	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行业内的当地内资企业会提高其生产效率
人力 资源 流动 效应	Q14	贵公司为员工提供相关的技术或管理方面的培训
	Q15	贵公司的部分技术工人会流向行业内的当地内资企业
	Q16	贵公司的部分管理人员会流向行业内的当地内资企业

①关于吸收能力影响 FDI 溢出效应产生的文献综述详见参考文献[5]。

②Q11 至 Q25 度量方式相同,Likert 5 度量形式,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一般,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后向联系	Q17	贵公司目前逐渐倾向于使用本土内资企业为供应商
	Q18	贵公司对于本土内资企业为供应商商会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
	Q19	贵公司对于本土内资企业为供应商商会提供相应的管理培训
	Q20	本土内资企业供应商在贵公司的帮助下会逐步提升其供应产品质量
	Q21	本土内资企业供应商在贵公司的帮助下会逐步提升其服务质量
	Q22	贵公司目前逐渐倾向于使用本土内资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等生产经营服务
	Q23	本土内资企业服务提供商在贵公司的帮助下会逐步提升其服务水平
前向联系	Q24	贵公司生产的产品部分供应本土内资企业
	Q25	本土内资企业使用贵公司供应的产品后技术水平会获得提升

(2) 样本选择和数据搜集。由于本文主要从跨国公司视角来研究 FDI 产业集群内部的溢出效应,因此选取苏州地区外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被调查对象。在苏州大学 MBA 中心的帮助下,笔者采取现场发放问卷的方式,针对苏州大学 MBA 学员中目前在苏州地区外资企业中担任中高层管理职务的人员进行了现场调研,发放问卷 160 份,回收 112 份,剔除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89 份,回收率 56%。

(3) 数据分析方法的确定。问卷回收后,运用 SPSS 15.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针对提出的两个假设,主要运用以下两种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其一,对于 H1 的五个假设,主要做描述性统计分析,针对溢出效应五个渠道各题项得分的均值做对比分析以及相关分析,得出结论。

其二,对于假设 H2,采用逐步分层回归分析。因变量为溢出效应各渠道,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将因变量各指标各题项的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而产生一个单一的因子值,然后将该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自变量选取 FDI 性质量表中的企业性质,企业员工规模,企业年销售额,以及企业来华投资时间;控制变量为行业中外资比例,行业企业集聚程度,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以及有关公司外资来源地和所属行业的虚拟变量。

## 2. 研究结果分析及讨论

运用 SPSS 15.0 对 FDI 集群溢出效应量表作

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3 至表 7 所示,并采用逐步分层回归法分析 FDI 性质对溢出效应的影响,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 (1) 示范/模仿效应

表 3 示范/模仿效应

问卷题项	Likert 5 平均得分	Spearman's RHO	
		Q11	Q12
Q11	3.2921	1	0.150
Q12	3.0787		1

\*\* 置信度为 1% 水平; \* 置信度为 5% 水平

对于示范/模仿效应,通过题项 Q11 和 Q12 测度,Q11 测度当地内资企业对于外资企业产品生产或流程的模仿程度,属于“硬技术”模仿能力;Q12 测度当地内资企业对于外资企业管理制度和模式的模仿程度,属于“软技术”模仿能力;Q11 和 Q12 的得分分别为 3.2921 和 3.0787,接近一般水平,这和假设 H1a 相反,这可能与集群内部内外资企业差距较大有关(Q10 - 内外资企业差距得分 = 3.87),虽然技术差距大会增加内资企业学习外资企业先进技术的机会,但是差距过大会增加内资企业吸收并消化这些技术的难度,因此在这里示范/模仿效应不明显。

逐步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硬技术”示范/模仿效应,外资企业规模越大,溢出效应越小,这可能是由于规模大的企业使用的技术较复杂,内资企业不易模仿;而企业集聚程度越大,“硬技术”示范/模仿效应越大,这和集群知识外溢理论是一致的;此外,欧洲企业对于内资企业的“硬技术”示范/模仿效应较大。对于“软技术”示范模仿效应,逐步分层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员工规模越大,“软技术”示范模仿效应越明显。

### (2) 竞争效应

表 4 竞争效应

问卷题项	Likert 5 平均得分
Q13	3.6629

题项 Q13 测度在外资企业竞争压力下,行业内的当地内资企业会提高其生产效率的程度,平均得分 3.66,接近同意的水平,这和假设 H1b 相反,这可能是由于被调查者只考虑到外资企业的进入带来的行业内竞争压力所引起的正溢出效应,而忽略了可能会造成的“挤出”效应。

逐步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越大,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竞争溢出效应越小。因为技术差距越大,内外资实力悬殊,产生溢

出效应的可能较小。

(3) 人力资源流动效应

表 5 人力资源流动效应

	Likert 5 平均得分	Spearman's RHO		
		Q14	Q15	Q16
Q14	3.7865	1	0.054	0.011
Q15	3.0562		1	0.657**
Q16	2.9775			1

\*\* 置信度为 1% 水平; \* 置信度为 5% 水平

题项 Q14 测度了外资企业对其雇员的“培训效应”,均分为 3.79,比较接近满意水平;而 Q15 和 Q16 分别测度了外资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能会流向当地内资企业的倾向,均分分别为 3.06 和 2.98,接近一般水平,说明集群内,外资企业的雇员不大可能会流向内资企业,这和 Kokko (1994) 的观点相反,支持了假设 H1c。

(4) 后向联系

表 6 后向联系

问卷题项	Likert 5 平均得分	Spearman's RHO						
		Q17	Q18	Q19	Q20	Q21	Q22	Q23
Q17	3.7528	1	0.321 **	0.378 **	0.423 **	0.298 **	0.169	0.095
Q18	3.1685		1	0.696 **	0.418 **	0.385 **	0.280 **	0.149
Q19	3.1124			1	0.379 **	0.345 **	0.200	0.211 *
Q20	3.5955				1	0.700 **	0.250 *	0.403 **
Q21	3.6629					1	0.370 **	0.599 **
Q22	3.6404						1	0.426 **
Q23	3.6629							1

\*\* 置信度为 1% 水平; \* 置信度为 5% 水平

题项 Q17 测度外资企业和当地内资企业供应商建立的产品供应后向联系程度,均分为 3.75,说明外资企业和当地内资企业通过产品供应建立的后向联系较紧密;Q18 和 Q19 测度外资企业对本土内资企业供应商在技术或管理上的培训程度,均分分别为 3.16 和 3.11,接近一般水平;Q20 和 Q21 测度内资企业供应商通过这种后向联系能提升产品供应或服务质量的程度,均分分别为 3.60 和 3.66,接近同意水平。此外 Q17 和 Q20 以及 Q21 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别为 0.42 和 0.30(置信度均为 99%),呈低度正相关关系,说明这种产品供应建立的后向联系会正向促进本土内资企业产品供应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因此可认为这种后向联系会对本土内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Q22 测度外资企业和当地内资企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供应建立的后向联系程度,均分为 3.64,说明这种后向联系程度较紧密;Q23 测度本土生产性服务提供商通过这种后向联系能提升服务质量的程度,均分为 3.66,接近满意水平。此外 Q22 和 Q23 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 0.43(置信度均为 99%),说明这种通过生产性服务建立的后向联系会正向促进本土内资企业服务质量的提升。因此,通过以上分析,H1d 结论得到了较强的支持。

对于后向联系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合资企业、来华投资时间长的外资企业以及

北美企业通过后向联系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大些。

(5) 前向联系

表 7 前向联系

问卷题项	Likert 5 平均得分	Spearman's RHO	
		Q11	Q12
Q24	3.3523	1	0.332 **
Q25	3.4494		1

\*\* 置信度为 1% 水平; \* 置信度为 5% 水平

题项 Q24 测度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通过产品供应关系建立的前向联系,均分 3.35,说明这种前向联系不是很明显;Q25 测度外资企业的内资客户通过这种前向联系能提升技术水平的程度,均分为 3.45,程度也不明显,然而 Q24 和 Q25 斯皮尔曼系数为 0.33(置信度为 99%),呈低度正相关关系,说明这种前向联系会正向促进当地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因此结论 H1e 得到部分支持。

四、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文对 FDI 产业集群溢出效应渠道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受制于作者的学术水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第一,本研究受制于人力、物力和时间等客观因素,进行问卷调查的样本统计数量有限,因此影响了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增加

样本数量,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另外,问卷的发放针对的是苏州地区 FDI 产业集群内不确定企业,今后的研究可以针对某个具体集群发放问卷,研究某个具体集群的溢出效应渠道及影响因素,提高研究结果的实际应用价值。

第二,本研究的量表对于溢出效应各渠道的衡量通过一些间接问题衡量,并且采用 5 分量表的形式,无法确保衡量的准确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提高溢出效应渠道衡量的准确性。

第三,本文研究集群溢出的视角是从外资企业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然而溢出效应的真正受益者是内资企业,从内资企业的视角研究结果可能会更准确些,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集群内内资企业的视角研究溢出效应渠道及影响因素。

#### [ 参 考 文 献 ]

- [1] 赵增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73079) 申请报告 [R]. 苏州大学商学院,2008.
- [2] 于明超,刘志彪,江静. 外来资本主导代工生产模式下当地企业升级困境与突破[J]. 中国工业经济,2006(11).
- [3] 姜瑾. 国外 FDI 行业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综述 [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7).
- [4] Crespo N & Fontoura M P. Determinant Factors of FDI Spillovers-What Do We Really Know? [J]. *World Development*,2006(3).
- [5] 吉丹俊. 关于 FDI 溢出效应的文献综述[J]. 上海商学院学报,2011(4).
- [6] Caves R E. Multinational Firms,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Country Markets [J]. *Economica*,1974 (162).
- [7] Kokko A. Technolog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2).
- [8] Jordaan J A. Determinants of FDI -Induced Externalities [J]. *World Development*,2005(12).
- [9] 朱华晟. 基于 FDI 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J]. 中国工业经济,2004(3).
- [10] Chang S J & Xu D. Spillovers and Competition among Foreign and Local Firms in China [J]. *Journa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2008(5).
- [11] 许和连,等. 外商直接投资的后向链接溢出效应 [J]. 管理世界,2007(4).
- [12] Javorcik B 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3).
- [13] Liu Z.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8(85).
- [14] 任胜钢. 苏州产业集群与跨国公司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5(1).
- [15] 张晔,梅丽霞. 网络嵌入、FDI 主导型集群与本土企业发展——以苏州地区自行车集群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2008(2).
- [16] 吴波. FDI 知识溢出与本土集群企业成长——基于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10).
- [17] Thompson E R. Cluster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hanced Technology Transfer [J]. *World Development*, 2002(5).
- [18] Buckley P J, Wang C, Clegg J. The Impact of Foreign Ownership, Local Ownership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on Spillover Benefit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7(16).
- [19] Javorcik B S & Spatareanu. To Share or Not to Share: Does Local Participation Matter for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85).

(责任编辑 光 翟)

## 叶燮的诗学观：“物我相合而为诗”<sup>\*</sup>

祁志祥

(上海政法学院国学研究所, 上海 201701)

**[摘要]** 清初叶燮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成体系的美学思想家。他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原诗》论著中。他从美在客观的立场出发,坚持诗歌创作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提出了“物我相合而为诗”的核心命题,分析了“在物之三”——“理”“事”“情”与“在我之四”——“识”“胆”“才”“力”的特征,主张以“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惆怅以为情”的创作方法,创造出“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这样的“理至”“事至”“情至”境界,由此分析了中国历代诗歌发展的“正”“变”“盛”“衰”,提出了“诗无一格”“雅无一格”风格主张。叶燮的诗歌美学,思理绵密,个性鲜明,在重视主客合一的审美经验的当代美学潮流中很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 叶燮; 诗学; 物我相合; 理至事至情至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69-05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已畦,寓居横山,时称横山先生,吴江(今属江苏)人。康熙进士,官宝应令,以忤长官被参落职。以论诗见称。所著《原诗》论述“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及诗歌创作各方面的问题,自成一家之言。另有《已畦文集诗集》等。

叶燮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成体系的美学思想家。他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原诗》论著中。他从美在客观的立场出发,坚持诗歌创作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提出了“物我相合而为诗”的核心命题,分析了“在物之三”——“理”“事”“情”与“在我之四”——“识”“胆”“才”“力”的特征,主张以“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惆怅以为情”的创作方法,创造出“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的“理至”“事至”“情至”之语,由此分析了中国历代诗歌发展的“正”“变”“盛”“衰”,提出了“诗无一格”“雅无一格”风格主张。叶燮的诗歌美学,思理绵密,个性鲜明,是中国诗学的宝贵建树,在重视主客合一的审美经验的当代美学潮

流中很有借鉴意义。

### 一、美的客观性、主观性和相对性

在世界观和美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上,叶燮堪称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坚持美的客观属性,明确提出“美本乎天”的唯物论美学命题:“凡物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也。”<sup>[1]</sup>“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sup>[2]</sup>“天地之大文,风云雨雷是也。风云雨雷,变化不测,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即至文也。试以一端论:泰山之云……或起于肤寸,弥沦六合,或诸峰竞出,升顶即灭,或连阴数月,或食时即散,或黑如漆,或白如雪,或大如鹏翼,或乱如散鬃,或块然垂天,后无继者,或连绵纤微,相续不绝,又忽而黑云兴,土人以法占之,曰将雨,竟不雨;又晴云出,法占者曰将晴,乃竟雨。云之态以万计,无一同也。以至云之色相,云之性情无一同也。云或有时归,或有时竟一去不归,或有时全归,或有时半归,无一同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sup>①</sup>

物之美虽然是客观的、自然而生的,但对物之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美学史的重新解读”(项目编号:05BZW010)。

[收稿日期] 2014-11-13

[作者简介] 祁志祥,男,江苏大丰人,上海政法学院国学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① 叶燮,原诗·内篇,清康熙间叶氏二弃草堂刻本。按:本书所引《原诗》,均据此版本。

美的认识却因主体不同而并不一致,这就叫“境一而触境之人之心不一”。叶燮在为其友孟举的《黄叶村庄诗》作序时指出:“黄叶村庄,吾友孟举学古著书之所也。……天下何地无村?何村无木叶?木叶至秋则摇落变衰,黄叶者,村之所有,而序之必信者也。夫境会何常?就其地而言之,逸者以为可挂瓢植杖;骚人以为可登临望远;豪者以为是秋冬射猎之场;农人以为是祭韭献羔之处;上之则省敛观稼、陈诗采风;下之则渔师牧豎取材集网,无不可者;更王维以为可图画,屈平以为可行吟:境一而触境之人之心不一。孟举于此不能不慨焉而兴感也。”

审美认识是客观的“美”与主体的“人”和“心”相互结合的产物。人的志趣、个性、职业不同,对同一自然物的心灵反映亦各各不同。于是,美与丑就呈现出相对性来。《原诗》外篇指出:“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者也。其间惟生死、贵贱、贫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恶死,美香而恶臭,美富贵而恶贫贱。然逢、比之尽忠,死何尝不美?江总之白首,生何尝不恶?幽兰得粪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则萎,香反为恶。富贵有时而可恶,贫贱有时而见美,尤易以明。……对待之美恶,果有常主乎?生熟、新旧二义,以凡事物参之:器用以商、周为宝,是旧胜新;美人以新知为佳,是新胜旧;肉食以熟为美者也,果实以生为美者也,反是则两恶。”为什么一般说来“人皆美生而恶死、美香而恶臭、美富贵而恶贫贱”?因为“生”“香”“富贵”在一般情况下给人愉快的感觉,而“死”“臭”“贫贱”给人痛苦、不适的感觉。为什么龙逢、比干尽忠而死,人们以死为美,江总从梁、陈一直苟活到隋朝,人们以生为恶?因为在这种特定情形下,由于道德理性的作用,人们感到“死”得崇高而“生”得苟且。同理,为什么“器用”以旧胜新,“美人”以新胜旧,“肉食以熟为美”“果实以生为美”?因为只有旧物、新人、熟食、生果才使人备感愉快。于是,生死、贵贱、贫富、新旧、生熟等等就成为引起特定情形下美感的不同对象形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叶燮主张通过人的认识和创造,将自然界分散的美集合起来,使其变得更强烈、更典型:“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

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而神明才慧本天地间之所共有,非一人别有所独受而能自异也。故分之则美散,集之则美合,事物无不然者。”<sup>[2]</sup>“孤芳独美,不如集众芳以为美,待乎集事、在乎人者也。夫众芳非各有美,即美之类而集之。‘集’之云者,生之植之,养之培之,使天地之芳无遗美,而其美始大。”造园艺术和编纂诗集之类的活动就是这种美的集中化、典型化的创造性活动。

## 二、“在物之三:理、事、情”

审美认识缘生于客观之美与主体心灵的作用与结合,作为审美认识物化形态的“文章”亦源于物我相合。《原诗》内篇指出:“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物我相合而为文章,是明清之际文人的共识,我们在谢榛、王夫之等人的诗文理论中不难看到。叶燮以独特的视角阐述、发展之,至刘熙载《艺概·赋概》则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至王国维《文学小言》则说:“文学者,不外(客观)知识与(主体)情感交代之结果而已。”

那么,“在物之三”是什么呢?叶燮作出了自己的独特分析,就是“理”“事”“情”。《与友人论文书》自述:“仆尝有《原诗》一编,以为盈天地间万有不齐之物之数,总不出乎理、事、情三者。”《原诗》内篇反复揭示:“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

万物的“理”“事”“情”是怎么产生的呢?《原诗》内篇指出,由“气”所化生:“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事、理、情之所为用,气为之用也……苟无气以行之,其能若是乎?”以“理”“事”概括物之特征可以理解,“情”字就令人费解了。以“情”概括物之特征确是叶燮的一大发明。那么,叶燮的“理”“事”“情”含义如何呢?《原诗》内篇打了个比喻来加以解释:“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可见,“理”即万物发生的原理,“事”即万物

发生后的形貌，“情”即万物发生之后生机勃勃的“情状”、神态。“情”不是主体感情的情，亦非真实的同义语，而是渗透着内在神韵、生气的外在形状，而不像“事”，仅仅是物的外在形状。以“情”指“情状”、神态，这是叶燮的特独用法。

天下万物，总不出“理”“事”“情”三类。而文章乃是天下万物的表现，《原诗》所谓“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因此，文章创作的大法自然是“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而不是准的、摹仿古人。《原诗》指出：“诗文一道岂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挈（通契）诸情，挈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故法者，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三者之平准，而无所自为法也。”“惟理、事、情三语，无处不然。三者得，则胸中通达无阻，出而敷为辞，则夫子所云‘辞达’。‘达’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谓。而必泥乎法，则反有所不通矣。”“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复何所本乎？不过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无碍，斯用之矣。……苟乖于理、事、情，是谓不通，不通则杜撰，杜撰则断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区区之见，句束而字缚之，援引以附会古人，反失古人之真矣。”《己畦文集》卷三《假山说》：“又如周昉之画美人，画美人者必仿昉为极则，固也。使有一西子在前，而学画美人者，舍在前声音笑貌之西子不仿，而必仿昉纸上之美人，不又惑之甚者乎？”从文章准的“理”“事”“情”出发，叶燮对六经以来的各类文章作了重新划分：“夫备物者莫大于天地，而天地备于六经。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合而言之，则凡经之一句一义，皆各备此三者而互相发明。分而言之，则《易》似专言乎‘理’，《书》《春秋》《礼》似专言乎‘事’，《诗》似专言乎‘情’，此经之原本也。而推其流之所至，因《易》之流而为言，则议论、辨说等作是也；因《书》《春秋》《礼》之流而为言，则史传、纪述、典制等作是也；因《诗》之流而为言，则辞赋、诗歌等作是也。”<sup>[4]</sup>

关于文章通乎“理”“事”“情”与明“道”的关系，叶燮《与友人论文书》在对六经源出的侧重于言理、言事、言情的三类文章作了分析之后指出：“数者条理各不同，分见于经，虽各有专属，其适乎‘道’则一也。而‘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

总贯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道’者何也？六经之道也。为文必本于六经，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实未能知之，能知之而实未能变而通之者也。夫能知之，更能进而变通之，要能识乎‘道’之所由来，与推夫‘道’之所由极。非能明天下之理、达古今之事、穷万物之情者，未易语乎此也。”由此可见，在“理”“事”“情”与“道”的关系中，“理”“与道为体”，与“道”的联系最密切，而“事”与“情”也“贯乎其中”，包含着“道”。“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非但与“明道”不相矛盾，而且是对“明道”的“变通”发展，甚至是“道之所由来”“道之所由极”。

至于文章之“美”与“道”及“理”“事”“情”的关系，叶燮《与友人论文书》说：“今有文于此，必先征其美与不美。……由文之美而层累进之，以至适于道而止。”可见“文之美”的根本在“适道”。而“道之所由来”“所由极”所“变通”又在“明天下之理，达古今之事，穷万物之情”，故“文之美”与“揆于理”“征诸事”“契诸情”相统一。

### 三、“在我之四：才、胆、识、力”

中明以后，受王阳明心学之影响，文艺美学家大多十分重视主体素质在审美观照与创造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李贽在《杂述》中分析、强调过作家“才、胆、识”的作用，袁中道在《妙高山法寺碑》中提出过“识、才、学、胆、趣”说。叶燮既然认为文章是主客观合一的产物，在分析了客体三要素“理、事、情”后，又转而分析到主体的四种素质：“才、胆、识、力”。《原诗》内篇指出：“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大约‘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

何为“才、胆、识、力”？四者之间的关系怎样？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作用如何？《原诗》内篇详细论述了这些问题。

“识”是一种辨别是非、独立不拔的见识。在兼顾主体的四种素质的同时，叶燮更强调“识”的重要性：“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在拟古主义盛行的时候，叶燮尤其强调“识”的可贵：

今夫诗，彼无“识”者，既不能知古来作者

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兴感触发而为诗。或亦闻古今诗家之论,所谓“体裁”“格力”“声调”“兴会”等语,不过影响于耳,含糊于心,附会于口,而眼光从无着处,腕力从无措处。即历代之诗陈于前,何所决择?何所适从?人言“是”则是之,人言“非”则非之。夫非必谓人言之不可凭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非之,又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

“识”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识”对“胆”“才”“力”的统帅作用方面。“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其离言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则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动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哉?”叶燮还具体分析了“识”与“才”“胆”的关系:

四者具足,而“才”独外见,则群称其“才”,而不知其“才”之不能无所凭而独见也。其歉乎天者,“才”见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强,不知有“识”以居乎“才”之先。“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

“识”明则“胆”张,任其发宣而无所于怯,横说竖说,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无有一之不肖乎物也。且夫胸中无“识”之人,即终日勤于学,而亦无益,俗谚谓为“两脚书橱”。记诵日多,多益为累。及伸纸落笔时,胸如乱丝。头绪既纷,无从割择。中且馁而胆愈怯,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矜持于铤两尺矐之中,既恐不合于古人,又恐贻讥于今人,……因无“识”,故无“胆”,使笔墨不能自由。

自古以来,诗以吟咏性情为主。有明迄清,感性张扬,由“情”求诗者多多。而叶燮《原诗》探讨诗的主体素质却不谈“情”,是不是意味着他对诗的言情特质的无视?不然。《原诗》内篇评论杜甫时曾说:“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得情,因情敷句……”可见他是不否定诗“因情敷句”的。他分析六经与“理”“事”“情”的关系时指出“《诗》似专言乎情”,后世辞赋、诗歌本此,亦表明他认识到诗歌的言情特

点。人人都知道诗者言情,非情人不能为诗人,再强调诗人的情感素质就显得多余;但在拟古之风颇盛的年代,诗人有自己的独特遭遇和真情实感,却不能言、不敢言,这就显出“识”的重要。可见叶燮论诗人的主体素质不谈“情”而强调“识”,是当时现实的需要,是反对拟古、自树面目、张扬个性的时代需要。

有了确信无疑的见识,自然生出无所顾忌的胆量。而无“胆”,则个性亦不能自树立:“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有了“胆”,创作就进入了无所拘束的“自由”状态,创造才能也得以尽情发挥:“‘胆’既拙(同‘屈’)矣,‘才’何由而得伸乎?”于是“胆”对“才”也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惟‘胆’能生‘才’。”“才”“必待扩充于‘胆’”。

有了“识”“胆”之后,若无一定的“才”,自家性情也不能表达出来。“才”是表达内在“心思”的才能。“无‘才’则心思不出,亦可曰无心思则‘才’不出。”“夫于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之谓‘有才’。”

“力”则是承载“才”的力量。“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载之。惟‘力’大而‘才’能坚,故至坚而不可摧也。历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力’之分量,即一句一言,如植之则不可仆,横之则不可断,行则不可遏,住则不可迁。”“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欲成一家之言,断宜奋其‘力’矣。夫内得之于‘识’而出之而为‘才’,惟‘胆’以张其‘才’,惟‘力’以克荷之。”他纵论历代诗文之“力”：“统百代而论诗,自《三百篇》而后,惟杜甫之诗,其力能与天地相终始,与《三百篇》等。自此以外,后世不能无人者主之,出者奴之。诸说之异同,操戈之不一矣。其间又有力可以百世,而百世之内互有兴衰者,或中湮而复兴,或昔非而今是。又似世会之使然,生前或未有推重之,而后世忽崇尚之,如韩愈之文。……信乎文章之力有大小远近,而又盛衰乘时之不同如是。”

#### 四、“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倘恍以为情”

以主体之“识”“胆”“才”“力”,契合客体之“理”“事”“情”,产生“作者之文章”。那么,“文



章”尤其是“诗”中的“理”“事”“情”是不是同现实中的“理”“事”“情”一样呢？不一样。《原诗》内篇分析说：由于主体的介入，客体的“理”“事”“情”在诗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变而为“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叶燮强调：“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只有“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例如杜甫诗句“碧瓦初寒外”“月傍九霄多”“晨钟云外湿”“高城秋自落”等等，“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理’即昭矣，尚得无其‘事’乎？”“古人妙于‘事’‘理’之句，如此极多……其更有‘事’所必无者，偶举唐人一二语，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似将海水添宫漏’‘春风不度玉门关’‘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颜不及寒鸦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万！决不能有其‘事’，实为‘情’至之语。”因此，叶燮赞同一位问话者对“诗之至处”的概括：“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

叶燮此论，触及诗人在情感的作用下，借助比兴、夸张等艺术手法，写出想象中的“理”与“事”，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形象思维理论的精彩总结。

由“物”之“理”“事”“情”与“我”之“识”“胆”“才”“力”合而为“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的“理至”“事至”“情至”之语这样一种诗歌美学原理出发，《原诗》内篇全面分析了中国历代诗歌发展的“正”“变”“盛”“衰”，由于内容太过具体庞大，这里不详述。在此基础上，叶燮提出了不偏一尊，“诗无一格”“雅亦无一格”“平、奇、浓、淡、巧、拙、清、浊无不可为诗，而无不可为雅”<sup>[4]</sup>的美学风格论。

叶燮的诗论立足于对审美发生的主客体二元性的基本认识，分析了“在物之三”与“在我之四”

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物我相合”之后化生的诗学新质，以此作为评价历代诗歌演变的标准和“不主一格”风格论的内在依据，层次丰富，独具个性，自成体系，是清代乃至中国诗学中的宝贵建树。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尽管他力图建立丰富严密的诗学体系，但逻辑的严密性还是不够的。比如他对“情”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统一。作为“在物”者之一要素，本指物之“情状”，与主体的感情无关。可在分析诗中之“理”“事”何以不同于现实之“理”“事”时，“情”又变成了驱使“理”“事”变化的主体情感因素。在讲“《诗》似专言乎情”“作诗者在抒写性情”“语于诗，则‘情’之一言，义固不易”（《原诗》内篇）时，“情”均指“在我”之情感，这就与“在物”之“情”相矛盾。又如在分析“物”之“理”“事”“情”在主体作用下变为“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时，对“我”之“识”“胆”“才”“力”这四个重要元素与这种变化的联系则语焉阙如；举例剖析也只是说明了诗是怎样“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的，而没有说明诗是如何“惝恍以为‘情’”的，等等。这些逻辑上不小的漏洞使得叶燮诗论如空谷足音，并没有在当时和清代中后期引起什么应和。然而不管怎么说，叶燮力图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对诗歌的发生原理和美学特征作出自己独立的解读，并努力摆脱历代诗话零星、感性的札记形态，系统地建构一种颇为严密的理论体系，是值得肯定和关注的。

#### [ 参 考 文 献 ]

- [1] 叶燮. 滋园记[A]. 己畦文集(卷九)[M]. 清戊午孟夏梦篆楼刊本.
- [2] 叶燮. 集唐诗序[A]. 己畦文集(卷九)[M]. 清戊午孟夏梦篆楼刊本.
- [3] 叶燮. 与友人论文书[A]. 己畦文集(卷十三)[M]. 清戊午孟夏梦篆楼刊本.
- [4] 叶燮. 汪秋原浪斋二集诗序[A]. 己畦文集(卷九)[M]. 清戊午孟夏梦篆楼刊本.

(责任编辑 师 语)

# 宋代奏议集序跋之书写特色及心理期待<sup>\*</sup>

梅 华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宋代奏议类文集序跋在文集序跋中别树一帜,成为一种颇有特色的序跋种类。针对奏议这种特殊的文体,宋人所撰序跋也有不同于其他一般文集序跋之处。在宋代奏议类文集序跋中,大多都会对奏议作者的政治生涯进行评鹭,并积极讴歌赞颂奏议作者触逆鳞、逆圣听的直谏精神。另外,序跋作者在撰序题跋时往往会表露自己对朝廷的情感与愿望,通过对奏议作者因言获罪之惋惜与对上下相得之感念两种方式,来表达其对君臣契合政治局面的追求与期待。

**[关键词]** 宋代; 奏议集序跋; 书写特色; 心理期待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74-05

有宋一朝广开言路,宋太祖曾立下“不诛大臣、言官”之誓约,鼓励文武百官积极上书言事,而富有浓厚修齐治平情怀的儒家士人本就有着强烈的参政议政热情,因此,在两宋时期出现了士大夫们“开口揽实事,议论争煌煌”的空前局面。心怀天下、放言国是的时代风气大大促进了宋代奏议类文章创作的繁荣,奏议类文体名目增多。宋人认为奏议为“治乱之龟鉴”,并且奏议也是士大夫政治思想与从政经历的集中体现,故在宋代仕宦至相应级别的士人常常会将其奏议类文章独立于其他诗文之外,单独编纂成集。奏议集的编纂与刊印是宋人别集整理和刊印的一大特色,大量的奏议集序跋由此而生。笔者钩沉《全宋文》及相关文献可知,两宋时期存世的奏议集序跋共计八十九篇。针对奏议这种相对特殊的文体,宋人所撰序跋也有不同于其他一般文集序跋之处。

## 一、褒贬讴歌:奏议集序跋之书写特征

奏议类文集作为一种政治性较强的文集,序跋作者在为其撰写序跋时,一般都会认真阅读文集所收文章,并会考虑到其特殊性,在对其进行品评过程中,与对待一般文集序跋不同,其标准与要求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晁说之《韩文忠富公奏

议集序》曾云:“命为他文或敢,而序韩文忠之奏议,则孰敢?”(《全宋文》130册)<sup>[1](P.71)</sup>在晁说之看来,为奏议类文集撰序题跋无疑应更为慎重与严肃。一般来说,奏议类文集序跋的内容分为以下几种:强调奏议有利于“治道”的政治功能;对奏议文风格特征的概述;对奏议作者之政治生涯的评鹭;对积极进谏者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精神的颂扬等。在宋人所撰奏议类文集序跋中尤以后两者为多,也最具特色。

首先,对奏议作者政治生涯中典型事例进行重点描述。一部奏议类文集往往集中展现了文集作者的政治思想,载录其从政经历及业绩荣辱,鉴于奏议类文集的这一特殊性,撰序题跋者往往会关注并突出文集作者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立场态度及举止作为,从而凸显出其高洁品性、政治操守及为政能力。作为官员,其在日常公务中处理的事务不计其数,而决定其一生荣辱之事则并不多,这一特殊情况决定了序跋作者不可能对奏议作者一生行状事无巨细地予以罗列,而只是选取其政治生涯中影响重大的事件予以描述与渲染,从而达到突出奏议作者政绩的效果。

晁说之《韩文忠富公奏议集序》先概述了富弼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言论及其对当时政治的

**[收稿日期]** 2014-10-25

**[作者简介]** 梅 华,女,河南信阳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影响,“公于仁宗时,言犹雨露也,陨而为天下泽。其在英宗时,言犹海潮也,震天地,转山石,孰不骨骸胆逝而敢抗之与?其在神宗时,言犹凤鸣也,律吕于九霄之上,而余音千里之远”(《全宋文》130册)<sup>[1](P.71)</sup>;随之又重点突出地胪列了在三朝中影响重大的几次历史事件。一是在仁宗朝,富弼曾在契丹屯兵境上时勇敢出访契丹,其不避生死,不辱使命的精神赢得了仁宗的认可。二是在英宗朝,一日富弼向英宗进呈除授官吏的文书,英宗龙颜大怒,将文书扔向榻下,若是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况肯定会知难而退,富弼不仅没有退下,而是拾起文书从容陈辞,曰:“前日陛下在藩邸时,喜怒犹不可妄,况今即天子位?窃以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师以伐四夷,否则陈斧钺以诛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为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过恶可怒者,何不斩臣以谢天下。”(《全宋文》130册)<sup>[1](P.71)</sup>由此可知,富弼的胆识与勇气非常人可比。三是在神宗朝,神宗针对“边事”问富弼,富弼不惮其烦地陈述了数十条意见,其中不乏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真知灼见,深得神宗欣赏。序跋作者通过这些典型事例,使富弼不避生死的气魄,勇于直谏的胆识,超凡脱俗的见识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也使得富弼这一人物显得有血有肉,形象丰满起来。

情况相类似的还有朱熹《丞相李公奏议后序》。李纲一生积极主张抗金,南渡之后要求出师北伐,但终其一生这些愿望未能实现,可以说李纲在历史上是一个悲剧性人物。朱熹在《丞相李公奏议后序》中主要围绕李纲被贬的相关历史事件展开叙述:先是徽宗政、宣之际,因论对夷狄兵戎之祸应防范未然而被贬官;然后是钦宗靖康之际,因反对向金人割地讲和而远谪遐荒;最后是建炎期间积极“分布要害,缮治城壁,建遣张所抚河北,傅亮收河东,宗泽守京城,西顾关陕,南葺樊邓,且将益据形便,以为必守中原、必还二圣之计”<sup>[2]卷七十六</sup>,但不久又“遭谗而去”。可以说,朱熹在《丞相李公奏议后序》中谱写了李纲政治生涯的悲剧史,最后总结曰:“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则都城必无围迫之忧;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用于建炎,则中原必不至于沦陷;用于绍兴,则旋轸旧京、汛扫陵园以复祖宗之宇,而卒报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sup>[2]卷十二</sup>,从而为李纲壮志未酬流露出无限的遗憾之情。

又,刘光祖《雍国虞忠肃公奏议序》。虞允文一生政绩显之于采石矶大捷,故刘光祖在《雍国虞

忠肃公奏议序》中仅仅围绕采石矶大捷这一典型事例展开。据刘光祖《雍国虞忠肃公奏议序》,在绍兴辛巳(1161)之前虞允文就曾论对曰:“虏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将劲卒备此二境”(《全宋文》279册)<sup>[1](P.69)</sup>,后果不其然,从而展现了虞允文在采石矶大捷前敏锐的预见能力。此后,金人果然叛盟,完颜亮带兵南下,虞允文上奏曰:“令成闵五万人到池州驻池州,到江州驻江州。他日虏重兵出上流,则荆湖之军扞其前,江、池之军进而援之;虏重兵出淮西,则池州军出巢县,江州军出无为,可为淮西官军之援”,序文记此运筹帷幄之细,展现了其在采石矶大捷中周密的部署能力,真所谓“因一军之出而两用之,最为得计”。虞允文因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最终在千钧一发之际,挽狂澜于既倒,取得了采石矶大战的胜利。很多人可能因暂时的胜利而骄矜,而虞允文没有,他未雨绸缪,“又令设备于瓜州,其他区画,悉各精密而不苟”,序文通过这些内容又突出了虞允文在采石矶大捷后不留后患的果断力。

选取奏议作者一生典型事例进行重点描绘是宋代奏议类文集序跋的一大特色,这种叙事方式可以达到以少总多、万取收一的艺术效果。

其次,对奏议作者敢于触逆鳞、逆圣听的精神进行颂扬。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皇帝居于金字塔之顶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使是公卿百官亦对皇帝存在着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若顺从于君主就可能飞黄腾达,若违逆于君主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君主这种口含天宪、一言定生死的权力使得群臣百官对其诚惶诚恐,常常感到伴君如伴虎。在宋代奏议集序跋中,序跋作者常常对不避生死,昧死以谏者予以肯定,充分表达出对这种难能可贵的为民请命精神的歌颂。

史浩《跋陈忠肃公谢表稿》记述了在绍圣、元符年间,蔡京、蔡卞专权,“识者愤之,而不敢言”,但陈瓘“乃奋不顾,为书数万言,力辟其非是”,最后被“流离窜逐”(《全宋文》200册)<sup>[1](P.36)</sup>,诚如刘克庄所言:“自昔端正士欲为朝廷区别忠邪,卒之忠邪不可区别,而身反受其祸。”(《全宋文》329册)<sup>[1](P.346)</sup>这种因直言而被贬的事例屡见不鲜,但正直之士并未因此而却步,而是一如既往地犯颜婴鳞,攘斥奸邪。他们所持所争者不是为一

身之荣辱,而是“为陛下忧,为社稷忧,为天下贤人君子忧”(《全宋文》154册)<sup>[1](P.223)</sup>。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才使得正直之士能言时人所不敢言之事,能争时人所未敢争之理。

在两宋风云变幻之际,陈东即因直言而被诛杀。据《宋史·忠义·陈东传》载:在蔡京、王黼掌权时,钳制言路,在朝之人多不敢言,但陈东率太学生们上书论曰:“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sup>[3](P.13359)</sup>,持论凛然,言辞激烈。南渡之后,高宗曾罢免李纲,陈东又上书曰:“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梳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sup>[3](P.13360)</sup>陈东对阻碍恢复中原的投降派之指责直言不讳,慷慨淋漓。由于屡次直言抗上,再加上朝中小人屡进谗言,最后陈东被冤杀,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为国尽忠,九死而不悔的动人乐章。陈东之遗稿留存后世,被反复传诵,后人对其不避生死、勇于直谏的精神予以赞美和颂扬。南宋黄震在其《陈少阳谏稿跋》中将陈东与伯夷、范滂并提,“伯夷叩马之谏,谏虽不偶,而首阳高风,千古大闲。范孟博慨然澄清犹易事,惟甘戮如饴,别家人恬若平时,最不可强。今观少阳稿及其临死帖,当与伯夷同功,与孟博同传”(《全宋文》348册)<sup>[1](P.196)</sup>。南宋潘汇征在其《跋陈少阳奏议》中亦论道:“公卿大夫,宁欺君卖国而不忍失富贵,布衣痛哭言事,乃杀其身不悔,不亦异乎!虽然,身可杀,名不可灭。”(《全宋文》323册)<sup>[1](P.222)</sup>后人这些赞叹是对陈东昧死以闻精神的认可,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真德秀在《跋傅侍郎奏议后》中对宁宗嘉定名臣傅伯成屡谏屡黜的精神予以扬誉:庆元初,韩侂胄初用事时,“无敢撻其锋者”,而傅伯成独恳恳上言,后来“坐是不合而补郡以去”;等到韩侂胄专权已久,朝廷已无异议者,而傅伯成依然上奏,“逆论其不可出使鄂渚”,最后又“坐是愈不合而罢斥以归”。真德秀最后议论曰:“学者平时诵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宠禄饵于前而刑祸怵于后,鲜有不委己徇人而畔其素学者。虽或勉强于一时之暂,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黜而

悔者有矣。若再三黜焉而不悔,则几希矣。至于直道自持,终其身而不悔,则虽古昔亦无几焉。”(《全宋文》313册)<sup>[1](P.187)</sup>真德秀此论可谓至矣。在功名利禄、身家性命与直道真理、大义原则之间,能经受威逼利诱而仍坚守如初者,实不多焉,大多“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由此更可知傅伯成等人行为的难能可贵。

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政治人物大致可分为贤臣、庸臣与奸臣。爱国忧民、愤世疾邪者是为贤臣。明哲保身、尸位素餐者,可谓庸臣。祸国殃民、陷害忠良者,实是奸臣。贤臣、庸臣、奸臣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和在历朝历代不断上演。宋代奏议集序跋中对正直之士、社稷之臣直言敢谏精神的颂扬,代表着序跋作者鲜明的价值取向,他们在用舆论之笔进行着对恶势力的挞伐和对正能量的弘扬。

## 二、君臣契合:奏议集序跋之追期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伦理,理想的治世应是君正臣贤,天下和合。作为一名圣君,一定要广开言路、善于纳谏,而贤臣则要心系国家安危,不畏强势,敢于直谏。故君思贤臣,臣思圣君是历朝历代政治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圣君、贤臣相洽相得才能最终带来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理想局面。依照儒家政治理论,臣子肩负着对上知无不言,对下知无不为的责任和义务,而奏议则充当了君臣沟通交流的一种媒介,但这种媒介能不能发挥作用,其决定权在君王手中,即臣子的意见和建议能不能被采纳和实施,其最终决定于君王。君臣相得、上下契合是君臣关系中最融洽、最和谐的境界,也是最可能臻于至治的重要基础。然而这样的和谐盛世,又是难得一见的。在宋代奏议集序跋中,序跋作者大致通过两种方式来表达其对君臣契合的追求与期待。

1. 奏议类文集序跋通过对士大夫因言去官壮志难酬的描述,来表达对君臣契合的期待

君臣契合是古代君臣关系中最理想的状态,但圣主难逢,大多数情况下君臣之间总是有或多或少的背隙。陆游《跋欧阳文忠公疏草》云:“庆历之盛,盖庶几汉文景矣,而贤人君子犹如是之难。文忠公之奏议,非独不明诸公之谗也,身亦堕排陷

中,滁州之谪是已。呜呼悲夫!”<sup>[4](P.2262)</sup>仁宗庆历时期向来被认为是宋一朝的盛世,是君臣一心、政治相对清明之时,然而就是在此时,贤人君子如欧阳修者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仍然受到谄毁排挤而被贬谪,更不用说在昏君暗昧于上、权臣奸弊于下的非常世道了。

在宋代奏议集序跋中记述了大量贤臣因直言而被贬谪的事实,序跋作者常常由这些事例引发出圣主难逢之慨叹,同时对因言左迁的大臣表达出一种惋惜之情,并在更深的层面上表达出对君臣契合的期待。袁燮《跋中丞陆公奏稿》云:“当是时,士大夫柔佞成风,而独能排奸如此,所谓凤鸣朝阳者耶?未几补外,可为太息”(《全宋文》281册)<sup>[1](P.132)</sup>,就在朝廷上下一片附和谄媚之声时,惟独中丞陆公挺身而出,但最后还是被贬官外迁,袁燮在此除了感叹惋惜直言进谏者被贬斥外,同时也流露出对君臣未契的遗憾之情。又,袁燮《跋胡文恭草稿后》云:“苏子由以直言对策,指陈缺失,批逆鳞而不顾,可谓忠谏矣,而坚欲黜之,何哉?”(《全宋文》281册)<sup>[1](P.133)</sup>苏辙也因直言而被贬,可见君臣际会之难。在该篇跋文中,袁燮还表达出其对于君臣契合的一种深深向往。忠诚义士抗颜切谏,挺身直言,其结果不是被贬官就是被罢黜,序跋作者在对这些史实进行载录评述时,还隐含着其对君臣背离、嘉言不纳的一种深层愤懑与担忧。

忠直之臣直言进谏面折君王,很多情况下被黜逐出朝廷,或被贬官,或被流放偏远之地。人生际遇由此大变,在身不由己富贵在人的情况下,九死不悔还是畏途知返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抉择。通过宋代奏议集序跋,可以发现这些被排挤出政治中心之臣子士人,随着仕途之挫折,宦海之沉浮,会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有些人会秉持一种“身在江湖,心系朝廷”的态度与情怀,这也是古代士大夫人格伟大之处。史浩《跋陈忠肃公谢表稿》记述陈瓘因直谏被贬官之后,“幽居南蓝,裘葛不足蔽体,簞瓢不能继日,人不堪其忧,而公温然盛德之容,了无愠色,笑谈舒愉,若被文绣而饱膏粱者。暨并谪台城,欣然就道,临岐掺袂,犹以京、汴为忧”。(《全宋文》200册)<sup>[1](P.36)</sup>史浩在最后称赞道:“非其所存介然不渝,安能甘此!”像陈瓘这样的士大夫在犯颜直谏,左迁贬谪远离朝政之后,依然心系天下,其精神可嘉,其人格伟大,而序跋作者在对这些人的人格和精神予以颂扬的同时,更

多表现的是对君臣未契的遗憾惋惜之情。杜范《跋倪文杰遗奏》云:“嘉定更化,召用诸老,济济在廷,而公独危言激论,落落不合,自此一斥不复。屏居十年,闭门著书,暇日棹扁舟、策短杖,赋诗酌酒,几与世相忘者。至其亲稿遗奏,爱君一念,至死不忘。”(《全宋文》320册)<sup>[1](P.234)</sup>杜范在此跋文中描述了倪思在被斥去官后选择一种侣鱼虾而友麋鹿的生活,但又身在江湖,心系君国,最后杜范感叹道:“使公之志得行于时,岂有二三十年秽染坏烂、不可收拾若是?其可痛哉。”在此,杜范既表达出对倪思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的惋惜,又流露出对因言斥官、君臣未契的憾嗟。

## 2. 奏议类文集序跋通过对君臣契合的追叙进而感叹盛时之难得,表达出一种对上下相得君明臣贤的盛世政治的向往和期待

宋代以前,以君臣相得而传为佳话者,如燕昭王与乐毅,经常受到后世的赞美。李白《行路难·其三》云:“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腰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sup>[5](P.76)</sup>李白在此热情颂扬了燕昭王与郭隗、乐毅君臣契合,成就霸业的史实。此外,经常作为君臣契合榜样的还有唐太宗与魏征。《新唐书·魏征传》云:“征状貌不逾中人,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sup>[6](P.3881)</sup>魏征对唐太宗可谓披肝沥胆,推心置腹,故在魏征逝世之后,唐太宗深为怀念,作《望送魏征葬》曰:“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谁共遣”<sup>[5](P.76)</sup>,深刻表达出因魏征去世而无人共有的遗憾与思念之情。唐太宗与魏征,作为君臣契合上下相得之典范成为唐代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的标志,也是“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关键。作为一种政治愿望,在宋代奏议集序跋中也多有对君臣契合的追慕与期待。曾巩《范贯之奏议集序》云:“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隐,一有得失善恶,关于政理,公无不极意反复,为上力言。或矫拂情欲,或切劘计虑,或辨别忠佞而处其进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余上,事有阴争独陈,或悉引谏官御史合议肆言。仁宗常虚心采纳,为之变命令,更废举,近或立从,远或越月逾时,或至于其后,卒皆听用。”<sup>[7](P.200)</sup>范师道作为人臣,矫拂世俗之弊,规劝君主之过,仁宗则虚心采纳,“为之变命令”,这种君臣之间难得的配合与默契,最终带来的是仁宗朝“朝政无大缺失,群臣奉法遵

职,海内又安”的局面。曾巩对君臣契合的描述并未就此而止,而是进一步通过感叹盛时难再表达出一种对君臣相合上下协同的追期,其在《范贯之奏议集序》最后感叹曰:“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

张田在《包孝肃奏议集题辞》中首先颂扬了仁宗皇帝之圣明,文曰:“仁宗皇帝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圣神明智之资,善容正人,延说议,使其谋行忠入,有补于国,卒大任以股肱者”,接着描述了包拯之贤能:“公上裨帝阙,下疗民病,中塞国蠹,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极乎是、必乎听而后已。其心亦无他,止知忠于君而为得也。”(《全宋文》48册)<sup>[1](P.195)</sup>可以说,正是由于仁宗之圣明才显示出包拯之贤能,诚如“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sup>[8](P.2830)</sup>。若无仁宗之圣明,包拯即使有经天纬地之才、匡国济世之智,亦会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慨叹。故张田最后总结曰:“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

北宋仁宗朝向来被认为是政治清明,君臣默契之时,有“汉文景”之誉,而南宋孝宗朝也被后人认为升级君臣关系融洽的一个时期。真德秀《跋著作刘公奏稿》曰:“(刘公)轮对则斥近幸盗权,以为阴侵阳之应,其上讨论事又申言之,至谓‘流荡戏狎,常始于燕游之无度;人兽杂乱,常出于御幸之无节。’呜呼,其亦可谓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讳言之时,其召遣贾祸当如何耶?而我阜陵优容讲纳,曾无纤介忤意,主圣臣直,讎弗信夫!”(《全宋文》313册)<sup>[1](P.212)</sup>真德秀在此跋文中对著作刘公敢于直言的精神和孝宗皇帝勇于纳谏的魄力予以推挹,对主圣臣直上下相得的称许,又流露出对本朝能够出如此政治局面的自豪与欣慰。

昔人有云:“君臣相遇,虽一语而有余;上下未孚,虽千万言而奚补?为臣子者,惟当罄其忠爱之诚而已尔。”<sup>[9](P.1619)</sup>君臣契合在封建社会中是难得一遇的,故历朝历代士大夫都对此理想境界向往有加。宋人在奏议集序跋中对士大夫因言去职壮志难酬的叙写与感叹,表达出对君臣未契的遗憾,同时也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对君臣相遇的理想状态的向往。宋人在奏议类文集序跋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君臣契合”的追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兴国梦”,这既反映出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旺盛的生命力,当然同时也暴露出其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局限性。

总之,宋代奏议集序跋中采用的独特书写方式,不但丰富了宋代文章学的研究,而且积淀了丰富独特的政治文化。宋代奏议集序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书写范式,不断地被后世认可和承继,其在序跋发展史中的开创之功和典范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 [参考文献]

- [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本.
- [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5]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 [6]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9]吴讷.文章辨体序说[A].历代文话本[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南山)

## 晚明周履靖“和陶诗”论略

邓富华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周履靖是晚明著名文人,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对周履靖的卒年作进一步的考察,确定其卒年当为明天启五年(1625);其次分析其慕陶情结的形成,而《五柳麋歌》篇篇和陶,且将已作与陶渊明诗文并存,其“和陶诗”不仅在陶诗学史上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陶集的传播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周履靖; 陶渊明; 晚明

**[中图分类号]** I207.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79-05

周履靖,字逸之,浙江嘉兴人。自号梅颠道人,又号梅墟、梅墟山人、茹草生、梅坞居士、螺冠子。周履靖博通经史,谙于金石篆隶及古玩器皿,专于著述,淡泊自如,编辑《夷门广牍》一百二十六卷,集历代以来小种之书及其所自著。周履靖在晚明交游广阔,与当时王世贞、陈继儒、皇甫汈、文嘉、刘凤、徐中行、吴国伦、茅坤、屠隆、董其昌等都有交往,叶向高曾称其为“海内高士”。本文主要就其生卒年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考,并且对其慕陶情节与“和陶诗”进行梳理论述,探讨其“和陶诗”与田园诗的价值与意义。

### 一、周履靖卒年再考

关于周履靖的生卒年,张军德认为其生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卒于崇祯十三年(1640)<sup>[1](P.124-125)</sup>,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sup>[2](P.171)</sup>、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等从此说<sup>[3](P.274)</sup>。徐朔方《周履靖年谱》则认为其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于崇祯五年(1632)<sup>[4](P.291)</sup>,汪超宏《明清浙籍曲家考》踵其说<sup>[5](P.505)</sup>。张军德将周履靖生年定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是根据周履靖《闲云稿》所收《己卯除夕》一诗来推断的。《己卯除夕》诗云:“残腊逼新岁,宵余尚旧年。松燃今夜火,竹爆早春烟。浊盾过村酝,辛盘入野筵。忽陈三十载,世事几变

迁。”<sup>[6](卷一-P.291)</sup>而《闲云稿》卷首有彭轸序,末署“万历己卯三月三日前刑部尚书郎彭轸撰”。张军德据此认为诗题中的“己卯”为万历己卯(1579),从“忽陈三十载”往前推三十年,得出周履靖生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说法。徐朔方则根据周履靖外侄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推算其生年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该日记万历三十九年(1611)八月十九日载:“梅墟周表叔七旬诞日,扶家君率儿子往称觞,以陈白阳画《古桧水仙图》为寿。”<sup>[7](P.30)</sup>李日华乃周履靖外侄,其日记逐日记事,所述当更为准确,据此推算其生年是可信的。另外,周履靖《五柳麋歌》有《和连雨独饮》“倏尔五十年”句,而《五柳麋歌》作于万历癸巳年(1593)。也就是说,周履靖的生年当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

但周履靖之卒年,张军德、徐朔方等均据清·盛枫《嘉禾征献录》所载定其九十一岁卒:“与王世贞、皇甫汈、文嘉、刘凤、徐中行、吴国伦、茅坤、屠隆、董其昌为莫逆交,年九十一卒。”<sup>[8](P.618)</sup>但是陈继儒在周履靖卒后编《梅颠稿选》,在其序中说:“道人今选稿具在,率本于天真烂漫,情性流行,不叫号以为豪,不呻吟以为幽,不狂搜险觅以为新怪。介石朋松,耕云钓月,笔墨纷披,飘然多逸群拔俗之想,年八十有四逝矣。”<sup>[9](P.333)</sup>这个说法更值得注意。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为周履靖好

**[收稿日期]** 2014-11-20

**[作者简介]** 邓富华,男,四川苍溪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友,两人交游唱和数十年,陈继儒曾作《梅颠道人歌》《周梅颠赞》,还为周履靖《泛泖吟》作序。可见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陈继儒的记述当更为可信。此外,《(崇祯)嘉兴县志》对周履靖的年岁的记载也与陈继儒所记相同:“周履靖字逸之,居白苎乡,……卒年八十四。有《梅颠遗稿》诸书行世。”<sup>[10]</sup>(卷十四)可见,清代盛枫《嘉禾征献录》中关于周履靖九十一岁卒的说法不知所据,并不可靠。如此,则周履靖卒年当为天启五年,即1625年。

## 二、周履靖的慕陶情结

周履靖在隆、万间号为隐士,而声名颇广。他“博洽嗜古,于书无不读……其赅前人作,压倒元、白,直逼古诗。”<sup>[11]</sup>(卷八《周梅颠道人索笑集序》)据严绍峰《梅墟书屋记》载:“逸之少业儒,不喜章句。”<sup>[12]</sup>(卷五P.270)且很早就有出世之念,其《感怀》云:“壮志侠少年,长怀出尘表。”<sup>[6]</sup>(卷三P.299)

周履靖的慕陶与隐居,与其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他自称“生而善病,甫弱冠弃去制举业。”<sup>[9]</sup>(卷十九P.486)据李日华《梅墟先生别录》,“先生甫束发,翁齿益高,……乃逼令先生婚。婚无何而竟构痲瘵,遂惘惘谢绝一切,幽栖于邑之郁秀观者几三年,雅善观主紫霞道人,所谭率世外事。”<sup>[13]</sup>(PP.481-482)不久,其父病重谢世,“郡县交辟数次不应,相国贻书欲缔布衣交,至欲古征士礼见,率不应。”<sup>[14]</sup>(卷二十二)“又郡中大疫,子复空橐募诸医储善药疗之,全活无算,于是家以复废,乃置酒召里中父老曰:‘余不敏,已具人世一兴替矣。人生旦暮耳,愿以生事听之,奴以蠹简终吾残岁。’”<sup>[15]</sup>遂筑闲云馆于鸳鸯湖之上,植梅数百株,募经史书画万余卷储之,日与宾客唱和为乐,每花时落英入户,几案皆满,辄狂吟竟日,故号梅癫。周履靖在经历了人世的变迁之后选择了隐居的生活,希望彻底了却世俗名利的烦恼,去过那种“潜身世外逃名姓,遗迹岩阿适性灵。”(《和贯休山居十咏》其六)<sup>[16]</sup>(P.512)的隐逸生活。

李日华说:“先生诗从陶、谢门入,而波及盛唐诸子。”<sup>[13]</sup>(P.483)周氏自云:“辞章羨靖节,道德宗老君。”(《和述酒》)<sup>[17]</sup>(卷三P.603)他在《归山乐歌》中这样描述其隐居生活:“静来打坐闲参禅,长日争夸似小年。相期社结竹林贤,闭门时养山中玄。”<sup>[9]</sup>(卷二P.349)类似的还有《醉桃花歌》《桃源行》等诗。渊明好酒,而周履靖说:“余不善饮,而性以此为适。”(《历朝酒歌序》)<sup>[9]</sup>(卷十八P.480)可以说,周

履靖无论在人世的感悟还在其诗歌创作中都有对陶渊明的企慕,他在人生的失意之后,选择的是逃离世俗的生活方式,追求一种淡泊宁静的心灵境界。当然,这样的抉择,并非始于周履靖,只是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品与行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历代士人的潜意识之中,一旦有了类似的生存体验,就会将陶渊明与己身联系起来。而在晚明时期,由于本有着一股崇尚隐逸的思潮,此时的文士就更加易于将其隐逸生活与陶渊明相联系。可以说,周履靖的逃世与慕陶,正是晚明尊陶与慕陶的一个典型。

## 三、周履靖的《五柳麋歌》与田园诗

也正基于此,周履靖将陶渊明的诗文“尽举其篇章按声而谱之”<sup>[17]</sup>(卷首P.588),名为《五柳麋歌》,现有丛书集成初编影夷门广牍本、明万历年间嘉禾周氏刊本。周氏刊本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有明代周嵩尧的手书题记。《五柳麋歌》共四卷,茅坤、屠隆、张献翼等人为其作序。关于他和韵陶诗的缘起,在《跋五柳诗四言五十韵》中有所交代:“岁在癸巳,时维孟春,……列坐言阔,促膝温存。奚囊一束,靖节诗文。云是宋刻,楮洁板新。世所罕睹,保护如珍。寄货之物,见售甚勤。高情眷眷,幽怀欣欣。慨尔沽易,命酒对斟。情意相洽,举杯殷懃。展展意悦,心骇目惊。四言绝倡,旷世寡闻。辞骚句雅,荣木停云。劝农命子,志旷思宏。衡门高志,答庞参军。饮酒雅调,归园居吟。大都汉魏,尺璧兼金。拟古杂诗,其声铮铮。贫士七韵,毛诗逼真。欲知奇论,细玩海经。述酒止酒,逸思纵横。怨诗楚调,情惨哀深。挽歌责子,悉其死生。归去来辞,独步词林。不遇古赋,妙在闲情。桃花源记,宛如亲行。五柳小传,高逸之铭。遍阅全帙,利禄毛轻。再咏再歌,高怀顷增。情契胶漆,遂尔和麋。窃其糟粕,摭成鄙吟。狂人孟浪,遗嗤宾朋。匪敢垂世,少畅余心。”<sup>[17]</sup>(卷四P.615)据此可知万历癸巳年(1593),这一年,周履靖五十二岁,他得到宋刻陶渊明诗文集,有感于与陶渊明“情契胶漆,遂尔和麋”。并且,他在这篇跋中,高度评价了陶渊明诗文的价值,称其四言是“绝倡”,《咏贫士》诗乃“毛诗逼真”,诸如此类,足见其对陶诗涵泳之深。他在《雪窗读五柳诗即事三十韵》中亦云:“漫读饮酒吟,景仰征君德。吟哦集古风,追和仿嘉则。如溷撒佛头,拙鄙敢云敌。陶公嗜黄花,我亦爱梅质。意气颇相投,却恨世悬隔。”



[17](卷一P.591)认为自己的爱梅与陶渊明的嗜菊有着相同的意味,其庚和陶诗,主要是“景仰征君德”,也就是对于陶渊明高风的企慕。可见,周履靖是将陶渊明作为一个道德理想的人物典型而看待的,他所追慕的也是陶渊明那遗世独立的高洁品格,他自感“意气颇相投”,但“世悬隔”,因此对于陶渊明的这种知音之感只有通过和其诗来达到与其神交的目的。

《五柳麋歌》先录陶诗,然后将自己的和诗列在陶诗之后,既是和陶又是效陶,但他的和诗又不仅仅是附庸风雅而已,其意还在于“歌我闲云篇”(《和答庞参军》)[17](卷三P.609),也即通过和韵陶诗,一方面表达对陶渊明其人与其诗文看法,另一方面,也是借和陶来抒发自己对世事人生的感慨。茅坤《周逸之和陶诗题辞》云:“予友人周逸之,田野间以歌咏自适者,数手陶氏集,抱膝而诵,复累欷不自己,已而一一和之,且按章擷句,按句擷字,按字循声,毋乃近于俗,所谓无病而呻吟者乎?然其旨趣寥旷,兴寄恬远,其殆仿古之山泽而欲遗名身后者已,予故多赏心而题以归之。”[18](卷三十二PP.154-155)就指出了虽然周履靖这种“按章擷句,按句擷字,按字循声”的和诗方式有刻板的一面,但只要不是无病呻吟,而能寄托自己的志趣,那就是有价值的,值得称道的。刘凤在为《五柳麋歌》作序时也强调了周履靖能以和陶来自书其趣:“且渊明自以耻臣后代,故托焉而逃其诗,固徜徉事外,无复有当世意。周君亦愤世忧生,触事兴感,叹无所出,以舒其抑郁之怀。惟肆于艺事,故其言虽磊砢不平,复不伤于用气,千载有作,非斯人谁归。”[17](卷首PP.586-587)此说虽不免过誉,但却指出了周履靖的和陶是“触事兴感”之作。故张献翼也云:“观其和陶一编,头头是道,重重发光,和澹以宣情,春容以达气。纵笔诸篇,无一字溪径,真得古人之髓,不徒索之形骸矣。词旨并妍,古今同调,亦奇矣哉。又征君隐操,将兴歌于蹇秀,高吟于遗金,于渊明士节雅有意焉,岂惟和其诗而已哉。”[17](卷首P.587)将周履靖的和陶定位为宣情的产物,并认为其和陶诗不仅在诗体的形式上“得古人之髓”,而且是有意追慕陶渊明的高节。可以说,周履靖“和陶诗”的价值正在于借和陶来抒发他自己的情感,所以屠隆《五柳麋歌序》云:“集中有出世语,亦有愤世语,有警时语,亦有悟时语,有奇语,有复语,茆鹿啾啾,大都任所自得,鸣所自适,道人颠耶?非耶?”[17](卷首P.587)

周履靖的和陶诗,从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表达对陶渊明的企慕。在《和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云:“早岁性耽读,时契古人书。囊萤与映雪,常愧吾弗如。适有远游兴,志在登天衢。金门思献策,乡井日已疏。迢迢云水阔,回首路萦纡。不惮关河远,心追万里余。烟树障吾目,白云覆吾居。危樯集海燕,桂楫惊游鱼。名缰与利锁,此身冠裳拘。得遂生平志,还当返故庐。”[17](卷三P.608)他早年也有一番抱负,也曾想“金门思献策”,但“名缰与利锁”又是自己所不能承受的。在《和饮酒二十首》其十二表达了对陶渊明的归隐与超然世外的歆羡:“彭泽陶五柳,诗酒名晋时。挂冠卧柴桑,赋就归来辞。高风振千载,芳声犹在兹。……于今追靖节,无日不颂之。”[17](卷一P.596)其《和有会而作》亦云:“静看富与贵,转眼忽已非。……世羨陶五柳,堪为达者师。”[17](卷三P.610)又如《和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述》云:“独羨陶征君,弃冠全靖节。我本山林徒,此生甘守拙。”[17](卷三P.609)表达自己与陶渊明同样有着隐逸的情怀,不为利禄所动:“志抱烟霞癖,结庐傍山隅。操瓢拂尘麈,飘然脱迷涂。但与杯酒洽,不为利禄驱。”(《和饮酒二十首》其十)[17](卷一P.596)

其次对归隐田园生活的描写。周履靖说自己“性本爱岩居住。”(《山居即事》)[6](卷三P.301)“自适丘园性”(《偶题》)[6](卷三P.301)。在弃绝世俗之后,开始了自己的“种柳学陶潜”(《咏怀》)[6](卷一P.287)、“依杖看流云”(《村居客过》)[6](卷一P.289)、“守道存吾拙”(《写怀七首》其七)[6](卷二P.295)的隐居生活。他笔下的田园村居生活,也是一种与世无争的脱俗状态,离开城市的喧嚣,没有纷纷扰扰的尘世往来,可以听鸟鸣,灌园蔬,吟新诗。可以说,在这些方面他是受到陶渊明的较大影响,如《和移居二首其一》:“喧嚣厌尘市,徒居苕村宅。墟闲但植梅,艺圃怡朝夕。穷年计有期,何肯被尘役。高堂非吾愿,陋室陈几席。溪桥故人来,把酒论往昔。意到赋新诗,衷情句内析。”[17](卷三P.605)

由于周履靖有乡居田园生活的体验,在其和陶诗中也多表现农事的诗篇,如《和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居家何所事,耕织以为端。车戽昼不息,宵织妇不安。三春能努力,深秋禾可观。负锄戴星出,荷笠冒露还。黄雀喧残照,西风袭袂寒。此日及西畴,方知稼穡难。”[17](卷三P.607)又如

《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禾稼稔畎亩，农家岂谓贫。秋深满场圃，因知春务勤。朝犁驱黄犊，昼餉犬近人。桔槔逢薄暮，树杪月色新。碧水平畦岸，盈盈意自欣。肩车归茅屋，渔艇渡绿津。索鱼问篷底，贯酒过北邻。岁晚征输毕，逍遥太古民。”<sup>[17]（卷三P.606）</sup>这些诗篇并不仅仅着眼于田园生活的平面描述，还在其中表达了作者对于生活的真切体验，如《和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就发出了稼穡之难的感慨，《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则抒发了“岁晚征输毕”之后的逍遥与欣慰。

再次，在和陶诗中感慨人生苦短，希望及时行乐。如《和连雨独饮》：“乌鬓易堆雪，青春弗再还。记得学舞剑，倏尔五十年。不须忧贫贱，为乐是良言。”<sup>[17]（卷三P.609）</sup>《和饮酒二十首其五》：“行乐须及时，莫待双鬓白。良辰不成欢，老至诚堪惜。”<sup>[17]（卷一P.597）</sup>“老去不复少，良辰杯可持”（《和饮酒二十首其一》）<sup>[17]（卷一P.595）</sup>“花前且沉醉，荣辱不足惊。滚滚红尘里。首白嗟无成。”（《和饮酒二十首其三》）<sup>[17]（卷一P.595）</sup>而对于亲情的描写，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如《和责子》：“清霜侵鬓毛，有子匪云实。四男在膝前，不能亲砚笔。兆隆虽二六，质钝世无匹。梦雷方五龄，勉强为儒术。梦震年四春，杯酒十饮七。阿科方二周，弗乳即噉栗。奈何未成人，奚必贪世物。”<sup>[17]（卷三P.610）</sup>《和悲从弟仲德》写自己的从兄逝后，上有老母下有幼子的凄凉：“含愁一往吊，泪洒如珠零。忆昔同携手，何期归幽冥。眷爱顷尔绝，遗容俨若生。悠悠九泉下，身朽名不倾。精灵何所托，世事嗟无成。痛哉堂上母，二子方弱龄。广厦无客至，孤房哭有声。蛛丝蒙绿牖，苔藓余闲庭。惟有梁间燕，依依恋故情。白骨埋黄土，丹青写病形。不堪题挽句，凄怆衷肠盈。”<sup>[17]（卷三P.610）</sup>

郑琰说：“靖节陶君芳声高躅，历千古莫之与京。樵李梅墟君词气口吻直逼其真，观之和陶诸什，宛是采菊东篱、悠然南山之句风致，梅耶？菊耶？何幸有两主人耶？逸之诗晚年精诣，其和陶诸什，俨若居五柳宅中作脱巾漉酒态，读之不能去手。”<sup>[13]（卷下PP.490-491）</sup>对周履靖的和陶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确实，除了《五柳赓歌》外，周履靖还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其诗歌创作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部分作品上，可以说他的诗风也是受到了陶渊明的重要影响，其田园诗由于融入了自己田园生活的实践而显得更加生动，如：

欲屏寰中迹，郊墟构小庐。不妨营日夕，聊以托村居。时听鸟鸣谷，欣看农荷锄。送云归岭岫，带月灌园蔬。得意哦新句，无材任朽樗。客来炊脱粟，僮去击鲜鱼。莫谓寰无物，还欣架有书。但能长寿考，利禄本来虚。（《田居》）<sup>[6]（卷二P.293）</sup>

欲屏尘嚣迹，移家住白云。情闲调野鹤，味淡煮香芹。春到梅枝好，秋来菊蕊芬。兴余还自酌，不觉醉斜曛。（《郊居》）<sup>[6]（卷三P.297）</sup>

绿树村边绕，清溪槛外纡。闲披高士传，频灌小园蔬。昼静闻山鸟，林深少客车。欲知逃世网，修竹是吾庐。（《春日南园杂兴八首》其三）<sup>[6]（卷一P.287）</sup>

樵李城南五里余，萧萧水竹野人居。浮云世外一樽酒，长日床头数卷书。虚牖月明留客醉，芳园雨过课儿锄。悠然流水柴门绕，白日垂竿且作渔。（《村居》）<sup>[6]（卷一P.290）</sup>

以上所举的四首诗歌不难看出，周履靖的田园诗歌并不着意写自己的农耕生活，而是注重对山居田园悠闲情态的描摹，也即在田园诗中赋予一种闲情。当然，在诗歌意象的运用上，借鉴了陶诗“荷锄”“菊花”“山鸟”等词汇。由于周履靖隐居梅墟过着一种耕读的田园生活，我们也不难看出其田园生活中对“书”的刻意强调，其文人气息十分浓郁。

#### 四、周履靖和陶诗接受的诗学史意义

陶渊明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开田园一派，受到后世不少文人墨客的追慕。自苏轼开和陶之风，后世和陶的作家不乏其人，其和陶之作更是不胜枚举，但将陶渊明的每一篇诗文都进行庚和，这又是不多见的，足见周履靖对陶渊明的尊崇之意，“后之和陶，仅学步其一二，尚未有能仿佛者，况章章步趋，有倡斯对，詎不尤难哉？”<sup>[17]（卷首P.587）</sup>换言之，和陶诗本身就是一种对诗歌技艺的考验，尤其是韵与意的兼得就更难能可贵了。对于这种“有倡斯对”，周氏自己的解释是“意气相若，堪为侣乎。”<sup>[17]（卷四P.615）</sup>显然，他认为自己的诗歌在“意”上更接近陶诗。

像《五柳赓歌》这样的和陶集，可以说是陶渊明诗文与周履靖和韵之作的一个合集，这样一个编刊方式，客观上对陶渊明诗文作品的传播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其次，周履靖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表达对陶渊明的尊崇，也是借陶诗来明志，而

其田园诗歌的描写,直承陶诗,在田园诗歌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明代中叶以来,隐逸文化开始在失意士人中兴起,并弥散开来,至晚明,从官员、名士到山人都表现出对隐逸的普遍歆羨。”<sup>[19](P.200)</sup>对隐逸的羡慕与向往是晚明的一种风气与思潮,周履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与此相联系,被推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正好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宗尚对象,而和陶诗的产生也与此相关。陶诗虽然自唐宋以来受到文人的普遍推崇,但陶诗在接受在明代也曾受到挑战,特别是何景明提出“诗弱于陶”,而前七子也大都持这种看法,他们提出诗宗盛唐与汉魏,而对陶渊明没有给予诗歌史应有的地位;直到晚明,陶诗又重新受到重视,其中晚明的隐逸之风更是推动了这种尊陶崇陶的思潮。周履靖的“和陶”正是晚明尊陶崇陶的重要表现,在陶诗接受史上也是其重要的一环。

#### [ 参 考 文 献 ]

- [1]张军德.周履靖的生卒年及其它[J].《中国文学研究》,1988(2).
- [2]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3]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 [4]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2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 [5]汪超宏.明清浙籍曲家考[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 [6](明)周履靖.闲云稿[A].丛书集成新编第68册[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7](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A].历代日记丛抄[C]第5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 [8](清)盛枫.嘉禾征献录[A].四库存目丛书[C]史部125册影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
- [9](明)周履靖.梅颠稿选[A].四库存目丛书[C]集部第187册影印明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0](明)罗炯.嘉兴县志[M].明崇祯十年刻本.
- [11](明)李培.水西全集[M].明天启元年刻本.
- [12](明)汪显节编.梅坞贻琼[A].丛书集成新编本[C]第5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13](明)李日华、郑琰.《梅墟先生别录》[A].四库存目丛书[C]史部第85册影印万历刻夷门广牍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
- [14](明)刘应珂.嘉兴府志[M].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
- [15](明)周履靖.螺冠子自叙[M].明万历刻本.
- [16](明)周履靖.《山家语》[M].丛书集成新编本[Z]第7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17](晋)陶渊明撰,(明)周履靖和韵.《五柳庶歌》[A].丛书集成新编本第56册[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18](明)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A].续修四库全书[C]第1345册影印明万历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9]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南山)

# 《安禄山事迹》的叙事艺术

——兼与正史比较

凌 帆 王立增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安禄山事迹》是唐代中后期出现的一部史传作品,以安禄山的一生为主线,记载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相关历史,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但此书叙事又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真实“历史”,部分叙述存在着主观臆测的成分,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文章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手法等三个角度分析《安禄山事迹》的叙事艺术,通过对《安禄山事迹》与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中叙事的比较,总结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的异同。

**[关键词]** 《安禄山事迹》; 叙事艺术; 正史; 比较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84-11

《安禄山事迹》(以下简称《事迹》),唐代姚汝能撰,《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史”类。本书主要以安禄山的一生为主线,对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相关历史作了专题记述。全书共三卷,上卷从长安三年开始,叙述安禄山的出生及后来受到唐玄宗的宠遇之事;中卷写天宝十三、十四载安禄山叛乱的过程;下卷记载安禄山称帝、被杀及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之事,一直叙及宝应元年。由于该书作者姚汝能生活在唐代,曾做过华阴县尉,而华阴正是遭受安史兵灾最严重的地方,姚汝能在这里既能听到很多有关安史之乱的传闻轶事,也可以看到不少战乱造成的焦土、废墟。因此,《安禄山事迹》的描写较为真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事迹》一书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真实“历史”,由于作者不可能“总是在历史现场”,所以部分叙述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臆测的成分,在实录的基础上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其中含有一些小说叙事的手法,具有一定的小说因素。

## 一、多变的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

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是叙述话语中对故事情节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是叙事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事迹》的叙事视角颇为多变,既有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编辑性叙事视角,又有限知视角,与正史中单一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有所不同,而视角的采用透露出了作者一定的政治态度与情感倾向。

### 1. 全知视角的运用

史传一般是“以文运事”,记录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史实,总体上采取全知视角,《事迹》也是如此,书中多采用全知视角,其中既有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也有编辑性全知视角。

#### (1) 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即作者全知,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前因后果;历史人物的优、缺点,高尚与卑劣之处;历史人物的情感变化历程、内心活动;历史人物之间的隐秘活动等,了如指掌、无所不知。作者作为叙事者,对书中人物的身世、性情、人生经历等都以全知视角展示出来,如:

安禄山,营州杂种胡也,小名轧荦山。母

**[收稿日期]** 2014-11-15

**[作者简介]** 凌帆,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王立增,男,甘肃天水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犂山，神应而生焉。……少孤，随母在突厥中。母后嫁胡将军安波注兄延偃。开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将军安道买男孝节并波注男思顺文贞俱逃出突厥中。道买次男贞节为岚州别驾收之。禄山年十余岁，贞节与其兄孝节相携而至，遂与禄山及思顺并为兄弟，乃冒姓安氏，名禄山焉。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解九蕃语，为诸蕃互市牙郎。

这一段话将安禄山的出生、包括他母亲的情况、少年经历，以及性情一一做了交代。而后，作者按时间顺序逐步交代安禄山的生平，他的封官拜将、封王进爵、封妻荫子，他的沙场征战、谋逆叛变，作者好像只是回忆一段历史旧事，读者在阅读接受时与叙事者、人物之间没有距离。

再如，对于哥舒翰的记载，哥舒翰是玄宗时期名将，拥兵潼关之初也令安禄山恐惧。潼关利在守险，不利出攻，哥舒翰作为守关将军不能坚持正确的意见，在玄宗的催促下冒然出兵，潼关失守。虽然主要是杨国忠蛊惑皇帝，但他作为一方大将，有着非常丰富的军事经验，非常时期不能坚持己见，潼关失守其责难托。失败后他又不能像颜杲卿那样至死不屈，很快投降了安禄山，还写信招降李光弼等大将，遭到诸将谴责，立功不成又被安禄山杀害。他的优柔寡断、贪生怕死终于导致了变节投降仍被杀害的悲惨结局。人物的多面性、立体性，通过作者的全知视角得到展现。

作者对人物情感的变化历程和心理的活动过程也采用全知视角，如卷下云：

禄山揣幽燕戎王、蕃胡酋长多未之见，乃诳曰：“自吾得天下，犀象自南海奔来，见吾必拜舞，禽鸟尚知天命所归，况于人乎？则四海安得不从我！”于是令左右领象至，则瞪目忿怒，略无舞者。禄山大惭，怀怒命置于窞井中，以烈火烧，使力惫，俾壮士乘高而投之，洞达胸腋，流血数石。

安禄山首先在心里揣测这些外王没见过唐宫的犀象、舞马，才敢夸下海口，一个“诳”字使安禄山小人得志的神态跃然纸上。然而，他没料到这些犀象通晓人性，不肯为逆臣表演。海口已经夸下，面对诸多幽燕戎王、蕃胡酋长，安禄山自是十分羞惭，继而大怒，残忍的烧死这些令他失掉颜面的犀象。

而且，作者对历史人物之间的隐秘活动也是

了如指掌，如严庄、庆绪、猪儿相谋刺杀安禄山：

庆绪每惧见废，严庄亦虑禄山眼疾转甚，恐宫中事变之后将不利，遂夜与庆绪及禄山左右阉竖李猪儿等同谋。庄谓庆绪曰：“殿下闻大义灭亲乎？臣子之闲事不得已而为者，不可失也。”庆绪小胡，性又怯懦，忧惧之际，遂应之曰：“兄之所为，敢不从命。”又谓猪儿曰：“汝事皇帝，鞭笞宁可数乎？汝不行大事，死无日矣。”

这本应是极其隐秘之事，如果所记是事实，生活在近百年之后的作者何以得知？如果所记不是事实，那又为什么这样写？这些虚构的描写，只能算是作者合理的想象。也就是说，作者叙事过程中保持全知全能的身份和地位，对任何事情都能一一道来。

《事迹》一书在叙事过程中，经常是将安禄山一方与朝廷一方两条线索交叉进行叙述，以便更加全方位记录事态的发展。如卷中，先写安禄山接连攻陷城池，陷太原、灵昌、洛阳；其后则记叙朝廷一方的动态。如此写作，只有运用叙事者的全知视角，才能灵活转换，头绪清晰，读者才不致混乱。再以天宝十四载的叙事为例：五月，先有安禄山请以蕃将代汉将，紧跟着是杨、韦痛陈其反状；六月，玄宗使黜陟使分行郡县，对应的是安禄山见使者全无人臣之礼。安禄山或朝廷一方如有举动，对方一定有相关的反应。因此，作者对一件事是分别从两个角度加以记载，唯有全知视角，方能从容驾驭，娓娓道来。

## (2) 编辑性全知视角

编辑性全知视角也就是作者从单纯的讲述故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故事的某一段情节进行评论。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到编辑性全知视角，叙事者的态度为作品做出价值上的判断，体现了叙事者的态度，表明了叙事者对作品、人物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也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关系。如：

①禄山恃恩宠，纵虚妄，以取媚于玄宗，皆此之类也。

②禄山恃此，日增骄恣。尝以曩时不拜肃宗之嫌，虑玄宗年高，国中事变，遂包藏祸心，将生逆节。

③其将皆勇而无谋，日纵酒高会，唯声色财货是嗜，不复萌西进之心。故肃宗得乘其弊，盖天所命也。

第①句是安禄山屡次假借祥瑞之事向玄宗邀宠,作者毫不客气指出他“纵虚妄”,是“取媚”。表明作者对他的这种行为的嗤之以鼻。第②句是在介绍安禄山母亲、祖母都封为国夫人,11个儿子都是玄宗赐名,长子庆宗还尚荣义郡主之后的评论。此时安氏可以说是满门受宠,但安禄山不但不知恩,反而包藏祸心,作者的批判之意显而易见。第③句是安禄山陷两京后,作者对他部下将领的一个评价。有勇无谋,沉湎声色,嗜酒好财,目光短浅,完全没有进取心,没有想到乘机夺取整个天下。这不仅是部将的弊病,也是安禄山自身的致命弱点,更是他最终没有取得天下的原因之一。当然,作者还是将肃宗的成功归为天命,“历史的宿命论”不得不说是作者认识的局限性。

## 2. 限知视角的转换

### (1) 视角的转换

历史叙事一般在总体上采取全知的视角,但是在局部描写上也会采取限知视角,从特定人物的角度讲述事件的发展状况。这时,作者在幕后统摄、调控一切,众多人物视角的转移、流动就完成了作者对历史的完整叙述。《事迹》中在局部也运用了视角的流动,一个叙事片段运用一个视角,属于局部的限知叙事;但就其整体而言,是由一个视角转移到另一个视角,限知视角的不断流动,从而构成了全方位的历史,本质上仍是全知的。如在马嵬之变中,玄宗的心理、行动,都是由近臣的眼中看出,叙事视角在书中人物之间流动:

入宫,憩于树下,惘然有弃海内之思。高力士觉之,遂抱上足呜咽。上曰:“朕之作后,无负黎元,今朔胡负恩,宗庙失守,竟无一人勤王者。朕负宗社,敢不自勉!唯尔知我,更复何言。”……王召从官,唯见素父子二人。上策杖蹶履,自出驿门,令各收军,军人不应。行在都虞候陈玄礼领诸将三十余人,带仗奏曰:“国忠父子莠篆,太真不合供奉。”上曰:“朕即当处置。”乃回步入驿,倚回久之不进,韦諤极言,乃引步前行。

玄宗的“弃海内之思”是高力士的视角,安抚军人则是韦见素的视角。要赐死杨贵妃,作者没有以全知视角描写玄宗的心理,只用韦见素眼中的“倚回久之不进”一句,犹豫、不舍、痛苦,爱情与社稷的抉择,帝王的无奈,都隐藏其中了。

再如下面一段话:

①其九月九日甲午,缚太原尹杨光翊,送

之。②贼将高邈伪进射生手二十人,光翊轻骑出迎,遂为所执,送诣禄山。③太原奏光翊被擒,并东受降城奏禄山反。④玄宗犹疑以讎嫌毁谮,尚不之信。⑤移牒陈其罪状,末云:“光翊今已就擒,国忠岂能更久。”⑥其日阴风凄惨,观者寒心。

第①句是高邈的视角,第②句是杨光翊的视角,第③句是朝廷的视角,第④⑤⑥句是叙述者的视角,其中第⑤句又是叙述者代安禄山言,叙事视角在叙述者与书中人物之间转移。视角不停的转移,全方位展现了史实,构成了叙述者的全知。运用视角转换不仅使叙事灵活多样,多方展示,避免单调,同时也满足了读者对历史的全知需求。

### (2) 聚焦

如果说视角是讨论“谁在看”,那么聚焦讨论的则是“什么/谁被看”。与聚焦相对的是非聚焦,即盲点。盲点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本就在聚焦之外,也可称为“外盲点”,一种是在叙事过程,由于限知视角的原因,暂设某个盲点,它随视角的扩展而消解,是为“内盲点”。对于《事迹》一书而言,其聚焦点自然是有关安禄山的事迹。自长安三年(703年)至宝应元年(762年),唐帝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数不胜数,作者虽有意网罗天下史料,但只撷取突出主题的事件入书。这里笔者要重点讨论的是叙事中的聚焦与内盲点,它要求透过文本聚焦部分,去窥探聚焦之外的内容。例如:

禄山始惧,责高尚及严庄曰:“汝等令我举事,皆云必成,四边兵马若是,必成何在?汝等陷我,不见汝等矣。”遂诫门下逐之。

这段话聚焦在安禄山责难部下,不过这只是表层意义。其盲点可以解读为安禄山一方进兵不利,节节败退,并导致主帅内心动摇、方寸已乱;而朝廷大军暂时占据优势。再如:

其九月九日甲午,缚太原尹杨光翊,送之。移牒陈其罪状,末云:“光翊今已就擒,国忠岂能更久。”其日阴风凄惨,观者寒心。

丁卯,陷灵昌郡。庚午,陷陈留郡,传张介然、荔非守瑜等首至。寻陷荥阳,传太守崔无波首至。禄山是行也,人以为败不旋踵,及频告捷,人皆失望。

十二日,封常清战败,西走保陕州。

十三日,陷洛阳,传留守李愷、御史中丞卢奕首至,平原太守颜真卿留其首,斩其使者,哭而瘞之。

此为卷中安禄山起兵后的一处叙事,连续几段记述战争双方胜败情况。话语聚焦处是安禄山大军的频频告捷,对应的盲点则是朝廷守军的节节败退和国人的失望,或者可以说是作者的失望与痛心。盲点表达的内容才是深层含义,才是作者真正要表达的内容。

### 3. 由叙事视角体现出的作者态度

作者在写这本书时,对自己的定位无疑是大唐忠实的子民,这一点我们单单从作者对安禄山的称谓上就可以看出。在安禄山谋反之前,作者对其称名字“禄山”;而在他起兵之后就直呼为“贼”了,“贼”、“贼党”、“贼将”、“伪官”等称呼比比皆是,还有称契丹为“虏”,朝廷一方则称为“我”、“我众”、“我军”,叙述者与朝廷位置重叠。我们从这些称谓便可以判断出作者姚汝能的立场。安禄山、史思明确是逆臣,但并非一无是处,他们能在盛唐掀起如此浩大的叛乱,叛乱初期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更是坚持了八年之久,其能力与威望不容小觑。本书卷上自注中有一事例,笔者以为颇值得玩味:

又其时选人张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也,不辨菽麦,假手为判,中甲科。时有下第者,为蓟令,以事白禄山。禄山恩宠渐盛,得见无时,具奏之。玄宗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升第者一二。奭手持试纸,竟曰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玄宗大怒,出吏部侍郎宋遥为武当太守,倚淮阳太守,敕“庭闹之闲,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仍以托人”。士子皆为戏笑焉。

自实行科举考试以来,科场舞弊是屡见不鲜。此事分属吏部,按常理,下第士子应求助于朝中文官或京城高官等。然而这位士子却向一不相干的边关武将申诉,足以说明安禄山不仅权势甚盛,能以武将之位干预文官选拔,而且用人方面的确相对公正。从书中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安禄山善于使用有才之人,就连抵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的常山太守颜杲卿都是他保奏的,那些食大唐俸禄的将军能死心塌地跟随他,不仅仅是蕃将,还有大唐功臣之后,如唐朝名将张仁愿的后代张通儒、薛仁贵后代薛嵩,至少说明了安禄山在用人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当然在作者眼中笼络人才不过是为了叛乱做准备。行文中对安禄山极力贬低,虽然没有过于直接的表明作者的态度,但已“于叙事中寓论断”。其原因就在于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

大唐经百余年积累起来的社会繁荣毁于一旦。

在这种背景下,姚汝能写作《事迹》一书的用意耐人寻味,笔者揣测其动机有二:其一,缅怀盛唐,抒发情志。安史之乱之后武将有了用武之地,而文士被排挤到社会边缘,没有了锦绣前程,追忆往昔,颇多生不逢时的无奈,这种心态一直存在于中晚唐文人之中。姚汝能一生应该是混迹于下层,面对黯淡的现实,又来到安史兵灾最严重的华阴,华阴的焦土废墟触动心中的块垒,胸中郁结化作文字,声讨带给文人命运转折的安史之乱,书中自然对安禄山等叛军将领极力贬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逆臣的痛恨。对于唐玄宗宠爱安禄山而导致安史之乱,更是满含讽刺和悲愤之意。但作者仍表现出对盛唐的留恋,人心思唐的心理时常隐现在叙事中,如卷中有“累其兵力不能进尺寸之地”,卷下有“城邑为墟,而人心不改。及闻肃宗治兵于灵武,人心益坚矣”。

其二,垂鉴资治与抑恶褒善。历来修史的目的之一就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姚汝能的写作也不排除这一用心。玄宗要建立边功,任用蕃将,宠爱安禄山,酿成大乱,这一经验教训不唯唐人,后世历代都未曾大意。除了总结历史成败兴坏的道理,以给当朝和后世提供借鉴,而且还要在世道人心方面提倡善恶教化。书中对颜杲卿宁死不屈的赞扬,对梨园犀象、伶人不为伪皇帝表演的描写,不禁令人感慨象犹如此,人何以堪!相反的是那些官吏纷纷投降,达奚珣乱前上书阻止安禄山借进献之名运兵,战后摇身变为伪朝侍中,文人气节尚不如伶人乐工!国乱显忠臣,板荡识诚臣。鲜明的对比中,作者抑恶褒善的用心不言而喻。

### 4. 与正史叙事视角的比较

新、旧《唐书》的叙事也都是总体上采用全知视角。《旧唐书·安禄山传》在写作上更加客观,行文只是按时间顺序记录安禄山等人生平发生的重大事件,很少带有主观情绪。《旧唐书》修于五代时期,各国纷争,正是唐代藩镇割据遗留的政治局面,他们无法对安禄山等人进行激烈的抨击,否则置自身于何地?《新唐书》的主观色彩则稍微浓厚一些,除了跳出叙事者的身份进行评价外,在篇末还有一论赞,更为集中地表达了撰著者的意志。宋代重修唐书的直接目的就是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想从唐朝寻找可资借鉴的事例。向往唐朝为国长久,因而要注意“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治乱



兴衰之迹”，特别希望效法“其典章制度之英”。修史过程中非常注重发扬“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之善，暴露“昏虐贼乱、祸根罪首”之恶，以达到“垂劝戒、示久远”的目的。为“暴恶以动人耳目”，更是将《逆臣传》置于全书最后，十分醒目，文中自然对安、史带有诸多抨击之语。

但是，《事迹》在限知视角的运用方面，明显要多于新、旧《唐书》，《事迹》中有数处是从张守珪、张九龄、唐肃宗等人物的视角进行叙述，新、旧《唐书》则很少，一篇列传中也很少进行视角的流动。究其原因，新、旧《唐书》因篇幅浩大，可以在其他人的列传中叙述有关事情，互为补充。而《事迹》毕竟是集中描写安禄山的，但姚汝能又想在书中尽可能包罗各种材料，如果仅从一方视角来叙述的话，将会省掉很多有价值的描写。限知视角与全知视角结合，对历史的叙述就更加全面了。

## 二、独特的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是叙事内容的存在形态。它是“沟通写作行为和目标之间的模样和体制”，将叙事的顺序和风格展现给读者。《事迹》叙事不拘泥于时间顺序，根据人事灵活处理，节奏上前快后慢，详略得当，这些与正史有相同之处；但体例上做到了推陈出新，自注的形式使行文叙事始末详备，更为独到。

### 1. 叙事顺序

作为史传文学，《事迹》在叙事上主要按时间顺序进行，但也经常穿插使用其他叙事形态，如倒叙、补叙、插叙、预叙。书中记安史之乱，由于涉及到的相关的人和事异常繁多，为了使正文中事件发展的脉络清晰，在记一些相对次要的人事时，作者往往打破时间顺序，采取其他叙事形态，这些通常表现在自注中。或上溯下及，或给相关人物立传，以使前后相互照应并使事件发展的线索更清晰。

#### (1) 倒叙

在书中，倒叙主要是追述事件发生以前的事况，最早上溯至玄宗即位之初的开元年间。如卷中杨国忠构陷张垆后，在自注中交代：“初，垆赞相礼仪雍容。玄宗翌日谓垆曰：‘朕罢希烈，以卿代之。’垆曰：‘不敢。’”贵妃在座，遂告国忠叛之，因以为恨。”再如，卷上写到安禄山于天宝六载加御史大夫，对于他的屡次升迁，作者在自注中说明了原因：

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咸以大将直登三事。李林甫既陷适之，遂反其制，始请以蕃人为将，尝奏于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国家富强，而蕃之未灭者，由文吏为将而怯懦不胜武也。陛下必欲灭四夷，威海内，即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将，生时气雄，少养马上，长习陈敌，此天性也。陛下抚而将之，使其必死，则夷狄不足图也。”玄宗因此而龙颜大悦。

这两段文字都使用了倒叙的方式。第一个例子，其倒叙是为了解释杨国忠为何要借机构陷张垆；第二个例子中的倒叙既说明了安禄山生迁的原因，又交代了一些其他事情——李林甫构陷李适之，适之罢相，林甫升为右相，怂恿玄宗提拔蕃将，从而为安史之乱埋下祸根。

#### (2) 补叙

《事迹》中有时会补叙相关事况，如卷上记张九龄劝玄宗杀掉安禄山，玄宗不肯。自注曰“玄宗至蜀，追恨不从九龄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酹，其诰辞刻于白石山崖壁中。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德宗以九龄先睹未萌，追赠司徒。”补叙内容围绕唐皇对未早杀安禄山的悔恨与遗憾，下及到安史之乱后以及德宗建中元年事，使此事有了完整的描述。

再如，安禄山窃国之初，封赏百官，自注中就对复国后这些任伪职的官员的命运做了交代：

初，汾阳收东都后，差人送伪朝士陈希烈等三百五十余人赴京，兼奏表请从宽恕以招来者三表。上皇以朝官不扈从，其恨颇深，遂下敕云：“初陷寇逆，忽被胁从，受任数年，得非同恶，戴天履地，为尔之羞，宜付三司详理处分。”后三司讞刑奏曰：“达奚珣、珣子摯、薛暹（一作兢）、韦恒、韩澄井、大通丹、大华、刘子英罪当大辟。陈希烈、张均、门用之、郭纳、许彦蒿并赐自尽。许房、宇文班、卢自励、达于□、萧克济、陈□、柳芳、李彦光、何昌裔、郝处俊、崔肃等流于徼外，勿齿。”帝曰：“珣、摯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摯一等，囚于所司。太师房琯曰：“张均欲往贼所，望五陵涕泣而不忍去也。”遂减死一等，流于崖州。发韩公张仁贍一作亶之墓，戮其尸，以张通儒故也。张万顷、独孤问俗、张休，并复旧官。

此处下及至肃宗至德二年。

#### (3) 插叙



如卷中所记攻常山事。正文曰：“禄山虽盗据河朔，百姓怨其残暴，所在叛去，累其兵力不能进尺寸之地。乃遣其党史思明、蔡希德以平卢步骑五千攻常山，颜杲卿力屈而城陷”。自注曰：“初，杲卿使男泉明及张通幽，承业贾深献捷，且求救于太原王承业。通幽献计于承业，承业亦心害其功，逗留其子，久而方遣，仍以所得贼将以为己功。是以承业等骤加官爵，故杲卿属焉”。正文记载安禄山进军状况，自注部分即插叙，短短的文字却包含很多信息：一常山城陷的原因，二张通幽背主，三王承业夺功，更有言外之意：有如此官兵，战争焉能不败？

插叙的又一重要表现在于，有相关的次要人物出场时，便随即为之立小传，这也是打破时间顺序的。自注中附列小传的人物有多人，如：阿布思、吉温、严庄、高尚、孙孝哲、王维、李猪儿、史思明等。

#### (4) 预叙

预叙，主要指具有预言性质的叙事，如梦境、预言、卜辞、童谣等。卷上有张九龄的预言。开元二十一年，守珪令禄山奏事，中书令张九龄见之，谓侍中裴光庭曰：“乱幽州者，必此胡也。”后来的事实证明，张九龄的预言不幸成真了。卷下有史思明的梦境。史思明在被杀的当晚，突然从梦中惊醒，曰：“吾向梦见小沙上群鹿，吾逐鹿（一本无‘吾逐鹿’三字）。及水，遂见鹿死水干。”鹿者，禄也；水者，命（明）也。梦境预示着禄与明俱尽矣。果然，骆悦带兵来了。预叙有着重要的伏笔铺垫作用，后面的叙事也在不自觉的证实着他们。

综上所述，《事迹》一书中使用了不同的叙事顺序，这样既保证了文章的脉络清晰，又使情节更加完整，历史就不仅仅是平原上波澜不惊的河流，更似山间小溪曲折多姿了。按时间顺序展开记述，能更好地还原历史发展的原貌。但有时集中描写则能突出文章的主旨、作者的用意。如《事迹》与《新唐书·逆臣传》都写到李林甫与安禄山的交往和安禄山不拜太子两件事，不过两书对于两件事的描写顺序却是相反的。《事迹》是在安禄山天宝六载加兼御史大夫的行文之后，以插叙的方式加入李林甫与其交往始末，然后转写玄宗令其见太子等事。《新唐书·逆臣传》则先写不拜太子，再写李林甫事。“叙事作品的众多片段在素材形态的时候，是东鳞西爪、零散杂乱的。顺序性要素的介入，于无序中寻找有序，赋予紊乱的片段以

位置、层次、意义”。《事迹》与《新唐书》一般情况下都是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的，但《事迹》在不影响时间顺序的前提下，经常用集中描写一类事情的方式以突出行文意旨，如上文提到的集中描写安禄山的异相等。此处亦与这种布局有关，安禄山故意不拜太子以示其对玄宗的忠心，下文紧接着写的就是玄宗对他非同寻常的恩宠，这样的顺序安排就让素材有了不同的意义，不仅使文章这一部分主题突出，也起到很好的联结作用。如果完全按照时间顺序书写，会使上下文之间的联结显得生硬。

## 2. 叙事节奏

《事迹》一书大致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但并非年年相扣，月月皆有，而是时间布局上有详有略：安禄山始生至开元二十年用概述，用年月领起记事；自开元二十一年始，其间又缺记开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天宝八载、十二载事。且即使纪事之年亦非平分笔墨，开元末及天宝初年记事多简略，至天宝六载后记述则转密，月下时常有日事的详细记载。之所以如此布局，作者能够接触到的史料比较狭窄，难以搜集齐全，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全书主题的确，符合作者倾向的史料的选用，应是最主要的原因。此书主要是为了突出安禄山、史思明谋乱这一主线，其他事情则省略不写。

《事迹》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时间从长安三年开始，主要叙述了安禄山出生至后来受到唐玄宗的宠遇期间发生之事；中卷写天宝十三、十四载安禄山叛乱之事；下卷记载安禄山僭号被杀及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之事，直至宝应元年。三卷篇幅大致相当，然而叙事速度差距甚大。上卷自长安三年（公元703年），至天宝十二年（753年），描写了51年间发生的事情；中卷只涉及天宝十三和十四两年；下卷是自天宝十五载（756年）至宝应元年（762年）共7年的时间。如果按卷数平分，三卷的时间速度之比为51:2:7；如果按历史时间平分，前20年只用了两段，不足500字；中间20年也是400余字；即前40年只有不到1000字。最后20年则占据了剩下的篇幅，二、三两卷和第一卷的绝大部分，前后时间速度之比，是42倍左右。显然，在叙事的分量上是前轻后重，叙事速度是前快后慢。

再来看新、旧《唐书》的叙事节奏。《新唐书·逆臣传》以安禄山部分为例，自天宝元年起始用年

月领起记事,开元年间事只选取些许典型事件作记录。安禄山出生到开元末约40年的时间,只用了近400字,平均一年只有10个字左右。比之《事迹》,还少了二分之一篇幅。天宝元年以至德二年安禄山被杀,其间约16年,篇幅则近5000字,平均一年约300字,前后时间平均速度之比,是30倍左右。《旧唐书·安史列传》的安禄山部分,开元初、开元二十年、开元二十八年有记载,前40年用了300字,平均一年不足8字;后面16年约2000字,平均一年约125字。前后时间速度之比,是16倍左右。

虽然叙事速度不同,但都是前快后慢,前略后详,重点都在天宝年间。这期间,安禄山的恩宠达到巅峰,不断加官进爵,封妻荫子,也是他积极准备谋反的准备阶段,最终在天宝十四载起兵。其叛乱后叙事节奏明显放慢,有时达到按日记事的密集程度。

### 3. 叙事详略

在任何叙事过程中,都不可能事无巨细,总会有详有略,详略之中就突出了主题。因此,作者的详略布局值得深究,那么何处详何处略,为何详为何略,是最基本而关键的问题。比如《事迹》与新、旧《唐书》都没有把战争场面作为描写的重点,而是偏重记录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记录将相的活动。常山失守,没有写战争的惨烈,而重点写王承业的夺功与颜杲卿的被俘不屈。战争失败,罪不在将士守城不利,而是军官们的明争暗斗、争名夺利,为一己之私而置国家利益与不顾。原因在于记录战争不是为了简单的描绘战争场面,更重要的是探究战争成败的内在原因,以资借鉴。

再如玄宗幸蜀一事,作者描写如下:

十六日癸卯,玄宗幸蜀。銮驾自延秋门出,百官尚未知。明日亦未有来朝者。已而宫嫔乱出,驴马入殿,辇运库物。上过渭桥后,杨国忠令烧断其路。上知之,使高力士走马至桥,止之曰:“今百姓苍惶,各求生路,何得断绝!”令力士扑灭了来。上止望贤宫,从官告饥,乃命杀马,折行宫木煮肉遗之。入宫,憩于树下,惘然有弃海内之思。高力士觉之,遂抱上足呜咽。上曰:“朕之作后,无负黎元,今朔胡负恩,宗庙失守,竟无一人勤王者。朕负宗社,敢不自勉!唯尔知我,更复何言。”即使中官入县宣告。咸阳官吏、百姓更无一人至者。午时,上犹未餐。良久,有村叟来献

蜜面,上对之惨然。既而尚食令人舁御膳至,分散从官。

没有交代幸蜀的路途遥远与过程艰辛,而是突出了烧桥、寻饭等情节。杨国忠要烧桥,而玄宗阻止,就体现了他的仁慈。较之安禄山的残忍,百姓更希望一位仁慈的君主,这正是人心思唐的重要原因之一。堂堂一国之君竟无饭充饥,其凄惨之境被烘托的更加凄惨,比之任何描述语言都更能表现幸蜀的艰难与玄宗的窘境。

总之,在详略布局上,作者不是简单的突出重大事件,而是详写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内容。重点描写某一事件时,则详写具有典型意义的场景,以在渲染烘托中突出主旨,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不是大肆铺张却言不尽意。

## 三、小说化的叙事手法

《事迹》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其叙事常常会打破历史叙事的传统与常规,在叙事中运用了一些小说化的表现手法,比如具有神秘色彩的传说、童谣等,刻画人物的细节描写,还有重复手法,都使这部作品体现出更加浓厚的文学色彩。

### 1. 传说

《事迹》一书开头即以神秘化的传说故事记叙安禄山的出生:“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犂山,神应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群兽四鸣,望气者见妖星芒炽落其穹庐。”这一记述不仅使安禄山的身世蒙上了一层神话的色彩,同时也将安禄山出场定型,贴上了标签。他是神灵的化身或转世,然而他的出生是妖星降落,附着在他身上的神是邪恶的,为不吉之兆,预示着安禄山必将成为天下之祸患。紧接着,作者以张九龄的预言再次加以渲染:

开元二十一年,守珪令禄山奏事,中书令张九龄见之,谓侍中裴光庭曰:“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作者借张九龄之口,再次强调了安禄山将成为大唐的不祥之人,是祸乱中华之人。张九龄一语成谶。天宝六载,安禄山身上又出现异兆:

(玄宗)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龙也,无能为者。”

这一异兆上承前文再次强调安禄山是“神应而生”,故能化为猪龙;下启安禄山的结局,他虽有龙首而终非真龙天子,从而铺垫了他起兵失败是天

命所定。玄宗因其化为猪身而断定是“无能为者”，因而并不在意，以为必不成大气。事实证明，玄宗断言不假，但是他小觑了安禄山的贼心与贼胆。

《事迹》在开篇接连用天象、预言、化身等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既表明了安禄山此人不寻常，又为他的失败结局埋下伏笔。但在正史中，此类传说相对较少，《旧唐书》完全没有，《新唐书·逆臣传》载有其出生时的异常天象：“及生，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其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的是“祥”字。但下文又说“范阳节度使张仁愿遣搜庐帐，欲尽杀之，匿而免”。不禁令人疑惑，究竟是吉是凶？笔者以为：《新唐书》言其“祥”，乃是相对于安母而言的，安母“祷子于轧犇山”而生禄山，望气者告诉安母这些天象是祥瑞，“母以神所命”。相反地，对于朝廷而言，民间出现的吉象却是威胁大唐的灾星。张九龄的讖语在正史中只见于《新唐书·张九龄传》，意在说明九龄作为一代贤相的善于识人，不如《事迹》置于开篇，与安禄山的神秘出生一起为下文造势，有重要的伏笔作用。至于安禄山醉卧化为猪龙一事，正史中全无记载。《旧唐书》完全不采用这些神秘故事，《新唐书》只有一两则，且分散在不同的传记中，无形中淡化了安禄山的异常形象。正史中这类神异灵异的描写并不少见，如《史记·高祖本纪》中关于刘邦出生的描述，只是不同的是刘邦是“真龙天子”，所以司马迁可以大肆渲染他的种种异象；而安禄山在唐书中被列入“逆臣”传，成则为王败则寇，假如安禄山成功了，史臣在修史时一定也会记下这些传奇。《唐书》是史官奉旨所修，他们眼中的安禄山，是乱臣贼子，自然不配有这些传奇；而《事迹》的作者只是混迹于下层的文人，在他看来安禄山不平常的一生当然具有传奇色彩，所以开篇集中记述神秘化的传说故事以预示安的异相，同时也解释了安禄山失败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

另外，《事迹》中还陆续记载了一些梦境、童谣等，以天命来解释事件的发展，新、旧《唐书》本着实录精神都没有采用。如卷中写到：

时肃宗睹其凶逆之状已露，言于玄宗，玄宗不纳。肃宗恐宗庙颠覆，乃至诚祈一梦。是夜，梦故内侍胡普升等二人舁一紫鞍覆黄帕，自天而下，至于肃宗前，一素板丹书，文字甚多，所记者唯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时，上天所命，福禄不覿。”

即使史官随侍左右，也不能对皇太子做梦的事情都一清二楚，应是姚汝能听到的传闻逸事，不一定真实。更何况，中国历史上向来有将天子神化的传统，那些只是他们宣传造势的手段，以示天命所归。对于小说而言，此等轶事是合理的；对于以实录为原则的历史叙事，其合理性往往受到质疑。因此，新、旧《唐书》中都没有记载此事。再如卷下还多次提及童谣，《唐书》亦不存：

禄山起逆之初，童谣云：“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一贯钱。”

虜未至前月余日，童谣云：“旧来夸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白里，清水河边见。”契丹初闻莫悟，至是而应之。

初，庆绪未败时，讖云：“渡河野狐尾独速，明年死在十八日。”又云：“胡绝其后，死在合河口。”至是而验。

这些童谣难免有牵强附会之意，更有可能是事后才编写出来的，正史记载有伤大雅，而史传小说中正需要这些玄妙的东西来增强作品的意蕴。

## 2. 细节

细节描写是对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细枝末节的描写。它是叙事情节的基本构成单位。细致生动的细节描写是小说的审美特征之一。细节描写能抓住生活中的细微而又具体的典型情节，它具体渗透在对人物、景物、事件或场面的描写之中。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同样，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活生生、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形象。

《事迹》与正史比较，刻画人物时更注重细节描写。比如叙述安禄山早年未发迹之时盗羊被捕，范阳节度使张守珪要杀他，安禄山大叫，《事迹》与新、旧《唐书》分别记载如下：

禄山大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事迹》）

守珪剥坐，欲棒杀之，大呼曰：“大夫不欲灭两蕃耶？何为打杀禄山！”（《旧唐书》）

禄山盗羊而获，守珪将杀之，呼曰：“公不欲灭两蕃耶？何杀我？”（《新唐书》）

第一句话大同小异，而第二句话则颇值得玩味。“而杀壮士！”是感叹语气，读来有惋惜之意，言下之意他安禄山是个难得的壮士，可以帮助张大夫平定两蕃，建功立业。这句话中安禄山不仅自称壮士，还对张守珪杀己表示惋惜，其临刑而不惧、自信且自负的形象一语而跃然纸上。新、旧《唐书》的“何为打杀禄山”与“何杀我”均为疑问语

气,虽然也含有他能助张大夫灭两蕃的言外之意,但不如“壮士”二字更彰显安氏的自负。

安禄山素来残暴,窃号称帝后又眼瞎患疽,性情尤为暴躁,动辄鞭笞属下,虽肱骨重臣亦不能免。又欲立宠夫人段氏之子庆恩代替长子庆绪为嗣,以致庆绪及左右深以为怨——安庆绪怕被废,严庄怕宫中事变于己不利,李猪儿怕挨打,三人遂相谋刺杀安禄山:

(至德)二年正月五日,遂相与谋杀禄山。

严庄、庆绪执兵立于帐外,猪儿执大刀直入帐下,以刀斩其腹,左右惧不敢动。禄山眼无所见,床头常着佩刀,始觉难作,扞刀不得,但以手撼帐竿大呼云:“贼由严庄。”须臾,腹已数斗血流出。掘床下地,以毡裹其尸埋之,戒宫中勿令泄。

安禄山临死时的最后一句话,在正史中的记载与此不同:

《旧唐书》:“撼幄帐大呼曰:是我家贼!”

《新唐书》:“是家贼!”

《资治通鉴》:“必家贼也!”

姚汝能的记载说明安禄山判断出来是严庄要杀他,以安禄山当时的情况来看似乎不太可信。一是安禄山早已失明,几乎不可能立即判断出刺杀之人,即使他对身边的人很熟悉,何况是李猪儿动的手,怎么会直接说是严庄呢?二是严庄谋反之心不是当天才生出来的,安禄山之前根本没有察觉,否则怎会留着他来刺杀自己?而《旧唐书》写作“家贼”更具有说服力,因为安禄山作为皇帝,大帐内外护卫必定不少,一般刺客很难不动声响顺利进入,只有内部的人才有此方便,所以很容易判断出这是家贼所为。本来刺杀一幕姚汝能与后世史官都不是亲眼所见,多是道听途说加以虚构改编而来,是按照事情可能发生的趋势虚构的情节,只有合情合理才能让人相信。所以《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沿用了更为合理的《旧唐书》。

史思明与安禄山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同为胡人,都性格急躁,残忍好杀,连生辰都在一起(史比安只大一天),更都是死在自己儿子的刀下:史思明因史朝义兵败而训斥之,不料一语不慎,招致杀身之祸,史朝义属下为保性命就要谋杀史思明:

思明知事变,踰墙至马厩,鞞马将乘之,悦等索见之,使麾下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马。

思明问悦等曰:“是何人作难?”悦曰:“怀王命。”思明曰:“我朝来语错,合招此事。然汝

废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长安,终归汝事。今虽废我,汝必不成。”因急呼朝义小名者三,曰:“莫杀我,我不惜死,恐汝有杀父之名。”因骂曹将军:“此胡杀我,我负汝何事,而行此逆乎!”悦等叱左右擒思明赴柳泉驿,乃回见朝义,朝义曰:“莫惊圣人否?”悦曰:“无之。”

这一段又显示了安史之间的不同,安禄山不识文字,不懂仁义道德。史思明不同,他知道孝,却不知忠;知道父子,却不知君臣;知道礼制,却不知守礼。再如他窃号称帝之后,进行了一系列遵从礼制的变动,这在安禄山是没有的:

乃立宗庙社稷,谥祖考为皇帝,以妻辛氏为皇后,次子朝兴为皇太子,长子朝义为怀王,诸子皆为王。以礼招魂葬禄山。置侍中、尚书令等官,立台省,无曹局,递为检讨之所,识者笑之。以范阳为燕京,命洛阳为周京,长安为秦京,置曰华等门,署衙门楼为听政楼,节度厅为紫微殿。又令其妻为亲蚕之礼于蓟城东郊,以官属妻为命妇,燕羯之地不闻此礼,看者填街塞路。燕蓟闲军士都不识京官名品,见称黄门侍郎者曰:“黄门何得有髭须?”皆此类也。

其中虽不无讽刺之意,却可以看出史思明在汉文化的濡染之下,对正统的艳羨,他的汉化倾向显然高于安禄山。

不仅安禄山,书中涉及到的其他人物,也都可以从细节处窥见人物性格,如介绍高尚时,作者着意写了他的一句话:“(尚)常叹息,谓汝南周铣曰:‘不危宁当举事不终,而不能咬草根以求活。’”高尚本名不危,居乡里时已有此叹息,所以他跟随安禄山后与严庄力劝安禄山谋反,落得个被史思明杀害的下场,这句话可以说是高尚一生所作所为的最好诠释。

作者不仅以细节刻画人物,更用细节探究历史发展的原因。在记述安禄山谋逆初期,朝廷接连溃败的史实时,也常常以一些细节处显示失败的原因,如哥舒翰失守潼关一事,作者记载了这样几件事情:

初,翰守潼关,或劝翰曰:“禄山阻兵,以诛国忠为名,公若留二万人守潼关,悉以余兵诛国忠,此汉诛晁错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翰许之,未发。或泄其言于国忠,国忠大惧,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多,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

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从之，遂遣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分部焉。又奏，召募一万人屯霸上，令其腹心杜干运将之焉。翰虑为所图，乃上表请干运兵隶于潼关，乃召干运赴潼关计事，因斩之。国忠语其子暄曰：“吾死无日矣。”翰自是心不自安。

初，翰至潼关，风疾颇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政事委行军田良邱。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全无斗志。

一方面，潼关守军内部不和，哥舒翰以病为由不理军事，属下两位将军又互争长短，以致全军毫无斗志；另一方面，哥舒翰与杨国忠也上下不一心，相互算计。国难当头，将相不和，杨国忠与哥舒翰皆以一己之死生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有此将相，安能不败？果然，哥舒翰一战而溃。

不过《旧唐书》有一处描写笔者以为甚好：

陈留郭门禄山男庆绪见诛庆宗榜，泣告禄山，禄山在舆中惊哭曰：“吾子何罪而杀之！”狂而怒，官军之降者夹道，命交相斫焉，死者六七千人，遂入陈留郡。

虎毒不食子，安禄山听闻庆宗被杀而惊哭，继而狂怒杀人，这是爱子之心的自然流露，是惜子的本能反应。这样就刻画了一个性格更为复杂的人物形象，残暴却怜子。《事迹》与《新唐书》只作安禄山怨庆宗死而杀李唐宗室以祭庆宗，没有写安禄山的哭，偏重描写安氏残忍的一面。《事迹》不写其哭，在文学叙事方面不得不说是个缺陷，但若从作者的道德意识形态考虑，就可以理解姚汝能的做法。姚汝能是大唐的臣子，安禄山却是大唐的逆臣贼子，全书以批判的口吻描写安禄山其人其事，这一表现出安禄山形象中美好一面的事迹，姚汝能完全可能知道，但不会写入书中。《旧唐书》毕竟是后世史臣所著，对于前朝的事情他们可以做到相对客观的记载。

### 3. 重复

#### (1) 话语重复

《事迹》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记述玄宗对安禄山的多次赏赐，如天宝九年，安禄山献俘入京，又入住新宅，作者不仅对玄宗的赏赐一一罗列在文中，甚至对所赐之物还加以描述：

玄宗赐银平脱破方八角花鸟药屏帐一具，方圆一丈七尺；金铜铰具、银凿镂、银鏤二具；色丝绦一百副；夹颌罗顶额织成锦帘二领；各紫绶帘罗金铜钩、分错色丝绦贴白檀香

床两张，各长一丈，阔六尺；并水葱夹贴绿锦缘白平绡背席二领；绣茸毛毯合银平脱帐一具，方一丈三尺；金铜铰具、绣绫颞夹带、碧绫峻旗、色丝绦百副；贴文牙床二张，各长一丈，阔三尺；水葱夹贴席、红锦缘白平绡背、红异文绣方绣褥、紫绡床帐兼黄金瑶光等并全两内帐设。续赐青罗金鸾花鸟子女立马鸡袍袴等，屏风六合，红瑞锦褥四领，二色绫褥八领，瑞锦屏两领，龙须夹贴席一十四领，贴文柏床一十四张，白檀香木细绳床一张，绣草敦子三十个。至于厨厩之内，亦以金银饰其器，又赐金平脱五斗饭罌二口，银平脱五斗淘饭魁二，银丝织成笊筐、银织策篱各一，金银具食藏二，零碎之物不可胜数。

又如，天宝十载正月初一是安禄山生日，玄宗、太真厚加赏遗，作者依旧如数家珍似的一一记入文中：

玄宗赐金花大银盆二，金花银双丝平二，金镀银盖椀二，金平脱酒海一并盖，金平脱杓一，小马脑盘二，金平脱大盖四，次盖四，金平脱大玛瑙盘一，玉腰带一，并金鱼袋一，及平脱匣一，紫细绫衣十副，内三副锦袄子并半臂，每副四事，熟锦细绫□□三十六具。太真赐金平脱装一具，内漆半花镜一，玉合子二，玳瑁刮舌篋、耳篋各一，铜镊子各一，犀角梳篋刷子一，骨合子三，金镀银盒子二，金平脱盒子四，碧罗帕子一，红罗绣帕子二，紫罗枕一，毡一，金平脱铁面枕一，并平脱锁子一，银沙罗一，银钷椀一，紫衣二副，内一副锦，每衣计四事件。

其余如天长节（为唐玄宗生日）的赏赐、安禄山入朝的赏赐，包括平日的一些吃食赏赐等，作者都不厌其烦地在文中以自注的方式作记录，这里不再逐一列举。然而在新、旧《唐书》中，至多提及玄宗给予了安禄山丰厚的赏赐，绝无详细的列举。话语重复的主要功能“在于强调，在于刻画人物，在于渲染气氛，在于造成读者心理上某种强烈的感受与震撼”。姚汝能如此写作，其旨意也在于突出强调，玄宗如此宠爱，安禄山却始终不满足，妄想谋国夺位，忘恩背义至此，怎能不令大唐臣民唾弃？玄宗的赏赐越丰厚，越让读者觉得安禄山的谋逆有悖人伦道德。“相同或相似语句的每一次重复都在意义上达到增值，情感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像螺旋式的攀升，以至直达叙述的中心”。新、

旧《唐书》未载,笔者揣测其中缘由,一是皇帝对朝臣的赏赐史官司空见惯,二是正史更多的是客观记录前朝有借鉴的历史,皇帝的赏赐时刻都会发生,对历史没有重大影响,无须入史。

## (2) 事件重复

安禄山和史思明备受唐玄宗宠爱,都封侯拜将,位极人臣;叛乱之后又相继称帝,生前可谓显赫至极。然而他们不是死于征战一生的沙场上,更不是作为皇帝终老,却是很不光彩地死在儿子的刀下。“安史之乱”的几位主要将领几乎都死于非命,最令人唏嘘的是安庆绪杀安禄山,史思明杀安庆绪,史朝义杀史思明。除史朝义是被唐将李怀仙所杀之外,其余都死于叛军内部的权力争夺与残杀,子弑父,臣弑主。冥冥之中因果报应,一报还一报,所报不爽。这里,“相同事件的重复叙述,由于重复的发展和变化,从而充实了作品的内容,加深了作品的意义”。

新、旧《唐书》的列传第一百五十五是安禄山、子庆绪,高尚、孙孝哲,史思明、子朝义六人合传,与《事迹》一样,也分别记述了安史等人被杀的情景,场景重复的叙述目的不在于强调而在于“惊人的相似”,于相似中蕴含着叙述事件的张力,从相似中直逼作品的内核:历史与人事、物事在惊人相似地重复着。《事迹》写史思明处死安庆绪兄弟时冠冕堂皇地说:“因何杀阿爷夺职掌?”新、旧《唐书》作:“为人子,杀父求位,非大逆邪?”那么为人臣,僭主求位,又该当何论?无论是唐皇还是安氏父子,都算是他的主子,先叛唐皇,再杀少主,不知史思明说出这句话时心中是何感想。再到史朝义弑父之时,史思明是否感觉到一切都是天意?

姚汝能与正史都大力描写安史之死,在向读者传达着一个信息:唐祚仍存,叛军不会得势,安史之死是因果报应,乱臣贼子,不得善终。正如《新唐书·逆臣传》赞曰:禄山、思明兴夷奴饿俘,假天子恩幸,遂乱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贼杀其父,事之好还,天道固然。然生民厄会,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贼暴兴而亟灭。张谓讥刘裕“近希曹、马,远弃桓、文,祸徒及于两朝,福未盈于三载,八叶传其世嗣,六君不以寿终,天之报施,其明验乎!”杜牧谓:“相工称随文帝当为帝者,后篡窃果得之。周末,杨氏为作八柱国,公侯相袭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窃位号,不三二十年,壮老婴儿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当曰此必为杨氏之祸,

乃可为善相人。”张、杜确论,至今多称诵之。如禄山、思明,希刘裕、杨坚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论。

## 四、结论

姚汝能本意虽是写史传,但全知与限知相结合的视角,叙事顺序、节奏、详略、体例的独特,小说化的叙事手法的运用,使《事迹》不自觉中具有了小说叙事的因素,《事迹》也因此有别于其他史传作品。传说、童谣等使全书蒙上了神化色彩,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话语重复的强调作用、事件重复隐寓历史相似轮回的意义,是《事迹》与新、旧《唐书》明显的不同之处。本文通过对《安禄山事迹》与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中叙事的比较,发现小说叙事与正史叙事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正史要求实录,小说追求艺术真实。史传叙事以“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的实录为最高原则,实录将其与文学艺术分离开来。小说中叙写神话、传说合情合理,然而若存在于史传中,其合理性就可能受到质疑。当然,史传中也会包含一些合理的虚构想象,但这些虚构想象是史官以经验为根据、对历史进行判断,产生的具有真实感的虚构,是在已知历史结局的前提下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细节的合理建构。其次,正史叙事在追求“实录”、“文直”、“事核”的同时,必然要求用精练简洁的语言对事件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具有浓缩性和精炼性。而小说叙事更注重描写的具体详实,《旧唐书·安史列传》只有八千字左右,《新唐书·逆臣传上》也不过一万二千多字,《事迹》则将近两万三千字。这主要是自注较为丰富的缘故,如果去掉自注,正文字数与正史大致相当,但内容丰富程度将大打折扣。

事实上,《事迹》在叙事上又深刻受到史传叙事传统的影响,可以说《事迹》的叙事是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结合。这个结合虽然不甚完美,文学史家们一致认为《事迹》作为一部传奇小说成就不高,但也给后世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框架,内容上则杂取史实与传闻轶事,形成虚实结合的创作模式,这一模式至《三国志通俗演义》而达到巅峰。这就是说,《事迹》对后来历史题材小说的写作所产生的影响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责任编辑 南山)

# 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应“知识、情商、能力”兼顾<sup>\*</sup>

——以“明代诗文”教学为例

徐 燕

(南通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通 226019)

**[摘要]**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应以宏观把握微观研究相结合、文史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教学, 让学生清楚掌握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和一般规律、古代文学的基本内容; 以作家的生平经历、人生态度激励学生; 用优秀的作品陶冶学生; 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教师应该从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从知识、情商、能力三个方面“教书”和“育人”的人。

**[关键词]** 知识; 情商; 能力; “明代诗文”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095-05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骨干课程。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总体教学目标, 开设本课程应使学生系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流变的历史, 掌握每一历史时期主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体裁的兴衰变异及重要作家、经典作品; 使学生具备阅读鉴赏、分析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能力, 并能初步进行独立研究; 引导学生通过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作品, 深入理解前贤的精神历程、人生态度和生命范式, 进而探索中华民族精神发展演变的历程, 并由此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社会人生抱有一种积极情感, 保证学生精神世界的平衡性、完整性与丰富性, 最终为构建诗性智慧、高尚人格奠基。

明代诗文有其自身特点与价值, “明代诗文”章节的教学是实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总体教学目标的重要一环, 也是“清代诗文”教学的基础。基于课程教学内容丰富, 课时有限的整体特点, 在立足教材并阅读大量明代诗文作品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 根据多年教学实践以及学生的课堂反应和课后反馈, 笔者确定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相结

合的教学原则, 采用教师讲授、提问、引导和学生讲述、讨论、分析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纵向勾勒明代诗文发展演变过程的基础上, 注意横向学习比较, 重点探讨重要诗人流派、代表性作家, 解读经典作品, 用十课时完成明代诗文教学, 形成不仅“骨架”明晰, 而且“血肉”丰满、重点突出; 知识积累、情商提升、能力培养兼顾的课堂教学特点。

## 一、以知识积累为主: 关于明代诗文概况的教学

中国古代诗文在唐宋时期发展到顶峰, 出现了李白、杜甫等一批杰出的诗人, 出现了“唐宋八大家”。以往习惯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举, 把明清小说尤其通俗长篇小说视作是可以和唐诗、宋词、元曲媲美的、明清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形式, 其次是传奇戏曲, 明代不仅出现了“四大奇书”, 也出现了被称作“东方的莎士比亚”的著名戏曲家汤显祖。但作为诗文发展史上一个客观的存在, 明代诗文有其自身特点, 有在文学史上可书写的一笔。

\*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南通大学教学成果培育建设项目“古典诗词教学与大学生人格培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NTDXJY201301)

[收稿日期] 2014-10-20

[作者简介] 徐燕, 女, 江苏南通人, 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 博士。



因此,明代诗文概况的教学,要点之一就是明代诗文的基本特点。明代诗文的第一个特点是作家多、作品多,数量之巨,超越以往各朝。第二个特点是流派蜂起。明代277年间,前有诗文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有“台阁体”、茶陵派;中有前后七子、唐宋派和后五子、广五子、末五子等;后有公安派、竟陵派、复社和几社等。他们多标榜门户,互相争论,各有其面貌,各有其精神,开拓有清一代诗风文风。第三个特点是虽有佳作,终乏大家。这实际是对明代诗文成就的总体评价,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点。但1994-1995以来,学界刮起一股不小的翻案风,形成论争。

明代诗文概况的教学,要点之二是明代诗文发展流变的主要脉络及明代社会与文学的关系,特别是明中叶后经济、思想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新变化对文学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该要点的教学着眼于学生进一步完善文体知识体系,进一步深入理解社会与文学的关系,充实和完善文学史思维空间。

以上两个要点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可以结合起来教学,具体实施过程如下:第一,由笔者提问“上古至明初诗歌、散文发展的主要线索、阶段性特点”导入新课。学生回答过程中,如果有疏漏之处,笔者适时点拨,学生相互补充,将对诗歌、散文发展流变历史的回顾引向完整正确的方向。如此,既可以对原有知识基础有所了解,又可以吸引学生的有意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一开始就形成比较热烈良好的课堂氛围,有利于学生构建清晰完整可靠的文体知识体系,有利于学生运用并掌握联系前知、相互比较、归纳总结的方法更好的学习明清诗文。

第二,在对学生的回答简单评价、总结、补充以后,笔者引导:“从大家刚刚的研讨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诗文自上古发端,唐宋时期至于鼎盛,至元,主要是以其固有的惯性在文坛据有一席之地。那么,诗文在明代有没有它的特点,有没有在文学史上可书写的一笔呢?当然有!”以比较、设问的方式,引起学生的思考和求知欲,以便进入明代诗文基本特点、发展流变的主要脉络及明代社会与文学关系的学习。这部分知识点密集,属于文学史的描述,由笔者讲授。以明代诗文的基本特点为切入点,其他两部分内容有机结合。在介绍明代诗文的第二个特点“流派蜂起”时,按时间先后顺序简单介绍每一流派出现的背景、代表人物、诗

文主张、贡献及局限,实际就客观呈现出明代诗文发展流变的基本脉络,每一流派的出现,与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影响分不开,自然也就将明代社会与文学关系的教学有机融入其中。

第三,关于明代诗文的第三个特点,可以和对明代诗文成就的评判结合起来教学。由笔者简单提示学生,关于明代诗文成就的高下,学术界是有争论的,要求学生广泛查阅资料,调查整理学界关于明代诗文成就的评价,并在学完“明代诗文”时谈谈自己对明代诗文成就的见解。这可以使学生带着疑惑,进入以后各节的学习,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 二、以情商提升为主:关于作家作品的教学

随着社会改革逐渐深化和市场竞争日趋加剧,急剧变革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使大学生人格形成变得更加不确定,在人格形成中表现出一系列迷茫、冲突,比如一些学生理想信念淡化,片面追求物质享受,组织纪律和组织观念差,厌恶读书,言必及利;一些学生耐挫力和适应力明显不足,很容易在遭遇困难、挫折时感到心理不适,对自己的目标朝令夕改、半途而废,甚至逃避现实沉溺网络虚拟世界,荒废青春与学业;也有一些学生不能适应相对自由、个性、丰富的大学生活,在频繁的人际交往中难以做到游刃有余,愤世嫉俗、怀疑一切、嫉妒别人优越条件,在交往中故意设置障碍,最终使自己陷入困境的现象时有发生。诸如此类。因此,大到大学教育,小到古代文学教学,都应当承担起提高学生情商,使他们更好的面对社会人生,更健康的成长成才的任务。就明代诗文的教学来说,可以具体落实到用作家的生平经历、人生态度感染学生,用经典作品陶冶学生。这不是强迫学生要怎样,而是启发学生从心灵深处自悟应该怎样,着眼于情感的潜移默化。

以明初诗文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的教学为例,笔者一般重点结合《送东阳马生序》《卖柑者言》《青丘子歌》,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入选初中语文教材,学生有一定知识积淀,熟知字词句文章内容等,又随着时间的沉淀,生活的洗礼,可以也应该较初中阶段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感悟。这样的作品,笔者鼓励学生制作课件,学生主讲。经过事先准备,课堂讨论补充,学生们一般可以总结出文章主要是宋濂回忆



青年时期的读书求学经历,主要写三点:一是借书。宋濂家贫无书,借人之书,抄录后一定按期归还,虽天寒砚冻,手指不可屈伸,也不敢懈怠,所以别人愿意借书给他。二是求师。宋濂常步行百里向名师叩问,名师学生很多,就耐心等待,再三虚心请教,所以才有长进。三是不耻贫寒,不与同学比物质享受。并归纳出文章的主旨是要对比如今的太学生,他们有书、有好老师、有国家提供的优厚待遇,若还不能好好学习,责任就不在他人而在自己了,说明专心求学,刻苦自励的重要,表现了宋濂对晚辈学业的关切、鼓励和教诲。这样的方式,不仅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意识,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表现能力,而且,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导学生思考并探讨困境与成长成才的关系,讨论往往和热烈。讨论加深了学生对宋濂生平和传统知识分子情怀的理解,减轻了学生对于贫寒、困难的畏惧心理,使他们相信“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刘基的《卖柑者言》是一篇寓言体散文,由买卖一个“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柑橘引起,通过买卖双方一问一答,由表及里,讽刺那些文臣武将,貌似威武堂皇,实则庸劣无能;揭露当时盗贼蜂起、百姓困顿、官吏贪腐、法纪败坏的社会现实,从而有力抨击统治者及其集团的腐朽无能和社会黑暗。笔者一般会提议学生自由组合,根据文章内容编排一个小品,课堂表演。学生只有在精读并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编排出小品,这样的方式,有利于强化学生的自学习惯及深入理解文章,而且学生们往往会被台上同学惟妙惟肖的表演、机智富有正义感的对答打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味文章特色与深意以及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导学生思索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学生是不是也应该具备兼善天下的进取精神和用世情怀?学生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但是对于这种精神情怀的具体表现方式往往存在不同见解。有的学生认为作为学生,无论社会地位、经济实力都是微弱的,所以应该先从修行己身做起,厚积薄发,等将来达到一定高度,处于一定位置再“治国平天下”;有的认为即使力量微弱,也应该注目现实,也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正视听,等等。正是在这种阅读延伸和激烈讨论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

课堂若仅止于此,总有些浅尝辄止、意犹未尽

之感,因此,笔者会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宋濂、刘基都由元入明,都是明朝开国文臣,他们文学思想在明道宗经征圣方面也类似,那他们的创作,联系和区别在哪里?这个知识点比较难,需要熟知两者生平经历和几乎全部的作品,因此笔者往往自问自答,即两者的创作都可以朱明政权开国立基为分水岭,入明前都以揭露元末黑暗,表示不满和抗议,抒发对天下太平的渴望为主要内容;入明后以歌颂为主,不少是为新政权的统一、巩固、建设而专门创作的赞美与宣传之文。不同的是刘基在入明前的创作中还更多表达出抱负不能实现的愤懑。这是因为,和宋濂不同,刘基还曾在元朝出仕。由此,把教学进一步拓展到“如何看待刘基出仕元朝,在元末动乱中为元军讨伐方国珍建立功勋,但在方国珍受招抚后,他被以‘擅作威福,伤朝廷好生之仁’的罪名,羁管于绍兴”这一问题上来。笔者会掌握教学的主导权,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指出这是刘基忠而见弃的悲剧,也是他作品中比宋濂更多抱负不能实现的愤懑之情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段经历,后人曾经对刘基的忠君思想和操守问题产生过许多訾诃。首先,元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少数民族统治者统一海内、建立全国政权的时代。刘基所忠君的皇帝是蒙古族人,这往往是后代狭隘民族主义者责难刘基的重要话柄。虽然,具有较高文明水准的民族取得政权,对于国家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个人并不能选择时代。刘基出生时,元王朝已建立数十年,蒙古民族已成为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统治者也吸收了汉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着新的文明,因此,并不能仅将隐遁山林或复兴赵宋王朝视为忠君爱国,所谓“华沦于夷,曷仕于时”仅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而已。其次,刘基处于元明鼎革,农民起义蜂起的时期,因此,忠君必须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前提。无疑,对农民起义的仇视是与历史发展规律相悖的,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刘基往往又是从保境安民的角度对农民起义进行价值判断的,这常常是许多往古英烈难免在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失节”的原因。由此,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应对历史人物包括刘基,多一分宽宥,而不能仅以今人的标准尺寸古人;进而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宽容,少一点苛责?以此,课堂教学不仅有容量,也有质量,更体现文学是人学,有益于学生情

商的提升。

当然,所谓宽容,并不是一味无原则的妥协,不是与世浮沉,人也应当保有自己的个性,笔者藉由这个话题导入高启以及《青丘子歌》的教学。首先指出,高启的人生态度、创作态度都与宋濂、刘基颇不相类。这也是在研究高启和本期文学史时首先必须注意之点。高启的人生态度最令人瞩目的,是对个性的尊重。在高启看来,维护个性而不使扭曲,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件。在中国诗歌史上,高启最早唱出了个性被压抑的悲哀和焦虑。笔者一般结合高启“海鸟那知享钟鼓?野马终惧遭笼鞿。江湖浩荡故山远,归梦每逐鸿南飞”,“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等诗句分析佐证,帮助学生理解,这也是深入解读《青丘子歌》的基础。其次,笔者配乐,请学生朗诵诗歌。朗诵,可以调动学生多样感官的协作劳动,可以逐渐将学生带回千百年以前,让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理念相碰撞,进而寻求那种超越时空的心灵契合,以至于进入这样一个境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再次,笔者结合PPT,以一个个问题,如谈到“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这两句时,笔者提问学生“倘若没有对一切事一切人的敏锐感受,怎能‘造化万物难隐情’?没有心灵活动的广大空间,又怎能‘冥茫八极游心兵’?而离开了对对象的关心、同情、共鸣,又怎能感受‘坐令无象作有声’?”,引导学生逐渐体会正是基于其尊重自我、尊重个性的人生态度。高启的创作态度大异于前人,他把诗歌创作作为自己的唯一事业,但绝不是基于功利的目的,也不顾世俗的毁誉,而只是为了自娱,使自己的创造力——生命力的一种——得到高度的发挥。这种纯粹从自我出发,通过心灵的自由翱翔来熔铸一切,以创造力的发扬来求得个体生命的满足的创作态度,实已具有近代的色彩。假如他不是朱元璋的屠刀下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沿着这样的创作道路走下去,也许会在诗歌创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最后,就高启才高早亡的命运,请学生各抒己见谈谈“关于保有个性、尊重个性和融入社会”,这是课堂开始就留给学生的问題,也应该是“高启”教学中的应有之义。

明初三大家及其诗文作品的教学仅是一例,其他如晚明诗文,其间对于人的个性的张扬和肯定,都闪耀着激越跳荡的个性精神,其间临大节而不乱,处荣辱而不惊的泰然处世态度与平静心态,

有许多地方可以为今天所借鉴。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不应该仅仅是使学生背诵一些经典诗文,知道一点文学史知识,它应当而且也有条件把适当而又持久的情商教育,贯彻于学术传授中,似盐之融于水,如霖之渗于苗,使古代文学里的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的良好的品格修养并外化为行动,使学生能更好的为人处世,自立于社会。

### 三、以能力培养为主:关于明代诗文成就的教学

随着鲁迅倡言“好诗被唐人做尽”,闻一多说“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学术界便对明清诗文日渐冷淡。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观点是:明代诗人作家或倡拟古,或讲性灵,就是不敢在思想上标新立异,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愈演愈烈。明中叶出现的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拟古流派,一直保持影响到明清易代之际,中间虽有提倡“韩柳欧苏王曾”的唐宋派,力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倡导“幽深孤峭”风格的竟陵派,意图矫弊革新,终因琐碎纤细,未能奏效。幸有晚明小品文和复社、几社的诗文,才为明代文坛增添了异彩。因此,享国时间与唐宋相近的有明一代,诗文汗牛充栋,流派竞起纷纭,但并未出现杰出作家作品,从诗文发展史上看,明代文坛又是寂寞的。

大概从1994-1995开始,学界刮起了一股不小的翻案风,出现了一批重估明清诗文价值、重评明清诗文作家、流派、文体成就的论文和专著,这一余波进入21世纪后仍未消退,且有向纵深发展之势。例如,有学者指出有明270多年,从未中断过诗歌理论的探索和诗歌创新的尝试,而且较之唐代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要变个人探索为群体探索,变个人尝试为群体尝试;二是某一流派主盟诗坛之际,往往有一支反对派与之争鸣争雄,使得明诗在批判中不断完善发展;三是各流派不仅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而且从各个角度挖掘了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认为明代诗歌探索诗美的执著精神,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传统都只有三唐诗歌可以与之媲美,“绝不是‘复古’、‘模拟’一类的贬语所能抹煞得了的。”<sup>[1]</sup>

学生有必要了解学术前沿的论争,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经过前期课堂教学和学生自己调查研究,笔者以讨论、辩论的形式请学生发表关于明代诗文成就的见解。这不仅可以检查学生对授课

内容的理解、自学情况以及消化程度,以有针对的进行以后的教学,也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研究的能力,还可以防止在课堂尾声易出现的学生注意力涣散。因为探讨的内容是教材未总结的,又是学生自己调查分析所得,学生往往很认真,一般也能得出中肯的结论,如有学生提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复杂的时代,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腐败并存,专制的强化和个性解放思潮兴盛同在,造成诸多矛盾现象。一个文人身上同时具有彼此冲突的思想倾向,也不难看到。但在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明代诗文取得了与之相应的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不管是这一时期诗文所获得的新进展,或是它所遭到的历史挫折,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都有其价值。学生联系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情况,分析比较,热烈讨论,课堂效果好。

对“明代诗文”章的教学,只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探索的个案而已,但窥一斑而知全豹。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以宏观把握微观研究相结合、文史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教学,让学生清楚掌握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和一般规律、古代文

学的基本内容;第二,以作家的生平经历、人生态度激励学生。第三,用优秀的作品陶冶学生。第四,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实际,整个“明代诗文”章的课堂教学,就是以实践教给学生一种学习研究的方法——在宏观把握纵向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注意横向学习比较,抓住重要作家作品乃至一些非一流但自己感兴趣的作家作品深入研究下去,发现并解决一些有趣又富有理论色彩的问题,从而提高从读教材、死记硬背到独立分析与研究有机结合的能力。这点很重要,因为课时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所有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等一一作详细和深入的讲授,必须教给学生一种可行的自学的方法。第五,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总之,教师应该从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从知识、情商、能力三个方面“教书”和“育人”的人。

#### [参考文献]

- [1]羊春秋.重估明代诗歌的价值[J].中国韵文学刊,1994(2).

(责任编辑 南山)

(上接第51页)

- [12]黄荣华.农村地权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15]张厚安.中国农村基层政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 [16]聂红琴,陈安.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构建及思考[J].唯实,2009(11).
- [17]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8]项继权.中国的村级组织[EB/OL].(20040507)[20080607].[http://www.cers.org.cn/show\\_704.aspx](http://www.cers.org.cn/show_704.aspx).
- [19]杨群红.改革开放30年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与探索[J].中州学刊,2008(5).

- [20]程同顺.中国农民组织化研究初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21]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22]翟昌民.乡村政治视域中的党建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 [23]崔士鑫.由谁解开这个结[N].人民日报,2002-04-04(10).
- [24]党国英.“两委合一”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发展[J].中国改革,2001(5).
-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6]孙中山.孙中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光 翟)

## 《纯真年代》中华顿对男性神话的解构

孙晓明 姜礼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6)

**[摘要]** 华顿在小说《纯真年代》中,通过倒置男性与女性在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中主导与被主导、引导与被引导的角色,解构男性的权威与神话。但由于作家自身的局限性,对男性神话的解构又具有不完全性。

**[关键词]** 《纯真年代》; 华顿; 男性神话; 解构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100-04

在父权文化体系中,男性是被神话了的存在。他们不但要在现实世界中扮演主导者角色,还要在精神世界中担任起引导者角色。罗兰·巴特认为,神话是一种意指方式,能够“使一些观念看起来无可置疑,因为他们是天然存在的或是神意的显示”<sup>[1]</sup>,男性神话的背后是男性中心主义者为了在男女二元对立中占居主导地位,千方百计地使大众自觉接受父权文化。

伊迪丝·华顿在其代表作《纯真年代》中,通过置换男女角色,完成了对男性神话的解构与颠覆,从而对父权文化提出质疑。小说中梅与艾伦常常分别被视为“传统女性与新女性的代表”。<sup>[2](P.12)</sup>而对传统女性形象与新女性形象的区别往往忽略了她们在与纽兰·阿切尔的关系中的同构性。无论是传统女性还是新女性,她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构了男性在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作为主导者的神话。华顿通过倒置传统男性与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解构了男性神话。但是华顿对男性神话的解构又是不完全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与其成长的社会大文化环境完全决裂。

### 一、解构男性作为现实生活主导者神话

在父权文化语境中,男性是被神话了的存在,常常以主导者形象出现。西方最高的统治者莫过于上帝,而上帝也总是以一个男人的面目示人。

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道,“男性天生卓越,女性天生逊色;男性统治,女性被奴役”<sup>[3](P.467)</sup>,男性主导生活的角色是与生俱来的,是符合的自然法则。因此,无论是从宗教还是自然法则的角度来讲,男性都被塑造为当之无愧的统治者形象。但是,《纯真年代》中男主人公纽兰却与男性神话所塑造的主导者形象大相径庭。他不再是传统父权文化中的主动者,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而是被动者,只能无奈地接受既成的事实。

情感是女性可借以淹没男性、解构男性神话的重要力量。在男女这一二元对立中,男性常被视为理性的,而女性则是感性的。这是男性对女性的定义,是父权思想的一个侧面展示,但同时也使情感力量成为女性对抗父权社会、解构男性神话的合法手段。借助于女性伟大牺牲精神的感化作用,梅铺平了她与纽兰通向婚姻殿堂之路。纽兰在与艾伦的接触中,逐渐为她的自由精神与真诚所感染,对艾伦的情感也由最初的同情转变为爱情。对传统的背叛让纽兰不安,并决心以提前举行婚礼的方式结束这种不安分的思想。面对纽兰的恳求,梅一针见血指出“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sup>[4](P.94)</sup>并表示不愿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正如梅自己所言,“姑娘并非像她父母所想

**[收稿日期]** 2014-09-12

**[作者简介]** 孙晓明,女,江苏连云港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姜礼福,男,山东临沂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象的那样一无所知。她有耳朵,有眼睛——有情感,有思想”,<sup>[4](P.95)</sup>梅并非如纽兰想象的那般天真无知,实际上对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此时的梅知道纽兰的变化发生的订婚之后,而关于索利·拉什沃斯太太的绯闻则是许久之前的事情。由此,读者不难推测出,梅或许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却清楚那个人根本不是索利·拉什沃斯太太。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感化了纽兰,“他直想拜倒在她的脚下”<sup>[4](P.95)</sup>。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纽兰无意识中已经沦为梅的猎取目标。

老纽约社会传统也是女性可以蓄意把握以解构男性神话的可依靠力量。面对婚姻破裂的危险,梅借助老纽约所秉承的传统法则再一次把纽兰牢牢囿于她们的婚姻之中。父权社会历史悠久,已经在传统观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换言之,传统在本质上是男性的传统,因为在那漫长父权社会之中,“一切都属于男性,女性连在语言、术语中也无丝毫的位置”。<sup>[5](P.351)</sup>女性处于失语状态之下,唯一能做的不过是墨守男性定下的规约。在老纽约,绯闻“对于男人无疑是愚蠢的,而对于女人——不知何故——却是罪恶的”,<sup>[4](P.62)</sup>传统之于男性是宽容的,而之于女性却是苛责的。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之下,如果梅公开指责自己的丈夫,非但不能留住纽兰,反而使自己处于一种尴尬不利的境地。她以自己的怀孕使艾伦决意远走他乡。但是,面对高高在上的夫权,梅还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力量——纽约社会这一“威力强大的机器”。<sup>[4](P.48)</sup>老纽约的人们重视家族声誉,梅巧妙地把握了这一点,使束缚她的老纽约传统成为有力的武器,帮助她成为这一游戏的胜利者。梅策划了最后的宴会,而宴会的本质就是正式将艾伦从纽约上流社会除名。就像纽兰所注意到的一样,梅眼中有“胜利的光芒”。<sup>[4](P.214)</sup>尽管今天看来,她留住的只是无爱的婚姻。但与被丈夫抛弃后可能面对的命运相比,这种胜利带给她的无疑是幸福。在梅和纽兰的关系中,梅表面上臣服于纽兰,但实际上却掌握着主动权。

此外,华顿还通过把梅与狄安娜女神这一意象联系在一起,强化她作为猎手的形象,从而解构男性作为主导者的神话。小说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把梅置于猎手的位置,而纽兰则是被捕获的猎物。梅的形象多次与狄安娜女神联系在一起。“那副狄安娜女神般超然的神态和订婚那天晚上走进福特家的舞厅时一模一样”,<sup>[4](P.133)</sup>此种描述在小

说中可以说比比皆是。狄安娜作为月亮女神,象征着纯洁。在纽兰眼中,纯洁正是梅主要特质。他甚至断言梅的纯洁如此深不可测,以至于不可能看懂歌剧《浮士德》。但是,狄安娜同时也是一位狩猎女神。小说同时也暗示,梅与狄安娜女神的联系更多的是建立在其作为射猎女神的形象之上,“那位身材高挑的姑娘看起来就像刚狩猎归来的狄安娜女神”。<sup>[4](P.42)</sup>此外,华顿别有用心地把梅塑造为射箭能手的形象。梅的爱好之一就是射箭,甚至还在赛会上得过奖。借助于梅的这一运动爱好,华顿无疑突显了梅作为射猎者的形象。与此同时,华顿还别具匠心地把纽兰与动物意象联系在一起。在拜访亲友时,纽兰感觉到自己“仿佛是一头被猎人用诡计捕获的野兽,刚刚被展览过一番”。<sup>[4](P.44)</sup>把纽兰与动物意象相联系,淋漓尽致地表现其情感的同时,也暗示了他作为猎物的地位。因此,就梅与纽兰的关系而言,男性与女性作为猎手与猎物的传统角色分配已完全被颠覆,男性作为主导者的神话更是不复存在。

## 二、解构男性精神引导者神话

成为女性精神引导者是男性编撰的又一神话。在父权文化语境之中,男性智力水平被认为处于一个女性无法企及的高度,“一般而言,男性在智力上优于女性。尽管关于此种说法的起源众说纷纭”。<sup>[6](P.57)</sup>即使是在女性地位极大提高的今天,男性智商高于女性的说法依旧甚嚣尘上,毋宁说华顿所处的时代。正是智力上的优越让男性坚信,他们要成为女性的精神引导者与灵魂守护者。小说中,纽兰·阿切尔就是这一信念的坚定支持者,他希望自己扮演梅的精神引导者角色,成为她的“灵魂监护人”。<sup>[4](P.28)</sup>事与愿违的是,他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引导梅与自己一起畅游于他在想象中创造的精神世界。相反,在艾伦的启迪与引导下,他才得以窥见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悉知自己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求。值得注意的是,与男性的别有用心不同,艾伦对纽兰的影响完全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是以一种“奇妙方式”<sup>[4](P.67)</sup>完成的。

艾伦对生活的本真面目的追求,引导纽兰看透老纽约传统与习俗统摄下生活虚伪的本质。“纽约直来直去,一切都贴着诚实的大标签。如果你能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它这一点,该有多好”<sup>[4](P.49)</sup>,尽管这是艾伦对老纽约的一次误解

读,却也表明了你对生活本真面目的钟爱。此外,艾伦对书目的选择再一次突显了她对生活本真面目的偏爱。艾伦倾向于阅读保罗·布尔热、休斯曼的和龚古尔兄弟的著作。这些作家都是早期法国自然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以写实的手法真实再现了生活的本来面貌,冷静客观,甚至近乎残酷。由此也可窥见艾伦对生活本真面貌的追求,正如朱赫今与胡铁生所说“埃伦的个人伦理追求的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接受不加掩饰的东西”。<sup>[7](P.157)</sup>与此同时,她的睿智又赋予了她洞悉老纽约上流社会林林种种的能力。对于范德卢顿家族在上流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事实,艾伦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因在于“他们故意很少露面”。<sup>[4](P.48)</sup>“你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认清了那些因看得太久而无法看透之事”,<sup>[4](P.65)</sup>与艾伦的交谈让纽兰认识到了老纽约生活的虚伪与荒谬。在与艾伦的进一步接触中,纽兰逐渐对自己过去的的生活产生怀疑,一切似乎不过是一场又一场表演,“过去一度充斥他生活的事情,现在看来就像保育院里孩子们滑稽的表演”。<sup>[4](P.115)</sup>纽兰曾经就像柏拉图所说的“洞穴囚徒”一般,坚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就是真实生活的全部,而其实一切不过是具有欺骗性的影子。对于老纽约种种繁文缛节,他怡然处之;对于梅的美丽纯洁,他由衷地感到骄傲。艾伦解开了束缚他的绳索,引导他走出洞穴——用符号表示的世界,见识到生活的本真面目。“你使我第一次瞥见了真正的生活”,<sup>[4](P.153)</sup>正如纽兰所承认的一样,是艾伦启迪了他的心智,引导他透过老纽约浮华的表面,窥见生活的本真面貌。

艾伦的自由精神激起纽兰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为了自由,艾伦敢于逃离不幸的婚姻,并希望以离婚的方式从法律上确保自己自由。为了自由,她拒绝与疼爱自己的明戈特老太太住在一起,独自一人住在远离纽约上层的街区。可以说,艾伦是自由精神的完美体现,“甚至渴望最孤独的自由”。<sup>[4](P.49)</sup>在与艾伦的接触中,纽兰也受到了她那自由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小说中,纽兰曾多次产生远走高飞的想法。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能够付诸行动,却也让读者窥见纽兰抛弃习俗规约、自由追求爱情的决心。此外,纽兰的自由精神还体现在其对书房装饰与管理权的坚持上。在当时社会,上流社会女性没有职业,房子是她们的主要活动场所,“获得房子的装饰权、管理权是女性确立自己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sup>[7](P.157)</sup>

但是书房是纽兰唯一的私人空间,也是他唯一可以暂时获得自由的自由空间。为此,他不顾家人的怀疑与反对,按照自己的喜好装饰了图书室,“坚持图书室的窗帘应装在竿上来回的拉”。<sup>[4](P.186)</sup>尽管纽兰尊重梅的权利,依然坚持了自己对牢牢把握住了书房的装饰风格,捍卫了自己最后的一点自由。

### 三、男性神话解构的不完全性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华顿对男性神话的解构都是不完全的。梅作为猎手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女性特质与现存权利机制的运用。一方面,女性自我牺牲精神迎合了男性对女性的道德与品质要求。另一方面,老纽约这一威力强大的机器总体上也是有由男性控制的,因此它总是苛责女性,宽容男性。“尽管梅比传统女性更复杂,但依然没有突破父权结构”,<sup>[2](P.37)</sup>梅的胜利是建立在对男性神话的认可之上的。作为精神引导者,艾伦对纽兰的影响也仅仅停留在心理层面,而并未对他的生活产生实际影响。纽兰没能成为自由的追求者,而是彻底成为社会角色扮演者——好公民、忠诚的丈夫和好父亲。他的生活充实体面,甚至认为“这理应是一个人的全部所求”。<sup>[4](P.219)</sup>最能说明他坚守传统的莫过于那张他一直不愿丢弃的正宗东湖牌书桌。“对正宗东湖牌家具的偏爱,显示了他的‘肤浅’,我们由此得到的线索之一就是,纽兰是一个注重‘品味’的人而不是一个注重‘原则’的人”,<sup>[8](P.121)</sup>品味本质上就是繁文缛节的另一种表达,也是老纽约上层身份的象征。老纽约传统已经深入到纽兰的骨髓,流进了他的血液。对于纽兰而言,扮演好社会附加在他身上的角色远比自由更重要。可以说,艾伦对纽兰的实际影响就在于让他安于传统生活的同时,为失落“生命之花”感到深深遗憾。<sup>[4](P.219)</sup>

对男性神话解构的不完全性与华顿的成长环境、所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社会大环境而言,战后美国社会性别角色的转变为解构男性神话提供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社会价值体系坍塌,男女性别角色定位也不可避免受到冲击。而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贡献则进一步彰显了女性的能力。华顿成长于父权神话充斥的家庭环境之中。华顿从未受过正规教育,她的母亲更是反对她在文学上的追求,因为“好女孩不

写小说”。<sup>[9](P.435)</sup>成年后,与同时代众多女性命运一样,华顿在适婚年龄被嫁给了门当户对的爱德华·华顿。而这段婚姻后来也被事实证明毫无幸福可言。这些坎坷的生活经历让华顿深切地体会到男性神话对女性的束缚与压抑。1913年离婚后,华顿移居欧洲,致力于文学创作,迅速成长为一位成功而自信的职业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不满与对女性的自信反映在其作品中就是女性对男性神话的解构。但是,早期生活经历让华顿在体验到女性艰难处境的同时,也使父权思想深深植入其血脉之中。纽兰在回顾自己的生活时说道,“旧的生活方式也有它好的一面”。<sup>[4](P.219)</sup>这既是纽兰心声,也是作者华顿自己的切身体会,“在最平凡的意义上,我出生的那个小社会尚好”。<sup>[10](1.3)</sup>老纽约本质上是父权社会,对老纽约难以割舍的眷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华顿对父权社会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的复杂性使华顿对男性神话的解构又必然具有不完全性。

#### 四、结语

男性神话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即使今天也并没有完全消弭。它宣扬男性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而女性唯有服从;宣扬男性在智力上优于女性,担任着女性精神引导者的重任。在《纯真年代》中,华顿通过倒置男性与女性引导与被引导、主导与被主导角色,使得原有的男女权力关系发生惊人的倒置,从而解构了男性神话。但是,成长于男性神话甚嚣尘上的环境之中,华顿对男性神话的解构又必然是不完全的。

#### [参考文献]

[1] Barker, Chris.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DB/OL]. London: Sage UK, 2004. <http://search.credoreference.com/content/entry/sageukcult/myth/0?searchId=c6053baa-2933-11e4-aded-0aea1e3b2a47&result=3>. 2014-8-16.

- [2] Moore, Alison Rossetto. *A New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Woman in Edith Wharton's The Age of Innocence and Ernest Hemingway's A Farewell to Arms* [D]. Sacramento,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all 2012.
- [3] Smith, Nicholas D. Plato and Aristotle on the Nature of Women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983(4).
- [4] Wharton, Edith. *The Age of Innocence* [M].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9.
- [5]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二版)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6] Fulzele, Makarand. *Man is the Extension of Woman: Know the Ultimate Truth? about Yourself?* [M]. Bloomington, 2012.
- [7] 朱赫今、胡铁生. 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之辩——华顿小说纯真年代中房子意象的伦理内涵[J], 东北师大学报, 2012(6).
- [8] Fryer, Judith. *Felicitous Space: The Imaginative Structure of Edith Wharton and Willa Cather*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 [9] Kaplan, Amy. Edith Wharton's Profession of Authorship [J]. *ELH*, 1986, 53(2)
- [10] Wharton, Edith. *A Backward Glance* [M]. Adelaide: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2014.

(责任编辑 南山)

## 移置、流放、错位：“间质空间”视域下的《祖先游戏》

鲁晓川 胡戈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 《祖先游戏》是艾利克斯·米勒的一部杰作。书写了凤氏家族移置、流放和错位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的移民身份困境和民族心理诉求。最终跨越了时空、文化和家国的桎梏成功地摆脱了移民身份的困顿。本文将从空间视角对超越了时间和历史的文化身份在移置、流放、错位后走向杂糅的必然性进行深度空间剖析探讨其如何在中澳世界里寻求“间质空间”即第三空间建构文化身份,使其中澳二态性的文化身份从对立走向融合。

**[关键词]** 移置; 流放; 错位; 《祖先游戏》; 间质空间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104-04

艾利克斯·米勒是一位优秀的英裔澳大利亚当代作家,《祖先游戏》是他的第三部小说。1992年该小说出版后立刻引起了澳洲文坛的高度关注,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完美小说描绘”并一举荣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英联邦作家奖、太平洋作家奖和联邦作家协会奖四个重要文学奖项,在澳大利亚文坛占据着独特地位。米勒也因此成为了澳大利亚小说界一颗新星。

《祖先游戏》跨越历史和现实的界限,跨越地域的限制,通过空间叙事将中澳历史巧妙的联系在一起,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移民凤氏家族四代人在中澳文化中挣扎、迷惘和不懈的身份寻求和文化杂糅。凤一幸运地发迹于澳大利亚,视一位澳洲土著人为祖先,后成为往返于中澳之间运送淘金者的富人;维多利亚是凤一和爱尔兰裔妻子所生的混血女儿,她一生没有离开过澳洲却着迷于幻想中的中国,用其毕生之力描绘她想像的中国家园;凤三出生在澳洲,生活在上海,后成为中国知名的银行家,却始终抵制中国传统文化,有严重的澳洲情结;浪子是凤家第四代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小说的主人公,自幼生活在在中澳文化的夹缝中,形成了双重的人格,抛弃中国的祖先自愿流放到澳洲,却并没有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艺术家,一直生活在孤寂与困顿中,在中澳共同边缘的空间中移

置和流放,艰辛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建构自己新的文化身份。

“间质空间”是指“文化之间发生冲突、交融和相互趋同的交叉位置”。在这一空间里,不同种族、阶级、性别和文化传统之间进行差异文化的“间性协商”,在双方的对抗与交往中不断变化,最后产生对差异文化的相互“默认”。<sup>[1](P.53)</sup>不同文化在这里互融、互渗,文化之间的差异模糊不清。因此,生活在间质空间的人因地域的“移位”文化的“错位”而处于边缘生存的状态,“流放”就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他们往往产生归属上的失落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漂泊无根、无处安身使他们对“家园”有着强烈的渴求,希望找到心灵的依托,身份得到认同。萨义德用“流放”来描绘被殖民者文化归属上的失落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流放”是指地域、种族意义上的流放,处于流放状态的人,往往经历着文化身份上的困惑和心理上对“家园”的渴望。凤一和浪子就是纯粹的流放者,为了求生和解脱主动选择流放到异域。但澳洲和中国文化巨大的反差最终于带给他们强烈的文化“错位”感。维多利亚既非纯粹澳洲人,却成长在以白人为主导的澳洲社会;浪子主动流放到异域寻求发展却得不到澳洲社会的承认,他这种中澳混杂的文化身份,始终使他无法将自己整合为一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鲁晓川,男,四川巴中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胡戈,女,广西南宁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个单纯的统一体,时常处于自我身份的怀疑之中。游移于两种文化身份之间心灵无所归依的痛苦自然使浪子产生想“家园”的念头。文化身份的困惑必然产生心灵的流放,心灵流放的必然后果便是对“家园”的渴望。凤一和浪子都是“错位”的中国人,一心远离中国“家园”的根基,主动流放在中澳文化的边缘。

## 一、物理空间

物理空间指小说的自然景观部分,是小说中的重要隐喻系统。常常在小说中以地域、场景、建筑等形式出现。《祖先游戏》是空间象征意味极浓的现实主义之作。小说中物理空间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地域并置的空间叙事和具体的物理存在来建构的。通过独特的空间视角,将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生动描写了凤家四代人在中国和澳洲移置、流放和错位的经历。

### 1. 地域并置的非线性空间叙事

凤一出生在中国福建是一个孤儿,他为了摆脱饥饿和贫穷带给他求生的困境,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开往新南威尔士殖民区的船。在登上船的那一瞬间,他已认为自己不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跟船长同行的澳洲人。凤一是孤儿,没有父母,没有祖先,甚至没有名字,因此他在中国找不到存在感,对出生地福建也没有半点留恋。他到异域寻求重生就是想借此抹杀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当他从拉金斯船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名字“风”时,他十分激动,顿时觉得自己获得了重生。船长给他起的名字“风”赋予了他新的身份。

当凤一来到巴拉腊特牧场后,他毅然剪掉辫子,换掉破旧衣服,从牧场的商店买了红色羊毛衫、皮马裤、英式棕色靴子和一顶系蓝色带子的棕色帽子,一副本地牧羊人的打扮。服饰作为一种物质文化景观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它隐喻着与人的一种关系,是人一种潜意识对身体进行包装和修饰的行为,是内在自我意识的外在表现。

对英式服饰和英式文化的接受说明了凤一认同了英式文化传统价值观,有意识地融入异域环境。他喜欢自己的名字、英式服装和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但这只是他心理适应和接受的表征,凤一毕竟长着一张黄皮肤的中国脸,在新南威尔士殖民区仍被澳洲主流社会视为“他者”。现实与凤一的美好愿望必定是格格不入的,他的中国性是永远不可能彻底抛弃的,因为“无论文化之间如何杂交,文化的核心不会改变”。<sup>[2]</sup>

在凤一好友土著人多赛特下葬的时候,他意外发现了金子。他认为这是上天特意安排的,多

赛特就是他的福星,因此他将多赛特一位澳洲土著人视为自己的祖先,后往返于中澳之间运送淘金者到澳洲,成为横跨两个大洲的富商。在往返中澳的途中,他随身携带多赛特的颅骨和从多赛特衣服上取下的六颗纽扣,直到临终前将它传给自己唯一的儿子。颅骨和纽扣是两个极富隐喻意义的物质文化景观,颅骨可视为凤一对祖先的崇拜,这是他身份的象征,纽扣则可理解为凤一和祖先多赛特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是凤在澳洲生存的精神寄托,纽扣还连接着中西两种文化,最终在凤一身上体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杂糅。

凤一和爱尔兰后裔马丽的婚姻隐喻了中西两种文化的杂合,发迹后他不停地往返于中国和澳洲两地之间,象征了凤一中西杂糅的身份得到了构建。凤一意外收获金子成了富商使这个中国孤儿在澳洲异域土地上获得了重生。他生于中国,发迹于澳洲,所以他认同两个国家,当他在澳洲生意上达到顶峰时,对中国他仍然充满怀念之情。一个人独处时,他虽然身体躺在墨尔本的豪宅中,心却惦念着福建厦门的别墅,回忆着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房子是家的意象,此刻凤一想念和向往的是回到中国的家,寻找自己身上的中国性,中国仍然是他最终的归宿。

在小说中对凤一的叙述不是线性的而是通过不同的地域空间来展现凤一身上中西文化的对立与融合。通过对墨尔本、福建厦门、营生、巴腊拉特等不同地点的串接充分体现了小说地域空间并置的叙事风格。对墨尔本豪宅、厦门别墅、英式服饰和多赛特的颅骨和纽扣的物理存在的描写隐喻了凤一移置、流放和错位背后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文化身份建构的对立与杂合。

### 2. 凤三“中国脸外国性”

小说主人公浪子的父亲凤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脸外国性”的人,他有严重的西方情结,一直视祖父凤一发迹的澳大利亚为祖先的家园。凤三是中国有名的银行家,他住在上海租界里,所住之所的装修全是西式风格,屋内屋外无不透露出他对西方的崇拜,在凤三眼里这所精心装修的房子是他安逸舒适的家,回到家里就像回到了自己祖先的家园——澳洲一样,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但实际上这所房子是他对抗中国传统文化和抛弃自己中国性的象征也是具体的物理存在,通过对凤三西式装修风格房子的物理空间叙述有力地隐喻了凤三“中国脸外国性”的异化的、错位的西方情结。

“家”作为具体的物理存在,是精神空间的意象。凤三虽然表面彻底澳洲化但他对自身“中国

性”的否定是不彻底的。他可以把女儿全部嫁给老外,可以把自己的家装潢成澳洲风格,但是他却坚持自己家业的继承人必须有百分百的中国血统。他认为只有纯正的中国血统才有资格拥有祖先拼搏一生积累起来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从祖父凤一、生父凤二、他本人以及自己的儿子浪子都是纯正的中国血统。凤三对家族血统的维护说明了他“中国脸外国性”的典型特征是具有两面性的。“家”这个物理空间的建构隐喻了中澳文化的杂糅,这种中西杂合的文化身份在他的家族中会代代相传。

## 二、社会空间——在中澳文化夹缝中寻求生存的第三空间

空间具有社会属性,任何一个社会,从事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它自身的空间。列斐佛尔在提出社会空间这个概念的同时,还谈到社会空间是物质性的空间实践,是观念的空间也是生活的空间,即可知觉的、可构思的和可生活的三重空间。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社会空间不仅包括可见的人们活动场所,也包括人们在人际交往活动中受意识形态控制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等。在社会空间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人类群体之间的活动交锋。

浪子是《祖先游戏》的主人公,作为凤氏家族第四代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出生即“错位”的人,他艰难地从母亲身体里出来却注定一生也到不了他该去的地方。他从小性格孤僻,被祖先驱逐,流放到异域也不被接受,与其曾祖父凤一同时是中澳两个国家的富人形象不同,他被中澳两个国家同时抛弃。

浪子从小受到有严重澳洲情结的父亲和出身中国传统家庭的母亲的双重影响,自幼就生活在父亲母亲价值冲突的夹缝中。凤三崇尚澳洲,视澳洲为自己祖先的家园,所以他一直蔑视以自己的岳父黄玉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浪子在杭州外祖父黄玉华家时就学习中国传统艺术,在上海跟随父亲凤三时就学习欧洲历史、法语、数学和德语;在杭州,母亲强制要求他穿中国传统服饰,讲汉语,在上海,父亲却不顾浪子的意愿让他穿西服,讲英文。所以浪子被迫杂合了父母双方的价值意愿,一直活在来自父母价值冲突的阴霾中。因此,上海和杭州不仅仅是地理层面的能指,也是社会空间的所指。当价值冲突发生时,他顿感自己被不可调和的双重矛盾分裂和移置。所以,浪子只有在跟随母亲往返于上海和杭州两个城市的火车上才觉自己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因为,此时他可以做回自己,不被上海和杭州双重窒息

的生活所折磨,有一种“旅行即归家”的舒适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浪子生存的社会空间下,一种无依无靠、无存在和归属感心理空间的表征。但浪子夹缝中生存的社会空间则显示了浪子身上中西文化杂糅的特征。

尽管浪子在中国传统艺术方面甚有天资,但他外公黄玉华仍然不喜欢他,原因是浪子是凤三的儿子。因此黄玉华每次跟女儿去祭祖时都拒绝带浪子前往,这是对外孙中国性身份的否定,黄玉华认为浪子跟他父亲一样不可能真正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外公的行为让本来就生活在中澳文化夹缝中漂浮不定的浪子开始了身份属性的抗争,他最终认同了父亲的澳洲情结,抛弃了自己的中国性。浪子为了真正归属澳大利亚祖先的家园,他决定要亲自毁掉中国祖先的纽带,毅然决然地将外公收藏的自11世纪世代相传的黄氏家谱付之一炬。斩断了自己的中国性,浪子对中国已无半点留恋,在向往澳洲新家园的同时,他也成了没有祖先纽带被移置、流放的真正浪子。

浪子抛弃了自己的中国性,摒弃了对祖先的忠诚,选择自愿流放,憧憬在澳洲做一个自由、独立、拥有新身份的个体。正如,史皮斯先生对浪子所说,在流放中寻觅自己的家园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可以在流放中找回真正的自己,找到自己归属的家园,体验“流放即归家,旅行即移置”的身心自由之感。

浪子被中国的祖先移置,自愿流放到澳洲后,天资聪慧,极富艺术天赋的浪子在澳洲并没有取得期望的艺术成就,艺术作品也不被主流社会青睐,仍然一下人无依着地生活着。浪子被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抛弃的原因主要是澳洲人不可能视华裔的艺术作品代表自己的文化,还有就是浪子所处的时代不可能被澳洲社会完全接受和认可。在澳近生活了40年,浪子最终没有彻底摆脱掉中国性而是建构起中澳杂糅的文化身份,他留存着曾祖父凤一视为祖先的多赛特的颅骨,也保留着母亲亲手绘制的传统中国茶具,中国和澳洲已成为他自身无法分割的两个部分。浪子生活的社会空间隐喻了他在中澳两种文化的异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第三空间,建构新的文化身份。

浪子和他曾祖父凤一相隔一百多年,但作为不同的空间存在,他们表现出极其相似的命运,从社会空间角度看,浪子就是曾祖父凤一的化身,他在中澳文化夹缝中求生存的经历就是祖先移置、流放的历史再现,从人物空间融合意义上讲,“浪子”这个名字并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整个凤氏家族的代名词。

### 三、心理空间——维多利亚内心召唤的声音“中国情结”

小说中的个体心理空间是个体空间的重要体现,从人物的住所,到内心独白都体现了心理空间特征。空间既可以是具体的物理形式,也可以是被标识、被分析、被解释的精神存在,它决不是与人类、人类实践和社会关系毫不相干的物理存在。反之,正因为人涉足其间,空间产生了意义,才使得心理空间隐喻效果更明显。<sup>[3]</sup>

维多利亚在孩提时,在母亲和几个姐姐眼里就是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她的长相极具中国性,长着一双亚洲的眼睛和一副东方人的脸蛋。她视父亲凤一的出生地中国为自己祖先的家园,她的存在就是中澳结合的产物。

对维多利亚而言,中国是神秘的可亲的,是她向往的地方,尽管她从未离开过澳洲的家,但她却用毕生的精力完成了她的作品《冬日来客:北半球的生活》,苦苦寻觅着自己内心深处神秘的东方世界。维多利亚特立独行,一直生活在母亲和姐姐们以外的空间,虽然与母亲和姐姐的生活失去了交集,但是她却超越了世俗的边界,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时刻期盼着她的父亲凤一能从中国早日归来与她共叙父女情,每当父亲从东归来时,她满心欢喜;当父亲离开时,她伤心落泪。维多利亚虽然生长在澳洲却对东方世界的中国一往情深,在她的梦幻世界里中国的一切都是神秘的,令人向往和着迷。她视父亲送给她的中国唐三彩为宝贝,在她的精神空间里唐三彩就指代神秘的中国,因为唐三彩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昌盛。唐三彩又叫陶瓷马,对于受澳洲文化教育长大的维多利亚,她天真的以为陶瓷马就是东西方世界里的神马,想象这匹超自然的神马可载她去到父亲所到过的神秘的中国。维多利亚在自己的心理空间无意识地建构起了中澳之间的联系。她内心深处的声音时常告诉自己就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流放女孩。浪子在小说中也提到,自己的姑祖母维多利亚是一个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中国人。

虽然维多利亚生活在想象中的东方世界,但她并没有完全抛弃自己的澳洲性,事实上她很爱生她养她的澳洲家园。当她的哥哥凤二从中国来澳洲继承父亲遗产时,她却表现得非常冷漠,不与凤二交流,因为凤二是纯正的中国血统,她与凤二没有兄妹感情,因此认为对哥哥来说,除了父亲的遗产外,澳洲对他没有任何意义。由此可说明,维多利亚的心理空间是中澳两个世界的结合,此精神空间既不完全属于中国也不完全属于澳洲。她以建构一个臆想世界的方式杂糅了自己的

中澳的文化身份,她本质上是一个纯粹的澳洲人,出于对父亲出生地中国的好奇,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追寻着中国情结。

在小说中,维多利亚和凤三对精神空间的追求和向往是如出一辙的。凤一的女儿维多利亚出生在澳洲却长着一副东方的面孔,犹如一个血统纯正的中国人,她从未去过中国,却对中国的一切好奇和着迷,一直珍藏着父亲送给她的唐三彩,因为幻想中的中国代表着她心中的理想世界。凤三出生在上海,有一半的澳洲血统,一直有严重的澳洲情结,视自己为澳洲人,一直珍藏着祖先在澳洲的照片。这种多维的叙事空间和空间并置的叙事策略共同建构了一个移置、流放和错位的凤氏家族。

### 四、结语

凤家四代人,从凤一到浪子,不管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凤一和凤三,还是活在想象世界中的维多利亚和浪子,没有一个是纯粹的中国人或澳洲人,他们都生活在中澳两种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中澳文化杂糅后形成的第三空间融合了中澳特质,使凤家四代人建构起了杂糅的文化身份。本文通过具体存在的物理空间、依托物理空间而存在的可被分析、被解释的精神空间和主人公生存的社会空间等空间叙事视角来展现《祖先游戏》中不同的空间建构,揭示了凤一和凤三在中国和澳洲两地辗转所表现出的严重澳洲情结,他们极为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一心想要斩断自己的中国性、认定澳洲是自己祖先家园的错位心态;维多利亚生在澳洲从未到过中国却对中国的神秘如痴如醉以致于产生想象中的东方世界;浪子在中澳文化夹缝中最终选择抛弃自己的中国祖先,主动流放到澳洲,但在澳洲他并没有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艺术家,因自己的艺术作品与澳洲主流社会认同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所以他仍继续痛苦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空间视域下的凤家四代人最终选择重新融入中澳文化,寻求两者的共同点,勇敢地面对和接受中国和异域文化的差异,在中澳文化世界里寻求和建构自己真正的文化身份。

#### [参考文献]

- [1]任一鸣. 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 [2]方红. 杂交主义与非殖民化进程中的文化两难[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2).
- [3]陆扬. 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J]. 外国文学研究,2004(4).

(责任编辑 南山)

## E. B. 怀特的幻想世界

——以《夏洛的网》为例

陆 新

(扬州职业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9)

**[摘要]** 在《夏洛的网》中, E. B. 怀特于现实的世界中开辟出一方幻想的天地, 这方天地属于孩子, 只有孩子那对万物平等的心、那纯净的眼睛才能发现并关注。这个被我们称为“幻想世界”的世界其实是另一个真实的世界, 一样有高尚与卑劣, 一样有梦想和缺憾, 它和现实的人类世界恰形成对照, 它显示出现实世界存在的某种可能性。

**[关键词]** E. B. 怀特; 《夏洛的网》; 幻想世界

**[中图分类号]** I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108-06

E. B. 怀特为孩子们写了三篇童话, 尤以《夏洛的网》最负盛名, 他用极为写实的方法创造了一个幻想的世界, 让读者沉思。

### 一、童心的世界

1. 平等——弗恩的生命世界。这个我们称为“幻想世界”的世界首先是由一个孩子的眼睛发现和见证的。

“‘爸爸拿着那把斧子去哪儿?’ 摆桌子吃早饭的时候, 弗恩问她的妈妈。”<sup>[1](P.2)</sup> 这是《夏洛的网》的第一句话。这是个奇妙的开头, 怀特像是突然切开了一个时间的切口, 八岁女孩弗恩的世界忽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弗恩的世界中, 生命是一样的, 它们各自形态不同, 然而它们都是生命, 它们应该被公平地对待, 所以她顾不上吃早饭要赶上她的爸爸, 因为她要救下那只小猪。仅仅因为它是个落脚猪就要被杀掉, 弗恩觉得太不公平了。“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很小很小, 你也把我给杀了吗?”<sup>[1](P.2)</sup> 弗恩质问她的爸爸。在她心中, 小猪和小女孩是同等重要的生命。阿拉布尔先生却说: “女孩小是一回事, 落脚猪小又是一回事。”<sup>[1](P.3)</sup> 小猪和小女孩处于不同的生命等级。大人的世界是个等级的

世界。

弗恩终于救下了小猪, 她因此拥有了一头小猪——“一只还没有白老鼠大”<sup>[1](P.6)</sup> 的小猪的暂时喂养权, 不过弗恩不知道这是暂时的, 她像妈妈爱宝宝一样爱着威尔伯, 早晨起床、下午放学一到家、吃晚饭时、睡觉前, 她都耐心地喂威尔伯喝牛奶, 她给威尔伯围上围涎, 她给它热牛奶, 她抚摩它, 喂它。威尔伯也像婴儿爱妈妈一样依赖着弗恩, 当弗恩喂它牛奶时, 它总是抬起头来, 用深情的眼睛看着她; 当弗恩上学时, 它和弗恩一起走到大路上, 陪她等校车, 等到弗恩上了车, 它就站在那里一直等到校车拐弯看不见为止; 弗恩终于放学了, 威尔伯几乎一刻不离地跟着她。

可是时间在流逝, 威尔伯在慢慢长大, 起先它睡在厨房炉子旁的箱子里, 后来给搬到板棚里, 换了个大一点的箱子, 两个礼拜后, 它又给转移到户外一棵苹果树下的新做的小猪栏里。终于当威尔伯长到五个礼拜大的时候, 阿拉布尔先生说它已经够大了, 必须卖掉了。

从没想到过这一切要结束, 从没想到过要和威尔伯分离。而大人们早就决定好了: 一只小猪长大了自然得被卖掉, 它只是一头小猪罢了。

**[收稿日期]** 2014-11-18

**[作者简介]** 陆 新, 女, 江苏扬州人, 扬州职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硕士。

这里有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名字。大人们一直叫它小猪、落脚猪，只有弗恩称呼它威尔伯，当她在上学的路上终于想出这个“最漂亮的名字”<sup>[1](P.7)</sup>，当她在回答老师问题时却做梦似的说着威尔伯时，威尔伯已经变成了弗恩心爱的“小宝宝”。名字是如此重要，名字意味着身份的确立，意味着被从一个类别中独立出来而具有了个体的意义。

在童话的第八章“家里的谈话”中，弗恩和妈妈说起了她谷仓中的朋友们，她理所当然地说着坦普尔顿说着夏洛，阿拉布尔太太很是担心了。在成人眼中，老鼠只是谷仓里一种讨厌的动物，到了夜里便四处活动，啃噬谷仓，偷食粮食，所以一定欲捕之而后快，谷仓众多杂物中赫然就有一个“生锈的老鼠夹”，那就是大人们对老鼠的态度。但是如果一只老鼠有它的名字“坦普尔顿”，一切就不一样了，它就成了一只独一无二的老鼠，它就被从成千上万的别的老鼠中分辨了出来，它的性情、它行动的轨迹、它生命的意义都将为这个名字所承载。同样，在人类眼中，蜘蛛是那么微小的一种动物，甚至很多人会误以为它是一种昆虫，他们不会知道蜘蛛有八条腿，不会知道蜘蛛的每条腿都有七个节，当然更不会知道它们怎么举起一条腿来打招呼。所以对于弗恩的哥哥艾弗里来说，“夏洛”没有名字，他称它为“大蜘蛛”“老蜘蛛”，一只蜘蛛对于一个精力旺盛的小男孩来说，就是被捕捉、被戏弄的对象，因而他一发现夏洛，便折了树枝要把它敲落下来；然而对于弗恩来说，那个蜘蛛叫“夏洛”，它是威尔伯最好的朋友，它那么聪明，以至于弗恩忍不住要向她的妈妈去赞美夏洛的“演讲”，所以当艾弗里折腾青蛙时，弗恩虽然不忍，哀叹是场“灾难”，吩咐艾弗里在荡秋千时把青蛙拿出来，但是她容忍了艾弗里的行为，然而当艾弗里发现了夏洛时，弗恩立刻警告哥哥“别碰它”<sup>[1](P.73)</sup>，当艾弗里不听警告要去捉夏洛时，弗恩大叫了“你快住手，艾弗里”<sup>[1](P.73)</sup>，弗恩的心因为夏洛的命运而紧张了。一只叫“夏洛”的蜘蛛和一只普通的蜘蛛是不一样的。

所以名字不是一件小事，在一个大家都有名字的人类世界，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意味着不可能被平等对待；同样，在一个大家都没有名字的动物世界，拥有了名字就意味着你是一个独立的该被平等对待的个体。当阿拉布尔太太听到老鼠、蜘蛛都有了名字时，她敏锐地产生了疑惑。小猪可以有名字，因为它是弗恩的宠物或玩具（大人眼中

就是这么看的吧），宠物或玩具对于主人来说是一种假定的关系、虚拟的关系、暂时的关系、局部的关系，但是当这些有了名字的老鼠、蜘蛛都被弗恩说成是“我们”“大伙儿”的时候，阿拉布尔太太觉得“她对于那只小猪和所有事情的举动有多么古怪”<sup>[1](P.55)</sup>。“我这小外甥女是个十分古怪的孩子——满脑子怪念头。”<sup>[1](P.82)</sup>弗恩的舅舅朱克曼先生也这样评价。

弗恩的世界和大人的世界明显显示出了差别。

2. 是小猪还是小孩？——威尔伯的世界。离开弗恩进入到谷仓底的小猪威尔伯觉得非常“孤独”，童话第四章的标题就叫做“孤独”。这是个重要的词，一只小猪会觉得孤独，而不是觉得饿觉得困，它像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宝宝最期待妈妈来接她一样，每天等着弗恩放学来到谷仓底看它，陪着它。

可是这一天下雨了，下雨打乱了威尔伯的所有计划，原本它对这一天有着非常完美的计划，它的计划详细到每个小时它要做什么，然而下雨了。这让笔者想到怀特的第三本童话《吹小号的天鹅》中老师问：“什么是 Catastrophe？”有人说“地震”，有人说“战争”，一个很小的红头发女孩珍妮用尖细的声音说：“比方说要跟爸爸妈妈去野餐，做好了花生酱夹心面包和啫喱卷筒蛋糕，把它们放在保温箱里，保温箱里还放进了香蕉、苹果、葡萄饼干、纸巾、几瓶汽水、几个煮鸡蛋，然后把保温箱放上汽车。正要动身的时候，下起雨来了，于是爸爸妈妈说下雨天不能出去野餐，这就是 Catastrophe（灾难）。”我们等着老师的评价，结果她遇上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她那么理解小孩子的心，她说“非常好，珍妮，这件事没有地震糟糕，这件事也没有战争可怕，但是正要去野餐却碰上了下雨，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我想这就是 Catastrophe（灾难）。”<sup>[2](PP.56-58)</sup>“我什么事都美美地计划好了，偏偏下雨”<sup>[1](P.27)</sup>，啊，这也是小猪的灾难，在这阴冷的猪栏里，威尔伯感到孤独了：“一个朋友也没有”，“弗恩也不会来了，噢，天啊”<sup>[1](P.27)</sup>。威尔伯哭了，连雇工勒维来喂它早饭，它都不愿意动一下。它沉浸在它的伤心中，它试图和母鹅玩，可母鹅没空，它要孵它的蛋；它试着询问一只小羊，可小羊似乎天生对猪带着偏见，不愿跟它玩；只剩下坦普尔顿了，可坦普尔顿连什么是玩都不知道，它

的生活就是吃、寻找、窥探、躲藏，它现在冒着雨去偷吃小猪的早饭了。小猪扑倒在肥料堆上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当然是因为孤独，也因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早饭被别人吃掉”<sup>[1](P.30)</sup>。

这一天接下来也没什么好事情发生，小猪没吃早饭也没吃中饭，它情绪低落，它宁愿饿着肚子，它需要朋友需要爱，可是大人们不知道，勒维和朱克曼先生觉得它生病了，把药硬灌进它的喉咙，就像一个小孩子被大人捏住鼻子硬灌进药水一样，那种难受的滋味，真叫人绝望，可惜人一旦长大就忘了那种难受了，或者就觉得是小孩子就应该忍着那种难受，于是他们又做着同样的事情。大人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这一天随着黑暗的到来终于结束了，这令人绝望的痛苦的一天。而在这个时刻，黑暗中传来一个细小的好听的声音：“你要一个朋友吗，威尔伯？”“我可以做你的朋友，我观察你一整天了，我喜欢你。”<sup>[1](PP.30-31)</sup>这是谁呢？在这样一个绝望到顶点的时刻，小猪那么急切地想要看见这个朋友，然而天就是不亮，黑夜像是故意要和它捣蛋一样就是迟迟不走。

所以威尔伯这一夜没睡好，像一个春游前一晚的小朋友一样夜里不断醒来，不断问妈妈几点钟了。“这天夜里威尔伯醒来十几次。”<sup>[1](P.33)</sup>到离天亮还有半个钟头，它就醒了。

从此，威尔伯拥有了一个和弗恩一样爱它的朋友——夏洛，它是一只灰蜘蛛，那个早晨，它挥动它八条腿中的一条，向着威尔伯友好地打招呼，它不说“你早”或者“你好”，它说“敬礼”，这不就是“敬礼”，一只蜘蛛不就应该这样打招呼吗，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你一定这样觉得。

“我觉得你很美。”<sup>[1](P.37)</sup>威尔伯赞美夏洛。一个大人会怎么描述蜘蛛呢？“大蜘蛛”“小蜘蛛”“灰蜘蛛”“黑蜘蛛”“长腿蜘蛛”……也许有很多种说法，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说“很美的蜘蛛”。

夏洛开始准备吃早餐了，一只苍蝇撞到了它的网上，夏洛向威尔伯展示它怎么捉住这只苍蝇，它向苍蝇潜下去，“吐出几根丝捆住它，把它翻过来翻过去，捆得它动也不能动”，“威尔伯惊恐地看着”<sup>[1](P.38)</sup>——一个生命在猎杀另一个生命——尽管“它讨厌苍蝇，可为这一只感到难过”<sup>[1](P.38)</sup>。在小孩子的眼中，生命全是一样的，形态也许不同，可是都是生命啊。可是夏洛杀了苍蝇。

威尔伯对夏洛的恐惧很快就被喜欢取代了，

它“一天比一天喜欢夏洛”<sup>[1](P.49)</sup>，像一个小孩子总是喜欢模仿大人做事一样，威尔伯说起了大话：“我要想结网也能结，我只是不结罢了。”<sup>[1](P.57)</sup>弗恩和夏洛都被这说大话的小猪给逗乐了。小猪学着夏洛的样子爬到高处，差别是夏洛是飞快地爬上门顶，而小猪是用它那胖胖的身体爬到了肥料堆顶上。然后它悬空往下跳，夏洛跳下来时有一根丝拉着它的身体，“我”的身后有没有呢？小猪赶紧往身后瞧，可是身后似乎一无所有，紧接着它就扑通一声落到地上了。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小猪动起了它的脑筋，是的，缺根绳子。向坦普尔顿借了一根绳子拴在自己的尾巴上之后，小猪再次爬上了肥料堆，充满信心，纵身一跃——反正有绳子拽着它，可是它忘了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什么东西上了，所以它再次扑通一声落在地上。

怀特真是太懂得小孩子的心了，在小孩子的头脑中，孩子自己可是无所不能的“巨人”，所以他们常常爱说大话，所以这个第九章的名字就叫做“威尔伯说大话”。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因为身体弱小常常失败，他们只能依靠大人的帮助。威尔伯当然是一头小猪，它喜欢吃热泔脚，喜欢睡在肥料堆上，身体痒了它喜欢去猪栏上蹭一蹭；但是它会觉得孤独，需要朋友需要爱，它爱说大话，它难道不是一个小孩子吗？所以当它从老羊那里得知自己会在圣诞节前被杀掉，然后被做成熏肉火腿时，它尖叫了——它从没想过会有这么可怕的事，威尔伯简直不知所措了。“我不要死！救救我，你们哪一位！救救我！”<sup>[1](P.50)</sup>威尔伯尖叫着，哇哇大哭。作为一个弱小的幼者，它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夏洛成为了那个拯救者，它为此耗尽了心力，在它的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它做好了它的卵袋，那里面有它的五百四十个孩子。作为一个种族，蜘蛛的生命将得到延续，但是作为这一只蜘蛛夏洛，它即将死了。可是威尔伯不知道，因为它不懂得，当它得知到了春天会有五百四十只蜘蛛宝宝出生时，它是那样兴奋，它见过小鹅们出生，也许还有小羊羔出生，它以为所有的出生都是一样的。它还不知道它最忠诚的朋友根本看不到它的宝宝们的出生。它还不懂得生命残酷的一面。而一旦它懂得，它便不再是小孩子了。

## 二、另一个真实的世界

当怀特创造这个幻想世界的时候，他决定让它成为另一个真实的世界。他一定不相信会有什

么“大同世界”“黄金世界”，他创造的这个世界也不会是。

尽管他那么向往人类可以更加正直、善良、忠诚、守信，他写正直勇敢的小老鼠斯图亚特，写忠诚善良的灰蜘蛛夏洛，写诚实守信的吹号天鹅路易斯，都在表达这种向往，之所以是一种向往，是因为真实的人类世界是不完美的——自私、偏见、冷漠、狡诈……那么他创造的这个幻想世界呢？

1. 幻想世界也是一样，有偏见，也有高尚。生命的世界不知为何总是会有偏见，没有来由，似乎也没有办法解决。

在仓底的世界中，小羊们似乎就天生地讨厌小猪威尔伯。童话的第四章，威尔伯在那个雨天觉得特别孤独时，试着找一头小羊羔和它玩。它很友好地问：“你能跟我玩吗？”“当然不能，”那小羊羔说，“第一，我没法到你的圈里去，我还没大到能跳过围栏。第二，我对猪没兴趣。对我来说，猪的价值比零还要少。”<sup>[1](P.28)</sup>“比零还要少”这句话让威尔伯弄不明白，它用挺清楚的逻辑证明没有什么会比零还要少。可是小羊羔没有耐心听，“噢，别说了”，“你自个儿去玩吧！反正我不跟猪玩”<sup>[1](P.28)</sup>。最后这句话实际上证明了前面的两条理由都无关紧要，因为事实是没有理由——“我”就是不喜欢猪。威尔伯很难过。是的，偏见总是让人难过。

第五章的开头，威尔伯一夜没睡好，早早地醒来等着天亮，天终于亮了，可是它还是找不到昨晚跟他说话愿意做它朋友的人，它不得不大胆地发问，其他牲口都抬起头来看它，“那些羊厌恶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sup>[1](P.35)</sup>。看来，不止是那一只小羊羔讨厌猪，羊们似乎都有点不喜欢它。是因为什么呢？不知道。怀特也没有给出原因。世界上总有那些几乎说不出原因的偏见与厌恶。

第九章，威尔伯说大话，想出风头，结果受到了小小的教训，当它正和夏洛聊天，想象自己在一片森林里用“了不起的有力的鼻子拱开树叶，在地里又嗅又找，闻啊，闻啊，闻啊”<sup>[1](P.62)</sup>的时候，一只小羊羔走了进来，很不客气地说：“你自己的气味就够闻的，我老远就闻到你了。你是这里最臭的东西。”<sup>[1](P.62)</sup>威尔伯再次难过了。幸而夏洛狠狠地教训了小羊羔。这次的厌恶似乎有明确的理由，然而完全不考虑别人处境的厌恶其实就是自私。

所以怀特所创造的幻想世界并不是一个完美

的世界，它和真实世界一样也有偏见与厌恶，但是怀特同时也告诉孩子们有没有偏见存在并不最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懂得尊重。

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幻想世界其实是另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如此相似，一样有卑劣，有偏见，但也一样有高尚，一样有对爱和忠诚的认同。

夏洛在现实的生活中不过是一只微不足道的灰蜘蛛，然而它却在那样短暂的生命中创造出了奇迹，它用尽全力地去拯救小猪，哪怕到生命最后一刻、哪怕在它必须完成生命延续所赋予它的产卵的任务时，爱和忠诚都没有被它忘却。它用自己的生命昭示了生命应有的价值。“它死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谁陪在它身边”<sup>[1](P.164)</sup>，而它死了之后，却没有“任何一个谁”能忘记它。

2. 动物眼中的人类世界——旁观者清的讽刺。我们不知道真实的世界中动物们是怎么看人类的，据说牛眼中人被放大了，狗看到的人实际上被缩小了，这属于生物学家的研究范畴，我们关注的是在怀特的幻想世界中，那些动物会怎么看待人类。

第九章中威尔伯因为说大话出风头受到教训之后，夏洛安慰它不会织网没什么，“没有多少动物会结网，连人类也织不过蜘蛛”，然后夏洛从一只蜘蛛的视角审视着人类的行为，

“你听说过昆斯伯罗大桥吗？”

威尔伯摇摇头。“是张网吗？”

“有点像，”夏洛说，“不过你知道，人类用了多长时间才把它造出来吗？整整八个年头。天啊，等那么长，我都要饿死了。我一个晚上就结成一张网。”

“在昆斯伯罗大桥上，人类捉什么呢——甲虫吗？”威尔伯问道。

“不是，”夏洛说，“他们不捉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在桥上走过来走过去，老以为另一边有更好的东西。如果他们在这桥顶上倒过头来静静地等着，也许真有好东西来。可是不——人类每分钟都向前冲啊，冲啊，冲啊。我很高兴我是一只坐网的蜘蛛。”<sup>[1](PP.61-62)</sup>

怀特很“真实”地写出了蜘蛛眼中的人类，蜘蛛理所当然地不能理解人类的行为，但蜘蛛却在这种不理解中几乎“旁观者清”地一语中的——在这走过来走过去、每分钟都向前冲的生活中，活着



到底是为了什么？

夏洛眼中的人类显得那么愚蠢，于是它“捕捉”到了救威尔伯的主意：“办法就是给朱克曼玩个把戏。我既然能戏弄一只甲虫，我就一定能戏弄一个人，人没有甲虫机灵。”<sup>[1](P.69)</sup>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夏洛花了几乎一夜的时间在它的网上织出了“王牌猪”三个字。最早发现这个奇迹的是勒维，然后勒维告诉了朱克曼先生，朱克曼先生告诉了朱克曼太太，对于这样一个“奇迹”，他们惶恐紧张，认为这是一个“神秘的信号”，他们重新去看他们家的那只猪，三个人站在那里一个小时，最终他们都认为这只猪确实不同寻常。于是朱克曼先生去找了牧师，牧师指点他不要外传，他需要时间领悟（这神的旨意）。但是秘密很快被传开了，人类世界就是这样，“要保密是很难的”<sup>[1](P.82)</sup>。周围多少英里的人都赶来看“奇迹”——看威尔伯，读夏洛的网上那几个大字。最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一只小猪。哈哈，不由得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装》，大家都说光身子的皇帝的新衣服真好看，谁敢承认自己愚蠢呢？这里也一样，谁肯承认自己看不出这小猪的不同寻常呢？那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而艾弗里竟因为曾经想用树枝打朱克曼家的蜘蛛而受到了妈妈的惩罚——不准吃晚饭——要知道捉蜘蛛对一个像艾弗里那样精力旺盛的男孩子来说是多么正常的行为。更有趣的是，朱克曼一家因为要接待太多参观的人而荒废了农事；牧师先生经过了几天的领悟终于向大家宣布：蜘蛛网上的字确实是个奇迹。

所有这些愚蠢的行为不过验证了夏洛一开始就说过的话——“人没有甲虫机灵”。

夏洛的计划初步奏效，它召集仓底的动物们开会想找出下一个适合用来赞美威尔伯的词，它要“做”一个新的“奇迹”出来，“了不起”这个词被选中了，威尔伯觉得羞愧，它脸都红了，一再强调自己一点也不了不起。这是动物世界的道德观念吧——名不副实叫人羞愧；但是不要紧，这几个字是用来给人类看的，人类是只要“看到印出来的东西，发表出来的东西”<sup>[1](P.87)</sup>，就都会相信。所以就用人类的规则来戏弄人类吧。

经过夏洛一夜的辛苦，第二个“奇迹”降临了。这里有非常有趣的描写：“勒维连忙奔过去叫朱克曼先生。朱克曼先生连忙奔过去叫朱克曼太太。朱克曼太太连忙奔过去打电话叫阿拉布尔先生和

太太。阿拉布尔先生和太太连忙爬上他们的卡车开着赶来。”<sup>[1](PP.92-94)</sup>这一连串的“连忙”真把人类的愚蠢劲写尽了。朱克曼先生更坚信自己拥有了一只了不起的猪，既然是了不起的猪，那就不能再把它当普通的猪那么对待了，首先不能再让它睡在牛粪上，得让它睡在干净的麦草上。勒维尽管因此多干了活，然而他明白，作为这样一头了不起的猪的饲养者，他理所应当承担额外的工作——这真是绝妙的讽刺，而更为讽刺的是，威尔伯躺在干净的麦草上，它觉得不舒服，它更喜欢牛粪那松软可爱的感觉，因此它推开勒维辛苦铺好的麦草，在肥料上伸开手脚。唉，没办法，人类就是这样愚蠢地以己度人。

不仅夏洛，老羊也是个智者，它不仅懂得老鼠坦普尔顿的心理，也深谙人类的心理。（或者大多数人和老鼠的心理其实差不多？）所以它在小猪上集市去参加评奖前告诉小猪，“当他们把你往板条箱装的时候，你要挣扎，如果毫不反抗，朱克曼先生会以为你中邪了，他会不敢上集市去的。”<sup>[1](PP.120-121)</sup>老羊其实是在说：你千万别让人类发现我们其实比他们聪明，所以要配合一下他们愚蠢的想法。

在集市上，威尔伯终于获得了特别奖章，扩音器里那个声音向大家介绍着关于这只猪的奇迹，告诉大家，这个奇迹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但大家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只蜘蛛会织出字，只除非——是神的旨意，是奇迹，因为不用说，蜘蛛是不会织字的。你看，人类那么固执愚蠢地坚信着一些事，人类太自大了，他们不知道在蜘蛛眼里，人类没有甲虫机灵。

在这个幻想的世界中，动物世界是和人类世界并存的，动物们也不具备超自然的能力，它们同样是通过观察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的行为，那些看起来有点荒谬的评价为什么竟给我们“旁观者清”的强烈感觉呢？

### 三、悲悯的世界

是谁在看着这个幻想的世界并把它讲述出来的呢？这里有个视角的问题。总的来说，有一个全知视角的叙述者存在，“他”甚至在威尔伯因为夏洛的“嗜血”而对这段刚刚开始友谊感到疑虑和恐惧时，忍不住站出来预先告诉读者：“它是错看了夏洛。在夏洛凶猛残忍的外表下，有一颗善良的心，到头来，它会显示出自己是个多么忠实



的朋友。”<sup>[1](P.41)</sup>“他”生怕读者和小猪一样误解了夏洛。这个无所不在的叙述者似乎洞悉着真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全部秘密。“他”是谁?“他”当然不是怀特,但是“他”背后站着怀特。因此“他”什么都洞悉,因此“他”平等地、公正地看待这两个世界的所有生命,因此“他”怀着悲悯关怀着每个生命——它的处境、它的痛苦、它的梦想、它的无奈。

就说说老鼠坦普尔顿吧,那个被人类憎恶、要用老鼠夹来消灭它的家伙,那个在动物世界也不受欢迎,被认为不是一个“正经动物”的家伙,它贪婪,所以它有收藏癖,不管什么东西,一段烂绳子、一个不能孵出小鹅的臭鹅蛋,它都当作宝贝似的藏进它的洞中;它自私,所以它才不愿意浪费自己的精力去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它之所以愿意陪威尔伯和夏洛去集市,是因为老羊告诉它“集市是老鼠的乐园”,“有足够的让人恶心的食物,够大队老鼠吃个痛快”<sup>[1](P.119)</sup>;它甚至显得很冷酷,在拯救小猪的计划需要它的帮助时,老鼠说:“让它(威尔伯)死掉算了,我才不在乎呢。”<sup>[1](P.89)</sup>可是等到老羊向他证明了因为威尔伯的食物=坦普尔顿的主要食物来源,所以威尔伯被杀=坦普尔顿被饿扁——“肚子瘪得我们可以穿过它看到另一边的东西”,“坦普尔顿的胡子抖了起来”<sup>[1](P.89)</sup>。

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家伙,那个全知的叙述者也让它有机会表达心酸和委屈。在夏洛临死前,威尔伯要赶在人们回到这里之前把夏洛的卵袋带回谷仓,它需要老鼠的帮忙,威尔伯那么着急,可是老鼠打哈欠,拉拉胡子,抬头看看那卵袋,它并不起身,而是抱怨着:“我倒想知道,我帮了这么多忙,我得到过什么感谢呢?对老坦普尔顿一句好话也没有,只有毁谤、讥讽和冷言冷语。对老鼠一句好话也没有。”“谁关心我坦普尔顿呢?”<sup>[1](P.161)</sup>

其实仔细想想,这老鼠还真没干过什么危害谷仓世界的事情,它不像谷仓其他的牲畜那样有主人的喂养,它得依靠自己,它用老鼠的方法打洞、躲藏、搜寻食物、收藏东西,所以它总是在黑夜、在别人都休息的时候悄悄地谋生。是啊,它把什么都当作宝贝,藏在它的洞里,可是它没有妨碍谁啊(就算它是一只品味不太高的有点收藏癖的老鼠好了),相反它的收藏品可是好多次发挥过作用啊,最有价值的一次当然是那个臭蛋的爆炸,臭味熏跑了要捉住夏洛的男孩艾弗里,那是多么惊

险的瞬间啊,连弗恩都不能阻止她哥哥的行动呢。而坦普尔顿对它的收藏品能发挥作用是很高兴的,有一回小猪说大话说它也能像夏洛一样结网,只是它需要一根能拴住它尾巴的绳子,让它能像夏洛那样从空中吊下来,于是它向坦普尔顿借绳子,坦普尔顿显得那么慷慨,“一点没问题,你要什么给你什么”<sup>[1](P.58)</sup>,它还应小猪的请求帮它把绳子系在了尾巴尖上。它这意外的慷慨和热心总让人有点怀疑它的心思,你看当小猪摔下来后坦普尔顿“龇着大牙”笑得多么开心啊,但即使那样也只是恶作剧而已,没有更坏的心思。

这只老鼠没干过什么坏事,当然它也没有主动去干过什么好事,然而它却在拯救小猪的行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一切都是在它卑劣的本性被引诱的前提下进行的,都是他确定能得到实在的好处之后才进行的,但是考虑到它的处境,它有理由这么做。这原本是小羊羔嘲笑小猪太臭时,夏洛教训小羊羔的方式,但用在坦普尔顿身上不也一样合适吗?

时间的流逝让坦普尔顿也老去了,当它在信守承诺的小猪的食槽里吃得像个旱獭那样大时,当然是贪吃的,但也是因为它的“人生”从没有过这样的舒心的衣食无虞的日子,不是吗?老坦普尔顿能这样舒心地生活,这是怀特的悲悯。

E. B. 怀特所创造的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它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它是现实世界有可能成为的样子,它是另一个真实的世界。“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大门是敞开的。每个孩子,年轻的和年长的都可以走进去,去体验……世界可以在不断地阅读和朗读中被重新发现:人类、动物、天空和地球,以及人们所谈及不到的一切。”<sup>[3](P.1)</sup>E. B. 怀特的童话正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扇门,通往无比开阔的世界,只要你愿意——走进去。

#### [ 参 考 文 献 ]

- [1][美]E. B. 怀特. 夏洛的网[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2][美]E. B. 怀特. 吹小号的天鹅[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3][德]舒比格.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M]. 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师 语)

## 《西游记》第59回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王 焯 刘宗敏

(海南师范大学初教学院, 海南海口 571158)

**[摘要]**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目前约有十余种语言的外文译本。本文主要是从其众多的译本中择英语译本中的两个代表性译本进行翻译策略维度方面的比较研究,其中译本一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译本二由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比尔·詹纳尔翻译。研究发现,两种译文各有特点。杨戴夫妇始终秉承忠实与通顺的翻译风格,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异化为主、归化为辅,更多地保留了中国文化的元素;而詹纳尔的译文主要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译文语言相对来说更加地道、生动。

**[关键词]** 西游记; 源语文本; 译语文本; 比较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114-06

《西游记》是我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其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广为流传。由于翻译者们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译者的角度、目的和风格的不同,各种译文在语言表达形式、内容忠实性等方面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基于此,笔者择众多英译本中的两个代表性版本中的节选篇进行比较分析,主要从具体的翻译策略维度出发进行对比研究。译本一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翻译(其译本以下简称“杨译”),译本二由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比尔·詹纳尔(W. J. F Jenner)翻译(其译本以下简称“詹译”)。

### 一、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特征概述

#### 1. 《西游记》第59回原语译本评述

##### (1) 吴承恩与《西游记》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他从小勤奋好学,饱读诗书。然而两次乡试的失利,加上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沉的。此后,他的生活穷困潦倒,品尝了人生酸甜苦辣,于是开始更加清醒深沉地考虑社会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吴承恩一生经历了弘历、正德、嘉靖、隆庆、万

历五个朝代。历史上,这些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朝廷的腐败使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再加上灾荒连年,盗贼风起,在吴承恩家乡一带就发生了饥民变乱、人民相食的惨状。加上个人生活的窘迫,他深感无力,据说是在他老年后创作了《西游记》。在孙悟空这一文学形象上寄寓着他内心的愤懑和不平,寄寓他打破现存秩序的强烈要求,寄寓他斩除邪恶的强烈愿望。同时,他通过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来反映民主、平等和自由追求,揭批封建统治的黑暗统治以便人们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共同反对封建黑暗统治。

##### (2) 语言和文化特色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接触的浪漫主义长篇小说。它主要讲述了孙悟空、猪八戒等师徒四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小说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故事情节、幽默诙谐的语言,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个性鲜明、深入人心的英雄人物,书中描写了许多浪漫瑰丽、极富感染力的神奇故事,同时揭露了明朝中期的社会历史情况和进步的政治思想。这部作品想象汪洋恣肆,情节奇妙有趣,结构宏伟而严谨,可以说是中

**[收稿日期]** 2014-11-20

**[作者简介]** 王 焯,女,湖北黄冈人,海南师范大学初教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刘宗敏,女,甘肃兰州人,海南师范大学初教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古代神魔小说的扛鼎之作。就语言特色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语言绚丽,诗词歌赋较多;第二,语言充满喜剧色彩和诙谐性;第三,语言具有明显的讽喻性,尤其人物会话上。

《西游记》全书分为100回,前七回描述的是孙悟空的出世以及他大闹天宫的故事;第8-12回介绍的是玄奘的身世以及他去取经的原因及去取经前的准备;其余的88回主要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降妖除魔,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小说蕴含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涵盖了科技历法等文化信息,如小说开篇就有对十二地支的描写;第二,从诗、对话、人名、称谓、官衔、文化生活以及各种习俗方面也进行了文化信息的渗透;第三,大量的宗教方面的信息,确切的说,佛、儒、道三教思想的融合在小说中较好地呈现出来。

## 2. 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詹奈尔译本评述

### (1) 译者及其翻译风格

杨宪益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从小饱读四书五经,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深入透彻。戴乃迭是在中国出生、在英国教育滋养下成长起来的著名汉学家。杨戴两人中西结合、珠联璧合,在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翻译与传播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杨氏夫妇的大量译作不仅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们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特点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指导。

就翻译风格而言,杨戴夫妇主要是秉承忠实和通顺的原则,在尽可能地传达原作者的思想的同时,考虑到目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使译文保持了顺畅的特点。由于不同语言的起源、表现形式、社会效用等方面的原因,作者不得不采用多种翻译手法。因此,两人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手法,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所选文本 Pilgrimage to the west 第59回 Tripitaka is stopped by the Flaming Mountain ; Monkey Tries to Get the Palm - leaf Fan 是杨氏夫妇英译本《西游记》中的一回。

詹纳尔(W. J. F. Jenner),英国人,著名汉学家和小说翻译家,出生于英国伯明翰。他就读牛津大学期间,就已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学。在1963年到1965年间,他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作一名翻译工作者。此后,他又在英国利兹大学任教,主要教授

中国文学。詹纳尔的《西游记》英译本是众多译本里最完整、全面的全译本。他的《西游记》译本 Journey to the West 于1977年至1986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本文第59回 Sanzang's way is blocked at the Fiery Mountain ; Monkey first tries to borrow the plantain fan 选自其中一回。

就翻译风格而言,詹纳尔主要是遵循更加贴近于目标与读者阅读的原则,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且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詹纳尔译文相对于杨氏夫妇译文更加地道、生动,也更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规律,也更多地考虑了目标读者的地位。

### (2) 译本的语言文化特色及成因

《悟空借扇》第59回小说原文本是4段,是严格按照小说发展的情节(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展开故事的描写的。詹氏基本保持了原文的篇章结构,将其译成5段,结构紧凑严谨,形式上更加忠实于原文。而杨氏夫妇将原文结构灵活调整,译成了19段,也是基本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先后记叙的,同时采用对话式形式,清晰明了,通俗易懂,达到了虽与原文形不似但神似的译文效果。

就译本的语言文化特色而言,杨氏夫妇译本从语言上更加朴实,翻译尽可能的保持通顺与忠实。对于文中所含中国文化信息的翻译,作为在中国出生、饱读四书五经的翻译家来说,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到了中国文化信息的对外传播,因此他们的译文对于目标读者来说,更多的是保留了原著的文化特色,以求得中国文化最大限度的传扬国外。因此,两人译文多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手法。

对于英国籍翻译家詹纳尔来说,他的翻译目的无可异议——文化交流,即更多的是希望英语目标读者能够读懂译文并了解一些中国文化。他对于英语读者的阅读水平和兴趣以及接受能力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因此,他更多的是站在译文读者的角度进行翻译实践的。

对比研究发现,詹纳尔的译文语言相对更加的地道、生动,英语语言的表达更加符合英语表达规律和英语国家读者的阅读口味。因此,他主要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且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

## 二、翻译方法维度下的两种英译本之比较

翻译方法,主要是针对原语与目的语之间存

在的客观差异,译者在转换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策略。本文对比研究两种英译文,主要从语义翻译:表达中的选词、翻译的灵活性、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12处/例);词法翻译:转性译法、换形译法、增词译法、省词译法、具体译法、抽象译法(9处/例);句法翻译:转态译法、合句译法、换序译法(4处/例);成语与翻译(2例);标点符号与翻译(2例)这5个方面15个具体的翻译方法对比分析。

### 1. 语义翻译

例1 (标题)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杨译) Tripitaka is stopped by the Flaming Mountain ; Monkey Tries to Get the Palm - leaf Fan. <sup>[1](P.26)</sup>

(詹译) Sanzang's way is blocked at the Fiery Mountain ; Monkey first tries to borrow the plantain fan. <sup>[2](P.5)</sup>

清代翻译家严复认为优秀的译文就要做到“信、达、雅”,其中“信”即忠实于原文<sup>[3](P.23)</sup>。上例中,詹译严格遵循“信”的标准,将“一调”中的副词“一”译成“first”,小说中讲到孙悟空三调芭蕉扇,而节选篇是“一调”,詹在这里将它译出来了,非常忠于原文内容,符合“信”的标准,而杨译就不及此。另外,詹译语言相对地道生动,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读来朗朗上口。

例2 行者笑道,“嫂嫂勿得恹吝,是必借我使使。”

(杨译) Monkey laughed. “Don't be so mean, sister! You must lend it to me.” <sup>[1](P.26)</sup>

(詹译) “Don't be so stingy, sister - in - law,” said Monkey with a smile. You've got to lend me it. ” <sup>[2](P.5)</sup>

从选词角度分析,杨的“laugh”强调笑出声音,詹的“smile”是“微笑、小笑”,强调笑不出声。因此,laugh比smile强调的程度要深一些。另外,Smile显得平淡温和,与悟空形象不符,且此处又为名词,与原文不符,没有做到忠实于原文;而laugh以动词形式出现,既忠实于原文,且更能体现出悟空鬼机灵的性格。杨译“sister”,这个称呼很平实,就指“‘姐姐’再无特别含义;而詹sister - in - law表示“弟媳”、“嫂子”这种译法更忠实于原文。孙悟空与牛魔王曾是结拜兄弟,罗刹与牛魔王是夫妻,因此悟空称罗刹“嫂嫂”是符合中国人伦关系

的,同时悟空称罗刹“sister - in - law”也能间接反映出悟空讲义气、重情义的一面。关于句中“是必”一词,杨译成must,语气比詹的“You've got to”语气更加强烈,更能表现出悟空此次借扇决心之大,更適切一些

例3 使铁棒打着洞门叫道:“开门! 开门! 老孙来借扇子使使哩!”

(杨译) He banged on the gate with his iron staff and shouted, “Open up! Open up! I've come to borrow the fan.” <sup>[1](P.27)</sup>

(詹译) “Open up! Open up!” he shouted, hammering on the doors with his iron cudgel. “Monkey's here to borrow the fan!” <sup>[2](P.6)</sup>

上例中,两人将原文中的“打”分别译成了“bang”和“hammer”,都能够传达出故事当时要表达的内容,即孙悟空借扇速救师傅过火焰山的那份紧迫感与急切的心情。但相对而言,詹用“hammer”有反复敲打、连续击打(尤指发出大声)的意思,比“bang”(sth to hit sth in a way that makes a loud noise,也有猛击、重击的意思)敲打的“连续性”要深一些,更能体现出孙悟空当时急迫的心情以及他急躁的性格。从这点来讲,詹的译词更加准确。

例4 行者见他闭了门,却就弄个手段,拆开衣领,把定风丹噙在口中,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螾虫儿,从他门隙处钻进。

(杨译) When Monkey saw that she had closed the gate, he decided to play a trick. Having taken the wind - calming pill from his collar and put it in his mouth, he transformed himself into a tiny gnat and squeezed through a crack in the gate. <sup>[1](P.27)</sup>

(詹译) When Monkey saw this he used magic. He tore the lapel of his tunic open, put the Wind - fixing Pill in his mouth, shook himself, turned into the tiniest of insects, and squeezed in through the crack between the door. <sup>[2](P.6)</sup>

从语义翻译的角度来看,杨戴、詹都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既忠实原文,又能使读者准确地理解源文想传达的意思。如句中对“钻”的处理,都译成了“squeeze”,十分贴切,还能从侧面体现出孙悟空聪明机智、随机应变的个性。

例5 罗刹道,“孙行者,你在哪里弄术哩?”

(杨译) Rakshasa demanded, “what magic are you up to? Monkey ” <sup>[1](P.28)</sup>

(詹译) Raksasi asked. "I've never been able to do conjuring tricks, Sun the Novice?" [2](P.27)

以上例子里对“道”一词的译法不同,杨译“demand”,其意为“坚决、强烈要求”,詹译“ask”也有“要求、请求”之意,但 demand 要比 ask 的语气要强硬,并带有命令的口吻。相较而言,demand 更符合原文,也更能体现出罗刹当时惊慌失措的状态。另外,笔者认为,杨戴的译文更灵活一些,对副词“哪里”的处理,他们译成了“what”,表面意思虽与原文不符,但仔细斟酌,未尝不可,并且在整篇文中,读者也能够读懂它;相对来说,詹的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上下句衔接很灵活,也更准确一些。

## 2. 词法翻译

例6 行者辞了灵吉菩萨,驾筋斗云,径返翠云山,顷刻而至。

(杨译) So monkey left Lingji and somersaulted through the clouds straight back to mountain of Emerald Clouds, arriving there in next to no time. [1](P.30)

(詹译) Taking his leave of Lingji Monkey rode his somersault cloud straight back to Mountain Turquoise Cloud and was there in a moment. [2](P.29)

上例中,杨将“筋斗”译成了动词“somersault”,采用了转性译法,既符合原文,同时也符合语言中的使用规律(名词动用),较地道;而詹将其作为名词与 ride 连用,也是符合原文要表达的意思的,比较灵活贴切。此外,针对句中“行者”一词,杨詹二人都采用了换形译法的手段,译成“monkey”。但这样译既不忠于原文,又丢失了源文化的特色,给读者一种含文化歧视的意味。虽说孙悟空是猴子身,但作者赋予它了人的特性,且是一只只有思想又非常聪明的猴子。如果对“猴子”的翻译在 monkey 基础上再作进一步注释(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翻译 1、monkey,注:This monkey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other monkeys which is a kind-hearted, caring, brave, loyal, alert and thoughtful monkey; 2、The monk or Buddhist who isn't taken part in the tonsure ceremony)或采用其他翻译(如音译 Sung Xingzhe),或更加准确,更富文化蕴涵。

例7 慌得那门里女童即忙来报:“奶奶,借扇子的又来了!”

(杨译) The panic-stricken maid inside rushed to report to her mistress, "That man is back again to borrow the fan. [1](P.31)

(詹译) This so alarmed the servant girl inside the doors that she ran back and reported, "Your Highness, he's here to borrow the fan again." [2](P.30)

上例中,从译文整体看,两种译文都比较灵活,尤其体现在其词性转换上,均采用了转性译法的翻译法,将源文的“慌得”分别译作了“女童”的定语,即“panic-stricken”和“This so alarmed”,这是符合英文表达顺序的,也比较通顺流畅。相对而言,杨译更好一些,更能体现出源文中女仆被吓被恐的神态。另外,杨译对文中“女童”介词定语“门里”一词省略,不过对整句无影响;他们将采用增词译法给“报”一词增加了宾语“her mistress”,显得比较具体也符合英文表达习惯;而詹对此词的处理是完全忠于源文的。此外,詹将文中“奶奶”一词译成“Your Highness”,相比“her mistress”(此用法普通且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现代意义的称呼)能够体现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严格(即便是妖界也如此,更何况人间);最后,詹将源文中副词“又”也译出了,这是忠实源文的,也与后文罗刹的话相照应(此次借扇并非一调,而是又借),其实也能从侧面体现出悟空借扇百折不挠、坚定不移的精神。

例8 那罗刹又扇两扇,果然不动。罗刹慌了,急收宝贝,转回走入洞里……

(杨译) She fanned again and yet again, but sure enough Monkey didn't move. Then Rakshasa lost her head and putting away her magic fan turned and fled into the cave. [1](P.32)

(詹译) She fanned twice more and still he didn't move. By now she was so alarmed that she put her pride and joy away at once, went straight back into the cave... [2](P.31)

上例中杨译“宝贝”与詹译“宝贝”译法各不相同,杨译“magic fan”,采用的是具体译法,也是直译,使之一目了然、浅显易懂。另外,用 magic 修饰 fan,又属增词译法,且与前文罗刹“一扇再扇”呼应,更能体现出此扇的特别之处;而詹译“pride and joy”,是意译,同时也采用了抽象译法,也能够体现出扇子的“别样价值”。文中“走入”一词,杨译“fled into”,詹译“go straight back”,杨的译法更能体现出罗刹惊慌失措、急于逃走的状态,相比更生动,也更符合原文。

### 3. 句法翻译

例9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杨译) Tripitaka is stopped by the Flaming Mountain ; Monkey Tries to Get the Palm - leaf Fan. [1](P.26)

(詹译) Sanzang' s way is blocked at the Fiery Mountain ; Monkey first tries to borrow the plantain fan. [2](P.5)

上例中,两种译文都采用了转态译法,将原文中的主动语态译成了被动语态,这是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的。同时能将原文要传达的意思恰当的表达,使读者读起来很顺畅。另外,这两种译文都是主句为主动语态,从句为被动语态。实质上,詹译更贴切一些,如加了“way”(是路被堵)和副词“一”的翻译“first”,更符合原文,也更能体现出语言的准确性。

例10 行者辞了灵吉菩萨,驾筋斗云,径返翠云山,顷刻而至。

(杨译) So monkey left Lingji and somersaulted through the clouds straight back to mountain of Emerald Clouds, arriving there in next to no time. [1](P.30)

(詹译) Taking his leave of Lingji Monkey rode his somersault cloud straight back to Mountain Turquoise Cloud and was there in a moment. [2](P.29)

上例中,杨戴译成此句采用了合句译法,给整个句子加了一连词“so”,使句子变成了状语从句。这样译符合原文逻辑关系,也比较顺畅,更有利于读者阅读。

例11 罗刹闻言,心中悚惧道,这泼猴真有本事,我的宝贝,扇着人,要去四万八千里,方能停止;他怎么才吹去就回来也?这番等我一连扇他两三扇,教他找不着归路。”

(杨译) Alarmed to hear this, Rakshasa thought, “That wretched - ape certainly knows a trick or two! My treasure fans men eighty - four thousand li without stopping, how did he manage to get back so soon! This time I' ll wave my fan at him two or three times, so that he can' t find his way back. ” [1](P.30)

(詹译) The news frightened Rakshasa , who thought, “That dammed Monkey really has got some powers, if I fan anyone else with my treasure they go 27,000 miles before stopping . How can he be back so soon after being blown away! This time I' ll fan

him two or three times and he' ll never be able to find his way back here. ” [2](P.29)

上例两人译法不同,杨译是按照正常语序的翻译;而詹采用换序译法,将原文中的主语进行语序调换,即将源文中的成分在译文时进行了结构或顺序的调整(此处是主语的换序),将源文的主语“罗刹”在译时换成了“言”即“The news”,这样既符合原文表达的意思,也使译文做到最大程度上的通顺,更贴近目标读者。

例12 行者道:“嫂嫂休得推辞,我再送你个点心充饥!”

(杨译) “Don' t stand on ceremony , sister! Monkey continued, “Here' s some cake to stay your hunger!” [1](P.33)

(詹译) “Don' t try to say no, sister - in - law”, Monkey then said. “I am going you a pastry in case you are hungry. ” [2](P.32)

上例中,两种译文对源句的处理都采用了换序译法,即将源文中的插入语“行者道”进行顺序的调整,放在了两句话衔接之间,这在译文上是忠于源文的,同时也更加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

### 4. 成语与翻译

例13 行者道:“我是个至诚有余的君子。”

(杨译) I am a very honest gentleman. [1](P.34)

(詹译) I give you my word as a gentleman. [2](P.33)

上例中,杨译对成语(至诚有余)的翻译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法,用“honest”既能说明悟空自己不仅在言语上是至诚之人,在行动上也是至诚的人;而詹译 give one' s word 表承诺、答应,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但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笔者认为,此处翻译的话应为:我向你承诺我是一个君子。这是没有确切的翻译到“至诚有余”这个成语的。因此,杨的译文更忠实于原文,也保留了其文化内涵。

例14 (行者)巍然不动。

(杨译) stood immovable as a rock. [1](P.34)

(詹译) stood unmoved. [2](P.33)

上例中,从译文中看出,詹译中规中矩,无特别之处。相对而言,杨译更加优美一些(可达“雅”的标准),采用了比喻手法,将行者不动时的样子比成坚石一般,也从侧面体现出当时悟空镇定自若的状态以及这种状态与前文中“定风丹”的呼应。

## 5. 标点符号与翻译

例 15 罗刹又骂道：“泼猢狲，你好没道理，没分晓！夺子之仇，尚未报得；借扇之意，岂得如心！你不要走！吃我老娘一剑！”

(杨译): “You scoundrelly baboon! The idea! ” Swore Rakshasa. “What impudence! You haven’t yet paid for taking away my son, and now you want borrow my fan – not likely! …” [1](P.36)

(詹译): “Dammed macaque,” Rakshasa shouted back. “You’ve outrageous, and you understand nothing, I’ve got to avenge the loss of my son, so how could I possibly be prepared to lend you my fan? …” [2](P.35)

上例中，杨译多处用到感叹号，表达的感情非常强烈，充分体现了当时罗刹失子及其痛恨悟空的心情，非常符合源文要传达的思想；而詹译运用的是反问的语气，虽说也表达出源文的本意，但语气显然比感叹句表达的要弱，因此杨译更忠实于原文，也更准确。

例 16 急纵身，结束整齐，双手提剑，走出门来道：“孙行者，你不怕我，又来寻死！”

(杨译): She hastily got up, buckled on her armour and picked up her two swords. Reaching the gat she shouted, “So you aren’t afraid of me, Monkey! You’re come back to be killed.” [1](P.33)

(詹译): She sprang to her feet, tied all her armour firmly on, and went out of the cave with her swords in her hands shouting, “Sun the novice, aren’t you afraid of me? Why have you come back here to get yourself killed” [2](P.32)

针对小说中罗刹的语言，杨戴二人将其以感叹句的语气、陈述句的语序翻译，这样既与源文相符合，并且也能体现出罗刹因失子对孙悟空的厌恶程度之深；而詹将此句以疑问句的语序翻译，虽是反义疑问句句式（也符合源文，句意表肯定），但相比杨译，这种译文表达出的情绪不够强烈。因此，杨译更忠实于原作、更加生动。

## 6. 行文格式与翻译

针对译文的行文格式，笔者从段落、句数、字数、标点符号等四个方面对杨译与詹译作如下对比：

杨译文与詹译文行文格式对比表

比较版本	原文	杨译	詹译
段落	4	19	5
句数	40	48	55
字数	1100 个汉字	812 个英语单词	897 个英语单词
标点符号	75 个逗号， 30 个句号， 21 个冒号， 5 个问号， 26 个感叹号， 22 个双引号， 共 179 个	48 个逗号，46 个句号，4 个问号，18 个感叹号，25 个双引号，共 141 个	59 个逗号，61 个句号，6 个问号，1 个感叹号，28 个双引号，共 155 个

通过以上表格，我们可以发现杨译和詹译行文上大体是很相似的。但就具体词数、句数而言，杨译版本在形式上更为简洁，句型更加简短；从段落方面来说，詹译更忠实于原文；从标点符号的使用上来讲，逗号、句号、问号、双引号的使用频率基本一致，单就感叹号的使用状况而言，杨译版本的感叹号使用次数大大超过詹译版本，这表明杨译版本中人物对话语气都比较利落干脆，说话直接，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孙悟空和铁扇公主行事果断、言辞犀利的人物性格。

### [ 参 考 文 献 ]

- [1] 杨宪益，戴乃迭. 西游记(选译)[M]. 北京: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1960.
- [2] 詹纳尔(Jenner, W. J. F). 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3.
- [3] 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南山)

# “去英语化”时代高校英语教师出路探析

王春梅

(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淮安 223003)

**[摘要]** 伴随着高考改革,高校大学英语改革及高校职业教育化转型,“去英语化”时代已悄然降临,它给大学英语老师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大学英语教师只有从提高教学水平,提升学历层次,加强科研能力和改进教学手段等方面来自我提高,找到自身与学科的方向与出路。

**[关键词]** 去英语化; 大学; 英语; 教师; 出路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4)12-0120-04

## 一、引言

新千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又先后举办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2014年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英语的地位与作用毋庸置疑。其实,中国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学习英语的热度不断攀升也是有目共睹,可以说是举世瞩目,中国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EFL(英语作为外语学习)国家。

几十年间,在各级考试棒的直接指引下,英语学习受到了家长、教师和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持续关注与追捧,学习者学习英语的年龄在持续下降,英语学习市场在不断壮大。虽然我国的英语学习时常因为“哑巴英语”“费时低效”而被国人诟病,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年轻一代的整体英语水平较之父辈已然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 二、“去英语化”时代的来临

英语学习在风光了数十年后,由于高考政策的转变加之高校如火如荼进行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无用论”不时甚嚣尘上,其学科地位与课时面临大幅度的下滑,“去英语化”时代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促成这一局面的形成有三大因素:

### 1. 高考政策调整的新趋势

2014年上半年,全国多个省市纷纷出台新的

高考政策,纷纷要拿英语“下刀”进行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并随即公布了具体的实施时刻表。英语在高考中所占权重的降低,甚至不被计入高考总分,势必会影响到课堂内外的英语学习,给持续多年的英语学习热快速降温。

尽管教师、家长和学生三方对改革反应不一,但激烈的争执与讨论不能阻止高考“去英语化”时代的悄然到来:2014年,山东省高考改革已确定在保留英语150分和120分钟考试时间的基础上,将取消英语听力题型;从2015年开始,江苏省高考英语将实行一年两考,英语成绩不再计入总分,而是以等级的形式计入高考成绩;2016年北京市高考中英语总分将会从150分下降到100分。

高考政策的调整短期内不会带来暴风骤雨般的变化,但长此以往,学校方面对英语课程的设置,家长对英语的重视程度,教育市场以及社会对英语的期待都会不可避免地倾轧,其趋势不容小觑。

### 2.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直接后果

高考的反拨效应是迅速而灵敏的,但高校在削减英语课时的这一问题上这次走在了义务教育的前面:自2003年开始,新一轮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在国内范围内的高校中相继进行,涉及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评价方式等多个方面。

**[收稿日期]** 2014-10-20

**[作者简介]** 王春梅,女,江苏淮安人,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国内的“985”院校率先大幅度削减了大学英语课程,北大、复旦、南开保留了8-9学分的英语必修课,而清华和上海交大则力度更大,仅保留了4-6个学分的该类课程。海南大学宣布从2013年秋季学年开始,只要求新生第一学年必修大学英语,两学期共计8个学分,这仅是对上一届要求的一半;其他的本科院校也在压缩英语类课程,如淮阴工学院从本世纪初的16-17个学分逐渐减少到现有的12个学分。

追根溯源,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也是和我国义务制教学阶段及高中阶段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密不可分。根据最新的2013版《全日制普通高中英语新课程标准》,高中生的英语课程水平分为六、七、八、九四个等级,完成七级目标即达到毕业要求,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能掌握“4500个左右的单词和一定数量的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这已很接近2007版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对大学生的一般要求:“掌握的词汇量应达到约4795个单词和700个词组”。此外,高中教学改革也促使高校的改革要力度加大,高中英语同样分割为必修课与选修课两大块,选修课开设范围广泛,有语言知识类,有文化类,也有欣赏类,“几乎把现在大学英语的所有课程都移植了过去”。<sup>[1](P.22)</sup>

现在的高中英语教学不再是往昔单纯的语法和练习训练,它已经将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纳入教学目标,不仅关注语言能力,更关心学生的自学能力与自我合作能力。可以说,高中生英语水平的普遍提高是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基础与前提。

### 3. 宏观政策的必然产物

在2014年3月22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教育部将促使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随后,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表示,“国家将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并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

目前,我国现有普通高等院校共1200所左右,其中一半的高校要进行转型,而且不排除名牌的

“985”和“211”高校进行转型的可能性。高校的转型势必会带动各专业的培养大纲、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变动,致力于通识教育的大学英语课程很可能被更贴近专业的相关课程所取代,从而更有利于培养应用型与职业型的新型人才。

### 三、大学英语老师的现状

自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我国高校招生规模数年间节节攀升,扩招前的1998年全国大学共招生100余万,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几年不停被翻番,2001年、2002年、2004年、2005年的招生规模逐一轻松突破了200万、300万、400万和500万大关,扩招至今还在继续,但速度已明显放缓。大学英语教师扩充的脚步赶不上扩招的步伐,大学英语的师生比从1998年的50:1,到2001年的130:1<sup>[2](P.128)</sup>,在到2008年的148:1<sup>[3](P.12)</sup>,在这么大的基数之上,全国大学英语老师也是为数众多。

高校大学英语教师整体的学历学位层次有所提高,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2001年教师的硕博比分别为21.9%、0.3%,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增长为60.1%、1.5%<sup>[4](P.4)</sup>。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大学英语教师中硕士已经占了六成,博士也有所增加,但比例依然维持在低位,与其他学科普遍博士化尚有很大差距。此外,高级职称的比例也偏低,教授与副教授的比例分别为3.3%和22.6%,两者总和只占全体英语教师的四分之一有余,学历与职称这两个方面制约着高校大学英语教师的发展。

此外,大学英语教师强烈的自我发展与学习的愿望与进修资源匮乏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根据周燕的一项调查,高校英语教师的职业满意度较高(67%),但对自己的收入普遍不满意(68%),教师非常渴望得到进修的机会,47%的受访教师抱怨没有进修机会,44%的教师反应课务繁重,19%的教师自工作以来一次也没接受过进修,61%的教师仅获得一次进修的机会<sup>[5](P.207)</sup>。

大学英语教师面向的是各个专业的学生,他们有着参差不齐的英语基础,各不相同的学习预期与不同的英语需求,这都给大学英语教师带来了挑战。与此同时,缩水的课时,论文发表的艰辛,比工科更难申请到的课题让高校英语教师发展的道路举步维艰,大学英语教师的发展道路充满了变数与不确定性。

#### 四、大学英语教师的发展展望

在“去英语化”时代到来之际,现在的大学英语教师不进则退,要么完善自身,提高迎接新形势给予的挑战,要么黯然落幕,离开教学岗位。大学英语教师的能力由三个部分组成:英语能力、研究能力与教育技术能力<sup>[4](P.5)</sup>,大学英语教师应进一步扎实和拓宽自己的英语能力,重视和着手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加强自己的教育技术能力,做到与时俱进。

##### 1. 夯实英语能力,拓宽授课范围

近年来,外语界对于大学英语应走 EGP(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即通用英语)道路还是走 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即特殊用途英语)道路存在着诸多的争论,这种辩论归根结底是大学英语的性质之争,是大学英语的人文性、工具性与专业性到底孰重孰轻之争。面对当前高中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现状以及国家的宏观政策,大学英语侧重工具性与专业性的趋势会逐渐明朗,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即行业英语)在整个大学英语体系中的比例会有所增加。

EOP 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它总是与特定的行业紧紧相连,常见的有文秘英语、旅游英语、商务英语、法律英语、化工英语、物流英语、机械英语等。对于绝大多数出身于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师来说,文秘英语、旅游英语、商务英语和法律英语通过自学与在职培训即可上手,而专业性较强的化工英语、生物英语对于缺乏专业知识的大学英语教师来说绝非一朝一夕即可掌握,它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跨专业的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这类课程给任课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学英语教师要不断进修以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和拓宽授课的范围,进修可以是脱产的也可以是在职的,既可以通过面授形式也可以是通过网络在线学习的形式。

大学英语教师中博士的比例很低,一方面因为国内招生英语类的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本身就有限,另一方面因为很多高校都限制英语教师跨专业读博,使得很多跨专业的课程缺少胜任的主讲教师。针对这一突出的矛盾,王守仁呼吁高校放宽对青年教师考博的限制,鼓励更多的英语出身的教师跨专业读博,一来可以提高大学英语教师的学历层次,二来也可以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为新形势下大学英语教学提供更坚实的师资

保障<sup>[4][5]</sup>。

##### 2. 加强科研意识,深挖科研能力

人们时常把教学和科研比喻成人的两条腿,教学是大学英语老师的长腿,科研则是短腿。本世纪初高校扩招后,大学英语课程需求陡增,教师的教学任务繁重,诸多大学英语教师疲于奔命,游走于各课堂之间,课后还要进行备课与作业批改工作。这一时期,高校对教师的科研也未做过多的要求,常常以课时及课堂受欢迎程度来评价教师,教师的科研意识普遍淡漠,仅有少数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兼顾科研工作。周燕面对高校英语教师做过的一个相关调查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对于“一个好的英语教师不一定非要会搞科研”这样的命题,表示认同或基本认同的占 38%,不置可否的占 13%,对此表示不同意或基本不同意不足一半(49%)。<sup>[6]</sup>

近几年,由于师资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后大学英语的学时与学分不断削减,广大的一线教师的教学压力得到了缓解,周课时不再是以往的十几二十节,回落到了周平均课时 8-12 节,教师得到了比较充足的做科研的时间。此外,高校开始抓科研工作,把科研能力列入到教学评优、年终评优、职称评聘中,从外部逼迫教师重视科研工作,形式也不拘泥于发表学术论文,鼓励更多的教师申报校级、市级、省级甚至国家级别的各类项目与课题。

科研能力是新时期衡量一个大学教师能力的重要指标,它也是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瓶颈。现在,大多数的大学英语老师都拥有硕士学位,他们都有自己做毕业论文的经历和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为他们进一步进行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个人科研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一个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科研团队或学科组,个人从中可以学习到课题申报从题目甄选、收集资料、撰写申报表、开展研究、写研究报告或发表研究论文等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有助于个人今后独立开展课题申报与主持课题研究工作。当然,大学英语教师也从自己教授的阅读、听力、口语等课程中选题也是非常好的开展科研的方式,教学理论来自于教学实践,最终又反哺课堂,这正体现了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的作用。

想要把握自己关注领域最新的发展与研究方向,定期参加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也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社会关起门来搞研究已经行不通,新的研究

的思路和想法往往都产生于不同研究方法、手段、切入点等的交流与碰撞,多参加学术研讨会有利于拓宽研究者的思路,在学术交流中找到创新点与新的研究课题。

### 3. 提高教育技术能力,为教学提供更优质服务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要求各高校采用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教学模式,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构建多元化的学习模式。现在大学英语改革的趋势是逐步减少面授课时,稳步增加网络学习时间,教师提供在线答疑,并监督学生按时完成布置的任务与作业,也为最终的成绩评定提供客观依据。由此可见,在信息化与网络化的社会中,高校英语教师如果不能熟练地掌握教育技术,就寸步难行。

先进的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可以给教师充当左膀右臂,做教师最得力的助教:语料库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可以很有说服力地帮助学生掌握某些易混淆词汇的用法,也可以了解地道的英语表达形式;批改英文作文对大学英语老师来说是一件非常耗时的的工作,现在借助计算机的批改能力,教师可以从改单词,改语法错误等形式方面的错误中解脱出来。以批改网为例,它可以准确地标示出哪个单词有误,哪句是中式英语,哪几句话有抄袭的嫌疑。教师不再把精力消耗在学生所犯的各种形式类的错误上,有了更多的精力来分析同学们共通的错误,也可以把目光投向更为宏观的谋篇布局,文章构思等方面。

提高教育技术水平不仅能使课堂气氛更活跃、教师的讲解更生动,还能把教师从教书匠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因为在现代社会教师不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生学习的监督

者、协助者,大学阶段的学习学生是真正的主体,教会大学生学习的方法是更为重要与有意义的。

## 五、结语

“去英语化”时代的迫近威胁了大学英语现有的公共基础课的学科地位,课时的一减再减使得原本工作量饱满的大学英语老师即将面临教学工作量不足的局面,它给大学英语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它也在提醒大学英语老师不要把大学英语老师简单等同于仅讲授大学英语的老师,大学英语老师要与时俱进,拓展讲授更符合学生兴趣与实际需要的外语类课程,拓宽学生的思路与眼界,把“授人以渔”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此外,高校英语教师也应提高自身学历层次,提升教学水平与手段,挖掘自身科研能力,这样才能化解“去英语化”时代到来所带来的挑战。

### [参考文献]

- [1]蔡基刚. ESP 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方向[J]. 外语界,2004(2).
- [2]王守仁. 高校大学外语教育发展报告(1978 - 2008)[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 [3]王海啸. 大学英语教师与教学情况调查分析[J]. 外语界,2009(4).
- [4]王守仁. 在构建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过程中建设教师队伍[J]. 外语界,2012(4).
- [5]王守仁. 关于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几点思考[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1).
- [6]周燕. 高校英语教师发展需求调查与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3).

(责任编辑 南山)

##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Hu Yuan's Educational Thoughts —A Case Study of Taizhou High School in Jiangsu Province

ZHANG Shu - jun

(*Party School of Tai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Abstract:** Hu Yuan's educational thoughts are valuable educational resources. Taizhou high school, the former site of Anding Academy where Hu Yuan gave lectures, inherits Hu Yuan'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carries forward the spirit of Hu Yuan. The school, regarding cultivating sensible and practical talents as the schooling philosophy, pays attention to formative education, advocates effective education and highlights quality education. Meanwhile, taking responsible education as the school mission, it lays emphasi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 the car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fine management. Moreover, the school further develops the reform spirit of Hu Yuan, and probes into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the new talent-cultivating mechanism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for student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chool.

**Key words:** Hu Yuan; educational thoughts; the current practice; Taizhou

##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for Nearly 30 Years

WANG Qian - wen, PENG Xiao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For nearly 30 years,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which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namely, overall research, research on historical figures and specialized research. Among them, the most prominent are th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theory,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ians as well as economic history. However, specialized research needs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nearly 30 year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research

## Ye Xie's Poetic View: "Harmony between Object and Subject Makes Poems Poetic"

QI Zhi - xiang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Abstract:** Ye Xi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s one of the few systematic aesthetic thinkers in ancient China, whose aesthetic ideology embodies in his works - The Origin of Poetry. From the standpoint that beauty is a sort of objective existence, he holds that poetry is a dynamic reflection of subject to object and puts forward a core proposition that "Harmony between object and subject makes poems poetic". In addition, he analyzes the three elements of object ("philosophy", "thing" and "emotion") and the four elements of subject ("knowledge", "guts", "talent" and "effort") and maintains such writing methods as delivering the ineffable and subtle philosophy, describing the things that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imagination and effusing the emotions hard to directly express, which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poetry. After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poems in all ages, he proposes that poetry does not have a particular style, neither does elegance. Ye Xie's aesthetics of poetry, with its meticulous thoughts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s of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aesthetic tre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harmon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Key words:** Ye Xie; poetics; harmony between object and subject

## The Deconstruction of Male Mythology in The Age of Innocence

SUN Xiao - ming, JIANG Li - f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11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Age of Innocence, Edith Wharton deconstructs male authority and mythology by inverting the roles of males and females in both the real world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women serve as the leading role; men as the subordinate role. Nonetheless, Wharton's deconstruction of male mythology is not complete due to her own limitations.

**Key words:** The Age of Innocence; Wharton; male mythology; deconstruction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Journey to the West

WANG Ye, LIU Zong - min

(*College of Primary Education,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1158, China*)

**Abstract:** Journey to the West, one of the four great classical novel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ten foreign languages. This paper do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erms of the two representative English versions, one of which is translated by China's famous translator Yang Xianyi and his wife Gladys B. Tayler and the other by the renowned sinologist and translator W. J. F. Jenner. These two version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Yang and Gladys' version adheres to the faithful and smooth translation style, mainly adopts literal translation supplemented by free translation and uses suc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s "foreignization goes first, domestication second", which retains more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while in Jenner's version domestication predominates over foreignization, which makes language relatively more authentic and vivid.

**Key words:** Journey to the West; source text; target text; comparison